TIBETOLOGY TRANSLATED TEXT

第十辑

#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二十世纪的西藏

#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辑）

张植荣　主　编
肖　蓉　副主编

西　藏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杨志国
封面设计　程跃飞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25 字数：300千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7—223—00585—8/Z·38
定价：5.60元

（藏）新登字01号

# 目　录

序：国外藏学的演变与特点　杨公素（1）
为何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吴天威著　杜永彬译（5）
西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地位　（苏）节昂列夫著　张方廉译（17）
中华民国时期的西藏　（苏）节昂列夫著　张方廉译（22）
古德使团与14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坐床　（英）阿拉斯塔·兰姆著　刘敬师译（90）
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　（法）亚历山大·达维·耐尔著　李凡斌　张道安译（122）
世界屋脊　（美）A·汤姆·格兰菲尔德著　何桂金译（148）
英国在西藏的扩张　（苏）节昂列夫著　张方廉译（174）
美国、西藏与中国　（美）N·C·霍尔著　成军译（286）
美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　克里斯·穆林著　张植荣译（305）
几乎被人遗忘的西藏冲突　T·D·奥尔曼著　刘敬师译（319）

美中央情报局操纵西藏叛乱

(日)高桥照著　欣华译(322)

西藏三十年

(美)琼·托伊蒂尔·德雷尔著　陈尧光译(327)

红星照耀香格里拉　T·D·奥尔曼著　刘敬师译(343)

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

(美)M·C·戈德斯坦著　扬凡译(348)

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

是谎言还是事实

(美)M·C·戈德斯坦　C·M·比尔著

张植荣　李扬凡译(373)

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

(美)M·C·戈德斯坦著　张植荣　肖荧译(396)

达赖喇嘛和美国　詹·安德生著　李有义译(442)

为西藏而斗争：利用宣传与公共

关系发动政治攻势

(美)A·汤姆·格兰菲尔德著　刘浩译(455)

中国与达赖喇嘛的对话(1978—1990)：是谈判前的

准备还是死胡同？

(藏族)达娃诺布著　肖蓉译(488)

编者赘语　(515)

# 序：国外藏学的演变与特点

杨公素

国外藏学对我国西藏历史、文化及宗教各方面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上半叶。那时开始，先后有几批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越过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地区传教。他们关于西藏的游记成为西方藏学的最早研究材料。但只是到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人乔玛之始，西方的藏学研究才真正肇端。乔玛曾旅行至拉达克，并终生从事西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研究。在他之后，西方对藏学的研究成为了东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殖民者东侵后，许多帝国主义分子也潜至西藏，从寺庙窃走大量文物、经书及藏文典籍。由于藏文原始资料的增加，西方藏学逐步走向深入。这个时期西方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究始于宗教和历史文化等内容，但直接服务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活动。例如乔玛本人就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的研究一方面推动了藏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客观上为殖民主义侵略西藏提供了依据。

进入二十世纪，特别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方对西藏的研究获得了重大进展。其研究范围已从原来的宗教、历史和文化方面扩展到藏医、藏历及西藏民间艺术。国外藏学家队伍壮大，藏学专著不断涌现，藏学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他们在继承早期藏学研究基础上开拓了许多新领域。尤其是

1959年达赖集团出逃后，一些上层人士和高僧受到西方学术机构的聘用，壮大并推动了国外藏学。他们出逃时携带了大量藏文图书档案和重要历史文献，成为当代国外藏学的重要资料。正是因为达赖集团在外的广泛研究和宣传，使得当代国外藏学具有不同以前的特点：

1.研究的焦点在政治问题上。他们著书立说，创办刊物，召开学术会议，游说世界。其中虽然有不少是纯学术的研究与探讨，但其主流包藏着祸心，他们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进行反共反华活动，为西方阵营利用西藏问题发动反华冷战寻找根据。这股研究，从1959年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到现在受雇于达赖集团的范普拉赫，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从国际法或国际关系的角度，歪曲中国历史，利用西藏问题，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前者依据流亡集团的材料，向联合国提供了所谓的“调查报告”，成为联合国搞第一个所谓“西藏问题”决议的重要根据。后者于1987年出版的《西藏地位》，则从法律角度为“藏独”论寻找一大堆“合法”的理论依据。

2.昔日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纷纷加入了藏学的行列，为分裂集团“歌功颂德”。黎吉生是其中的典型。此人是英国最后一任驻拉萨代表，在现代西藏史上，许多重要的分裂活动都是他出谋划策的。如西藏外交局（1942），泛亚会议（1947），驱汉事件（1949）等。西藏和平解放时，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被赶出了西藏。但是他对社会主义新西藏耿耿于怀。1959年10月，当他听说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关于西藏问题的辩论后，深感世人对西藏的陌生，于是写了一本《西藏简史》。这本书歪曲中国历史，妄图为“藏独”论寻找

历史根据，并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是“侵略和占领”。因黎吉生在西藏曾长期任职（1936～1950），他关于西藏的书被国外藏学奉为权威。达赖集团出版发行的反华刊物及声像带还请他当顾问。

3.因受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冷战的影响，国外藏学界对西藏的研究存在着较多错误的观点。在西藏的历史地位、民国时期的西藏、西藏的人权、西藏问题等方面，都有许多错误的认识，或者是故意的歪曲，用以攻击中国。而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他们或有掩饰，或为之辩护。对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视而不见，或歪曲报道，大叫什么“西藏人权问题”。

但是，在国外藏学界，也有不少追求真理、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们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认真探索，客观地介绍西藏，研究西藏，探讨西藏的未来与发展。其中有许多藏学家为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不远万里，排除阻力，深入西藏从事实地调查，并写出了有份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应推美国人类学家M·C·戈德斯坦教授。他曾深入西藏西部牧区生活达16个月之久。他的研究基于长期的实地考察，自然比范普拉赫之流的信口雌黄来得客观与真实。也正因为这些，戈德斯坦的研究受到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攻击。跟戈德斯坦教授一样实事求是、治学严谨的学者还有不少，如谭·格兰菲尔德、克里斯·穆林、节昂列夫等。

国外藏学界这股清新的学风正在兴起。它将对过去那种服务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研究形成强大冲击，并使国外藏学逐步走出误区。目前国内藏学界与国外藏学界的学术交流逐步展开。但是我们对国外研究的新成果介绍不够。北京

大学西藏研究小组有志于推动国内外藏学交流，组织翻译了这本译文集。集中的文章侧重反映二十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与地位；揭露英、俄、美等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与干涉；报道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问题；研究本世纪所谓的西藏问题的演变和西藏分裂集团近年来玩弄“西藏人权问题”的实质。这些文章持论有据，观点中肯，有益于国内藏学界更好地了解国外同行。

北京大学西藏研究小组是由几位青年学者组成的。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没有稳定的研究经费。凭着对祖国的满腔热血，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藏学研究，期图为西藏的发展和祖国的团结事业贡献绵帛之力。近几年来，研究小组的成员先后发表了不少成果，积累了大量资料，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他们有一个打算，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开展与国外藏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使更多的海外人士客观地认识西藏，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廓清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散布的诬蔑政府的种种谣言与流毒。与此同时，他们也想把国外藏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涉及二十世纪西藏的成果译介到国内来，帮助国内藏学界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国外藏学研究的动态。

作为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老同志，我为有更多的青年一代关心西藏，研究西藏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从工作岗位上退居二线后，一直从事藏学研究，并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外交和西藏研究等课程。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感到有责任鼓励小组的青年同志们继续研究，早出成果，出好成果。研究小组约请我为他们编译的这本书作序，乃欣然从命。是为序。

1992年11月写于北京

# 为何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吴天威 著 杜永彬 译

**编者按**：吴天威博士是美国伊利诺斯州卡本代尔南伊利诺大学教授。他在中国念完大学，于三十八年前到美国，在马里兰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从1972年起，他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至今。现将他在《中美论坛》1988年5月号第4期发表的文章刊载。本文从生态、历史、文化等角度考察了西藏的地位。

一般人都认为，西藏是一个遥远的佛教国家，是最后一片"香格里拉"（净土），它座落在世界屋脊。在人们脑海里所浮现的西藏往往是一片终年冰雪覆盖、寒冷，不开化和荒凉的土地，是难以到达的外部世界。事实上，自从西藏历史的黎明时代始，它就在各方面都是敞开着的，只是在本世纪上半叶，西藏才与中国中断了联系，这是由它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所造成的，而这种无能就成了对西藏产生种种误解的根源。这篇短文试图从生态、文化及西藏同中国关系的历史等方面阐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生态

我们头脑中的西藏自然图景所展示的是，西藏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面，它以圣城拉萨为中心。这一地区可称之为西藏本部。英国人、印度人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所称的西藏或“大西藏”，远远超出了“西藏本部”的范围，而除了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拉达克西部和阿萨姆北部的阿克赛钦边界地区这块中印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外，西藏南部边界是确定无疑的，也是明摆着的；西藏东部和北部的边界则是十分广阔和松驰的。自西向东，沿着昆仑山，于北纬79°、东经91°处转向北，穿越柴达木盆地，向东沿甘肃走廊抵达北纬103°处，然后向南折向四川；现今的西藏向南纵向切割了四川省三分之一的土地，这大约相当于旧日的康或喀木（近似于前西康省）。康属东藏，是大西藏的四大部分之一，其他三部分是青海、卫（内藏）和藏（外藏，包括被称为阿里的极西部地区）。藏区有250万平方公里，整个西藏高原包括西藏本部，青海、四川的三分之一，甘肃的六分之一，云南的十分之一的土地为藏族居住区，占全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提起西藏边界，人们就会想到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他于1914年代表西藏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了领土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青海全省被宣布为自治区（青海是建行省而不是自治区，译者注），由六个自治地区组成，其中五个为藏族聚区居，另一个既有藏族，也有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四川省有两个自治地区；甘肃和云南各有一个自治地区。这些自治地方，合起来比西藏本部还要略微大一些，共有46332平方英里，并且

这些自治地方的总人口远远多于西藏本部。据1982年中国的人口普查，西藏为1893393人，与青海一省的3895578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12000英尺；而以西藏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为最高，平均海拔18000英尺；在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脉之间的谷地，也就是雅鲁藏布江河谷、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海拔在12000英尺以下；西藏高原北部海拔在12000英尺以上，由几大山脉组成，即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等；再往北，则耸立着青海南部高原，平均海拔超过15000英尺；这些巨大的山脉东西绵延16000英里，（南北）宽400—500英里，耸立着许多支脉，构成了深谷和大河通道，著名的有长江、怒江（萨尔温江上游）、澜沧江（眉公河上游）和黄河，这些大江大河发源于青海、西藏，由众多的支流汇成，从而使整个西藏地形呈现出某些世界上非常独特的风景，这表明西藏并不仅仅是一个冰雪覆盖的荒凉世界。

虽然西藏的西北部是一片渺无人烟的荒漠，但是，在西藏内部，大部分地区气候复杂多样，动植物种类繁多，民族方言和习俗都不尽相同。而其种族构成则是相同的，尽管主要是蒙古利亚人和康人，其东北部有高加索人。近年来在西藏南部的聂拉木和东北部的昌都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而且，这些文化遗存与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甘肃、陕西和四川的一些地方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遥相呼应，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近年来，在西方盛行的错误观点认为西藏并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事实是，早在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766—1112年），羌人就已存在，他们生活在现在的甘肃、青海或邻近地区，其中许多人后来迁徙到了西藏，并同当地的土著民族融为一体，现在已难以分辨。但是，今天的西藏人的祖先与羌人有着亲缘的关系，尤其是被称为“发羌”的那一支羌人部落，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就曾多次提到。

西藏作为单独的政治实体出现在拉萨南部的雅鲁藏布江畔，是在公元六世纪，当时被中国人称作“吐蕃”，这个词显然来自“发羌”。位于中国土耳其斯坦边缘的敦煌石窟中所保存的文献，描述了九世纪以前西藏的发展史及其与中国唐朝的关系。

在祖辈创业的基础之上，松赞干布（618—650年）时，不但巩固了他在西藏的统治，而且还从四面八方发动了一系列征服邻国的战争，进而占据了青海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西北部和云南西部。因此而摆出了直接威胁中国唐朝（618—907年）的态势。后来虽然唐朝取得了对西藏人的胜利，并且把他们赶出了四川松潘地区，但是唐朝宁可姑息吐蕃而不愿同它再战，因而采取了处理民族关系的传统政策，于641年以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联姻，这是汉族文化开始影响西藏的标志。半个世纪以后的710年，唐朝金城公主与藏王墀德松赞（704—755年）联姻。安禄山起兵反唐之后，唐朝权势开始衰落，吐蕃趁机侵扰唐朝边境，进而攻占唐长安达十

二天之久。在吐蕃政权极盛时期，其边界向西扩展到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向北扩展到了甘肃走廊，向西南扩展到四川西北部，向东南扩展到云南西部的南诏王国。唐朝与西藏的友好关系随着823年“舅甥会盟”的建立而得到恢复，“盟约”保证，唐朝和西藏永远保持和平融洽的关系，并且划定了唐朝与吐蕃的边界。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克马洪线”就是以此为基础提出的。“盟约”的条文刻成石碑竖立在现在拉萨的大昭寺前面。

十世纪唐朝灭亡，与之相应的是吐蕃的分裂并进入封建割据时期。后来中国新兴的宋朝(960—1279年)继续给予吐蕃封建主和教主以特权地位和封爵。从宋代开始，中央王朝就受到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如契丹、女真以及北方的蒙古和西部的党项羌的威胁。党项羌具有繁荣、发达的文化，它与西夏王朝（1038—1227年）有着密切的关系。藏族在沙州（现敦煌）保卫西部边界，并成功地抵御了成吉思汗的进攻达三年之久，直到他们被蒙古军队完全征服为止。当西夏沦陷于蒙古之手时，党项羌的一支逃到了东藏，并在现乾宁和雅江地区建立了一个小王国，这个小王国延续了400多年，直到1700年才被清朝征服。

随着蒙古族的兴起，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成吉思汗1206年远征可可诺（青海），他在这里会晤了西藏代表，并接受了西藏向元朝的归附。1239年，成吉思汗之孙阔端率领蒙古大军进入西藏，从而完成了蒙古对西藏的征服。1247年西藏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同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一道到甘肃武威（当时的凉州，译者注）的蒙古军营与蒙古族统治者建立了联系。

忽必烈汗，这位后来的蒙古帝国的汗王和中国元朝皇帝，为年轻的八思巴（1235—1280年）和萨迦派所感动，1260年他刚建都就赐与八思巴“帝师”的封号，并要派他管理新建立的全国佛教机构，充任西藏政治事务的领袖，这是在西藏确立神权政治统治的开端。

明朝（1368—1644年）承接元朝，但它并未改变蒙古人对西藏的政策，继续向西藏封建贵族和佛教各派领袖封赐金印爵位，但不是象忽必烈那样只封授萨迦派，而是多封众建。更为重要的是，明朝与西藏间的供施制度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并出现了汉藏贸易的繁荣。

清朝（1644—1912年）建立，满族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满族统治者意识到了西藏喇嘛教，尤其是黄教（或称格鲁派）对蒙古人所产生的影响。蒙古政权刚建立不久，就把军队派到了西藏。后来，围绕五世达赖的继承人问题，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爆发了战争，并且导致了1720年满清王朝的军事干涉。接着，清朝在拉萨驻军，并吞并属于川、滇的康区，从而取得了对西藏的直接控制权。并且，满清统治者又把势力伸向外藏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阿里地区（这里由班禅喇嘛管辖，1600年，班禅喇嘛被宣布为转世活佛在札什伦布寺坐床任寺主）。这表明，在满清王朝确立统治的初期，就企图对西藏进行有效的控制，派驻军队于拉萨及北部的阿萨姆等就是实施其意图的有力措施。

即使在“民国”时期，在中国政权衰微时，袁世凯以及后来的蒋介石，都没有放弃西藏，并没有把它给与英国或印度的意图，众所周知，袁世凯拒绝接受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这就为中国后来否认以“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间的

分界线创造了条件。蒋介石当政时期，曾派遣了以吴忠信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西藏去管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即位典礼，从而消除了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种种误解。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胜过了历代中央王朝、蒙古族或满族对西藏的治理。自从1950年（应为1951年，译者注）中国军队开进西藏后，西藏当局在同年5月被迫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就大大增强了北京对西藏的控制。1956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建立，表明接管西藏的过渡阶段业已完成。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如象俄国共产党一样，宣称是无神论者，自然也就反对包括喇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这就损害了达赖喇嘛以及旧西藏统治集团的利益。中国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消灭封建社会，而在当时的中国，再没有比西藏更封建的社会了。在西藏，寺院领主和贵族仅占总人口的5%，而他们却统治和奴役着仍然生活在中世纪农奴制下的广大西藏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广大的西藏人民用委婉的术语“解放”比用于中国的其他民族更为恰当。在西藏的上层喇嘛和贵族领主看到自己统治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之时，他们便在当政时期千方百计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且四处求援，从而引起了美国、台湾的国民党和对西藏极为关注的印度的注意。结果，1959年爆发了公开起义，随后便发生了达赖喇嘛和旧西藏当局大多数逃亡印度的事件。从此，他们开始掀起了独立运动。后来，中国在西藏镇压反抗时又做过了头，“文革”期间，又给西藏带来了很大危害。台北和北京都谴责西藏独立运动和最近发生的拉萨骚乱事件（1987年10月），把这些事件看作是对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背叛。而

这些事件却得到了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一些同情和支持，原因很简单，就是流亡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要求保障人权和宗教自由，认为没有人能够剥夺这种权利，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在西藏的统治纪录却是如此之拙劣，以至使他们的人权保障成了一场笨拙的表演。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要保障西藏的人权，也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发展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应当被看作人类的文化遗产。

## 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如前所述，新石器时代西藏的考古研究已展示了西藏民族及其文化与中国相应时期的文化和民族有着亲缘关系。历史记载表明，自西藏有史以来就同内地有所接触。但是，直到公元六世纪在西藏南部所出现的一个统治实体已很发达时，中国和西藏之间才开始建立起正式的联系。如象日本那样，西藏从唐朝大量地吸收了汉文化，这决不是巧合，中国盛唐文化的灿烂辉煌在中世纪是举世无匹的。

641年，藏王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是中国文化传入西藏的标志。据说文成公主当时带去了1500名工匠，包括酿酒、纸、墨、铁匠、建筑等方面的工匠，还带了3800种农作物种籽和各种家禽家畜。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象农具、纺织、丝织、冶金等技术，随着历法、数学、医学等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当时必然会传入西藏。依照文成公主的要求，唐朝还送给西藏一些儒家经典，如《周礼》、诗集和文学作品，从而促进了西藏艺术和人们思维的发展。至

今，仍可看到中原文化对西藏的影响，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藏族代表人物，都确认西藏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事实。

而且，西藏佛教已引起西方许多人士的注意。佛教发源于印度，它是通过与松赞干布联姻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墀尊公主首次介绍到西藏的。据说文成公主在拉萨建立大昭寺，她为丰富藏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所作的伟大贡献至今还为广大的藏族人民所牢记。佛教传入以前，西藏有原始的本土宗教——"本教"，它与"萨满教"有些相似之处，并且还可能受到了"印度教"的影响。佛教传入后，佛本斗争就开始了，它们互相影响，彼此吸收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九世纪中叶。一个世纪以后，当佛教在西藏再度复兴时，它便采取了一般人称为喇嘛教的特殊形式。

一般认为，喇嘛教是怛特罗佛教(密宗)与本教信仰的某些特点相融合而形成的。密宗是以怛特罗佛经典为基础的，它崇拜女神，并且在其教派的宗教仪式中给予妇女以重要的地位。按照密宗仪轨，神应当强迫而不是通过正确的信条和幻术象征去进行劝说，但同时也不忽视思维技能的训练，不忽视瑜伽冥想的实践。1045年孟加拉学问高深的佛教徒阿底峡（982—1054年）被迎请入藏，他建立了噶当派，格鲁派即是从此派发展而来，后来成为达赖和班禅喇嘛的官方宗教（黄教）。

1073年，日喀则西南部昆氏家族建立了萨迦派，并为以后历代寺庙寺主提供了教规和寺庙。萨迦寺的第四代寺主大学者萨迦本钦，上述曾提到他同蒙古人进行了会晤。此后，萨迦派在西藏成为最具有宗教和统治支配地位的教派，直到

中国的蒙元王朝衰落，随后它的权力被十二世纪中叶所建立的噶举派所替代。噶举派有几大支系，并建立了许多寺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噶举派一支，其寺主于十三世纪提出并开始在该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为历代达赖和班禅喇嘛所遵循。

达赖和班禅喇嘛都属于宗喀巴（1357—1419年）于1409年建立的黄教。如象十一世纪噶当派的创建者阿底峡一样，宗喀巴强调戒律、独身和伦理道德，主张通过渐修以达到解脱和觉悟。他是黄教的建立者和改革者，在他的一生中，和其弟子们建立了甘丹、色拉、哲蚌三大著名寺庙，至今仍很有名。忽必烈汗虽然保护喇嘛教，但他这样做更多地是为了其政治得失，而不是由于蒙古人对喇嘛教的真正信仰。然而，在十六世纪晚期，西蒙古的俺答汗率其部下到青海定居，并在这里同哲蚌寺的寺主索南嘉措（1543—1588年）进行会晤。在此期间，俺答汗赐以索南嘉措第三世达赖喇嘛的封号，（蒙古语达赖意为“大海”），第一和第二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则分别留给宗喀巴弟子根登朱巴（1391—1474年）和根登嘉措（1475—1542年）。

1633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活佛在乌尔嘎（乌兰巴托）出现，喇嘛教开始在蒙古受到欢迎。和硕特蒙古在其领袖固始汗（1582—1654年）的领导下，占据柴达木和青海地区，他们属黄教。1642年，为了保护五世达赖喇嘛，固始汗派蒙古军队到西藏击败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对手——原来的噶玛派，因而保全了全西藏的黄教。但是，固始汗之子却成了西藏之王。

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蒙古与西藏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

加强。满族受到蒙古人的很大影响，以至他们最初把西藏事务委托给蒙古人。满清第一个皇帝于1653年在北京召见了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年），并授予他宗教权力，而不是政治权力。五世达赖喇嘛设立了班禅喇嘛办事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寺主罗桑确吉坚赞（1570—1662年）作为第一世班禅喇嘛（这是藏族学者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是第四世班禅——译者注）于1645年坐床任职。后来，满族统治者于1691年认可五世达赖喇嘛的大弟子，另一个叫做"呼图克图"的转世活佛在内蒙古多伦坐床登位，从而使蒙古喇嘛教取得了与西藏平等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转世活佛涌现出来。例如，在西康有八个呼图克图，青海有八个，新疆有三个，甘肃有一个。除了藏族和蒙古族外，在中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信仰喇嘛教，即土族、裕固族、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锡伯族、羌族和怒族等。

### 英国和印度的卷入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地理上相邻和历史的关联外，西藏与中国密切的文化联系使任何分离都是无意义的，也成为不可能。有趣的是，延续了四千年的全部印度史表明，印度曾经遭受到许多来自雅利安人和莫卧儿人的多次侵略，所有这些侵略都来自西北部的伊朗高原，没有一次来自喜马拉雅山北部的。正如难对付的帝国主义者之一的查尔斯·贝尔爵士评论的："西藏同印度的联系仅仅是凭籍于英国的存在，……一旦印度获得自治，西藏、不丹和锡金这些同印度在种族和宗教方面不同的国家，就会强烈地倾向中

国”。至于西藏，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曾说：“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我从来都没觉察到中国的主权，或者称为宗主权受到任何外国的挑战。”

## 人权

总之，企图否认中国在地理、生态、经济和文化的长期不断的联系是不可能的。这种联系可追溯到大约三千年以前。并且，西藏同中国的正式的政治联系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从地理政治学战略的角度来看，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中国需要确保喜马拉雅山中国一方（北方）它的后院的安全，就太无知了。自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后，藏族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封建束缚和迷信，开始看见了光明，并且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道路上享受到了社会和物质生活方面的进步。不幸的是，西藏还没有从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所造成的重大创伤中解脱出来。为了弥补这一过失，北京依据自己的财力给予西藏优惠待遇，目的在于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同汉族一样，藏族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西方式的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企图把西藏人民拉回到达赖喇嘛和旧贵族的统治下是不人道的，也是十分可怕的，他们既不懂得也不知道怎样在西藏实行民主和宗教自由。藏族应该生活得更好，人权应当得到保障，不仅是这一代，而且应该世世代代都如此。

# 西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地位

（苏）节昂列夫 著 张方廉 译

**编者按**：节昂列夫，苏联著名汉学家和东方学家。1956年他写了一本关于西藏历史的书，名为《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作者在自序中说，"作者的任务是要在这本小书中叙述从1888—1919年外国在中国的西藏地方进行扩张活动的经过；揭露这种活动的目的与伎俩；说明藏族人民为争取自由所作的英勇斗争及其在斗争过程中与伟大的汉族人民团结一致的重要意义。"这本小册子大量引用了俄文资料和英文资料，史料翔实、权威。俄文方面包括：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苏联科学院档案库、《红色档案》。英文方面包括：1886～1917年英国国会辩论报告、英国外交部关于西藏的史料组编、1889～1910年英国《兰皮书丛刊》中"有关西藏的文件"。书中还征引了英俄两国曾旅行西藏的探险者的大量日记、报告与传记，以及中国、印度、英、俄等国的有关杂志。

该书于1958年由张方廉译出，内部刊行。本文摘自该书中译本"引论"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

西藏自古以来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族和藏族人民的友谊可以溯源于古代。关于藏族最早的记载仅仅见于中国史籍①。

古时，藏族散居于现今的青海和西藏境内。正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汉族即与定居现今四川境内的藏族部落有了亲密的关系和交谊②。藏族从汉人输入“育蚕、造纸、制墨、酿酒、碾磑等等进步技术”③。他们从汉人学会制造陶器，调制乳脂干酪和纺纱织布。西藏使用的织布机也是从中原输入的。这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输入，都对西藏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两汉三国时代（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包括部分藏族，均为汉族所吸收同化④。从七世纪起，许多汉族学者应聘到西藏去。他们携往西藏的有天文、历算和许多重要书籍，其中有《诗经》、《左传》之类的古典著作。当时，西藏名门巨族的子弟也被派到唐朝学习。汉族文化传入西藏，促使西藏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藏汉两族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极为亲密。这就有理由认为，“从这个时候起，藏族即为伟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⑤。

到八世纪，唐朝与西藏之间的政治关系业已巩固起来。唐朝皇帝册封藏王以封号爵位；藏王也不断给中国宫廷纳贡，表示臣服之意。比丘林首先发表他在中国王朝的地舆志(《一统志》)中读到的唐朝皇帝与藏王在822年(长庆二年——译者)会盟的约文。这个“伟大的和永敦睦谊的”盟约充满互相尊重的精神。它是汉藏关系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文献⑥。

盟约全文刻于建立在拉萨的一座石碑上，迄今仍完整无缺[7]。但是，由于上述盟约与中国建立密切联系的西藏不久即因居于藏境之外的藏族部落的侵扰而陷于分裂。公元875年，这些部落的一位领袖拓拔思恭在中国现在的宁夏境内建立政权，为此后蔚为中亚大国的唐古特人的西夏国奠定基础。西夏的高度文化主要是接受于中国的，其文字与汉文相似。中国书籍，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至正朝仪》等[8]，均经译成西夏文。西夏国的文化系仿自中国这一点，经以研究中亚著称的科兹洛夫，在哈拉一霍托古城遗址指导发掘所得的考古学资料所证实[9]。另一部分藏族部落在青海甘肃一带建立吐蕃国，嗣后并入中国了。西夏国王曾经接受中国册封的“王号”[10]。这种情形，直至1227年西夏为成吉斯汗的大军所征服，旋被并入蒙古帝国以前，都没有什么变化。过了不久，西藏全境也并入蒙古帝国的版图。在1275年，元帝忽必烈授权萨迦寺八思巴喇嘛管理这个边陲地区之后，西藏始有政教合一的地方政府[11]。

西藏在八世纪始有喇嘛教。喇嘛教是流行的佛教教派之一，其教长于1576年获得“达赖喇嘛”的称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达赖喇嘛开始执掌西藏的地方政权。

清代管理西藏的大权集中于理藩院，该院组织条例写道：“西藏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即前藏、后藏。为了适应此种划分，宜派驻藏大臣两员前往……统辖西藏各级行政机关的大权委由该驻藏大臣等执掌”[12]。

驻藏大臣的制度起源于1727年(清雍正五年——译者)。所有西藏大小官员和各级喇嘛统归驻藏大臣管辖。无论民政或军事的处理均须受驻藏大臣的监督。西藏地方当局不得

与外国有公文来往，这是驻藏大臣的执掌。驻藏大臣监督西藏的税收和财务开支，各种公产亦归其管理。他们有权把任何不遵定制者交付法庭惩处。驻藏大臣的权力还不限于民政方面，他们还决定一切喇嘛寺院堪布的选任事宜，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选任事宜。达赖喇嘛充任西藏地方首长，须经清帝裁可。诚如比丘林译的那本《西藏纪事》所公正指出的那样，西藏属于中国，但有其"因时制宜，适合地方情况的政治机构"。

西藏全境分为几个大行政区。这些大行政区又是由53个行政单位——宗——组成的。综管后藏政教的班禅喇嘛是西藏仅次于达赖喇嘛的宗教教长，他驻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班禅喇嘛在西藏西南部的势力特别大。

在外国资本侵入的前夕，西藏内部生活的特点是农民与封建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西藏农民自有史以来即不断与压迫者进行自发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外国势力渗入西藏逐渐剧烈起来。与此同时，西藏封建主相互分为敌对集团的裂痕日深，使外人在西藏的阴谋诡计易于实现。

注释：

①俄国研究藏族历史的东方学者均极其推崇这些史籍。著名的俄国东方学家比丘林（19世纪时代俄国东方学杰出代表之一），在其根据中国史籍（《廿三史》、《通鉴纲目》、《一统志》）所编著的《西藏青海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除圣经以外，没有哪一本古代史对于古代各民族是象中国人对其四邻各族人民所作的记载那样，能追溯到切近其起源的。"

②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载《学习》杂志，1950年，第3卷，第1期。

③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北京1951年版，第129页。

④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

⑤张国华："西藏和平解放两周年"，载《人民中国》，俄文版，1953年，第10期。

⑥比丘林：《西藏青海史》，俄文版，第2部，第178页。

⑦刻著盟约的石碑向为英人所重视，他们企图任意曲解原文的精神。例如，在1904年有瓦德尔，1920年有柏尔，不久以前尚有李查逊，均曾仔细研究这个盟约的约文。据黎吉生说，柏尔，尤其是瓦德尔，在翻译和注解这个约文时，都把基本情况搞错了（见黎吉生著"拉萨的古代历史文告"）。

他们没有哪一个愿意找出盟约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只有比丘林才着重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会盟双方力求和平相处与团结一致。

⑧吕振羽著：《中国民族简史》，第131页。

⑨关于哈拉—霍托古城发掘所得的结果，可参阅科兹洛夫著的《蒙古、安多和哈拉—霍托古城遗址》。

⑩比丘林：《西藏青海史》，俄文版，第2部，第121页。

⑪神权政体的统治形式和大量寺庙——剥削西藏农民的最大封建中心——的星罗棋布是西藏封建制度的特点，它具有封建生产方式一切落后的特征：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直接生产者被赋予某些生产资料，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技术水平非常低下，等等。

⑫参看《清理藩部则例》，卷六十一。——译者

⑬卢华初（译音）：《西藏记事》。比丘林译自中文，圣彼得堡1828年版，第134页。

# 中华民国时期的西藏

（苏）节昂列夫 著　张方廉 译

**编者按：**节昂列夫在这篇文章中叙述了自辛亥革命到西藏和平解放这一段时期的西藏历史。文章侧重探讨了辛亥革命对西藏的影响，西姆拉会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西藏的政策。对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作者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在西藏方面借和平方式实现收复中国全部国土的爱国主义口号是英明的”，中国宪法所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将使“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及其他各族人民一道为自己祖国的繁荣而倔强地劳动”。

本文摘自《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三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 辛亥革命和西藏事变

辛亥革命在伟大中国人民的整个历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全世界的进步人士均欢迎中国的革命。布拉格会议“确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于解放亚洲和摧毁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都具有世界意义”，热情祝贺中国革命志士，表示万分兴奋和无限同情。“自这次革命以后，俄国无产阶级即不断关怀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1]。

反之，中国的革命却在欧洲资产阶级当中引起“掠夺中国、开始瓜分中国、攫取中国领土的欲望”[2]。辛亥革命之后，企图乘中国革命的机会，在西藏实行其种种阴谋的英国资产阶级，其所执行的政策正是如此。

武昌起义之前，广东、湖南、湖北等省曾先后发生反对清廷，反对帝国主义的骚动。其在四川省内，这种骚动竟演变成为武装起义。1911年9月初，全省大部分地区即已入于起义人士之手。

武昌爆发的革命浪潮，涌遍全国各地，直至最遥远的边陲地区。中国各族人民均紧随汉族人民之后，加紧致力摆脱殖民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清朝为全国各族人民所一致痛恨；汉人的革命运动是促使他们从事解放斗争的一股巨大力量。

1911年9月中旬，四川的省会成都被地方起义部队包围；中央当局不得不从西藏的几个邻省抽调军队到四川。在成都已为革命军克服之后，清廷的一位大员傅华丰在雅州集结军队反对革命。内战随之而起。

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的时候，几百名驻防西藏的汉族士兵起而拥护共和派。1911年11月，即有一些报纸评论拉萨汉族防军归附革命的事件[3]。驻守拉萨、江孜、日喀则、干坝、春丕谷等处的汉族士兵均拒不服从清廷任命的司令官。汉族士兵在西藏的起义使清廷在西藏的政权根本发生动摇，对藏人推翻其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国统治集团决计利用中国革命的局势，来巩固它在西藏的地位。准备工作原是早已做好了的。英国当局把套在尼泊尔、不丹、哲孟雄人民脖子上的殖民压迫的锁链拉得更

紧，多方剥夺各该属国土王的政治权力，并在邻接西藏的地区内修筑了几条道路。早在武昌起义开始的那一天，英国政府即已命令英印当局在北阿萨姆整备完毕的阿博尔远征兵团进军。这个兵团沿着由印至藏的两条军用道路之一（阿萨姆路线，从季布鲁加尔城沿西藏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而上）前进，使西藏有与中国内地断绝联系的危险。鲍威尔少校奉命为远征兵团的司令，所部包括几个独立分队，共计官兵2,000人，运伕约3,000名[4]。除阿博尔远征兵团以外，同时还从印度东北边境分兵向几个方面，如向洛希特河谷方面进军。1911年6月，《北京每日新闻》报写道：英人前往或侨居西藏的人数日见增加。目前，英人的总数已达13,000之众的庞大数字[5]。

英国的军事远征使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处境愈益困难，使中国各种离心力量的气焰，包括利用藏族人民解放运动的西藏亲英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起来[6]。

由于地区的落后，所以西藏没有一个先进的、能以领导群众斗争的有组织的阶级；农民既无组织行动的经验，又无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这就是运动的领导权必然落入封建主之手的原因所在。复因英帝国主义的横加干涉，使这个领导权尽为最热中于亲英而蓄意分立的西藏地方封建主集团所窃取，这种情况更便于达赖喇嘛集团中人乘机活动。1911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与俄国政府驻北京的参赞舍金谈话时说，"达赖喇嘛重返拉萨可能有利于西藏恢复秩序"，绝对不是偶然的[7]。达赖喇嘛回藏之后无疑会执行英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这一点是俄国一位驻印的外交官当时已公正指出的，这位外交官说道："当前英国已把对西藏计划当中本

质上虚有其名的角色交给达赖担任了。”[8]清朝的覆灭促使多数西藏封建主加入达赖的阵营。

英国当局从未停止干涉中国西藏方面的事务。中国的各种报纸，从1911年年初起，纷纷刊载中国官员由西藏发来的电报，揭发“英国不断煽惑喇嘛暴动”[9]。

最后，英国当局又派遣与达赖亲密的英国间谍纳姆岗[10]前往西藏，他就利用那些信仰达赖而早已配有英国武器的西藏地方部队，与忠于达赖的封建主一道，发动反抗中央政府的活动。

我们手头尚无详细说明在西藏历史上无疑是最为有趣的一点的各种资料。关于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之后，西藏接着发生的许多事件，其性质与规模究竟如何，当时的文献和报纸所记载的极不一致。中国成立共和国之后，流寓拉萨的汉族人士、商贾和官吏组成一种代议机关或会议，受权实行监督财政，批准年度预算，调阅驻藏大臣的文卷，在决定政务和立法问题时向其陈述意见，如果认为驻藏大臣所采取的措施会破坏或有碍社会管理，尚可抗议，必要时，尚可禁止其实施。会议机关有权监督任命文武官员的事宜。1912年3月初，拉萨发表告市民书，通知共和国业已宣告成立，政府各机关均已升起共和国的新五色国旗[11]。

各种消息都可说明专制王朝设在拉萨的西藏统治机构已向民主化方面实行某些改革。由于领导大权仍掌于驻藏大臣联豫和钟将军（钟颖——译者）之手，以及是年12月即发生中央防军要求开赴四川的骚动，足证这些改革只有表面的性质。

西藏统治机构上的改革对于藏族人民的生活没有什么意

义，因而绝无影响，他们依然视中央官吏为清朝的代表，视中央防军为维护清廷的武力。

由于清朝被推翻后，在西藏的"解放运动"发展的结果，这种运动被封建主由反清变为反汉，更被分立主义者用来搞脱离祖国的活动。

从1912年3月起，英国即对西藏的南疆，即距印度边境不远的地区，开始其军事行动。驻守江孜的少数中央防军最先受到西藏民兵的袭击，该城原系供英人贸易开辟的商埠，英国各色间谍云集，是英国在西藏驻军最多之地。经过几次接触之后，守军知道来攻者的人数甚众，自己又全无增援希望，所以于4月1日放下武器。至4月10日，日喀则的守军也被迫放下武器，一到4月中旬，汉人和藏人即在拉萨发生冲突，冲突逐渐向东扩展，蔓延到由拉萨通往中国内地的各条道路上。

至于这次"运动"的规模如何，各种文献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出入甚大。一方面，有肯定它是西藏的普遍"起义"，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事实证明它正好与此相反。例如，据1912年4月25日的《泰晤士报》说，好象"西藏居民现在几乎都已处于战斗状态"。但同样是英国人的许多作者却吐露了驳斥这种说法的消息，如喇嘛教徒不愿参加这种事变、封建集团内部极不一致、藏人反抗达赖喇嘛的命令和挺身维护汉人的种种事实。

这时，班禅喇嘛本身，由于英国当局对达赖的这种赤裸裸的方针，他已逐渐转变为反对"阴险毒辣的"外国人的立场。英国驻哲孟雄和西藏的政治代表柏尔说到当时的情景这样写道："札什喇嘛（班禅喇嘛）的政府与汉人有秘密联

系，不援助拉萨，几至被武力强迫。”[12]柏尔指出说：“西藏最大的、拥有喇嘛10,000之众的哲蚌寺，在其几名堪布被处死以前，一直袒护汉人，甚至在这种严刑对待之后，也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肯支援达赖。登吉林寺院公开站在汉人方面战斗。”[13]喇嘛大众的这种立场证实这次反对汉人的行动具有亲英的倾向。大多数的喇嘛始终视英人为有破坏喇嘛教本身基础和权力之虞的最凶恶的敌人。可见他们挺身反对拥护达赖亲英政策的人即是为了争取与中国内地统一而战斗。但受外国间谍煽动起来的战争仍然在汉人与西藏分立主义者的部队之间持续进行。英国当局迄未公开援助西藏分立主义者，他们认为可以用西藏人战胜西藏地方的汉族人。英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利益都集中在受革命势力笼罩的华南和华中，因而不敢公然反对中华民国[14]。

1912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命令，其中说明西藏当然系中华民国的领土，藏族人民系公认的中国公民。在西藏的管理方面，拟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俾能促进国家内政的统一和各族居民的团结”。命令表示，西藏事务的管理将与本部各省一样，由内务部主管[15]。这是在全国群众运动日益扩大的条件下，当时的总统袁世凯对中国民主党派及其领袖孙中山所作的让步。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3条载明：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和青海。西藏和其他各省一样，在议会占有五个代表席位。在中国政府历次的文告中，一直着重说明共和国保证给喇嘛平等权利，对他们施行任何强暴，均在严格禁止之列。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不愿放弃其对西藏的主权，是非常

明显的。当时英国当局决计公开武装援助西藏封建主中的亲英集团，在平定该地动乱所必要的幌子下，派兵前往西藏。1912年5月30日，《国光新闻》写道，英国借口保护本国商业利益，进军西藏，分驻各要害。早在5月15日，北京即已传出消息，中国外交部已要求英国公使制止英军侵入西藏。

是年6月间，中国方面尚不断报导拉萨中央守军与西藏地方军继续激战的消息。但从6月底起，守军即被迫逐渐缩小防区，因为他们没有生力军增援，而最重要的是没有军火补充。诚然，中国某报曾一度吐露，财政部长熊希龄已奉命由英国汇丰银行汇银10万两，以应拉萨守军急需的消息(16)。

英国政府干涉汉、藏两族人民相互关系的活动越来越露骨。

1912年6月24日，达赖喇嘛在流寓印度几达两年之后，由英人郑重其事地将其遣送回藏。这大概也是为了加强分立主义者的声势。

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是西藏地方政府亲英集团更加肆行无忌的信号。从西姆拉传来的消息说，凡同情汉人者均被杀害；登吉林寺长惨遭毒打，并被处以磔刑，

西藏东部的战事日趋激烈。是年6月，藏兵占据喇嘛丫和理塘两城，截断巴塘与区内各地的交通，也为夺取雅江创造了条件。西藏分立主义分子利用各省之间原无确定的境界，竟将广大地区并入西藏，借以提高他们的权势，扩大他们的封建剥削范围。

这些地区的居民大多数是非汉族的各族人民，常起骚动。清朝在其作垂死挣扎的年代里，仍在这些地区执行驱使这些民族反对汉人的政策；他们并始在这里进行移民，由满

族人员接替当地行政官吏，捐税繁苛，徭役不时，种种弊政，殆难尽述。但当地各级统治者——土司却对汉族的反感更大，他们反对共和国的一切改革；为了不让这些改革见诸实行，甚且不惜投靠英国[18]。

在以上种种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决定派兵入藏。中国学者刘贯一写道，北京政府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藏局糜烂”[19]。

1912年8月，中华民国的军队开抵理塘和巴塘。中国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号召恢复“西藏的秩序”，“不容外国（所谓外国即是暗指英国）侵占中国的土地”，否则四川、云南、贵州、甘肃、新疆和东方的和平均有遭受威胁的危险。另一方面，英国报纸也频频唆使英国政府公开干涉，维护分立主义分子，那就是说，从中国夺取西藏。

1912年8月中旬，英国政府又一次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英国驻华公使受权通知中国政府。说英国不承认中国有管辖西藏的权力，英国“不能容许任用汉人接替西藏的行政职位，不能容许袁世凯所公布的把西藏与中国内地各省等量齐观的说法”[20]。俄国驻英代办从伦敦发来的报告说：“英国表面上反对这样确定西藏的地位（即把西藏与中国内地各省同等看待——著者），究其实是反对中国增加驻防拉萨和西藏的现有军队员额。伦敦内阁警告以后要停止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取道印度的交通线，唯一例外是中国假道印度撤军回国。”[21]8月17日，中国外交部接到英国一份备忘录，其中声明，在英国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以前，决不承认中华民国[22]。

这份实际等于哀的美顿书的备忘录，是帝国主义列强对

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上述时期政治局势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各国动辙以武装干涉威胁中国，外国驻华军队不断增加员额。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上起了莫大的作用，他们在这个场合确是行动一致。

当中国政府因为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发生冲突，请求美国帮助时，美国统治集团竟以愿意对英国严守友好中立通知英国内阁。正如《新时代报》记者从伦敦发出的消息那样，华盛顿方面认为这是用来换取英国在巴拿马问题上的友好行动的[23]。

英国政府曾以有意干涉中国内政一事，预先通知美国，美国政府对此并未提出异议[24]。

日本对于西藏问题的立场取决于英日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经过重新审核修改，于1911年6月13日续订的。这个同盟的任务之一，是武装保护英日两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帝国主义利益和镇压足以威胁这些利益的各种进步力量。续订英日同盟条约签字的一周之后，俄国驻伦敦的外交官耶尔莫洛夫即发来报告说："按照英日同盟条约的精神"，如英国与中国断交，日本即应援助英国[25]，英国则须支持日本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声势日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作斗争。

由于某种国际性质的理由，帝俄政府原来不打算积极干预西藏问题。但当时没有俄国参加是不能解决西藏问题的。[26]

英国在西藏问题方面的种种无理要求激起中国全国的义愤，所有报刊一致表示极大的愤慨。俄国驻华公使写道："不管约翰·朱尔典先生如何极力向中国官方解释，说什么

英国的要求，仅仅只为了确认直至现在为止、根据中英两国间的各种条约、已在西藏造成的现状而已，但中国政府对于他的论据却不加理睬，尽管它已不得不命令军队停止入藏”[27]。袁世凯已下令兼程前进的中国军队停止入藏。显然，这应算是袁世凯对英国统治集团所作的让步，借以酬答英人同情其帝制自为的计划，并支援其反对中国民主党派的斗争。

英国当局于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其在西藏地方的权力之后，自己却续派新军入藏，实际已将西藏中部占领。据刘贯一写道："英帝却借口保商为名，竟由江孜派兵3,000，进驻拉萨。"[28]其实，据一位中国官员于1912年12月从西藏向北京报告说，英军入距拉萨的已有四个步兵团和三个骑兵团之众。在印度出版的英文报纸《先锋报》，为了证实英国的侵略行为这样写道："中国武装力量想在拉萨恢复优势的任何企图，必然会遭到英国政府方面武装力量的痛击。"[29]

英军驱逐中国部队，让他们取道印度边境退出西藏。英国当局不让中华民国政府派来与达赖喇嘛谈判的特使杨奋（译音）入藏，阻挠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直接交涉。《先锋报》写道：英帝国主义者急切盼望中国军队尽速撤出西藏，说明他们想使拉萨方面拥护中央、反对达赖政策的一派人失去支援[30]。据中国报纸报导，达赖已从英国当局方面获得巨款，用于扩充藏军员额，配备优良武器。他请求英国将西藏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源源输送武器、弹药和装备。1913年1月，各报甚至披露英国与西藏缔结的全约共分五条的秘密协定："第1条，英国承认西藏享有独立国家的一切权力，达赖喇嘛为藏人的宗教领袖。第2条，英国政府在西藏具有特

权，能在西藏境内设立电台和邮政机构。第3条，英国政府将在西藏驻扎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并帮助藏人建立西藏军队。第4条，英国将帮助西藏建立各级财政机构。第5条，自本约签订之后，中国将只享有精神上的（？——著者）权力，不得妨阻西藏执行其政治和司法权能。”(31)

尽管第1条就嚷嚷什么西藏独立，但这个“协定”的殖民性质，从上述的约文看来，是丝毫不容怀疑的。2月12日，《国光新闻》披露中国最高行政当局先一日晚间就西藏局势问题举行会议的消息。蒙藏委员会代表报告英国政府业已采取完全侵占西藏的种种方策。该会代表说，英国怀着这种野心，虽然也不断在外交方面耍花招，但却一直在西藏扩大英军的兵力。他证实英藏条约确已签订，按照该约的规定，西藏事实上已变为英国的属地，英国获得在西藏扩大军队员额到它认为必要的程度，获得在西藏修建铁路、设置邮政机构、勘查地下资源、改编警察和其他许多权利。讨论的结果，通过立即向英国驻华公使询问英国在西藏所取政策的目的何在。根据各报所引用的资料，当时英国驻在西藏的军队员额已达到6,270名的庞大数字(32)。英人在拉萨郊区兴建能容士兵10,000名的营房，大大扩展英国侨民区。他们不断将武器运入西藏，屡屡妨阻中国军队在邻接西藏各地区内的军事行动(33)。

西藏封建主中的亲英集团，仗着英帝国主义的力量，要在西藏中部为他们1910年的失败“实行报复”。分立主义者已将政权攫夺到手。据西藏首席噶伦朗钦·沙特拉以骄矜的口吻在印度对记者声明说，“拥护中国的那派人已经不再存在了”。虽然朗钦曾着重补充，说他们并未处死什么人，只

是把他们“分散到个别寺院”，让他们在那里“度着理想的生活，成为虔诚的喇嘛”[34]；但事实的真相，当然不限于此。例如，象把曾经帮助汉族的藏人大批枭首[35]这样的事，象捣毁天嘉林寺并没收其大量土地这样的事[36]，以及残酷虐杀擦绒噶伦和他的儿子、由拥护达赖的人将他们父子的尸体剁成肉泥这样的事，都是人所共知的[37]。

分立主义者一窃得政权，西藏——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与中国内地相隔绝，这绝非藏族人民之福，对于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害更大。

大家知道，要解决某个民族的构成问题，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均应从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环境条件等方面综合考虑。西藏的这次事件正发生于中国反对清廷的民主运动和辛亥革命（1911年）的高潮时期，必须从这个观点才能看清它的重要意义。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即令松懈一点点，也是与西藏劳动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上面曾经提到中国境内的汉族、藏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文化方面的共同性，提到他们之间相当密切的经济关系。从政治形势着眼，西藏分立对于西藏劳动人民特别不利。一经处于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内，西藏人民不可避免就要陷入英国剥削各族被压迫人民的体系当中。接替清朝的是英帝国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更加凶恶的死敌。就西藏人民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是与业已掀起革命斗争的汉族人民加强联系。只有汉族人民取得胜利，才能使藏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网罗中解放出来。

英国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其主要目标在于瓦解中国各族

人民的解放运动，支持中国的反动派。如果以为这种政策是由于英帝国主义者希望保持清廷的统治，那也是错误的。英国政策矛头所向是以英国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为依归的。汉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是一种威胁。他们多方支持封建余孽，因为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正是他们能在中国建立政治和经济统治的重要条件。英帝国主义者力图利用藏族反对清廷的活动，来激起他们走向脱离中国的叛乱。他们不断挑起汉族与藏族之间的民族纠纷，借以妨阻藏族与汉族团结于能够致封建制度于死亡的统一阵营之内。于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运动偷偷顶替了全国的、全民的斗争，这种狭隘的民族运动大有助于英帝国主义在西藏扩大势力，因为它把西藏人民注意的目标从与帝国主义殖民者作斗争、从与其最凶恶的敌人作斗争的方面转移开了。

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之后，英国殖民集团又一次利用西藏封建主的离心倾向，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西藏策动的反对汉族的动乱给中国增加了许多困难；而英帝国主义政府复利用中国的困难，力图夺取中国这一部分领土。

在辛亥革命时期，西藏业已与中国内地相隔离，英国殖民主义者从而屡屡阻挠它的民主化。这样就使有利于多数西藏人民的民族问题无法解决。

至于西藏能否在英国殖民体系之内发展经济和文化，那末，照我们看来，这是根本谈不上的。

这样一来，曾经以自己的斗争在重创英帝国主义的事业上作出过贡献的英勇的西藏人民，竟又落到英帝国主义殖民剥削的陷阱当中去了。

侵略西藏是英帝国主义者在这个时期用来瓦解中国和整

个东方革命运动的方法之一。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使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的革命行动不能联合起来。

英帝国主义者这个时期在西藏的切近计划究竟怎么样？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看一看英国议会的辩论报告。许多议员都关心于实现英国垄断组织的各种阴谋诡计。例如，某一名唤李斯的议员在1913年2月14日坦率地说出，他“希望能看见印度茶叶在西藏抛售”(38)。李斯极力怂恿乘中国革命的机会，扩大英国在西藏不纳税课、不受任何限制的贸易。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提请在西藏设置驻藏代表，为此，不能在诉诸武力的面前却步(39)。

许多议员都道出了英帝国主义者希望在西藏得到什么。洛依德·乔治用这样的词句表达这种希望：“我们希望在那里从事贸易，而且也希望准确地、经常地明了那里一切正在发生的事”(40)。在口是心非，捏词掩饰，硬说英国对西藏并无什么计划之后，洛依德·乔治接着说道：“但是我们有许多人都认为在拉萨设立领事的时机业已到来，因而我们应当与俄国谈判，修改英俄条约限制我们不得有代表驻拉萨的各项条款。”(41)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葛雷在为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作狡辩时，竟至责怪中国怀有侵略主义，表示英国政府深信此种干涉将可导致“西藏自治”(42)。英国国会议员中，有些人建议不到英国在西藏方面的要求均已得到满足时，切莫承认中华民国；另一些人则建议公开占领西藏。例如，雅捷上校发言的侵略性质即更为露骨，他建议将春丕谷合并于印度，使已将巴塘划入其境内的西藏，经由巴塘一线与中国内地隔绝起来(43)。

英国政府仗着国会的支持，又在西藏问题上转入新的攻势。但这一攻势却使局势更加复杂，连沙俄政府也牵涉进去了。这种局势的实质，在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于 1913 年4月25日致总理大臣科科乌采夫的书信里，谈得非常清楚。

这封信是因为达赖喇嘛请求俄英两国政府正式承认“西藏的独立”和“保护”写给总理大臣的。此外，达赖还请求给“西藏的不可侵犯性和中立地位作出新的保证”，以便“迫使中国放弃它的奢望”，并“按其他方式调整不再符合于1907年条约精神的既成局势”，那就是说，要把1907年条约向承认“西藏的独立自主”方面重新审订[44]。

萨佐诺夫在致科科乌采夫的信中说到达赖的这些请求时写道：“我国在西藏的利益非常有限，完全以俄属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归奉以达赖喇嘛为教长的喇嘛教这件事为基础。英国与俄国不同，它的属国印度是和西藏境界相接的。”萨佐诺夫往下写道：“因此，在1907年与英国政府调整英俄之间的一些最迫切问题时，帝国政府签定了一项特殊的英俄条约，该约的主旨在于承认西藏为中国的领土。这样，就在不牺牲俄国任何重大利益的条件下，我们给英人在西藏扩大势力设定了限界。”[45]

俄国统治集团明了，达赖请求关于西藏问题重新审订1907年的条约，用意在于英国要在中国的西藏扩大势力。因此，萨佐诺夫声明，尽管达赖有此请求，但俄国当然不应负发起谈判西藏问题的责任；这个发起的责任应当让英国当局承担。他着重指出说，谈判不会造成达赖喇嘛所希望的结果，那就是说，不会导致承认表示西藏已经不属于中国的“西藏独立”。至于英国统治集团方面，他们却认为这正是

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发动新攻势所要获得的结果。

## 西姆拉"三方"会议

英国殖民集团受了自己的政策在西藏着着胜利的鼓励，决定一俟适当的时机到来，首先的一着，是巩固这些胜利的成果；其次，也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一着，是进而对中国人民采取新的侵略行动。按照英国当局的阴险打算，无论是巩固胜利成果也好，无论是采取新侵略行动也好，均可乘中国政府不仅对西藏地方，而且对其他几省尚不能实行有效控制的时候（前者系受了英国当局的公开阻挠，后者亦应归咎于英帝国主义者的罪恶活动）[46]，即对其施加外交压力，定可如愿以偿。

为了解决业已拟定的课题和使英帝国主义的贪求取得表面的法律依据，英国所使用的外交策略是坚决主张召开有英国、中国和西藏代表参加的会议。英国资产阶级的刊物多方渲染，仿佛这个会议是解决汉人与藏人之间的各种争议问题所必需的，吹嘘会议可以变为"汉藏代表就西藏边界问题互相控诉，英国代表只在其中起仲裁作用"[47]。实际上，会议经过情形如下："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中旬在印度境内的西姆拉开幕。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虽然表面已作为独立的一方出席会议，但实际是个傀儡，只是一味支持英国的要求而已。英帝国主义者和窃据西藏地方政权的封建主双方的直接目标一致，和西藏地方当局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隶属地位在这次会议一开始时就完全暴露无遗了。

英国外交家，在"藏人利益"的幌子下，竭尽全力想使

这片辽阔的土地脱离中国。代表英国出席西姆拉会议的柏尔早已与西藏全权代表在江孜晤面，早已劝他把只要好歹能据以要求西藏独立和将中国其他各省土地并入藏境的文件统统都提出来[48]。显然，当时英国内阁所拟的提案业已脱稿，由西藏"首相"伦兴香托拉携往西姆拉出席会议。这些提案的内容，据柏尔书中所载大抵如下：给予西藏处理本身内政外交的权利，遇有对外关系问题与英国相商榷；中国从西藏撤回驻藏的全权代表、各级官吏和士兵。将新龙、德格、巴塘、理塘和直至打箭炉（康定）的土地，并入西藏疆域之内[49]。

根据另外的一些资料，在西姆拉会议上向中国全权代表提出的提案，更确切些说，是提出的要求，包括以下各点：

1.西藏必须成为独立国家。

2.西藏与中国的边界包括：由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脉往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省，甘肃西部、四川西部和云南北部。

3.西藏有权不以中国为转移与英国签订商约。

4.西藏境内不应再有中国的机关和军队。

5.中国承认达赖喇嘛是中国和蒙古境内佛教团体的领袖。

6.中国赔偿西藏政府和居民所受的损失[50]。

中国全权代表提出中国方面的提案是：

1.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凡是从中国领土不容分割这个原则引伸出来的结论，均应为西藏所尊重，为大不列颠王国所承认。同时，中国应允不将西藏置于本部各省之列，大不列颠王国应允不兼并西藏或西藏任何部分。

2.中国任命办事长官一员，随带卫队200名驻拉萨。

3.西藏在军事和外交关系方面受中国领导，非通过中国不得与外国进行谈判；但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当局之间的直接联系，业经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予以规定，不在此例。

4.西藏地方政府赦免拥护中国的西藏人，发还他们的财产。

5.对于西藏的第5条要求可予以考虑。

6.1893年和1908年的商约如需改订，应由有关各方共同进行。(51)

可见，中国全权代表经过考虑有关西藏各种现行国际条约而拟定的提案，虽然提出予西藏政府以自治权，但其据以出发的原则却是西藏与全中国统一。这个提案未能满足英帝国主义者和站在分立主义立场上的西藏封建统治上层的欲望，竟被他们拒绝了。

嗣后，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提出他自己的“三方”条约草案，坚持非接受不可。英国的草案实际与原来向中国提出的要求毫无区别，它只是把英帝国主义者想一举夺去中国这块辽阔富饶土地的真意加以伪装而已。在这个草案当中，提出把中国这部分藏族和与藏族相近的部族居住的土地，其中包括藏族只占居民一小部分的地区，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同时，按这个草案，“外藏”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内藏”亦已成为某种英国的保护国。在英国为其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所准备的官方参考资料中写道，如果接受了英国的草案，“内藏”就会成为受英国保护的“自治国家”。在字面上，允许中国政府多少在“内藏”实行一些监督权，但不能“破坏西藏地理上或政治上的完整性”(52)。这样一条照会，实际又把中国政府对这个地区的权利剥夺了(53)。

按照英国的计划，“外藏”的领土应包括中国皇帝原来划归拉萨当局管辖的土地。并入“内藏”的则是多少世纪以来，向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四川、蒙古、柴达木、青海等省区的各一部分。《哈尔滨通报》指出说，“在会议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中”，英国“最关心的问题是看承认西藏独立的范围，究能向东伸到哪一点”(54)。

英国草案第2条载明，中英两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应允尊重它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它的政治（包括达赖喇嘛的遴选和坐床等事宜），一切均由西藏政府自行处理。中国政府应保证不将西藏改为中国的行省，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不兼并西藏。

从这一条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政府须放弃其对西藏的一切权力，包括裁可遴选达赖喇嘛的权力，承认“外藏”事实上脱离中国。其所“换得”的则是英国政府“承认”其对业已化为乌有的西藏享有“宗主权”。

第3条的内容是中国政府不得调遣军队和委派官吏前往“外藏”，不得在西藏设立汉人移民区，更有甚者，是中国政府尚须承认英国在西藏享有各种特殊权益（“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以及英国有权“在印度比邻和附近国家维持和平与秩序”。英国政府早已在自己的提案中规定英国可以派遣文武官员去西藏，可以在西藏驻重军。

按照英国草案的第4条，慨然允许中国驻拉萨的代表设置一个小小的警卫队。

这就是说，按照英国的条约草案，中国政府就完全丧尽了它在西藏的主权；因为承认英国在西藏有特殊利益，那就无异于放弃自己在西藏的一切特权。从西藏与中国各省悠久

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着眼，这些权利之于中国永远是具有头等意义的。但如上所述，按照此项草案，英国政府已经获得派遣文武官员前往西藏，并在西藏驻扎重军以保卫英帝国主义者各种利益的权力，这也就是说，英国成了西藏真正的主人。

英国条约草案第5条规定，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不得互相或与其他任何国家举行谈判。唯独英国有权与西藏举行谈判和签订商约。中国之于西藏完全被视同外国。

按照草案第6条，中国政府连在西藏获得租让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此项权利只有英国一国独享。

"三方"条约草案第7条"甲"节宣布中英两国政府所订1893年和1908年"西藏通商章程"无效，同条"乙"节即责成西藏政府立即与英国代表研讨新的通商章程，以便实行英藏条约第2、3、5等款的规定。

英方提出的新约草案第8条，规定予英国驻江孜的商务委员以率领武装卫队、自由访问拉萨与西藏政府举行谈判的权利。这样一来，英国一名商务委员，事实上成了英国驻在西藏的总督。

草案第9条确定西藏的境界，并规定中国政府没有干涉各寺院堪布的遴选和任命的权利，没有解决有关"内藏"各宗教机构的其他问题的权利。

按照草案第10条，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之间，如果对本约各项问题发生不同的意见，应请求英国政府作"公正的调整"。

在这个草约的附注里，注明"外藏"将不选派代表参加中国的国会，也不参加其他"类似组织"(55)。

从英国提出的这个"三方"条约草案的分析中，在在可

以证明，如果接受了这个草案，中国政府即将丧尽其对成为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西藏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但事情还不止于此。英国殖民集团希望签订“三方”条约，使他们能够在中国内地各省扩大他们的扩张活动。其所以把四川、云南、青海等省部分土地并入“内藏”，尽量扩大唯英国之命是听的西藏傀儡政府对“内藏”的权力，都是为不久之后夺取中国这些土地作准备。该约规定授权英国政府调整中藏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议问题，为英帝国主义者借制造这类纠纷问题，在长江流域和中国各地彻底实行其阴谋诡计开辟了途径。

西姆拉会议始终严守秘密[56]，它是在对中国代表施加恫吓和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这是1914年4月27日中国代表在英国条约草案上签字的原因所在。但是，中国政府怵于全国人民的群情激昂，——他们当然绝不能容忍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行为——未敢批准西姆拉条约。

因为此约未获批准，所以英帝国主义者决定在事先取得沙俄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严守中立的保证之后，再对中国政府施加新的压力。

1914年春，俄国外交大臣奏明沙皇，说英国大使业已预先告诉他，英国有意向俄国政府提议，“就废除1907年条约限制英国的种种规定和听任英国在西藏自由行动方面，重新审订该约”[57]。但英国驻俄大使馆递交俄国外交部的西姆拉条约付本，却激起俄国统治集团的不良反响。萨佐诺夫向英国大使比尤克嫩声明说，此约将置“西藏于英国的单独保护之下，显与1907年的英俄条约相抵触，按照该约的规定，双方相约不得派遣代表驻拉萨，不得在西藏获取租让权”[58]。

值此对德大战的前夕，英国内阁深恐触怒自己的盟友沙俄政府。沙俄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本来就和英国的利益常常发生冲突的。因此，英国外交部表示，愿意将最使彼得堡方面反对的第10条条文加以修改。它正式通知俄国政府，在未与俄国达成协议以前，英国政府也决不利用第6条和第8条所列的各项规定[59]。

1914年6月初，英国驻俄大使以西姆拉条约第10条业经修改，"现已按照沙皇政府所希望的精神写成"[60]为由，正式通知俄国外交部。至于该约第6条和第8条，英国政府则提议在签订西姆拉条约的时候，应同时公布几个文件，其中声明：

（1）"英王陛下政府和沙皇政府应允，不经事先就各该问题取得协议，不得为各自的臣民在西藏强求租让权"[61]，但在一个秘密的文件中，却是俄国政府应负责"不为俄国臣民强求那样的租让权和不反对英王政府可能为英国臣民获得的租让权"[62]。

（2）英王陛下政府应允，"不经事先取得沙皇政府的同意"，决不享用该约第8条所赋予的权利[63]。而在一个秘密的文件中，却是俄国政府应向英国政府保证，在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商务委员有必要访问拉萨时，俄国政府不致加以反对。

以上摘自以典型秘密外交为特征的英国政府的正式文件的引文，说明英帝国主义急于要在西藏扩大势力，取得合法外貌的巨大贪欲。英俄两国政府不敢在世界舆论之前公开声明放弃早先对西藏所承担的责任，因为英国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原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发动新攻势的计划之中的。这种政策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列强在亚洲方面的势力范围已经发生某种程度的再分配过程。

俄国沙皇政府终于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帝国主义作了让步。

英国政府既与俄国沙皇政府达成协议，便使用公开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当局签署这个条约。1914年6月6日，英国通牒北京政府，声明不管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英国代表将与西藏代表团一起在条约上签字(64)。英国通牒中说道，条约草案“实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国政府拒绝签字，不欲解决藏案，则该草约所定之利益，中国不能享有。”(65)英国当局竟规定中国政府签约的期限，向其声明，如西藏“遭到中国方面的侵略”，英国决定予西藏政府以援助。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能够迫使中国签约。中国政府尤其反对的是西藏边界问题。

1914年7月3日，西姆拉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英藏代表当场在该约付本上署名，其第10条约文依然未动。他们还签订一项新的英藏通商“章程”，来顶替英帝国主义者早已感到不满的1908年在加尔各答签定的“章程”。这个没有中国方面参加拟订的新“章程”，使西藏完全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支配。西藏全境均处于英国商务委员的控制之下。英人可以兴修各种建筑物，可以在西藏任何地区租赁土地；西藏当局应当毫不迟延地将所需地段拨给他们。英人在西藏土地上犯下罪行，实际上不会受到一点惩罚；反之，西藏人万一对英人犯下不管什么罪行，却制定了极详尽的严刑峻法。

西藏当局负有保护由印度架设至西藏境内英国通商商埠的一切电报线的全责；对西藏人破坏电报线者订有惩罚办法。

“章程”规定西藏当局不得在商业或工业方面成立垄断组织，亦不得以垄断权利授予公司、行号或私人。但是，大

英帝国的臣民却有在西藏全境与任何人进行交易、雇用任何运输工具和不受丝毫限制经营各自事业的绝对自由。西藏人民头上加了一项新负担，即专为保护英人生命财产的警察经费。而通商“章程”却并不禁止武器、军火这一条贸易。

新的通商“章程”说明已为使西藏沦为英国毫无权利的、和英帝国主义所属其他殖民地一模一样的殖民地作好了准备。但英国资本家利用西藏攫夺其他中国地区、扩大其扩张活动的野心，却因接着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未能实现。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者在西藏的政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在西藏方面所推行的政策，其主要方向依然和从前一样。

英帝国主义不能运用外交手段使新的中国领土并入西藏，以扩大其在中国西南方面的势力范围。但这绝不就是说，英国帝国主义政府会放弃与西藏相牵连的各种计划。

1914年6月10日，英国外交大臣葛雷谈到中国代表团在西姆拉会议所取立场时，在下院声明说，如果中国不打算签署这个条约，那末，其种种后果，对中国来说，都会是不堪设想的[66]。可以认为，此项声明表示英国当局确有利用西藏地区对中国人民展开军事进攻的意图。

英国各色间谍源源抵达西藏境内。由于他们干涉西藏的政治，使中央军队和西藏地方军队之间发生多次冲突事件。

英国殖民主义者阴谋挑拨藏族反对汉人的政策，在英帝国主义者开始由西藏对中国内地几省实行侵略的时期，表现得特别露骨。英人宣传由拉达克至打箭炉的广大区域原非中

国所有。例如，1910年8月，《泰晤士报》发表一篇文章，其中大放厥词，仿佛中国曾有多次"完全隶属于西藏"[67]。过了两个月，《亚洲社会杂志》刊出前面常常提到的那位瓦德尔的一篇"科学"论文。作者在文中多方使用捏造历史的手法，竭力为部分蓄意分立的西藏封建主及暗中支持他们的英帝国主义者垂涎直至打箭炉的中国土地找理论根据[68]。在比这更晚的一些刊物里，许多英国作者竟不再有所掩饰地支持分立主义者的要求。这样一来，报纸刊物所选载的这些言论大概是想表达英国政府在西藏问题方面所采取的立场是公正的，是旨在保护藏人利益似的。英国在西藏的间谍与报纸上的一伙文人相唱和，多方挑拨藏族反对汉族，不断给西藏分立主义者各种军事帮助。西藏亲英统治集团把从英人手里拿来的钱购买自己军队所使用的武器。《北京每日新闻》写道，为了购买军火，英国曾借给西藏300万美元[69]。关于藏人配有最新武器一事，《东亚航运协会会报》写道："这些东西，他们都应感谢英国人。"[70]《国光新闻》曾就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关于英人将武器输入西藏"提出抗议一事发表评论[71]。其他报纸也纷纷报导英国间谍到达西藏东部[72]、英军分驻拉萨各地和英人训练藏军的消息[73]，报导"驻藏英军妨阻中国军队"[74]前进的消息。

由于英国侵略者的种种阴谋，西藏境内极不平静：中央军队和西藏地方军队的冲突迄未停止，生灵涂炭，村舍为墟，田园荒芜，牲畜绝迹。西藏人民原本反对受英人教唆与汉人发生冲突，一部分反对英人的僧俗封建主根本就没有支持分立主义者的傀儡政府。

奉行亲英政策的西藏地方政府，连在西藏中部都不能使

自己的政权趋于巩固。最大的寺院，如哲蚌、色拉等，均不服从这个政府的命令。驻于扎什伦布寺的班禅喇嘛和后藏行政当局开始给这个政权越来越多的抵抗。这说明藏族人民既反抗外来的，也反抗内部的压迫者。俄国驻印外交官员纳博科夫在说明西藏分立主义者的地方政府及其首长达赖喇嘛完全依赖英国的时候写道："看到西藏当局的脆弱无力"，侨居拉萨的英国人必然"要获得比英藏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权势。"(75)

假手西藏地方政府在西藏推行其政策的英帝国主义者是毒害西藏人民的罪魁祸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英帝国主义者即无暇顾及西藏，其侵夺所谓"内藏"的活动开始不象以前那么积极了。

但英国政府仍然利用这段时间巩固其在西藏方面的阵地，为此后对西藏邻省发动新的进攻作好准备。

按照刘贯一的论断，英国政府侵略西藏的计划在于促进达赖傀儡政府对英国的依赖，在于以武器、弹药供应分立主义分子反抗中国。除此以外，刘贯一还写道，英国当局计划使印度货币流入西藏，在印度边境厚结兵力，将"内藏"土地交由西藏政府管辖，扩大藏军员额，随后将其编入英领印度部队，在西藏设立电台等(76)。

英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尽量从中国攫取新的土地。因此，英国殖民集团竭力激起西藏封建主想将中国广大地区并入西藏，借以扩大其封建剥削范围的贪欲，并在这一方面多方直接援助他们。英帝国主义渴望获得新的土地这一点对部分西藏封建主也是有利的。

英帝国主义者和西藏统治上层狼狈为奸的种种侵略阴

谋，造成西藏地方常备军不断扩充的局面。这支部队不仅为了供侵犯中国内地之用，而且也为了镇压反对地方政府所行亲英政策日激的西藏人民。军队的员额最先规定为10,000名[77]。单是军队的薪饷这项经费每年即确定为87万卢比，相当于西藏地方政府岁入总额的一半[78]。藏军所需武器全由英国当局供售。柏尔写道："我们有时准许它（指西藏地方政府——著者）在印度取得军用品。"[79]

但是，扩大军队的员额、装备和薪饷，需要大量的经费。这些经费都是取自西藏劳动人民的。同时，英国当局也利于马上建起一支强大的西藏部队，借袭击比邻的中国其他省区和保护西藏亲英统治上层不致为人民的怒潮所摧毁，所以特许西藏政府对那些按远低于世界行情的价格，由西藏输出的羊毛、皮革、盐类抽收少额税课，附带条件是把由此得来的税款全部充扩军的经费。

藏军不仅配有来福枪、机关枪、乃至大炮等英国武器，穿着同英领印度军队一色一样的服装，而且还由英国教官训练[80]。

英国统治集团还从事于"教育"西藏青年的工作。他们在西藏设立英文学校培养官吏——英帝国主义者的忠顺走狗。遣送西藏"豪门"的青年子弟到英国和印度留学，以后派往行政系统和西藏军队担任高级职务。

英国派驻西藏的间谍头子竭尽全力在藏族人民当中散播不信任汉族老大哥的种子。在这种工作方面，他们还有专以歪曲汉藏关系史为能事的英国"学者"给他作帮凶[81]。

英国在西藏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之一，是中国中央政府在这个边陲地区的权力日渐衰微和西藏与中国各省相隔离的

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国政府的官员和军队均被遣送出境；至1913年1月，西藏即已没有北京当局的正式代表。

西藏脱离中国本部，对西藏与其他各省的通商贸易影响极大，交易数额显著下降。例如，由内地输往西藏的中国茶叶，1910年总值为210,000英镑，而1913年仅为72,187英镑[82]。1913年西藏对内地的输出、入总值约计265,312英镑或1,691,465金卢布[83]。这个数字比《季宪报告》举出的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年的总值减少了88%左右，或者比英人李顿指出的那些年代的总值减少了60%[84]。

但是，英藏贸易却在不断地上升。例如，1914—1915年英藏贸易的总值为5,056,000卢比，1915—1916年为6,405,000卢比，到了1916—1917年即增为7,140,000卢比[85]，19世纪末叶，西藏对英领印度的贸易总值增加了2倍[86]。

自古以来，由拉萨通往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处的通商大道，渐渐失去了重要性。商品的流通主要通过由拉萨经江孜、帕里、亚东至噶伦堡的一条路和由拉萨经日喀则至拉达克的一条路。

在英国外交部的参考资料《西藏》这本小丛书当中，处处强词夺理，仿佛西藏的"自然市场"是英领印度而不是中国[87]。

英帝国主义者在西藏的贸易政策越来越带有殖民地的性质。输出的依然是原料，输入的依然是轻工业品。西藏由印度进口的货物类别中，细致到连手工业作坊所需最简单的设备都应有尽有。柏尔再也找不出什么东西，比他亲身遇见一队由印度至西藏的队商，满载打算以后售予西藏贵族沐浴的澡盆这个玩意，更适于供他那本"词藻丰盈"的著作，作英

藏贸易的举例[88]。

西藏对外贸易的方向既已发生变化，同时又在政治上与中央相隔离，这种情况对当地封建上层是有利的。西藏封建主逐渐摆脱汉人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中介作用，在很大的程度内都亲身投入商业活动。

汉人的商业高利贷资本被排除于商品流通之外，使西藏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恶劣的影响；因为代之而起的是更带掠夺性的英国资本。

西藏境内没有大的工业城市，也就是说，没有农产品的主顾；因此，主要的市场都是英印商人的市场。出入这种市场的只是那些拥有必要资力的人，即只是封建主、封建主的代办和大商人。因为与外贸市场发生关系的不是农户，而是封建主的庄园，所以一切商业利润都落到封建主的腰包里去了。这种利润驱使他们贪图更多的剩余劳动，驱使剥削者增加地租租额的要求更加厉害起来。

西藏卷入世界市场的体系，使这个地区之内的封建压迫变本加厉。虽然农民所负担的各种苛捐杂税，各种不法诛求以及巨额地租主要是用谷物、牲畜、自制工艺品等实物交纳的，但是，所有这些实物，现在封建主都能比较容易地在外贸市场上换成货币。此项货币当能尽其固有的一切职能，包括储蓄职能。这种情况使封建主更乐意从农民手里获得更多的原料和产品。

西藏地方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封建主和商人。政府拥有放牧于"官"地之上的一百多万头牲畜[89]。个别封建主也占有巨大的畜群和辽阔的土地。例如，帕尔希约有绵羊20,000头，牧场13个[90]；他一家的现金收入达5,000英镑[91]，

在西藏那种情况下，这个数目是大得惊人的。另一名唤拉鲁的封建主，他每年的收入是20,000英镑(92)。西藏还有一些资力雄厚的商人。例如，商人邦达在北京、上海、东京、加尔各答等地设有自己的分号。最近几年来，他不经打箭炉而经加尔各答采购中国丝织品在西藏发售(93)。

英帝国主义千方百计使剥削西藏人民的封建剥削形式永久保存；这种剥削形式也正是它的盟友——西藏封建主——赖以存在的基础。殖民主义者对于发展西藏的工业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要西藏担任的角色只是英国此后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当西藏当局向英国代表提议在西藏开凿矿井的时候，英国代表连这点请求都拒绝了(94)。

在这个时期之内，英国官员——驻在西藏的间谍头子——为数甚多。这些间谍头子分布于西藏比较重要的一切居民点。他们对西藏统治上层的影响是有决定意义的。西藏地方当局奉行的政策完全符合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英国间谍头子竭力促进早在哈斯丁斯任印度总督时期即已由英人一手造成的西藏上层喇嘛间的分裂，正如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吕振羽所指出的那样，“挑起达赖和班禅的对立……阻止藏族的团结”(95)。部分封建主竭力使西藏永远脱离其祖国的意图，激起藏族人民的反对，从而助长了这种分裂。

英国作家麦克戈汾写道，全藏显已分为两个活动甚力的派系：其一是“宫廷派”；另一则以所谓“民族会议”为代表，其中的分子多半是三大寺僧官。接着，他就从其帝国主义辩护人的立场来分析这两大派系：“两派都极端专制，但寺院派却更加反动。宫廷派包括许多久居国外的人士，比较进步。宫廷派对英国抱有好感，寺院派则同情中国。”(96)连

柏尔其人也无法否认，西藏确有一派人是反对达赖喇嘛及其左右执行亲英政策的。柏尔写道，西藏“民族会议”由最有力量的各大寺院和官吏的代表组织而成，这个会议的意见有很大的影响。据柏尔说，“该会议的亲汉分子正在不断增长中”[97]。西藏各大寺院均拥护中央的方针，因为中国本部才是保卫西藏不受各色侵略者和企图动摇喇嘛寺院实力的英国强盗侵略的支持力量。当时尚有许多情况，如削减各大寺院的权利，强迫征收各种税金维持军队、供应英国教官等等，都促使喇嘛教徒坚持这个方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英国政府即断定继续进攻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了。1917年3月1日日本报纸首先披露英国就西藏问题向中国提出的十二条要求[98]。就在这一年当中，受英国间谍头子唆使和指挥的西藏统治上层，仗着由英人装备和教练出来的西藏傀儡军队，开始对东面的邻省发动军事进攻。英国作者这次也把责任推给中国人。柏尔颠倒黑白，仿佛中央部队袭击了藏军前线的某一个或某两个岗哨，使藏人被迫采取攻势[99]。但亲身参与这次事件的英国领事窦赐孟却并不否认这次进攻是由藏军开始的[100]。

问题当然不在于用什么具体事实作为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重新燃起战火的借口。而在英帝国主义者估量实行他们有关侵占西藏的各种计划的大好时机业已到来了。的确，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停止，但国际局势却对侵略者有利。德国将被协约国击败，这时已非常明显。这样，英国在世界市场的角逐中少掉一个最可怕的敌手。法国早已是英国的盟邦。美国从未阻挠英国侵略中国的西藏。至于俄国国内，革命斗争日益扩大，专制政体业被推翻，这时已届伟大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了。

英帝国主义利用既成局势，依靠西藏傀儡军队，以新的力量由西藏向四川方面猛攻[101]。在拉萨当局的辖境和四川省之间有一个幅员辽阔的西康，这也是英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从中国夺去的。在英国1920年出版的官方参考资料《西藏》中写道，“打箭炉是中国和西藏之间的真正地理的和人种的界限”[102]。虽然这份参考资料的编者还不好意思把他们所垂涎的土地统统归于“西藏”的名义之下，但他们却说“仍然是军事冲突对象”[103]的界线的准确划分是不可能的。

巴塘和昌都两城位于通往四川的冲要大道上。早在1909年，英国驻成都总领事的助手托列尔曾经怀着侦察的目的访问过这两座城市[104]。他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昌都是打箭炉与拉萨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城市。从北京和加尔各答，从拉萨和打箭炉，都有货物源源运到昌都——西藏的心脏和中枢——出售”[105]。托列尔也曾从德格经过。

英国艾恩斯科辅等多人均曾衔英国政府之命，到过中国川康边境的许多地区。在成都以西的区域内，有几个部落世居其间，据艾恩斯科辅的报告说，他们所居之地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106]。这个间谍的主要目的是侦察上述地区的情况，诱惑各该部落的土司头人归顺英国，并挑拨他们反对汉人。在其自著的那本小册子里，他竟把昌都与川边之间的土地划归西藏，啧啧称赞这些地区尚未开发的大量矿物资源。“黄金在长江上游的河床内裸露；银、汞、铁所在皆是；铜和铅全区均有发现”[107]。艾恩斯科辅详细说明这些地区在战略方面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处在西藏和四川之间的地理位置，而且也由于有一条全亚洲最为“著名的”

道路从这里经过。

1918年4月，藏军发动攻势，侵占康藏高原东部的军事战略要地昌都城，至是年夏季，即据有西康省大部分地区，直抵雅砻江。尽管英藏司令部方面多方挑衅，但中国政府仍在1918年10月间与西藏签订停战协定。

凡是谈论1918年中央军队和西藏地方军队冲突事件的英国资产阶级文人，无不竭力颠倒是非，好象停战协定的签订，有赖于英国当局的从中斡旋。事实上，英国殖民主义集团正是反对中国各族人民和平相处的敌人。卡尔·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英国的力量建筑在征服其他民族之上，它带着鄙夷的神情，拒绝外国渴求在其自相残杀的各族人民之中散播和平种子的政策。"(108)

驻西藏英军司令部的代表窦赐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拖延和平谈判。西藏地方当局在侵占昌都城以后，即以西藏地方军队总司令卡朗喇嘛的名义发表声明，希望双方媾和，并邀请窦赐孟居中调解。窦赐孟时而借口中国代表的官阶不够显赫，时而托词电报发生故障，时而又诿称道途危险等等，来竭力拖延举行和平谈判，结果是西藏的傀儡军队在这个期间扩大占领区，这当然是英国统治集团求之不得的。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了重新挑起中央军队和西藏地方军队的冲突，屡屡干涉中国的内政。1919年春，英国领事窦赐孟忽然从不久以前还在厮杀的地方来到北京，"为了藏人的利益"，坚决主张解决西藏的疆界问题。因为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军队暂时分驻的地点正是英国当局所梦寐以求的，所以窦赐孟和朱尔典就提议以此为划定西藏疆界的根据。是年秋季，北京政府收到英国"调停中藏冲突"的条件。按照英

方条件的规定，凡是德格以西的中国地区均应划入西藏版图[109]。英国当局复利用他们的西藏代理人，要求将“内藏”包括在“西藏自治区”的范围以内。英国驻西藏和哲孟雄的政治代表柏尔写道：“西藏政府对内藏确有实权，在内藏确有实力。”[110]这样一来，英帝国主义者又多方怂恿西藏统治集团阴谋成立“大西藏国”，其东部的疆土应包括西康全省以及蒙古和甘肃的各一部分。当时执政的“安福系”原打算接受这些条件，但因全国各族人民的群起反对，使谈判陷于停顿[111]。

1920年1月，英国政府又要求继续讨论西藏的疆界问题。同时，军火武器源源由印度运来，英国间谍头子柏尔也赶往西藏。当英国部队源源进入西藏境内的时候，中国各地均纷纷举行抗议和誓与西藏团结一致的群众集会。

## 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失败

中国各地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之下所掀起的群众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同样风靡全藏。虽然历次的自相残杀抵销了藏族人民抗拒外敌扩张活动的力量，但英国的侵略行径和帝国主义使西藏与中国本部相隔离的恶毒意图，仍然不断激起西藏劳动大众的义愤。藏军部队往往采取行动，袭击英国的商队和英国官吏，屡屡与英国官吏的卫队发生战斗。西藏封建统治上层的亲英政策遭到西藏普通人士的切齿痛恨。

藏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不仅是为了维护西藏一隅，而且是为了维护整个中国独立的斗争，它是中国各族人民抗击外国

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摧毁了外国资本主义在全中国的阵地。藏族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在中国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事业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西藏各地反对外国人的发动日渐激烈。参加这种发动的有各阶层的广大居民：农民、喇嘛、西藏地方军队的军官和少数官吏[112]。

至1921年2月，情况竟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英国政府的代表只有在武装部队的保护下，才能在拉萨行动。

是年年中，由于西藏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酿成哲蚌寺5,000喇嘛公开的武装起义。该寺喇嘛竟想攻打拉萨，因为那里有他们所痛恨的外国人。这次起义遭到血腥的镇压；该寺被3,000士兵包围，经激战之后沦入敌手。参加起义者惨遭屠杀，西藏各地开始迫害和逮捕爱国人士。

在中国爆发"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之后，英国宣传开始把"俄罗斯威胁"换成"布尔什维克威胁"这种更吓人的字样，来掩饰英国殖民集团在西藏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英国报刊满纸眩人的谰言，说什么英国实行保护西藏，以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侵袭。英国当局加紧使西藏在政治上与中国相隔离。他们从中阻挠，使任何旨在改善西藏对祖国的关系的措施均无法实现。为了筹集藏军扩充员额和添补装备所需的追加经费，特将羊毛和茶叶的税额予以提高。当时，对英国商人收购出口的羊毛课税不到4%，而对多数由中国内地运来、为藏人所最需要的茶叶则规定课税10%[113]。这个时期正在西藏的麦克戈汾写道，从西藏去中国内地其他各省是触犯禁令的[114]。英国政府在西藏各城市均驻有军队。例如，英人在江孜建有坚固的堡垒，架有与亚

东和噶伦堡相联系的电报线。可见英国当局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完全和从前一样，依然在于巩固英国在西藏的地位，依然让西藏充当英国在亚洲进行侵略的桥头堡(115)。

分析西藏的现成局势，使孙中山在1921年有理由大声疾呼地说：“西藏是英国任意宰割的牺牲品”(116)。

英国蓄意侵略西藏，并利用西藏进攻中国内地其他各省的政策，从未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反对。太平洋会议之后，英国当局表现得更为积极。西藏问题在太平洋会议上被“搁置”一边；由于会议组织者的默契，中国这部分领土仍然只能供英国任意劫掠，并将其化为军事桥头堡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但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却在印度引起相应的反响；至于在西藏发生的事件，这种反响就更加显然。例如，象柏尔及其随员一行于1920年往游拉萨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竟在印度引起愤慨，确是很独特的。柏尔自承：“这位印度排字组组长是受了指使反对我们的。”(117)有些印度报纸揭发英人的意图，指出柏尔之行是与侵略西藏、奴役西藏的人民这种阴谋有关的(118)。

虽然英国政府总想把自己在西藏的政策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政策相协调，但事实证明这种“行动一致”往往只是暂时的。帝国主义联合对华政策的变幻无常，在西藏方面也常常暴露出来。英国统治集团不能不经常抵抗日本在西藏扩大势力。

日本早在蒙古积极进行扩张活动，实为英国在拉萨方面的一大劲敌。有些西藏富翁到过日本群岛。有些西藏地方军队的军官也曾经去过日本观光。日人参加训练西藏士兵。西藏地方军队所使用的武器有日式机关枪、步枪和炸弹。到英

国间谍头子劝告英国政府火速将英国军械运送西藏时，才使日本统治集团的种种计划，包括供售西藏15,000支日式步枪的计划，遭到失败[119]。

英国政府又加紧采取各种措施，其目的在于扩大英国在西藏统治集团中的影响。1922年夏季，由印度方面引来的电报线已架设到拉萨。英人在西藏取得各种租让权，英国商业资本越来越能控制西藏的市场。1924和1925年，由西藏输往印度的出口总值为331,000英镑，进口总值为419,000英镑[120]，每年由西藏输往国外的牲畜共30,000到40,000头；输往孟加拉的羊毛约2,000吨，盐类约3,000吨[121]。

英国间谍维护英国在西藏的势力所使用的伎俩之一依然是挑拨达赖和班禅互相敌视。由于这种政策，使班禅喇嘛不得不于1924年离开西藏，避往中国内地。随同班禅出走的尚有一部分反对西藏地方当局一心投靠英人的西藏僧侣。吕振羽指出说："同时直接分裂西藏内政，制造达赖班禅两派的纠纷。"[122]

西藏反动势力的活动使外国帝国主义者劲头更大，获利更厚。当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实行侵略活动主要靠一种隐蔽形式，即组织内战，竭力支持反革命分子打击爱国力量。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却正撞上中国革命这个无法克服的障碍。

西藏之所以在1928年8月爆发起义运动，原因也在于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压迫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许多历史资料只是说到造成起义的导火线。这次起义是由于一个征税组到达西藏南部爆发起来的。农民拒绝交纳各种非法的苛捐杂税，并且惩治了这些征税人员。当500名讨伐部队从拉萨

赶来的时候，当地居民都拿起武器，使军队不能不向后撤退。起义蔓延到广大地区，凡是起义的地方都建立了起义者的政权。英国十月间的电讯报导说："拉萨政府深恐暴动扩大，刻正实行动员，准备再次进剿。"(123)

这种自发的起义运动，虽然规模甚大，但终于被镇压下去。因此，英国间谍机关又能在西藏为所欲为了。

1930年，甘受英国间谍指使的西藏军事集团发动第三次侵犯西康的战争。1931年冬，军事行动扩展到青海境内。西藏地方军队不仅盘踞在西康和青海，而且还攻入新疆。1932年初，西藏最好战的分子竟扬言说，不到将西康、青海并入西藏，决不停止军事行动(124)。

在这次进攻中国内地中，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和在全国的地位均已更加脆弱的英国当局是利用了日本军阀在中国进行侵略的大好机会的。资产阶级报纸不断报导英日订有密约，规定英国在西藏、日本在满洲，可以自由行动的消息。各报盛传成立受英国保护的"西藏独立国"和英国不断将军火、飞机以及军事顾问、教官送往西藏去(125)。《工人日报》估计西藏这座桥头堡对于英帝国主义者的重要意义时，这样写道："据英国帝国主义者看来，西藏是许多问题的关键。第一，就利用西藏对苏联实行武装干涉计划方面说，西藏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其次，是从实现英国对华的种种野心着眼；第三，西藏的重要性决定于它和印度接壤。"(126)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上，该会书记O.B.库西宁同志在他的报告里说道，英帝国主义实行种种有效的军事措施，在邻近西藏的各省采取"十分具体"的步骤，"为瓜分华中和华西作准备"(127)。

西藏亲英集团奉行的那种唯英国间谍之命是听的政策，不但深为劳动大众所痛恨，而且也与多数大牧主、地主和僧侣的利益相冲突。一部分反对英国的封建主，利用西藏地方部队和军官团均已开往西康的机会，又继续掀起抵抗外敌侵略的运动。积极参加这次运动的尚有散居青海、四川、甘肃等省的藏族人士。蒙古居民也投入这次抗敌运动。班禅喇嘛居于运动的中心地位。班禅的代表在北京、甘肃、四川、内蒙以及其他各省设立政治性的办事处。他们的目的是准备使西藏从那帮“为虎作伥，多年以来使西藏象印度、缅甸那样遭受苦难”的“亲英派”手中解放出来(128)。

最后，西藏的一个大行政区——阿里——爆发了极大的骚动。西藏当局为了平息骚动，竟不能不从西康调回一部分军队。这样才使西康境内的军事冲突得以停止，于1932年10月8日在昌都订立停战协定。1933年春，西藏地方军队连吃几个败仗，始退出青海。

西藏地方军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的战斗使50,000人丧失生命，70,000人成为残废(129)。

英帝国主义者在西藏的阵地依然是很容易攻破的。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各省的交易仍旧极为可观(130)。在1933年6月达赖十三世逝世之后，亲英集团与深知西藏只有返回祖国怀抱始能得救的爱国人士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

中国政府曾因达赖十三世逝世，派特使前往西藏致祭。西藏地方当局也请求班禅喇嘛重返日喀则(131)。

英国当局决计阻止班禅喇嘛回藏。英国报纸大谈班禅重回西藏是英国当局“难以容忍的”(132)。西康的局势正好在这时又开始紧张起来。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2次全国

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说，英帝国主义正由西藏进攻四川[133]，——构成“中国大后方”的省区之一[134]。西藏集结大军30,000。打算渡过金沙江[135]。

外国帝国主义者虽然有此妄想，但终于未能使西藏与中国内地相隔绝。1935年6月间，向西北推进的中国红军主力到达四川境内。光荣的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路过西康省。据报纸消息，约有2,000名人民军队于5月25日开抵距西藏边境不远的巴塘地区[136]。在红军停留于这些多民族居住地区，主要是藏族居住地区的期间，战士们极端尊重各民族的风习和宗教信仰[137]。当地居民都把中国红军战士当为自己的兄弟，甘愿在艰苦的长征中帮助他们。西康居民与中国红军战士早于1935年即已建立的友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的和平解放西藏这件大事上起了极良好的作用[138]。

红军所经之地的藏族居民，纷纷把红军的真情实况传播到西藏。英国间谍痛恨这种真情实况的传播。西藏傀儡军对个别红军部队多次施行挑衅性的武装袭击。

中国人民深深知道，外人在西藏建立的太上皇统治对整个中国的威胁是何等的严重。中国报纸不断发表文章，号召粉碎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地区的阴谋诡计。有些报纸提出各种方案，其共同要点是援助西藏，使其能够摆脱外人的压迫[139]。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因为有各种势力强大、与英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集团盘踞其间，所以不能利用已有的机会在西藏抵制英国。至1936年，英国政治代表即在拉萨长驻不去。

1937年，中国人民投入抗击日本强盗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日本侵略者竭力封锁中国的一切海岸。西藏在中国国防上的重要性有增无已，因为有几条便于供应内地各省所需

商品和粮食的交通要道是通过藏境的。

在英国当局封闭滇缅路的期间，西藏队商大道即更为重要。但帝国主义者却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强盗战争的机会，越发使西藏与中国内地隔绝起来[140]，依然唆使西藏当局宣布独立，脱离中国[141]。

在中国人民备极难辛的抗日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者却在西藏大肆活动。

美国战略勤务局派遣大批秘密谍报人员深入西藏，目的在于准备从中国夺取西藏，占据西藏的土地，使藏族人民供美国殖民主义者奴役。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美国垄断组织即一步一步将英人从西藏及其邻近各省排挤出去。例如，他们攫得修建西南机场和道路的权利[142]。1942年，美国战略勤务局（OCC）（中央情报局前身——译注）续派许多间谍去西藏。美国间谍从军事政治方面研究西藏，进行破坏工作。分布在中国内省与西藏交界地区之内的OCC工作人员也紧紧地盯着西藏。为了作战略上的侦察，他们竟利用飞机在西藏全境搜寻宜于飞机着陆之处[143]。

1944年春，重庆政府派了一些官员到西藏去。英国驻哲孟雄的行政长官古德随着到了拉萨，又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

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第三次国内战争，使帝国主义者得以重新放手进攻西藏内部的爱国人士，使藏族人民受帝国主义者奴役的威胁更大。

1947年4月，帝国主义谍报机关和西藏地方当局决计彻底摧毁西藏的爱国力量。他们出动大批军队，要把主张与中国

本土统一的那批人一网打尽。色拉寺喇嘛所组织的抵抗最为有力。该寺被军队包围猛攻，旋即陷落，寺僧死百余人，被捕者甚多，所有财产被劫一空。死难者之中尚有一位反英的有力领袖热振活佛，其下属20余人亦惨遭镇压迫害。此次事变使全藏居民骚动起来，但人民的愤怒终于被重掌西藏政权的亲英派用武力镇压下去了。

1948年初，有几名藏官出发到欧洲和美国去。在伦敦和华盛顿他们均享有全权代表的权利。早在这件事情以前，帝国主义的间谍已经为利用西藏，作为他们反对业已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之军事桥头堡，进行各种准备工作。1949年夏，当国民党军队的彻底消灭业已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尚不断策动西藏与其祖国断绝关系。

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限令国民党办事处全部工作人员撤离西藏。汉人的一切商店和学校均遭封闭。

《中国每周评论》在一篇评述西藏事件的文章里指出说，利于这次事件和同情这次事件的正是那些处心积虑想夺取中国台湾的集团。该文作者着重指出说，在新战争贩子的计划中，西藏所占的地位比台湾更为重要，因为它距苏联不远，且可作为侵犯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的良好阵地(144)。印度进步报纸《闪电报》说明西藏事件是英美的诡计，“阴谋在中亚战略地带开辟反对人民民主中国的新战场”(145)。

外国的扩张活动给藏族人民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数万人惨遭牺牲和残废，数十万人由于饥饿和疫病而死亡。外国资本侵入西藏的后果就是这样的。

为了变西藏为其殖民地和军事桥头堡，帝国主义国家采

取了用以供奴役和不断掠夺各族人民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压迫方法。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挑拨离间、外交上的进攻、直接干涉西藏的经济生活、派遣暗探和建立谍报机构、挑拨西藏封建主、阴谋煽动藏汉族人民互相敌视，最后则是武装侵略西藏的领土。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农业——原料附庸，完全没有什么工业、现代运输机关、现代交通工具、中小学校、医疗机关和公路。

帝国主义者对于西藏从太古时代传来的那种原始农耕方法和手工业生产方法毫未触动。木犁、锄头、铁锹、镰刀依然是农民的主要工具。打谷还是用人脚和兽蹄从谷穗上踏下谷粒的简陋方法。西藏农民深受摧毁庄稼的霜冻和蝗害的苦痛。西藏牧人的畜群常因天然灾害和疾病而死亡。但外国殖民主义者从未尽过半点力量帮助西藏农业。

随着外国资本侵入而发生的是西藏货币的贬值和生活费用的上涨。与此同时，尚有层出不穷的“官”税和其他捐税。单是使用土地的地租一项，农民即须付出全部收获量的80%以上[146]。

由于劳动人民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生活条件，使西藏人口的增殖陷于停滞。

• • •

帝国主义国家在西藏方面的种种阴谋，始终都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强反击。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公开而明确地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147]。

帝国主义者在西藏的阴谋遭到全世界进步报纸的冷嘲热骂。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英明的对内外政策，使收复中国全部国土的爱国主义口号，竟能在西藏方面借和平的方法实现。

汉藏人民之间自古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固然大有利于西藏的和平解放，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却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一政策完全符合于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藏族人民即与中国其他各族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藏族代表参加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言。自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活动之日起，藏族即有代表积极参加该会议制定共同纲领的工作。藏族还有代表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在甘肃、四川、西康等省的藏族地区内，均已成立区域自治政府。尤其重要的是党和政府采取种种团结各阶层民主人士的措施，延揽他们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人民政府在民族地区执行的经济政策完全符合于当地居民的利益。例如，1951年春，政府商业机构按照比国民党统治时代高出4倍以上的收购价格向藏族人民收购羊毛。政府在竭力促进商业的时候，还极其注意提高畜牧业、农业，注意繁荣文化和发展保健事业。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政府在藏族地区所执行的政策与全国各地无异，一概是以尊重居民风习、传统和宗教信仰为基础的(148)。

人民政权一经树立，党和人民政府即经常地、耐心地向

广大群众解释自己的民族政策，这个政策的各种原则都得到中国各阶层居民的一致拥护。

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广大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对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事业裨益甚大。在抗击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在反对西藏反动封建集团出卖藏族人民供帝国主义者奴役、竭力阻挠西藏统一于中国的斗争中，在为争取全部领土复归于新中国的斗争中，汉藏两族人民的团结业已巩固起来，藏族人民的一切爱国力量，包括大多数喇嘛的爱国力量，业已联合起来。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各自领导的力量已逐渐形成统一的力量。其后，这种力量又与中央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种力量汇合起来，使和平解放西藏的事业受益不浅。

但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却不断受到帝国主义阵营反动力量的干扰。西藏境内又来了各色各样的间谍。1949年11月4日，达赖喇嘛的摄政大扎用自己的名义发出电报，说什么为了防御"共军"袭击的必要，呼吁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援助西藏。

1950年1月，"合众社"传出消息，仿佛摄政正打算派遣一个"亲善使团"前往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借以"表明西藏的独立"(149)。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也从没有人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拉萨当局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150)1950年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派代表到北京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未过几日，又提出"适当的区域自治"，同时要求他们召回"亲善使团"(151)。

中国政府旨在和平解决问题的各种步骤，都未得到西藏地方统治集团的拥护。美英帝国主义者仗着西藏当局的反动部队，仍然继续他们的挑拨勾当；他们利用西藏作为对人民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和武装斗争的据点[152]。当时西藏已开始动员。虽然西藏人民反对强制动员，但至1950年，西藏地方军队的人数已比1949年增加了3倍。西藏军队约有一半已开往西藏东部与中国内地各省接界的地方和昌都城，其参谋部里即有几名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间谍。

外国纵火犯竭力想在中国这一地带点燃他们早已列入计划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火焰。

例如，从印度报纸的消息看来，帝国主义者在尼泊尔的各种计划都是与他们侵略西藏的阴谋有密切关系的。据《涅塔治报》写道："美国先在尼泊尔建立许多军事基地，然后再从这些基地把武器运往西藏。"[153]

帝国主义者公然承认要把克什米尔变为他们侵略中国的战略基地[154]。当时，资产阶级的，特别是英美两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和电台都非常注意"西藏问题"。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诽谤中国政府的和平意向，竭力歪曲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从而迫使西藏地方当局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举行谈判。

但中国各族人民一致对帝国主义者在西藏的阴谋提出强烈的抗议，藏族人民自己也对此积极反抗，迫使西藏地方当局不得不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接触。

1950年春，西藏地方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代表团的一部分代表取道印度去北京，但在中途为英国当局所截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仍然坚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50年10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庆在《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而斗争”的论文中，在促其注意人民中国的军队和威力之后，说明中央政府力求用和平方法解放西藏。周恩来指出说，“人民解放军也决心西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对于这个为祖国安全所必须的步骤，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155)

但帝国主义在西藏方面的间谍却继续施行诡计，阻挠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而这般家伙盘踞在西藏境内，对于解放了的人民中国的确是一种威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忠于自己的人民的政策，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和第二野战军“开始解放西藏人民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巩固中国西部边疆的国防”，务与西藏人民紧密团结，对少数民族实行正确的政策。

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旋即发表联合文告，号召藏族人民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的事业中，竭力帮助人民解放军。

西藏人民热烈响应这个号召。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克服雪山草原、激流深谷的种种困难向前推进，沿途受到藏族居民的热情欢迎。所到之处，居民都自愿充当翻译，协助修路，搬运辎重，搜捕间谍和破坏分子。被捕获的俘虏有搜集军事情报的英国无线电教官(昌都电台负责人福特——译者)(156)和另一英人布尔。英国间谍彼得逊则漏网逃到印度去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清除藏族居住地区的帝国主义间

谍，同时在当地居民之中大力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藏族士兵不愿为与他们背道而驰的利益卖命，不愿和自己的兄弟战斗，纷纷投入人民的军队。例如，驻守麦康河上游宁静城的藏军第九代本的官兵，就是这样全体起义的。

中国人民军队解放了西康西部的数十个地区和城市，几百个村镇，占领康藏高原东部战略要害昌都城[157]。有些重要的藏族聚居地区刚一解放，就马上实行共同纲领关于民族问题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凡经人民军队解放的西康地区，人民生活很快就得到了安排。

尽管藏族人民一致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争取与全国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但美英战争贩子仍不断施行各种诡计。

美英帝国主义者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搞坏印度和中国的关系。

1950年10月27日，《华盛顿晚邮报》发表社论说：“一旦共产党控制西藏，那就会对亚洲局势发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西藏是与印度的北疆接壤的。西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如果西藏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那末，他们即要利用西藏作为侵犯印度领土的根据地。”《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共军进入拉萨，对于喜马拉雅山以南各区，乃是一个不幸的消息。”[158]美英帝国主义者唆使印度与中国失和，如果可能的话，即在亚洲这个地区挑起军事冲突的如意打算并未实现。印度人民赞同中国及其人民军队解放西藏的正义行动。许多印度报纸刊载读者来信，对帝国主义者在西藏的侵略活动表示愤慨，说明西藏是不能从中国其余各地分割出去的。信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攫夺西藏领土对亚洲所有各族人民的危

害性。

以苏联为首的伟大民主阵营国家均表示保卫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

藏族地区的居民一经获得解放，即热烈参加解放西藏的斗争。从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1月2日，在昌都举行昌都地区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签名书(159)。

代表全体西藏人民利益，并得到中国各族人民支持的藏族爱国力量在与西藏统治上层反动分子作斗争的当中，终于获得胜利。因此，当达赖十四世由于已届成年，于1951年年初亲自执政的时候，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即是承认从前执行的政策错误，派遣代表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全权代表团由达赖新近任命的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率领。

西藏代表团未能于4月22日以前到达北京，因为他们没有获准利用取道印度和香港的这条方便道路。阿沛一行则翻山越岭，完成这次困难的旅程。(160)

中央政府的代表与达赖的代表团及班禅喇嘛之间的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结束，签定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由于西藏的和平解放，回到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使中国完成了整个大陆和一切民族区域的统一大业。西藏人民受外国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悠久岁月已随西藏的解放永告结束，西藏人民“漫长黑夜之后的光天化日”生活业已开始了。西藏复归于中国之内，表明国际帝国主义在亚洲这一地区进行侵略的阴谋遭到破产，东方的和平业已巩固；最后，西藏

问题的公允解决使中印两国的友谊更加深厚。

全世界的一切普通人士均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深感满意。西藏问题和平解决的消息极为伟大民主阵营各国人民所欢迎，认为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的协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胜利。没有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存在，这种胜利是难于获致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这一胜利也大有赖于一切爱好和平者的深切同情。

和平解放西藏的胜利大大地有助于亚洲各国和整个东方的反帝运动，如酷爱自由的朝鲜人民对美国侵略活动的英勇而光荣的抵抗，越南人民为争取独立的勇敢斗争，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菲律宾群岛解放斗争的熊熊火焰。

为了履行协议，人民解放军于1951年10月26日进驻拉萨市。该市城郊居民共20,000余人在迎候人民军队的地方，举行群众大会。

群众大会之后，接着即举行欢迎解放军进入西藏的各种庆祝大会。

不久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分别开入西藏其他各城市。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全体居民的热烈欢迎。欢欣若狂的藏族人民高举着鲜明的标语、宣传画，高举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肖像和五星红旗，夹道欢迎自己的解放者和兄弟。

班禅喇嘛的左右，高级僧侣的代表人物和班禅青海行辕的藏族官员一行200人，在远离乡土28年之后，重又返回拉萨。班禅喇嘛也到达西藏，受到居民的热情欢迎。

藏族人民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藏族的代表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一开始就被选入共和国最高的立法机关——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

谁都认为给藏族人民以民族区域自治权是解决西藏民族自决问题最好的办法。西藏自古即为中国之一部。举凡共和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均曾致力于中国的解放斗争。藏族和中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才有真正获得解放的可能，因为全国均已根除民族压迫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民族问题则正在按照完全民主和民族平等的精神求得解决。西藏的落后状况只有靠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由于历史条件关系，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远较国内各民族为高的汉族人民，共同努力始能根本改观。除此以外，藏族尚有许多久居内地，在发展水平上高过他们，并有一切可能帮助他们的同族人。

1952年5月23日，藏族人民隆重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订的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报导，值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订的周年之际，达赖和班禅均电毛主席致敬。毛主席在复电中说：“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161)

## 自由西藏一瞥

自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以来，为时还不过只有几年。但是，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之内，藏族人民的生活业已起了极大的变化。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

政策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保证藏族人民有与全国其他各民族完全平等的权利，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在改善其生活方面给藏族人民以经常的帮助。

1951年，国营商业机关即按照比外国商人收购价格高出数倍的价格，在西藏地方大量收购羊毛[162]，1951—1952年，发放给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等市居民的无息贷款计5亿余元（旧币——译者）。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均获得此项贷款[163]。1953年，复以借贷的形式发给藏族农民种子375吨，供扩大耕地面积之用。在西藏解放以后的三年间，人民解放军部队帮助藏人开垦了2,700公顷的生荒地[164]，挖掘了许多公里的灌溉渠，并在水渠两岸种植柳树数千株[165]。

对于改进农业耕作方法，提高谷物收获量和栽培蔬菜均极为注意。仅仅1951年的一个春天，拉萨郊区新开土地即已施肥100多万公斤[166]。经验证明，西藏是可以获得高额收获量的。1953年，拉萨开办了一所农业人员训练班（农牧业技术干部训练班——译者）。

目前，拉萨近郊正在开采西藏解放以后始发现的煤层。西藏安装了第一座熔矿炉，修建起第一个毛纺工厂。据《西康日报》1952年报导，仅拉萨以西的罗布林卡一区即已建起住宅300所[167]。

西藏各城市均已设立邮电局。1953年12月，北京与拉萨之间的长途电话开始通话[168]。中国人民银行已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市设立分行。1953年初，拉萨各商业机关的交易额即比解放以前增加50%。市场物价不断下降。例如，茶叶的价格已降低三分之二[169]。

西藏创设了许多保健所，居民可以免费就医取药，组织

了流动医疗站和防疫队，派往僻远地区分别给居民和牲畜治疗疾病，进行预防措施和接种工作。1952年8月，西藏第一所医院——拉萨人民医院——开幕，实为西藏的一大创举。半年之内，在该院就诊的病人即达27,000余人；两年期间（1951—1952年），用于西藏地方的保健经费已逾130亿元（旧币）[170]。拉萨开办了兽医防治人员训练班，培养接种干部。靠了大力推行各种防治流行病的办法，仅1953年一年，即已防止9万多头牲畜免于疾病和死亡[171]。

对于发展文化方面非常注意。现已设立备有藏文书籍和期刊的图书馆多所。所藏书籍之中有许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品。拉萨成立了编译委员会，负责主持出版事业。西藏各大城市均已创办小学和普通教育班（社会教育班——译者）。

自和平解放以后，藏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加奋发起来。1953年春，西藏成立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该联谊会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1952年5月4日，拉萨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西藏地方组织[172]，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于1953年3月8日在拉萨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告成立。藏族人民对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日益增长和深厚起来。许多西藏代表团的旅行内地也促进了他们对祖国的爱戴。1952年夏，第一个藏族代表团到北京[173]。随后又有几个包括藏族各阶层的代表团来到中国的首都。藏族代表参加了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争取和平和友谊的联欢节。藏族人民对苏联人民抱着极热烈的同情。在拉萨举行中苏友好月的期间，居民和喇嘛纷纷集会，尽量阐扬中苏人民友好的重大意义，从各方面说明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取得的成就。

藏族人民积极参加当前最广泛、最有力的争取和平运动。中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和保卫和平会议的代表团均有藏族代表在内。

康藏和青藏两条公路于1954年12月25日竣工通车，是西藏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据《中苏友好报》1955年7月9日报导，两路全长逾4,300公里。1955年，由拉萨至日喀则，由日喀则至江孜和由江孜至帕里的三条公路均已修建完工。

西藏地方的内政方面仍然保持原先的行政系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均毫未变动。藏族代表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后又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藏军队业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应为西藏军区成立——译者）。藏人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西藏于1951年获得和平解放，表明帝国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方的种种阴谋已完全破产。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未停止其在邻近西藏边境的地区内进行各种挑拨活动，他们散布各种无稽谰言，诽谤人民政府在西藏方面的政策，企图煽起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敌意。由于帝国主义的扩张活动和历次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前在西藏地方造成的局势，使帝国主义的谍报机关更易于找到进行这种活动的机会。既然原来的条约均已失去法律上的约束力量，所以有必要与印度调整有关西藏方面的各项问题。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平等互惠的原则，于1954年4月29日签订了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正如《人民中国》杂志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协定“消灭了英帝国主义统治西藏的痕迹，为发展和巩固中印两国人

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174]。

按照这个协定[17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到印度共和国与西藏地方的通商利益，保留印度政府对亚东和江孜的商务代理处及在噶大克创设印度商务代理处的权利。中国政府同意开亚东、江孜、帕里、噶大克及其他九处为贸易市场。印度政府方面同意中国得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设立商务代理处，指定噶伦堡、西里古里、加尔各答供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由于尚无为中国商人开放印度其他地方的必要，所以协定载明，如果将来发生这种必要，印度政府“准备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考虑这个问题”[176]。

协定第1条说明两国商务代理处享有同等地位和同等待遇。可见，这一条即完全符合于平等互惠的原则；印度设在西藏地方的商务代理处现已不再带有片面的特权性质。其他关于香客朝圣事宜和关于经过中印边境往来于西藏地方事宜的一切条款也都是根据这个原则订定的。双方代表团在签署协定时还互换了照会。印度政府允于6个月内将其驻在亚东和江孜两地的武装卫队完全撤退，并将其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连同12个驿站（车马止宿的客栈或饭店），一并以合理的价格移交给中国。印度政府将其在西藏地方占用的地皮，除亚东部分（院墙内——译者）地皮外，一律交还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印度保留其在西藏地方的印度商务代理处院墙内的房屋，允许印度政府继续向中国方面租用商务代理处院墙内的地皮。同时，印度政府同意中国驻噶伦堡和加尔各答两地的商务代理处得向印度方面租用地皮并建筑房屋，供其使用。双方商人和香客的生命财产由对方政

府加意保护。双方商务代理得按照当地政府的法律及规定，接触被拘押和有罪行的本国侨民；双方商务代理得在当地雇用人员。双方商人均得租用房屋，按照当地法律及规定经营商业，以正常的价格雇用交通工具并按照当地法律及规定处理商人之间的纠纷。

由此可见，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各种有关交通和通商的重要问题均已得到调整，这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继续发展。

《人民中国》杂志评论这个协定的时候写道，中印两国自古以来一直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中国西藏地方的居民与印度之间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关系尤为密切。评论往下指出说："但是，从19世纪末叶起，当英国利用印度作据点，开始侵入中国领土西藏的时候，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对此，印度共和国当然不负任何责任。"(177)

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4年5月15日就这个协定有关的各种问题在议会发表演说时指出说："为了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够和平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意彼此绝不干涉内政，最后，即使不说也是很明白的，同意彼此绝不实行侵略，那末，这个协定对印度固然重要，我相信对中国也当然是很重要的。由于这个协定使亚洲地区的和平在很大的程度内有了保障。"(178)要对这个对亚洲、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进行评价，那就是和平共处原则的胜利。此项协定把帝国主义在西藏推行侵略政策的遗迹一扫而光，使中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更加稳固。

中印所缔结的协定之所以有重要意义，还在于其中适当

体现了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原则。

1954年10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之间在新德里签订了第一个中印贸易协定。在谈判的期间，中国代表表示本国政府同意继续在印度采购中国西藏地方所需的大量商品，印度方面同意为某些中国商品经加尔各答运往西藏地方创造条件[179]。为了发挥这个协定的作用，关于印度大米供售西藏的谈判于10月19日达成协议[180]。在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之后，中印两国通过西藏扩大联系的前途未可限量。这两条公路通车之后，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联系更加稳固，在西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必然要起极重要的作用。

藏族人民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

目前，中国西藏地方内部生活的特点是由于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广泛权利而引起的全民政治积极性。藏族人民正与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一道，为了自己祖国的繁荣而倔强地劳动。

**注释：**

〔1〕《苏联共产党（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录》，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3年版，第1部，第286页。

〔2〕《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3〕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4〕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5〕《北京每日新闻》，第815号。

〔6〕本书并未加意探讨藏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应是一种特殊研究的对象。

〔7〕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8〕同上。

〔9〕《中国与日本》，1910年，第25号。

〔10〕纳姆岗因为在青年时代犯下罪行，避祸由西藏逃往蒙古。当达赖驻库伦的期间，他夤缘得到达赖的信任。成为其左右近侍之一。在帮助这位宗教领袖逃往印度之后，纳姆岗一变而为达赖最亲信的红人。麦克戈汾在其所著的《乔装入拉萨》一书中，说纳姆岗对于这次事件所起的作用最大。他称纳姆岗是“反汉暴动的组织人”。柏尔在《西藏今昔》里更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认为“这次暴动的火焰是由达赖的特务煽起的”。第一个论断与第二个论断并无冲突。当时各报不断披露藏人之中按照达赖的命令组织起来的这次反汉运动。现在从印度派来西藏的恰好又是纳姆岗，他以前一直是在和英国当局商谈援助问题的。

〔11〕我国（苏联—译者）档案之中保存有两种文件，对于此事的经过，说明大抵相同：其一写于1912年4月，另一写于1912年6月。后一种文件系根据由一位自1911年秋天到1912年5月中旬这几个月之间都住在拉萨及其邻近的“局外”观察家（显然是个英国人）口头叙述，经印度报纸予以刊载的材料拟就的。这两种文件分别保存于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和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

〔12〕柏尔：《西藏今昔》，第120—121页。

〔13〕同上。

〔14〕《远东国际关系》，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第204页。

〔15〕《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2集，第19卷，第2部，第451页，附注一。

〔16〕《中国与日本》，1912年，第90号。我们迄今尚不知道

这笔汇款后来究竟怎么样，但这件事实本身说明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到了何种程度，以致为了接济自己的拉萨守军，竟不得不请求英国银行居中代汇。

〔17〕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18〕艾恩斯科辅（Th·Ains Cough）：《边境杂记》。上海1915年版，第9页，第16页。

〔19〕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19页。

〔20〕《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2集，第20卷，第2部，第47页，第506号。

〔21〕同上。

〔22〕《新时代报》，1912年8月23日（9月5日）。

〔23〕《新时代报》，1912年8月23日（9月5日）。

〔24〕当路透社传出这个消息时，美国驻华代表威廉（Williams）曾向华盛顿方面探询有无其事，没有得到否认的答复（见威廉著：《西藏与其四邻》，加尔各答1937年版）。

〔25〕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26〕例如《新时代报》记者写道："西藏现状的任何改变，不得到俄国的同意是不行的，英国对俄国负有尊重西藏独立的义务"〔见1912年8月23日（9月5日）《新时代报》刊载的"英国与西藏"文一中〕。

〔27〕《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2集，第20卷，第2部，第174页，第646页。

〔28〕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20页。

〔29〕《先锋报》，1912年11月8日。

〔30〕同上。

〔31〕《华北日报》，1913年，第14905号。

〔32〕《中国回声报》，1913年3月1日。

〔33〕《远东评论》，1913年，第1799期。

〔34〕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35〕《先锋报》，1914年3月13日。

〔36〕柏尔：《西藏今昔》，第122页。

〔37〕麦克戈汾：《乔装入拉萨》，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第179页。

〔38〕《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48卷，1913年2月版，第1464页。

〔39〕许多议员，包括泰罗（T·Taylor）在内，都持有这样的见解（见《报告》第48卷，1931年版，第1471页）。

〔40〕《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53卷，第388—389页。

〔41〕同上。

〔42〕同上，第53卷，第454页。

〔43〕《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56卷，第2323—2345页。

〔44〕达赖喇嘛"亲笔"函的译本现存列宁格勒国立中央历史档案库。

〔45〕列宁格勒国立中央历史档案库档案。

〔46〕帝国主义者在西藏邻省酿成的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容后再叙。

〔47〕《西藏》（英国外交部第70号袖珍书），第42页。

〔48〕柏尔：《西藏今昔》，第153页。

〔49〕同上，第152页。在西姆拉会议上向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甚至远远超出叶特上校在英国议会所说的范围。

〔50〕耐人寻味的是所谓"藏方"要求中竟然提都没提英国当局从中国夺去的那些不久以前尚属于西藏的一部分的领土，如哲孟雄、拉达克等等。一手制定这个要求原则的英国政府，却无意把这些土地返还西藏。

〔51〕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52〕《西藏》，第43页。

〔53〕诚如印人达斯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提案的主旨不仅要在西藏，而且要在中国其他地区扩大英国的势力。他一针见血地说，总之英人想重演他们征服印度的冒险事业，因为"内藏是西藏最富饶、最发达的地区，而四川的一部分也圈进了英国的势力范围"（《英人在西藏的扩张》，第113页）。

〔54〕《哈尔滨通报》，1913年，第2968期。

〔55〕条约草案的内容摘自伦敦发行的《三方会议提案》，1914。

〔56〕俄国驻印度外交官员在其致政府的报告中一再指出这一点。事实上，连英国国会议员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咨询，英国政府的阁员对之都是守口如瓶，概不置答的。

〔57〕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58〕同上。

〔59〕第6条和第8条也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激烈反对（《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3集，第3卷，第83—84页，第67号）。

〔60〕《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3集，第3卷，第212页，第176号。单是把第10条原先的条文取消了。

〔61〕《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

〔62〕同上。

〔63〕同上。

〔64〕《西藏》，第42页。

〔65〕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22页。

〔66〕《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64卷，第1447页。

〔67〕《泰晤士报》，1910年8月9日。

〔68〕《亚洲社会》，1910年10月号。

〔69〕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70〕同上。

〔71〕《国光新闻》，1913年4月20日，《中国与日本》，第

138期。

〔72〕《哈尔滨通报》，1913年，第2968期。

〔73〕《中国与日本》，1913年11月23日，第167期。

〔74〕同上，1913年4月20日，第136期。

〔75〕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76〕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26—27页。

〔77〕军队均须分编为营，每营共有士兵500人。每个营的指挥员有代本（上校）1名，连长5名，排长10名和班长50名。代本每年领薪饷2,000卢比，连长领700卢比，排长领300卢比，班长领100卢比。每个士兵规定每年领薪饷60个卢比，供给伙食和服装。

〔78〕达斯估计西藏每年的岁入约合200万卢比。

〔79〕柏尔：《西藏今昔》，第174页。

〔80〕1918年以后，凡是写西藏问题的英国作家对此都是毫不隐讳的。

〔81〕我们早已看清瓦德尔、柏尔等等之流如何竭力搜寻自己中意的借口，挑拨藏族反对汉族，否定汉藏两民族的亲密团结对于藏族的重要意义。虚构的藏族国家起源史尚不能使他们感觉满意。他们抹煞汉族在藏族人民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如在准噶尔大军入侵和1792年廓尔喀部落突然袭击期间所起的作用。例如，柏尔其人，不仅一口咬定廓尔喀人主要是被藏人组成的军队所打败，而且非常认真地宣扬是在西藏人用神咒召来瘟疫，使廓尔喀士兵感染之后才遭到失败的（柏尔：《西藏今昔》，第41页）。

〔82〕《西藏》，第61页。

〔83〕同上，第64页，英镑对卢布的折合率是按照1894年的票面价格1英镑等于630个戈比换算的。

〔84〕请参看第1章。

〔85〕《西藏》，第69页。西藏与英领印度的贸易总值。1896—1897年为2,098,527卢比，而1897—1898年即增为2,252,460卢比（截至1945年6月30日，单是经由哲孟雄的英藏贸易一年即达11,500,000卢比）。

〔86〕但英藏贸易总值仅仅只占印度陆路贸易总值的2%左右（列宁格勒国立中央历史档案库档案）。

〔87〕《西藏》

〔88〕柏尔：《西藏今昔》，第164页。

〔89〕达斯：《西藏游记》圣彼得堡1904年版，第243页。

〔90〕柏尔：《西藏民族》，牛津1928年版，第83页。

〔91〕同上，第84页

〔92〕同上，第85页

〔93〕同上，第130页

〔94〕据柏尔说，英国政府拒绝藏人的提议是因为它不愿意负西藏的责任，西藏之于英国，其"主要作用是次于喜马拉雅山的第二个堡垒"（柏尔：《西藏今昔》，第159页）。

〔95〕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第135页。

〔96〕麦克戈汾：《乔装入拉萨》，第198页。

〔97〕柏尔：《西藏今昔》，第191页。

〔98〕十二条要求的原文可参看1927年6月23日的英国《工人日报》。

〔99〕柏尔：《西藏今昔》，第166—167页。

〔100〕窦赐孟：《一个领事官的游记》，第51—53页。

〔101〕早在1915年，英人艾恩斯科辅即已在他那本《边境杂记》中写道：如果英国公司企业想在中国保持商业上的优势，它们现在就应当密切注意中国这一最辽阔、最富饶、拥有5,000万人口的省区（见《边境杂记》第7页）。

〔102〕《西藏》，第27页。

〔103〕同上，第2页。

〔104〕托列尔此行的报告，有后段摘要刊在《有关西藏的文件》（1910年）第185—186页。

〔105〕同上。

〔106〕艾恩斯科辅：《边境杂记》，第9页。

〔107〕艾恩斯科辅：《边境杂记》，第41—43页。

〔108〕《马恩全集》，第9卷，第199页。

〔109〕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24页。

〔110〕柏尔：《西藏今昔》，第251页。

〔111〕《中国每周评论》，第68卷，第12期，1933年2月18日。

〔112〕柏尔：《西藏今昔》，第187页。

〔113〕柏尔：《西藏今昔》，第255页。

〔114〕麦克戈汾：《乔装入拉萨》，第188页。

〔115〕关于英国统治集团为了巩固自己在西藏的地位究竟要追求什么目的，柏尔在《西藏今昔》一书中（第19页）说得非常含混。

〔116〕孙中山：《中国革命家札记》，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125页。

〔117〕柏尔：《西藏今昔》，第198页。

〔118〕同上。作者证实当时印度方面日渐滋长的反英情绪，对拉萨也有很大的影响（第199页）。

〔119〕柏尔：《西藏今昔》，第221页。

〔120〕米尔查·古拉姆："英帝国主义进攻西藏和华西"。载《域外东方》杂志，1933年第3—4期合订本，第130页。

〔121〕《中国年鉴》，1926—1927年，第808页。

〔122〕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第135页。

〔123〕麦克戈汾：《乔装入拉萨》，序言第9页。

〔124〕古拉姆："英帝国主义进攻西藏和华西"，载《域外东方》杂志，1933年第3—4期，第132页。

〔125〕《柏林日报》，1933年2月1日。

〔126〕英国《工人日报》，1933年1月21日。

〔12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速记报告，第1卷，莫斯科1933年版第21页。

〔128〕麦克戈汾：《乔装入拉萨》，序言第10页。

〔129〕《人道报》，1933年1月3日。

〔130〕柏尔：《西藏今昔》，第219页。

〔131〕《中国每周评论》，1934年8月18日。

〔132〕1935年夏，南京政府宣布班禅喇嘛定于六七月间启程去拉萨，但经过数月之后，始知班禅并未回藏。1936年4月25日，上海《申报》写道："由于西藏亲英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班禅喇嘛无法返藏。"

〔133〕《中国全国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集)，莫斯科1935年版，第64页。

〔134〕真林（译者）：《两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39年版，第33页。

〔135〕《真理报》，1934年2月28日。

〔136〕《中国每周评论》，1936年4月25日。

〔137〕同上，1936年6月6日。

〔138〕例如，据各报报导，凡是红军曾经到过的西康各地的藏族居民均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积极性，竭尽一切可能帮助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39〕《中国评论》，1935年，第11卷，第1期。

〔140〕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35页。

〔141〕尽管帝国主义的间谍机关用尽了各种诡计，但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的代表却于1940年1月到达拉萨，参加达赖十

四世的坐床典礼。南京政府的代表到达西藏，主持达赖喇嘛的掣签事宜和坐床典礼，这就无异于“西藏自认为是中国领土”（见刘贯一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33页）。

〔142〕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52—153页。

〔143〕斯密：《通西藏的金门》，1949年版，第234页。

〔144〕《中国每周评论》，1949年9月19日。

〔145〕《闪电报》，1949年8月1日。

〔146〕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100页。

〔147〕同上，第49页；《新时代》杂志，俄文版1949年，第49期。

〔148〕1950年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表文告，严申为了保障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他们的传统和地方的风俗习惯，应竭力保护各地的喇嘛寺庙。未经寺庙住持同意，军队不得在寺庙驻扎。至寺庙所属的各种建筑物、神殿、经楼以及其他财产，均应予以充分的保护。（参看1950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译者）

〔149〕《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译者

〔150〕〔151〕《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译者

〔152〕英国公认的西藏问题专家麦克唐纳，带着异常熟悉内幕的神情，于1950年1月在《政治家》报发表文章，纵论西藏的局势说：“为了促进西藏的政治效能，尚应增设几个部，如军政部、外交部、后勤部、交通部，扩充军队员额，加紧进行教练和装备自动武器。”《约克郡邮报》驻加尔各答记者于1950年6月发出消息说：“不久以前，我看见有500至2,000匹骡子，驮着一箱一箱的手榴弹和子弹，每天攀登陡峭的山径，经纳特胡尔山道运往拉萨。所有这些驮运的东西都是美国的武器”。

〔153〕《真理报》，1950年1月20日。

〔154〕1950年年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声明说，美国非常关心克什米尔问题，因为它距西藏不过几英里。

〔155〕《真理报》，1950年10月1日（见同日的《人民日报》——译者）。

〔156〕《人民日报》，1950年11月9日。——译者

〔157〕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以前，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范围尚包括西康省的一部分地区，连同昌都在内。

〔158〕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67页。

〔159〕《西康日报》，1951年2月19日。——译者

〔160〕《真理报》，1951年4月24日。前往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的西藏代表团分为两路去北京。由阿沛率领的代表于4月16日抵重庆，然后经西安至北京。其余8人则取道印度、香港至北京。

〔161〕《真理报》，195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1952年5月24日——译者）。

〔162〕《人民中国》，俄文版，1953年，第10期。

〔163〕同上。

〔164〕《人民中国》，俄文版，1958年，第10期。

〔165〕《中国评论》月刊1953年，第4期。

〔166〕同上。

〔167〕《新时代》杂志，俄文版，1952年，第48期。

〔168〕《人民中国》，俄文版，1954年，第13期。

〔169〕同上，第10期。

〔170〕《人民中国》，俄文版，1953年，第10期。截至作者撰稿时，西藏已有好几所医院。

〔171〕同上，1954年，第13期。

〔172〕同上，1952年，第11—12期。

〔173〕同上，1954年，第13期。

〔174〕《人民中国》，俄文版，1954年，第13期。

〔175〕协定全文可参阅《人民日报》，1954年4月13日；俄文译文载于《国际生活》杂志1954年第1期。

〔176〕协定第2条。

〔177〕《人民中国》，俄文版，1954年，第10期。

〔178〕《国际生活》杂志，俄文版，1954年，第1期。

〔179〕《人民中国》，俄文版，1954年，第23期。

〔180〕《真理报》，1954年10月20日。

# 古德使团与14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坐床

（英）阿拉斯塔·兰姆 著　刘敬师 译

**编者按：**阿拉斯塔·兰姆，英国学者，专攻中印边界问题。自60年代开始，著有大量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论著。《英国与中国中亚细亚：通向拉萨之路1767—1905》（1960年出版）；《中印边境：有争议边界的由来》（1964年出版）；《麦克马洪线：1904～1914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关系的研究》（1966年出版）；《在拉达克的中印边界》（1973年出版）；《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一个帝国的外交史》（1989年）。这一系列以历史线索为根据著写的专著，奠定兰姆在国外研究中印问题的权威地位。所有这些书都涉及到西藏。作者治学严谨，立场公正。他的父亲留内尔·兰姆曾在华出任英国外交官达30年之久。《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一书是研究西藏近代涉外问题的专著。作者大量引用了英国原印度事务部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以及公共档案局资料，还拜访了许多涉及近代西藏历史的人物如贝利上校、尼威尔上尉、黎吉生、柳升祺等。本文选自该书第九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西藏历史上少有的动

荡岁月。十三世达赖的晚年与圆寂，他与九世班禅的矛盾及九世班禅客逝青海，国民党政府加紧与西藏联系以及英帝国主义对西藏新图谋，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与坐床……等重大藏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古德原为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卡罗是英印政府外务秘书。十三世达赖晚年逐步认清了英帝国主义侵藏野心，并加强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国民党政府准备武装护送班禅回藏，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对此，英帝国主义企图从各个方面制止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为达此目的，英印政府外务秘书卡罗先后进行了两个阴谋活动：第一，派遣以古德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前往西藏，干涉班禅返藏，在拉萨建立英国代表机构，挑拨汉藏关系，破坏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第二，卡罗在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会议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上大做文章，企图以此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38年前后，卡罗围绕西姆拉会议建议英国政府收回或销毁了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原版（因为本版真实记载了西姆拉会议情况，指出"中国拒绝正式签署这项三边条约"），而以修改后的1938年新版伪充1929年原版。修改后新版把西藏列为与中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并认为"麦克马洪线"在藏印之间是得到批准的。卡罗派遣古德使团、篡改条约之举都是为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利益，并否认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地位。本文对上述历史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描述。

因其利用了英、印等国丰富的官方档案，并采访过许多当事人，故将它译出，对于了解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藏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原文后注太长，故省略未译。

卡罗（时任英属印度政府外务秘书一译注）在1936年4月13日写给英国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秘书哲特兰侯爵的信中，再次提议应再派一个使团前往拉萨，此使团拟由接替惨死的威廉姆逊而新任驻锡金政务官的巴西尔·古德率领。此举的一个直接目的与中国人护送班禅喇嘛回藏这个问题以及护送不得再深入西藏边境的要求有关。藏方要求余下的行程由藏人在获得英国保证的条件下完成护送。分明有这种可能：英国官员可以在靠近玉树（Jyekundo）一带相机行事，某三方谈判或许可以补足甚至取代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还有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潜入西藏东部，由此可以引起英国对拉萨的进一步支持。对此消息无论如何得调查清楚。1936年5月21日哲特兰侯爵同意派遣使团，古德立即指示诺布顿珠前往拉萨开路。

由于有病在身，诺布顿珠实际上到了1936年6月26日才抵达拉萨，这时他发现噶厦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中国共产主义的危险显然已经过去。更有甚者，以调解宽恕班禅喇嘛的愿望当时已为愤怒所代替，因为从他先期到达的行李中发现了用于战争的武器，这表明班禅喇嘛的意愿并不是和平。处于这种境况之下的西藏人对威廉姆逊事件之后不久又出现的使团并不表现出太大的热情，但是英印政府还是决定继续前进。

古德使团在规模上比以前的任何一个使团都要大。跟许

多以前的拉萨之行一样，这次除了诺布顿珠和Dr.Bo Tsering之外，还有一个医务人员、上尉W·S·摩根，和一个规模庞大的欧洲代表团。古德有两个助手：他的私人秘书、探险家和登山家F·斯宾塞·查普曼；驻江孜商务代表休·黎吉生，此人将充任古德这个驻锡金政务官的特别助理。如果在最后的时刻不为病魔所阻的话，老资格的戴维·麦克唐纳也将同行（作藏语翻译）。此外还有一小队军事人员，包括准将菲力普·尼姆，和中尉E·Y·尼庞以及皇家通信兵S·G·道格，他们随身携带了大量无线电装置。队伍离开甘托克时空下120匹驮行李的矮马，以便在江孜多装一些物件，加上仆人和赶马人，这就组成了一行令人瞩目的马队，与1934年黄慕松将军的入藏队伍相比肯定毫不逊色。

同往常一样，使团并不预先通知中国政府，这在那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自1904年荣赫鹏首次探险以来，英国的在职军官就一直象他们1904年所作的那样，由一个准将率领前往西藏首府。这次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个使团是个友好使团，并无护送的军队。总果中国人可以派遣一个高级军事官员到拉萨，那么英印政府也可以派遣。当然，无线电装置也要与黄慕松携带的相当。但是，如果这个使团确实要到玉树去同班禅喇嘛及他的中国盟友周旋，这些装置也同样会非常有用，这只是可能。

使团于1936年8月24日抵达拉萨，同往常一样下塌于德吉林卡。过了西藏的新年庆典，古德于1937年2月17日离开西藏首府返回锡金。其他一些人早些时候已经离去，剩下的随后也将离去。除了“荣赫鹏远征”那次外，早期的英国使团人员在那里被用一种相当秘密的方式处决了，古德使团积

极地要寻觅宣传的材料。F·斯宾塞·査普曼的任务之一就是拍一部西藏的彩色录相；而且他还能出版一本有关他1938年随团经历的书。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德给《泰晤士报》送了一份材料。当他还在拉萨的时候《泰晤士报》就以“英国人在西藏”为标题把这份材料发表在1936年9月25日的刊号上。在他的这份材料中也没有用太多的篇幅来清楚说明中国人对西藏的“宗主权”的观点。从某一方面看，古德使团一事可以描绘为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闹剧，以此证明中国对西藏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当然，鉴于条约国地位的复杂性和英国对中国的外交需要，有些东西是不能公开地说出来的。

当作令人瞩目的成就——步荣赫鹏之后尘第二次探索西藏奥秘（贝利、威尔和威廉姆逊这些以前的探险几乎不值一提），加强了稳固的盎格鲁—西藏的友谊——而向外界显示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收效甚微。古德使团的最大结果是在拉萨确立了一个英国常驻代表资格，这正是荣赫鹏当年的雄心，虽然这种确立是间接的。当古德于1937年2月返回锡金时，他留下了黎吉生。黎被噶厦暗中接受为驻拉萨的英国使节，就象黄慕松将军留下他的一个同僚蒋致余一样。除了名称之外，德吉林卡完全变成了英国驻拉萨的外交使团之家。还给黎吉生留下不少无线电装置（也与中国人已经拥有的不相上下），这些装置由雷京纳德·福克斯操作。此人于1937年3月已经替换了那个皇家通信兵。但是从理论上说，驻拉萨的英国代表不过是驻锡金政务官向外派出的代理，他直接对后者负责。黎吉生、诺布顿珠、卢德罗和雪利夫不同时期都在此身份限度内干过，黎吉生是最早的也是最后的一个。事实上，他一直干到英国退出印度之后，直到1950年中国和平解

放西藏前夕辛哈博士接替他为止。

除了在西方惹起种种出版物的发表之外，古德使团所造成的最明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西藏人再次准予一次英国人的喜马拉雅山探险。1938年的那次（由H·W·台尔曼率领）是二战爆发前的最后一次。现在看来，这次喜马拉雅山探险似乎与英国的几次拉萨使团密不可分。1933年的探险在第二次威尔使团前夕得到准许；1935年和1936年的探险恰在第二次威廉姆逊使团之前得到批准。可以说，这些喜马拉雅山探险之许正被噶厦变作献给前来的英国使节的欢迎之礼。但是，对古德使团来说，这种许可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件送别之礼，而且还是在古德开口索要之后才得到。更有甚者，西藏人明白地表示，他们对翻山越岭而来的外国人进行的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的商务越来越感到厌烦，他们希望这是外国人烦扰他们的最后一次。

从卡罗政策的内在联系上看，对古德使团的最大希望可能是：使团可以利用在玉树的班禅喇嘛与中国护送之间的矛盾，使英国能深深地渗入整个西藏并能倡导在东边靠近中藏边界一带举行三边的会谈。其结果说不定能够顶代那个流产的《西姆拉条约》，或者得到比1918年台克满在邻国关系上竭力设法维护的东西更为根本的某些东西。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了解的，班禅喇嘛的处境实际上从未创造过这样的机会。古德使团留在拉萨并只能与西藏政府进行会谈。

尽管中国代表蒋致余的确试图根据他的条件同英国人建立来往关系，但他并不造访古德；当然，古德也不会“先送秋波”造访蒋。谈到蒋致余，古德说，毫无疑问，“事实上他充当中国政府的代表，他的影响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西

藏人毫不动摇地拒绝给予古德和他的同僚以蒋在拉萨所享有的那种官方地位；但事实上他在每一个正式场合都受到尊敬，并总有一小队携带自动武器的卫队相随。

班禅喇嘛问题过去之后，对抗蒋的需要可能就成了古德使团背后的动力。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蒋对事实真相已知道得很多，尽管西藏人告诉古德他们并不希望蒋这样。中国人有无线电设备，——这是制造巨大好名望的机器，——西藏人向古德强调，他们早就想除掉这些东西。关键看英国人的无线电设备。在英国无线电设备到达之前，蒋不仅已经可以向世界广播中国的新闻，而且能以之帮助西藏的官僚、贵族、商人和僧侣解决问题，方式是让他们跟在中国的代表或同事取得联系。另外，每个周日晚上西藏都能收到发自成都的中国广播，这在拉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那里显然有些接收器材掌握在私人手中，有些是中国提供的。无线电是一件可怕的武器。新闻、宣传说到就到，而印度的或通过印度转来的报纸要经过几周时间才能到达，然后还得翻译成藏文。古德在德吉林卡张罗建立他自己的无线电，给摄政王和擦绒提供接收器、收听机，还为首席噶厦提供诺言。古德听说，蒋已试图说服噶厦拒绝允许英人使用他们的无线电。据说噶厦回答说，如果中国人可以拥有无线电，那么英国人也应该可以拥有。为了给噶厦制造一个可以用来反对中国人使用无线电的借口，古德提出在使团离去时把英国的设备移交给西藏人。但最后这事并没有实现（尽管英人在拉萨的无线电最后成为西藏无线电台的一部分）。原来的装置是印度军队的财产，必须送还印度并以民用设备取而代之。古德使团的第三个考虑重点是军事问题。尼姆准将的任务就是要估测

一下西藏军队的潜力和迫切的需要。他在西藏期间严格地考察过西藏人，他的主要印象是：

作为一个民族的西藏人是绝对不崇尚武力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能量都被宗教事务大大地吸住了。喇嘛官员和文武官员分享了所有权力。西藏政府和与军队有关的官员对健全的军事组织、管理和训练几乎没有什么主见。两个总司令——一个喇嘛，一个军人——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任命的代本和将军是没有经过什么军事训练的贵族。有经验的正式军士没有升任鲁本(级别较低的军官)以上的。西藏的军官等级制度不分青红皂白都由文官擢升为军官，不论其资格如何。事实上，那些曾经在印度受过训练的西藏军官几乎一概被放到与军事毫无关系的民事职位上。这些人几乎忘掉了他们在印度学到的所有东西。四年前在江孜学习机枪的指挥官一直未被起用，直到今年为止。结果他们已经不能进行指挥。野外训练实际上从未进行。在和平时期，军队受雇为政府当苦力。手枪、机枪和留易斯枪的瞄准练习从未举行，来福枪的瞄准练习也做得很少。结果，西藏东部的现役军队在军事行动中不能有效射击，徒靡弹药。对枪支的关照和擦洗被认为极差。

他最后的结论是：

有理由说，他们除了拥有一定数量的现代武器之外（他们中很少有人会用），军队与1904年的情

况相比并无多少长进。那时，英国使团在向拉萨挺进的过程中虽遭到多达15000名军队的抵抗，但这些军事抵抗并未造成什么困难。在每一次行动中，英国使团的兵力从没超过三营，且只有一两门山炮的支援。

谈到什么东西与这种相当无望的状况相关，尼姆不得不作些劝告。现有的军事储备已经不多。藏军装备中十门山炮（2.75英寸口径）仅有三门可说完好。噶厦在布达拉宫存放了大批炮弹。尼姆估计，无论何时，军队自身都有四分之三人员休假在家（这节省了军粮）。大约有20个小分队在金沙江一带沿中国边界摆开，但没有后援部队。尼姆建议在拉萨训练一个军官后备团，再通过它训练军队，这样将有大批的藏军可送到前线去发挥他们的作战技术和勇敢，夺取战争的胜利。这一过程可用七年时间。接受这种训练的人应当穿上合适的制服。他相信传统的英国式制服，包括沃尔利斯头盔，很不适于在西藏荒野上的行动。他写道："我建议，某些西藏式的穿戴应当推广。家织的西藏布料可用来做制服，西藏靴应取代英国靴，这容易做得到。"

谈到英国的卷入，尼姆指出两点。首先，需要从印度军队中得到更多的指挥官。其次，尼姆赞同，为了对西藏的要求作出反应，应该通过一个法案，给予更多的军供。1936年9月，他返回印度之后就草拟了一份订购单。印度政府也许可以供给西藏四门以上的山炮，以可发射12磅重炮弹的大炮替换迄今为止所提供的2.75英寸口径的武器，配以800发普通HE炮弹，再供给五挺威克尔型和十挺留易斯型机枪以及少

量装弹弹夹和子弹带。

印度政府最后决定，还是提供那种2.75英寸口径的武器，外加三挺D·P·水准的威克尔型机枪。这就是说，它们只够训练之用。他们说服不了印军总参谋部派遣必要的指挥官到西藏服役。他们所能献给噶厦的是：在阿萨姆邦的锡龙免费对12名军官进行训练。但是武器和弹药必须以现金偿付。在过去的军需供应上，西藏人已经欠了印度政府600,000多卢比。伦敦同意供给那些传统的军备，但建议将现金付款的要求改为某种借贷安排，就象1933年所做的那样。

令人惊奇的是，在印度的英国军事当局中的一部分人缺乏卷入西藏的热情。两个皇家通信兵尼庞和道格带着他们的军事装备被迅速撤走了。印度政府不得不找无军职的人员代替他们。显然，尼姆的报告已经说服了总参谋部：西藏军队是不值得帮助的。文官们不得不在1936年末和1937年初给军队施加重压，以理顺关系。

给西藏军队供应武器的建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国的抗议。蒋致余如果不是从他在西藏政治高层的关系中得到了有关消息，无疑便是从拉萨的传闻中听到了风声。他肯定用无线电将此事向南京作了报告。在此期间，1936年9月，中国驻伦敦代办陈博士几次到外交部晋见C·W·奥德，询问那些报告的真相。奥德指出，西藏和印度毕竟是邻居，不能指望印度"使它与西藏的所有来往都顺从于中国政府的愿望"。陈博士回答说，很遗憾，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存在任何英中间的协议。奥德驳斥说，中国有"许多好机会"，"就是因为中国自己的过错才使得《西姆拉条约》的签署失败之后进一步的谈判不能够举行"。印度外交部希望在这次交流中

看到可能重开三边会谈的萌芽，纵令很小也罢。因为某些条件正在出现。也许，古德使团就是这样一个条件。但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极不可能。

从英国的观点看，古德使团在拉萨所发现的政治形势相当不妙。13世达赖喇嘛死后和官披拉·隆厦倒台后，在噶厦中以最强有力的人物面目出现的却门噶伦当时正经受着癫痫病发作的折磨，实际上已从公共生活中退出。摄政王热振多少是个不可解的谜。古德认为他不是没有能力和野心。据说他也沉溺于宗教生活，而且一旦寻到新一代的达赖喇嘛，他就会结束摄政期。事实上，当1941年2月他的职位被达扎·仁波切攫取后，他就确实是下台了。那个长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驻锡金政务官的继任者擦绒一到位就立即晋见了古德。他目前控制着造币厂和军火库，但他不是噶厦中人，而且他当然也不是西藏的"强人"（英国人曾经认为他是）。事实是，那个时候拉萨根本就没有什么"强人"。西藏政府在14世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悬久未决，陷入僵局。英国的朋友很多，象晋美·次仁和年老的拉边·仁冈都是，后者除了管电之外还充当噶厦的英语翻译，但是没有一个是英国可资依赖以在任何使西藏现代化的计划中担当帮手人，更好地抵抗中国的进一步压力的。

使团军队的一次有趣行动是为了在拉萨附近寻找一个飞机场场址而考察几个可能的地点。最后确定了三个地方。这次寻找机场场址的行动是否意味着这是英国最后一次拒绝接受西藏人不要飞机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威廉姆逊之死时表现过），还很难说。如果说卡罗主义已经在拉萨与印度之间造成了日益紧密的现实联系的话，那么空中的联系就将是极端

有益的了。

在班禅喇嘛返藏这一问题上，正如前一章所看到的，古德使团并没有取得什么有意义的进展。使团前往玉树附近某处监视班禅喇嘛的返乡之行，这种可能性很快被发现根本不存在。古德有临场决定权，他告诉噶厦，英国就班禅喇嘛的护送问题向中国提出的抗议不得不"限于外交领域"，即使到了那样的地步他又是如何劝告他们不要极力抵制中国的护送的。他决定行使他的临场决定权，"经过充分考虑后"闭口不提抵制护送的问题，他基于这样的考虑：对噶厦所作的劝告"不可避免要为中国政府得悉，并将在威吓、拖延和外交手腕的较量中使西藏政府遭受损害"。

还在古德使团的准备阶段，班禅喇嘛和古德使团就已经同噶厦讨论过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确实会成为今后印藏关系历史中的主题之一。这就是达旺问题。这里需要说的是古德在1936—37年并没有解决达旺问题。

古德使团的最有意义的结果已经提过。它导致英国在拉萨的永久代表资格的确立。虽然从一开始这就是使团的一个目标，但在形式上并未完成。正如古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述，正当他要离开拉萨时，引起了噶厦的一些质询。他回答说他的紧急离开并不表示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事情随后会由黎吉生加以考虑，他还要继续逗留一段时间。噶厦对此没有提出什么反对。黎吉生留下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时是受了诺布顿珠的指示，而且卢德罗和雪利夫替换过黎吉生一段时间，直到"权力移交"三年后的1950年为止。但是，英国在拉萨的代表处从技术上说仍然完好无损（这也已经提到过），直到英国时期——甘托克下属的驻锡金政务官的前

哨——结束为止。代表处最后获得了更多优越条件并增加了成员，比如增加了一名医务官。但是，在正式意义上（例如，象在噶厦的英国总领事那样的）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外交使团。从后果上看，代表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英国正式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到了五十年代中国返回外藏之后，独立的印度政府才把这个代表处改为总领馆。

西藏政府当然不认为驻锡金政务官的一个代表机构在拉萨出现并取得常驻权就是授予了印度政府在管理西藏外交政策方面的任何特殊地位。这正如噶厦在1930年代早期不同英国商量就通过卡廷（30年代赴藏的美国人——译注）同美国建立了他自己的关系一样。所以西藏政府也不过是同在它境内探险的欧洲国家的代表建立联系而已。举个例说，193年，法国人已经设法取得了西藏人的同意，不走英国人的老路而登上了芒康。又如，1939年，纳粹德国能够使人感觉到它在拉萨的出现。只有地理上的偏隔——这种偏隔由于英印政府方面设置的障碍而得到加强——防止这种外部联系的扩大，以免在西藏国际地位的界定上进一步增加麻烦。

西藏地位的实质是卡罗主义的核心问题。1936—37年拉萨之行后，古德试图在分析这个地区的条约地位中帮助明确这一实质，这个分析附在他的使团报告的最后部分。这个问题已经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后来的事实是：西藏人已经发出了想与中国重开双边谈判的信号，这正是在班禅喇嘛出现在青海的背景之下。事实上，1937年初他们就在严肃地考虑要派遣噶厦里的一个夏披（Shape）到南京去同蒋介石政府商谈班禅喇嘛的护送问题：这件事通常被印度政府叫做“夏披使命”。噶厦也很关注发生在德格的印藏停火线问题上的

危机。这次危机于1936年间突然爆发，持续时间很短，但导致了一场西藏人与刘文辉代表之间的地方性谈判。噶厦认为，派代表到国外去同最高级的中国官员谈判都将有益于这两件事情的解决。自从1913—14年的“西姆拉会议”以来，这种事还没有发生过。古德不知道英国有无条约权利阻止这种高级别的双边会谈，如果没有，是否西藏就得在中国对它拥有“宗主权”的条件下参加，而不能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参加会谈。

古德诡计多端地指出，由于没有签署“西姆拉条约”，中国人已经使他们自己丧失了宣称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权利：

> 因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对西藏来说，除了印藏协定…（1904年的“拉萨条约”）…和目前仍在不大列颠与西藏间（得到俄国同意）有效的1914年《通商章程》以及1921年由查尔斯·柏尔爵士同达赖喇嘛谈妥的特别协议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有效的协议了。1921年的特别协议去掉了1914年协议中规定的前往拉萨必须限于一定时候的条款，规定无论何时，只要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双方愿意，英国官员都可以临时派往拉萨。

这是行侠仗义的想法，这些想法得到了其他许多来自英藏关系的历史研究和1914年以来中国对那些关系的态度的证据的支持，表明无论从那一点来看，西藏现在都是一个脱离了中国“宗主权”的独立国家。但这个想法不能说服印度外

长奥布里·梅特卡夫爵士，他指出（这肯定得到了卡罗的同意）：

> 古德先生持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国现在无权宣称它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但是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不是派生于1914年条约的特权，相反，它建立在悠久的惯例之上，并为以前的各种条约所承认，这些条约在1914年只不过得到更进一步的确证……在这些背景下，印度政府认为，否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或支持西藏政府试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都是说不过去的。

古德可能还在希望，如果能够明确宣布缺少中国签字的《西姆拉条约》法律上已经给予西藏以独立，那么中国人也许会被诱回谈判桌上来，按他们1919年5月方案的路线同意西藏的自治，以换取确定的中藏边界线。他认为英国人目前是最后一次处于使西藏人接受一条合理的（从中国方面看）东部边界的地位，这样的事他们在1914年不愿打主意。另一方面，英印政府认为"中藏边界的问题最好能够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平稳地解决，而不是通过几乎肯定徒劳无功的谈判去确定"。但是解决这些外交问题的迫切需要由于夏披使团计划的取消而消失了，尽管那些根本的问题无疑还继续存在。

《西姆拉条约》在发展中的卡罗思想中的重要性不是它的无效，不是需要重新谈判另搞一个，而是它实际上已经存在。它就是一个需要公开的事实。至少从1936年初开始，卡罗就在考虑如何达到这样一个公诸于众的目的。他提出了一

个巧妙的方法。最令他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将在别的章节讨论——在于确证1914年3月那些麦克马洪致伦青夏扎的备忘录；而那些备忘录不能离开产生《西姆拉条约》的整个外交环境。因此卡罗敦促“不失时机地钻入《艾奇逊条约集》中去”，不仅要找到那些备忘录，而且要找到迄今为止没有发表过的有关《西姆拉条约》的原始文本。

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困难。《艾奇逊条约集》的末版见于1929年，当时相关的第14卷已经把1913—14年的整个西姆拉事件的材料当作无效的文件处理掉了，因此没有加以再版。由于卡罗的继继敦促，加上外交部吞吞吐吐的默认，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秘书哲特兰勋爵便同意出版麦克马洪致伦青夏扎的那些备忘录（但没有附图）、1914年的《通商章程》和《西姆拉条约》（1914年7月原文），但不能出版1914年7月3日的英藏声明。当然，它们可以分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公诸于众。但是卡罗决定，应该通过用仍带有1929年日期的新版第14卷取代旧版第14卷这种简单的权宜办法将它们收到目前流行的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中。新版第14卷在印度印刷，并于1938年8月前送往英国，到10月它们便被分发了。有62本送到了伦敦。除了留在印度事务部的外，还有7本送给了外交部，其他的被送到版权图书馆、海军部、殖民事务部、帝国国防学院、皇家亚洲协会、东印度联合俱乐部、贵族院（上院）和众议院（下院）的图书馆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图书馆。没有被送到联合王国之外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许多图书馆只拥有真版1929年版第14卷的原因。有命令要求将原版第14卷收回印度事务部销毁。印度事务部在1938年10月22日的一份备忘录上说，“新版的原因

是，我们想谨慎地公布1914年的条约（从未得到中国的批准）”。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非常成功，1963年以前显然逃过了公众的议论。直到1962年英印关系出现大危机为止，《西姆拉条约》靠艾奇逊真作中的结论保持了尊严，这种尊严当然是假的。

《西姆拉条约》条约如果有效将会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吗？

1937年印度事务部的法律顾问认为，也许从理论上而不是从实践上来说，根据《西姆拉条约》和1914年7月3日的英藏声明（我们已经提过它没有发表），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噶厦并不具有同拟议的夏披使团中所指的那类中国人一起参加双边谈判的缔约权——将需要英国人参加一些会谈。但是由于使团没有成行，这种考疑便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中国人拒绝签署《西姆拉条约》是由于他们对西藏的“宗主权”吗？至少就大不列颠来说是这样吗？

1937年间，印度事务部查完了这个问题的许多细节。结论似乎是必然的。在竭尽全力审查了“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上英国政府的授权有多大”这个问题后，印度事务部的法律顾问们只能如是说：

> 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承认是毫无疑问的。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在1907年的《英俄条约》中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种承认又在1912年8月12日的照会、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和1921年8月26日的照会中再一次得到英国政府的确认。与此同时，我们总是小心谨慎地维护我们的政治和商业权利，并

把西藏当作中国对它拥有宗主权的一个自治国家。

此外，承认了《西姆拉条约》的第2条，西藏人也就承认了中国人对他们的宗主权。

发表《西姆拉条约》显然具有两个直接的好处。其一，在1936—37年古德使团出使拉萨期间，西藏人对《西姆拉条约》的真容糊涂透顶，更不用说懂得它的含意了。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能够向他们出示一些早期的图书是很有益处的，在那些书中印上条约的原文以便经过适当的翻译，能够在有文件根据的基础上详细地向他们说明条约的内容。很易受到这样的质询：即那时噶厦是否确实把握了他们自己的副本。那肯定能证明他们对有关麦克马洪致伦青夏扎备忘录的事所知不多，尤其是备忘录附图一事。其一，根据位于阿萨姆喜马拉雅的麦克马洪线（这不是我们本章要讨论的问题），许多东西可以从《西姆拉条约》和与之相关的地图（这不同于1914年3月英藏照会的那些附图）延引出来。这肯定就是为卡罗所特别关心的事情的方面。

除了麦克马洪线以外，《西姆拉条约》在1936年或1937年在实践上对印度政府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价值，虽然这并不是说将来找不到它的用处。当前英国在外藏的影响不是决定于条约，而是决定于地理上的邻近。要抵抗得住中国在那里的影响，英国人在拉萨的出现及其玩弄的许多设置障碍的花招暂时应该足够。

显示英国在西藏给中国人制造困难的力量的最明显手段，就在于控制那条经由英属印度连接中国与拉萨的便捷的、好走的道路。蒋致余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37年10月，蒋致余由于健康原因想离开拉萨，他在那里已经呆了三

年多了。蒙藏委员会命令他继续留在那里等到接任者从中国到达。驻锡金政务官得到报告，西藏人已经拒绝允许蒋的继任者入藏（此人当时正在玉树同班禅喇嘛的随员在一起）。后来虽放宽了限制，但1938年1月班禅喇嘛死后不久他们又改变了想法。与此同时，蒋致余不顾指示于1937年11月底离开拉萨取道锡金经印度返回中国。中国人很清楚，如果不同驻北京的英国大使馆重开谈判，他们是不可能使他们的新代表经印度进入西藏的。中国人决定任命在拉萨的中国无线电操作员张威白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和蒋的继任人。据说张爱抽大烟，行为相当古怪。因此，英国控制由锡金入藏的道路所造成的困难被有些人认为已经迫使中国人在拉萨作了相当不适当的任命，否则就任命不了。

1939年，英国在中国特使吴忠信前往拉萨的线路问题上再次发难。他（1936—1944年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随后为新疆省主席）被派往拉萨出席14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英国人宣布，如果能表明他确实接到了西藏人的邀请，就可以允许他途经英属领土。但是最后，如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受阻，那么就面临着这样的前景：中国代表团护送来自青海的新达赖喇嘛的事就会发生。发给吴忠信适当的护照不再成问题。

达赖喇嘛的转世自第二次威廉姆逊使团以来就是压倒拉萨一切政治事务的事。达赖转世的过程很复杂。1935年热振摄政王前往纳莫拉错神湖，他在那里得到启示，知道14世达赖喇嘛将在东方转世，最可能的地方是安多，也是说在中国统治下的青海省。经过拉萨内部和周围的宗教界的许多争论和根据适当的神谕商讨之后，决定派出能担当此神圣任务的

三路人马寻访西藏东部各地打探灵童下落。经过近三年的查访，访获了一小批灵异儿童，其中只有三个是真正重要的竞争者，而来自青海安多的昆班（kumbum）寺附近当采的那个最为灵异。1938年9月，此事上报了中国政府（时已从南京迁往重庆）。12月，驻锡金政务官在甘托克听说了此事。

至少根据中国对此事的解释，下一步将通过抽签决定最后的选择（正如我们已在上一章描述过的确认热振摄政王的方式）——著名的金瓶掣签法——在有热振摄政王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场的情况下。他扮演国民党的驻藏大臣的角色。1939年3月，伦敦的中国大使馆通知外相哈里法克斯爵士，金瓶掣签仪式很快就要举行，中国大使馆给予一个英国代表出席仪式的机会。

三个候选达赖喇嘛中，一个来自西藏本土（这就是《西姆拉条约》所用术语中所指的外藏的东部），两个来自中国青海省的安多。显然中国给拉萨当局施加了很大压力以劝说他们接受其中一个来自安多的候选灵童，此灵童来自当采（1935年6月6日生）。也许——在这点上的记述有分歧——讨价还价的部分是，如果藏人只接受当采的灵童作为一个无竞争选举中唯一的候选人，那么所有要举行金瓶掣签仪式的努力都将中止。但是，如果这是真的话，蒙藏委员会又似乎还未得知此事。可能，这场放弃金瓶掣签仪式的交易不仅有中国政府的促成，还有青海的统治者马步芳的帮衬。正如所料，就是当采的那个灵童在拉萨被大多数特定的选举人或鉴定人所接受。

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在青海，拉萨当局必须使他摆脱中国人并把他带到布达拉宫。中国人为他提供护送的机会——就

象他们为班禅喇嘛安排的那样——显然是完全存在的。同时也很明显，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合作，至少是青海的实际统治者马步芳的合作，未来的达赖喇嘛（一般认为，不到他踏上或转移到拉萨这块土地，他都还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就会在昆班寺遭到拦截。为了保证他安全离开青海，拉萨得给中国人付一大笔钱，至少要220，000块银元，也可能高达400，000块。不清楚这只是使马步芳的银柜鼓胀的一种手段，还是属于整个行动的一部分，从而在使中国同意免除金瓶掣签程序方面发挥一定作用。能肯定的是，1939年10月，至少220，000银元经由邦达昌以及香港和上海银行付给了中国政府的一些部门。

达赖喇嘛和随员在包括一个约由20名士兵组成的中国护送队的伴同下于1939年10月8日抵达拉萨。他离开青海一事发生得有点仓促，而且显然选定灵童一事很秘密，以至拉萨政治圈子里的许多方面并不确知在选举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相信金瓶掣签的仪式仍将到来并将在拉萨举行。

14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大大加强了热振摄政王的地位。他远非退回到沉思默想的生活之中，而是设法成功地罢免了首席噶伦——已故13世达赖喇嘛的侄儿司伦朗敦（据说他赞成选当采的那个灵童之外的另一个作达赖喇嘛）。并正在变成一个难以预料的独裁者。他随心所欲，渺视噶厦。新的中国代表团到达拉萨后他会干些什么，这尚属难料。

而一个难以对付的中国代表团就在前来拉萨的途中。这是由国民党政府所派的代表团，组成人员有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西藏处处长孔庆宗及其9个处员。无论在西宁与青海当局达成了什么共识，蒙藏委员会显然仍旧相信，吴抵

达拉萨后，仍将通过“金瓶掣签”的方式主持达赖喇嘛的最后确认。“金瓶掣签”制将是中华民国在西藏传统行政事务上发挥作用的最具戏剧性的表现。热振摄政王能够顶住中国坚持实行“金瓶掣签”制的压力吗？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代表团在拉萨，那么他的设想就可能更加坚定。1939年11月，当中国首席代表还在行进拉萨途中时，古德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即吴忠信正被拉萨的一般群众称作新任“驻藏大臣”。

中国代表团的大多数人员走陆路经打箭炉于1939年11月25日到达拉萨。吴本人则走海路经印度（在消除了英国官方设置的某些障碍之后）于1940年1月中旬到达。他很快得到热振摄政王的报告，报告说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真身是那么确然无误，没有必要再进行抽签。国民党政府因此同意不用进行“金瓶掣签”。行辕决定：“抽签过程应该予以免除”。为表善意，行辕宣布将拨400，000大洋作为坐床经费。

1939年12月9日，古德接到印度政府的指示，令他到拉萨出席新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同一天，噶厦令时在拉萨的诺布顿珠将即将来临的坐床大典通知印度政府，但是，千言万语没有一句邀请一个英国代表光顾的话。然而古德决定把这种通报形式当作“事实上”的邀请。在斯汤顿、I·M·S·上尉和他在甘托克的僚属索朗土登的陪同下，古德于1940年1月吴忠信及其队伍（吴忠信一行1月15日抵达拉萨时，古德还在江孜）离开锡金不久之后即动身前往西藏。两支队伍在寒冬中翻山越岭，幸好天气特别温和，没有下雪。在亚东，英国人遇到了擦绒，他近来在印度。到了拉萨，古德很快同来自江孜商务代表处的凯思少校和索思伯格上尉会合。

古德在西藏首府一直停到6月份，此前吴忠信已离去（1940年4月15日走），留下孔庆宗作中国代表（此人在布鲁塞尔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古德使团确实有幸能目睹这场古老而复杂的仪式的某些方面，这种仪式几乎肯定再也不能完全展示出原始纯粹的方面了。跟中国、尼泊尔、不丹代表团一样，英人一行也被引见给新任达赖喇嘛。尽管他只有4岁，但已经在承受公务生活的严酷方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能力了。所有这一切都沉浸在西藏新年庆典的巨大欢乐之中。

这个第二次赴拉萨的古德使团有一个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密切观察中国一行的活动，如果可能就跟他们作对。吴忠信是自满清驻藏大臣时期以来到拉萨的级别最高的中国官员，他是国民党政府的次长。和过去的驻藏大臣一样，他的任务无疑就是要显示中国在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上起关键作用。通过坐床大典吴忠信努力显示中国在拉萨的地位和列强并不一样。他究竟有多大成功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有这种可能，即他在更大程度上设法说服西藏人不要承认英人在西藏事务上具有同等的地位，而他们原来是准备这样做的。吴忠信代表团到达拉萨时受到隆重欢迎，噶厦中的四个噶伦有三个参加了欢迎仪式，大多数资深的西藏政府官员也前来迎接。在坐床大典上，中国人设法取得了与别人不同的、更加显赫的座次。在前来参加大典的各代表团向新任达赖喇嘛敬献礼品和表示祝贺的三天中，1940年2月22日作为第一天具有关键性的外交意义。吴忠信出席了这一天的典礼（还有尼泊尔和不丹的代表出席），而古德没有出现。英国人在描述一事件时对这个事实作了轻描淡写，并且没有对此给予

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

吴忠信的继任者孔庆宗博士是中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把他的任所命名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噶厦显然没有对他的自任自命提出异议。他获准以办事处的驻节医生在拉萨开设一家中国的医院，与正在兴建的英国医院相竞争。吴和孔都很容易接近西藏官僚圈子里的各级高层人士。孔庆宗显然能够站得住，他成了中国政府设在拉萨的这个蒙藏委员会的常驻机构的负责人，而与此同时，在古德结束拉萨之行以前，英国代表还得不到西藏官方承认他们有常驻权。英国人在拉萨的存在继续保持一种非正式状态，就象1937年一样。

毫不奇怪，西藏人在同古德的谈话中尽力要把中国代表团的成功和重要性贬低到最低限度。他们说，中国在达赖喇嘛坐床问题上的作用根本就不存在。达赖喇嘛并没有变成在拉萨举行的任何仪式所导致的结果之化身：就西藏方面来说，当他在1939年9月从那竹卡（一批噶厦把他当作真正的达赖喇嘛到此迎接他）转到西藏之后，他就完全进入了他世袭的角色，10月份他到达布达拉宫后，这一点就更确定了。但是，不管西藏人可能对古德说什么，给世界其他地方所造成的印象——例如加尔各答的《政治家》和伦敦的《泰晤士报》都及时作了报道——都是，中国人在承认达赖喇嘛的合法性上设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尔各答《政治家》宣称“据详细但不十分确切的报道，吴先生已经把达赖喇嘛送上了宝座并宣读了一份声明，而达赖喇嘛已经向北京表达了敬意”。古德在他的出使报告中怒气冲冲地特别提到此事。

吴忠信是派往西藏的使节中与驻锡金政务官能够建立某

种交往关系的第一位中国官员。举例说，古德在1936—37年出使拉萨期间甚至没有见过蒋致余。威廉姆逊1935年与蒋较早建立的联系从他遗孀的回忆录中几乎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描写。吴忠信在他前往拉萨途中和古德同在甘托克官邸停留过。这两个人有过长时间的严肃认真的交谈（吴不说英语，但在他的代表团中有一个优秀的翻译奚伦）。他们在拉萨的许多场合又会过面。吴显示了古德所说的那种中国人对西藏人所特有的种族优越的态度。但是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认为：

> 说到中国对西藏的基本政策…英王陛下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的全部愿望就是西藏应该和平与繁荣；就是，中国随时准备帮助西藏，如果它希望这样做的话。与此同时，中国不会强行帮助或强行劝告一个不情愿的西藏。

1940年2月，英印政府决定通过其在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弄清在派遣吴忠信使团的全部真正用意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有什么正式的说法。大使克拉克·科尔爵士于3月7日汇报说他已经同中国外交部长谈过，这位部长指出：

> 吴西藏之行的目的是要消除中国对西藏有所图谋的印象。他解释说，前此在清王朝时期派出的钦差大臣曾对西藏有过某种侵略传统，这似乎对西藏仍有影响，国民政府希望根除这个印象。吴的任务就是要说服西藏，尽管中国随时准备帮助西藏，如

果它希望这样做的话，但中国政府希望看到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沿着她自己的路线发展。

古德无疑认为，所有这些与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蒋介石的一个讲话有冲突。那个讲话事实上认为西藏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

这个公开宣布的不干涉西藏的中国政策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政策不是真的，而噶厦却相信了，那么对英国的边界政策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古德应该同噶厦讨论此事吗？他受命口头通报西藏人：

> 达赖喇嘛坐床之后不久，鉴于吴忠信先生出使拉萨，中国外交部长在重庆通报英国大使馆如下：…吴先生…可能会告知西藏政府，西藏政府不必继续认为中国对西藏有任何不良企图。西藏政府不必认为目前的中国政府希望用清王朝时代驻藏大臣对待西藏的那种方式对待西藏，如果西藏希望的话。但中国答应不干涉西藏沿着西藏的路线发展。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这个声明是合乎事实上已经存在于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的。

但是古德受命进一步指出：

> 如果中国人表现出任何以违背这个政策声明的方式行动的倾向，英王陛下政府和印度政府将肯定对西藏政府给予支持，自13世达赖喇嘛时代以来，这

种支持就随时可以得到，以保持西藏事实上的自治。

古德是在1940年5月27日他正要离开拉萨时传达这些话的，所以他“用最可能简练的语言”表述了那些话的要点。噶厦同意他们目前的地位是由已故达赖喇嘛确立下来的事实上的自治地位（不是完全的独立，这够有趣的）。他们发现中国政府的讲话是最有助益的，这些讲话得到了英国的保证。如果中国人越过了界限，他们肯定要让印度政府知道。第二天，热振给古德描述了一下他所能考虑的西藏目前的对外政策。那就是，他代表西藏政府应与印度和中国保持平等的关系。

古德是口头给噶厦传话的，他确切地说了些什么，没有记录。但是在他的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暗示，他向噶厦表示过，多亏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在印度政府的鼓动下进行干预，中国人才同意西藏完全脱离他们的影响，除非噶厦明确要求中国施加这样的影响。

不管中国外交部长表示过什么——1940年3月7日克拉克·科尔对此作了报告——他很可能无意于走得象古德所理解的那样远，更不用说他向噶厦通报了什么。虽然如此，对中国人来说这还是关于西藏的很“慷慨大方的”讲话。当然，主要问题还在于，有一段时期没有界明“西藏”这个术语的地理范围，那时中国政府给西康和青海划定了明确的界线。特别是西康边界的划定向拉萨对西康的实际控制提出了挑战。（正如在随后的一章将要看到的，这也对阿萨姆喜马拉雅的广阔地带提出了领土要求，而印度政府不愿看到它落到中国人手中）。但是，除了西藏范围的界定之外，古德作过

解释的那些中国讲话似乎并不同英国的政策严重冲突，英国的政策是“尽一切可能使西藏保持为缓冲国，但不在保持英国影响这一问题之外从事具体行动，除非西藏当局遭到了严重威胁”。

在从拉萨到加尔各答的途中，吴忠信考虑折向德里，去同印度总督林里斯格尔勋爵谈一下西藏问题，根据这个意思提出的邀请被接受了。印度政府特别指出，总而言之，根据古德的看法，“吴的态度是：英国和中国在西藏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只希望西藏应该是和平与繁荣的”。此外，吴还在建议讨论不必限于西藏，可以扩大到在亚洲相互感兴趣的其它问题。林里斯格尔勋爵表示赞赏，而印度外务部对英中在中亚具有明显一致的目标着实感到惊奇，为此必须退回到19世纪末才能找到类似的先例。但是，最后吴忠信并没有去德里。

至少卡罗不相信中国对西藏的兴趣本质上是善意的。1940年1月，当古德正在为他出使拉萨作准备时，现在的印度外务秘书卡罗搞了一篇题为“蒙古人种地带”的长文。这篇论文当时广泛流传并一直广泛流传了几年之久，他对此颇为得意，因为文章是他政策的最明确的表述。文章纵然建立在对喜马拉雅地区相当有限的了解之上，确实也不乏一些巧妙的论点。（卡罗到过锡金和阿萨姆，但是没有任何象从柏尔到古德等一系列驻锡金政务官那样的经历，他对中国的了解极为有限）。

他绘制了一张几乎要被称作宇宙图的——一种曼陀罗（宣传平等周遍十法界的宗教思想—译注）—注有印度北界防御全部问题的地图。一个倒三角形的英属印度，它的北边是喜

马拉雅地区，包括东部的尼泊尔、锡金、不丹和在缅甸西边同拉达克相连的北部阿萨姆。这是一个“蒙古人种”人口占优势的地区（尽管有明显不是蒙古人种的尼泊尔统治家族）。这个地区以北是另一个“蒙古人种”地带——西藏，它以一条新月型的边线为界，这条新月型边界从新疆通过青海、西康一直到四川、云南，边界线这边都是中国控制的领土（更多“蒙古人种”）。这个地区以北是一个同心弧，西包括苏联和它的从属国蒙古，东包括日本控制下的领土满洲里和中国的日本占领部分。在所有这些地区，有许多不同的力量在活动，卡罗以某种技巧对此进行了分析。外弧表示苏联和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基地，内弧是中国的新月线，表示正在不断地对西藏施加力量。西藏反过来正在对沿印度边界的“蒙古人种的”民族施加压力。换句话说，有许多不同的帝国主义在活动，它们是苏联人和日本人，中国人和西藏人。这种形势是复杂的，从英国政策的角度看，尽管某些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可以确定，但没有什么简单的答案。

第一个优先考虑要包含对喜马拉雅地区有领土欲望的西藏人和处于这个山区内的国家和民族。第二个优先考虑是要把西藏留作反对中国的缓冲区。正如1910年代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对英属印度来说，中国人证明他们自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邻居。他们也把目光放到喜马拉雅地区的民族，他们认为这些民族是他们民族利益范围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现在甚至更危险了，因为他们也许会渐渐变得要么反对苏联人（或者直接反对，或者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来反对），要么反对日本人（或者两者同时反对）。因此，第三个优先考虑是要防止中国同时受到苏联人和日本人的反对。

如何达到上述目标？就西藏缓冲区来说，已经确立英国在拉萨的存在的政策可以继续用于对付中国人，至少可以在西藏的那些直接与英属印度喜马拉雅边境相邻的地区这样做。但是卡罗拿不准单靠这种政策是否有效，因此他赞成进一步实施两种政策，这两种政策可以叫做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政策。

地区性的政策相当简单。他要通过一套行政措施制止西藏沿印度的北部边界“侵入”喜马拉雅边境地带。许多非常具体的步骤能够设想出来（卡罗在这个方向上的政策已经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后果，这种政策将在另外的章节详细讨论）。危险在于，推行这种反对西藏对喜马拉雅地区的领土欲望的政策也许会导致英藏关系的严重紧张。

但是，从长远看，对英属印度的主要威胁更多的不是西藏对喜马拉雅部分地区的小小渗透，而在于：其一，中国对这一地区的领土收复主义野心；其二，在这些地区背后隐约出现的共产主义和日本人的威胁。卡罗通过下述的观察概述了他关于英国政策大致轮廓的看法：

> 尽可能促使中国与印度和西藏合作，抵抗俄国和日本的渗透以及保证西藏作为一个统一的国际行为体，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建立在半流产的1914年三方条约基础上的理想应该作些调整。但在为这种协调努力时，我们必须保证中国和西藏尊重印度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利益，而且应该时刻谨记，比中国更糟的邻国可能在它之后获得成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什么是英国和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真正利益所

> 在。英印在这一地区的真正利益对我来说似乎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对中国过分妥协而让中国取得对拉萨控制权的国家；第二个方面是，印度自己必须同所有那些我称之为"蒙古人种地带"的国家和地区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联盟。它们指望得到印度的保护，它们的分崩离析将冲破自身的防御。

现在我们再回到《西姆拉条约》问题上。《西姆拉条约》现在安全地秘藏在《艾奇逊条约集》里（根据卡罗的说法，其地位从"流产的"提高到"半流产的"），它可以用作某些有关西藏的英中协议的一个基础，在那些协议中中国人要么遵守它，就象它有效似的（这不可能），要么被劝说去谈判缔结一个新条约。如果英国单方面提出否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国民党政府除了坚持它的立场将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这个立场是：西藏纯粹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如果仅仅因为他们可能相信中国而对日本的侵略正处于最为艰难的时刻，坚持立场将会导致英国正式承认西藏的完全独立的话。那么，只要"宗主权"还摆在桌面上，他们就有可能被引诱进行谈判。

"蒙古人种地带"一说并没有使古德相信《西姆拉条约》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基础，在此之上能够确立西藏作为一个靠印度喜马拉雅边境的缓冲区的未来。他怀疑在不折不扣地推行1914年3月的那些麦克马洪致伦青夏扎备忘录（在此上面他只发现拉萨的愚昧无知）所指示的边界上逼西藏人太甚是否明智。他太斯文了，以致不能用那么多话说尽这一切。但

是1940年4月18日他的关于西藏政策的报告的调子已经足够一目了然。当1942年埃里克·台克满爵士在重庆有机会读到"蒙古人种地带"一文时，他对此也同样冷淡。印度事务部政治委员会在1940年5月30日的有关印度政策的主要报告中甚至没有提到此文。《西姆拉条约》，这个历届驻华英国外交官发现激不起外交部喜悦之情的东西，在后来英中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的历史中作用并不突出。从这点看，卡罗将它收入《艾奇逊条约集》的诡计并不能说特别具有成效。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勾画在"蒙古人种地带"里的某些观点的运用将深刻地影响在阿萨姆喜马拉雅的印度边界后来的历史。而且，在英国国旗1947年在新德里降下之后的长时间里，死而复活的《西姆拉条约》将继续激励印度的决策者。《西姆拉条约》所提到的"宗主权"的概念在关于西藏地位的非共产党人的讨论中仍然显著地出现。这是卡罗遗教的一部分：不把《西姆拉条约》收入《艾奇逊条约集》，西姆拉条约这个词说不是已经完全湮没无闻了。

有趣的是，1940年，不是日本人就是他们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傀儡政权也决定公布一些有关《西姆拉条约》的文件。这些文件与西姆拉会议的开始到1914年4月27日《西姆拉条约》的出笼过程有关，陈贻范已经草签了这个条约，而袁世凯政府后来不予承认。当卡罗正企图运用《西姆拉条约》作为西藏地位的某种证明——在这种地位上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了极大限制——时，那些对这种特意公布的文件负有责任的人正要竭力显示：这个《西姆拉条约》不过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企图强加给中国的另一个"不平等"条约。这种观点仍为目前的中国政府所赞同。

# 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

（法）亚历山大·达维·耐尔　著

李凡斌　张道安　译

**编者按：**达维·耐尔（1868～1969），法国著名藏学家和东方学家。一生曾五次旅藏，著有十多部关于西藏的著作。《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写1951～1952年，时值西藏和平解放。本文译自该书第一章。

古老的西藏注视着更为古老的中国。今天，我们将其称之为新生的中国，只是为了将她那沉重的过去与现在区别开来，而目前在新的中国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事件，实实在在是过去早就播下的种子所孕发的。古老的西藏正在注目凝视的就是这样一个新的中国，也许她还有所思有所想，但她的态度，无论如何也不是西方世界强加给她的那样。

自然物体离我们越远，看上去就越小，离得越近，就显得越大。与此相反，当我们从外部观察远方发生的政治事件时，首先感觉到的自然是最为重要的成分，而这些所谓重要的成分，实际上在那里也是无足轻重的。

不过，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今天看来无足轻

重的事情，到了明天，受到某种始料未及的因素的影响，亦有可能酝酿成为一场灾难。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萨拉热窝的悲剧事件本来也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奥地利大公被一个爱国者刺杀，类似的事情过去可谓屡见不鲜，但从来未引起过严重的后果；然而，一九一四年的这一事件，却导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希特勒上台，随之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又敢断定，最后的这次大战，并没有为更大规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播下火种呢？

所以，我们都无法预料，在这个落后的、有的地方荒无人烟的“世界屋脊”上，即使规模很小的冲突将会带来何种后果。更何况，小题大作、惟恐天下不乱者又大有人在呢！

我若是让读者与我一起就这样的问题去作种种臆测，显然是令人乏味的。我们还是先看一眼世界地图，从中领会一下西藏的地理位置所构成的边境形势。

西藏，地域辽阔，其边界插入中国版图之内，生活在那里的人达百万之多，说来也不算少；与其接壤的另一侧，是目前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

这里有许多因素直接影响着亚洲的命运，也许还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前途，这是无人想要否认的。但我想在书中向读者展示的，是现在西藏——即新生的中国所面临的西藏——的面貌。

我们某些人曾将西藏描绘成一个被颠覆的国家，用他们那些混淆视听的语汇来说，这里存在一个中国人侵占的问题。

那么，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我们的答案是明确的：除去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的事情之外，并无任何新鲜之处；我们不能说西藏被中国人占领了，适当的词汇，应该说中国人“光复”了西藏。

许多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就与中国密不可分。无疑，藏族与汉族自古以来就在战场上和粗野的交涉舞台上不断较量过，双方都不乏诡谲与狡诈，但彼此却从未闹到要一刀两断的地步(2)。

藏族与汉族的联系可溯至公元前。中国编年史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对这种联系有所记载。据我们手头的资料，这种联系还远非从这个时代才开始的。在漫长的历史上，这是一种粗暴的关系，一种相互进犯的关系，两个民族互相屠杀，无数人死于战祸，汉藏间的疆界也在不断变迁，直至近代仍是如此。我浪迹天涯，曾到过昌都、德钦和巴塘，以及先后曾为汉族和藏族轮流占据过的一些其它地方。

许多藏民似乎并不知道，七世纪至八世纪曾是他们本民族军事史上光辉的年代。公元七六三年，藏族部落占领过当时的王朝都城——长安（现称西安，陕西省省会）。在这个时期前后，藏族人以伟大的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帕米尔高原和古波斯国的疆土上，他们的部落在整个中亚到处游牧，安营扎寨。

只是在此之后，他们才一落千丈。随着游牧部落的四处流散，藏族人那种对战争的狂热劲头虽然没有完全消失，却也日渐冷淡下来。尽管在后来的几个世纪的内部纷争中，以及在抵抗蒙古入侵者的战场上，人们仍然能够依稀地看到他们的这种尚武精神，但始终都有汉族的影子出现。汉族人不

是在台前，就是在幕后。

到了一七九二年，尼泊尔的廓尔喀（Gourkas）军队占领了包括日喀则在内的藏南大片土地，汉族人进兵西藏，才帮助藏族人赶走了入侵者。在这次战争中，尼泊尔人付出了一个部落作为战争赔偿，这个部落在中国境内一直由尼泊尔人供养，直到当时的王朝被推翻[3]。

汉藏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反复无常，时而干戈相向，时而玉帛互往，两个民族的联系却难以置信地不断加深。中国（名义上对西藏，事实上仅仅是对拉萨政权）实现了并不严酷的宗主权，并向拉萨派出了一位职位相当高的驻藏大臣，对西藏的政权统治实行监督。

自此，宗教神职人员中的达赖喇嘛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承认方可坐床，而且在坐床之日向中国皇帝像顶礼膜拜，俯首称臣。日喀则的班禅喇嘛当然也不能例外。

喇嘛教会集团中的贵族成员——活佛是由两种形式产生的：较重要的喇嘛由中国政府敕封，并要举行蒙古式的正规仪式；其余大多数的喇嘛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敕封，在贵族中的地位较低，并分成几个等级：中央政府没有敕封但达赖喇嘛承认的属于一个等阶；受封于其它大喇嘛的则属于另一等级。

根据最新的材料，新的北京领导人打算对喇嘛和活佛（至少对较为显贵的喇嘛）仍旧采用这种方式敕封。他们在敕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时已经沿袭了传统的作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姿态。

后来，西藏舞台上渐渐出现了俄国人和英国人。俄国人相比之下显得软弱无力，而英国人却跃跃欲试，一心要取代

中国的影响，并为此曾阻止俄国人在印度边境驻兵。

于是，西藏大地上又燃起了新的战火。一九〇四年，不列颠远征军强占圣城拉萨。这一次，中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帮助藏族人驱赶入侵者，当然，他们能否抵挡得了英国远征军是值得怀疑的，但他们连丝毫努力也没有尝试。愚昧而不幸的藏民，只能深信喇嘛施予的护身符可以保平安，避刀枪，他们勇敢地投入战斗，使不列颠远征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中国政府的这种无能表现，藏族人始终满腹怨恨，耿耿于怀。事隔二十多年后，我在拉萨仍然听到有的藏民对此愤愤不平。

后来不久，困在西藏的中国军队被藏族驱赶出来。一小队一小队的中国士兵，垂头丧气地被迫穿过喜马拉雅山，经印度从海路回内地的情境，藏族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由于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英国人终于占领了包括拉萨在内的藏南地区，他们封锁关口，很快就卡断了与相邻各国的通道(4)。

即使在这种时候，汉藏之间在藏东由来已久的纷争一刻也没停止。

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拉萨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不过，西藏政府的代表同时也表示，他们对英国军官带来的一切同样厌恶。

然而，中国并没有放弃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在各种场合都坚持表示要继续行使这一权利。当时，北京设有一个西藏蒙古事务局（即蒙藏委员会——编者），可惜的是，该局管辖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应管理的事务也所剩无几，实际上所能管

治的也只是居住在中国内地的那些蒙古族人和藏族人。

国民党人的最后一个行动，是向拉萨派出以该事务局局长邝思雨（应为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处长沈宗濂——编者）先生为首的代表团，以示这种似有实无的主权。

这个代表团在西藏做了什么，发表过什么言论，至今未见确切的报道。事实上，时间也不允许他们采取任何重大的外交行动。

一九四九年，拉萨发生了骚动，一方是反对这种主权要求的离心势力，另一方则试图推翻西藏政府。据当地共产党人的说法，这次动乱的矛头并非对着中国，而是为了反对国民党人的统治。然而，被问及此事时，"邝思雨"先生极力宣称，他当时并未看到存在共产党的影响。亚洲的事务往往如此，模糊不清，真假难辨。

不管国民党人是否采取过什么行动，他们最终是被驱赶出藏的。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首先被遣送印度的噶伦堡，再押送到加尔各答，然后由该处返回中国。

居住在西藏的所有汉族人，包括商人和从事其它活动的人，都遭到逮捕。

正当这些汉人由藏南纷纷外逃，藏族人为此神气活现地庆祝胜利之际，为数更多的汉人——毛泽东的军队，却由藏北悄悄地开进西藏。

虽然局外人觉得这出闹剧滑稽无比，拉萨当局却实在无法分享这样的幽默了。他们除了惊慌失措，还表现出令人困惑的幼稚，似乎对外界的形势一无所知，竟然还在打算派代表团前往伦敦，谋求英国人保护他们，帮他们抵挡毛泽东的军队。

拉萨政府的代表抵达印度之后，马上就恍然大悟。他们发现，对英国人抱有任何幻想都是徒劳的，英国人已从印度撤走，而西藏对他们来说已是毫无意义的地方，因此，他们根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解救西藏。

印度方面也向这批藏民暗示，印度亦准备与新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绝不会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西藏。代表团在印度四处碰壁，进退两难，毛泽东的军队已经向拉萨城不紧不慢地前进，就象久别家乡的人们返回家园。

是西藏领导人过分缺乏判断力呢？还是有人利用了他们的无知以期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一只手拥护中国人，另一只手策动藏族反对中国共产党人，这不仅是某些人的想法，而且是他们曾经付诸于实践的行动。虽然我无法断定，但达赖喇嘛的一个兄弟曾在台湾蒋介石处逗留这一事实，足以证实了上述传闻。

他是否被派往求援？也许他确曾十分天真地打过这个如意算盘。但对国民党人来说，西藏这块地方毫不值得他们大举反攻，在西藏问题上，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是完全一致的，即保证让西藏呆在中国版图之内。

达赖喇嘛的另两个兄弟（原先住安多昆班寺）目前侨居美国，其中一个正在耶鲁大学就读。应该说，这两人都有大量的财富，足以维持其舒适的生活，假如他们都洁身自好，远离可能触动其美丽的“雪山之乡”的一切动乱，那是再明智也没有了。

话又说回来，目前并无任何征兆表明西藏会出现骚乱，或者预示这种骚乱具有某种实际意义。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境内并未遇到一枪一弹的抵抗，他们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过

去的统治野蛮至极，统治者横征暴敛，在深受其害的人民中留下的只有不满和愤怒，我在西藏期间对此亦有所闻。

许多人，尤其是康地的藏族，都亲身体验过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旧的反动统治，相比之下，他们真心实意更喜欢共产党人。他们说，尽管共产党的干部并非个个都那么廉洁奉公，但他们加在我们头上的负担至少要轻得多。印度游客撒拉·桑地拉·达斯在日喀则也有同样的印象，并在其游记上有所记述[5]。

比起共产党人来说，西藏旧政府的苛捐杂税真是多如牛毛。令人可笑的是，在英国人曾经到过的藏南，那些负责征税的地方官员在回答那些叫苦连天的纳税人时，说这不是人间尊贵的保护人仁慈的达赖喇嘛要他们作出这样的牺牲，而是那些英国人——可憎的外国佬强迫他们这样做的；这些官员从不说明弄来的钱粮将要交到谁的手中，而是信口胡言，有意无意地散布仇外的情绪。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胡言乱语，使勇敢的藏民头脑中产生了天然的排外倾向，虽然表现方式不同或者程度不同，藏族人大都有着强烈的仇外情绪，这样说并不过分。

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经常征用人畜驮运行李、货物，使用者虽然不能为这些雇用的人畜要求报酬，但私下通常都给予适当的钱物，而以前的藏族贵人，却从不会如此慷慨大方，这也是普通百姓对西藏旧政府的另一种不满的地方。

自古以来，藏族人中形成一种不成文的野蛮的传统习惯：“小人”命该给“大人”进贡和卖力；如果尊贵的“大人”接受他的礼物和心意，“小人”应以此为荣，而“大人”并不欠“小人”任何人情。假如有谁知道，哪一位“大

人”回赠给“小人”礼物的话，这位“大人”毫无疑问要被人认为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缺少应有的尊严，这可是大逆不道的做法。

每时每刻，令人惊奇的是处处都可感觉到“小人们”的头脑中也有这种意识。我不止一次听农民说，赐予者并不值得尊敬。这是在西藏普遍存在的对武力与权势的崇拜。

然而，我也发现，这种盲目的崇拜已开始逐渐失去它的市场，至少可以说，当武力站在自身一边时，藏族人仍然是其虔诚的崇拜者，在武力触及自身利益时，更多的藏民已经开始怀疑其价值了。

近年来，许多藏族人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的宣传。那些原来对中国现代领导人就有良好印象的人，受到了这种宣传的鼓动，有些人则从这种宣传中看到另一种希望，希望诞生一个新的政权，从而能够给他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人们向藏族人宣传，派到这里来的共产党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是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好人。这些人到处传播正义，提出老百姓不应再受压迫，应当成为社会的主人……。无疑，向藏族描绘的前途是迷人的，我衷心祝愿藏族人民，还有更多的人民，都能到达光明的彼岸。

现行的政策唤起了藏族人的希望。当众鞭打的刑罚制度已被取消；结帮抢劫的强盗、有偷窃行为的士兵、以及损害藏民利益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直至处以死刑。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似乎言行一致，的确曾处决过偷盗的士兵。

所有这些，当然起到了一种安定民心的作用。然而，藏族对征服者的理解千百年来一直停留在一种最为野蛮的水准

上，所以，这一切也使他们大惑不解。

虽然中国军队目前看来处处小心，行动谨慎，但如果有朝一日遇到藏族人的反叛，他们才真正使藏民们更加吃惊呢！

当然，藏族也有自己光辉的历史，只是他们对此了解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罢了。在藏族史书中，写满了无数希腊神话般的历史传奇和壮丽的诗篇，有的比希腊神话更加令人惊叹不已，比如西藏民族英雄格萨尔的传奇故事[6]。

从善良无知的百姓，到学识渊博的绅士，谁都不会怀疑格萨尔这个残暴的战争巨人所建树的非凡业绩的真实性。

历史上的格萨尔是神的化身，他不惜用恐怖手段在人间建立公正的统治。在这部传奇里，不但描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同样也详尽地反映了古老藏族的尚武传统。

下面是格萨尔传中的几个片段，首先是美人抗击南部国王綮提的一幕[7]：

“尤拉通瑜与美人趴在马背上泅渡过河，会合起格萨尔的勇士们，一齐向南国士兵冲杀过去。南国士兵死伤无数，幸存者寥寥无几，仓惶逃回城堡。

“南国的綮提王得知失败消息，大怒不已，命令大将军库拿和佟充统领大军，马上向来犯敌兵发起反击。

“双方士兵混战起来，分不清谁是自己的首领，只见飞沙走石，乱箭无数，木棒乱舞；混战中，牧民们灵巧地抛出套索，缚住敌兵，摔在地上，拖死于乱马蹄下。

“库拿和佟充双双被擒，押到格萨尔跟前。库拿的四肢被钉在地上，佟充铁链缠身。

“格萨尔指着库拿对其士兵说：‘他就是魔鬼的儿子，

他的皮神奇无比，日后必有用场，给我活剥下来！，

“于是，库拿的皮被士兵们活剥下来。士兵们在桑提城堡四周堆上干柴，在冲天大火中，里面的人统统丧生，无一幸免。”

这就是格萨尔剥库拿的皮的传说。当然，原书中的描述更为详尽，我只好打断读者的思路，插进这段精彩的描述。我想由此说明，古老藏族的品行，从这里不是可见一斑吗！这种品行，也是新中国的统治者将要面临的。

“有一段时间，格萨尔闭关静坐，除了送饭的妻子，谁都不见。

“不久，妻子告诉他，他的一个臣属托东遭到了达孜士兵的抢掠，派人请求大王出兵复仇。托东狡诈多端，故意隐瞒他以前曾从达孜王(8)那里强行夺走一批纯种青马这一事实。

“神明的格萨尔对此事当然不会一无所知，但当议事院全体大臣在大厅商议时，在旁边那间小屋里坐静的格萨尔，打开对着大厅的小窗，下令动员一千名兵士，准备明日征讨达孜王。

“说完，格萨尔怒气冲冲地关上小窗。议事的大臣们面面相觑，怀疑自己是否都听错了。

“大臣们十分熟悉这位伟人的聪慧和权力，可这一次，他们一反常态，决定静候格萨尔说明开战的目的之后，才去召集人马。

“第二天，格萨尔召见全体大臣。礼毕，大臣们请求格萨尔说出为何要与达孜王作战。

“英明的格萨尔王当然知道托东的为人，也知道抢马一

事，他以此训导部下：

"'托东是一个不诚实的混蛋，一个糊涂虫。但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打一场有利于我们的大仗，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讨伐号称金元国之王的达孜王，为林国带回无数宝贵的战利品。'

"饲马官回奏说：

"'千真万确，托东是个恶棍，他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还从一个与我们和睦相处的国王那里偷马，竟敢反咬一口。我不明白，为何还要保护这个不仁不义的叛徒呢？一开战，我们许多将官和兵士就会因一个可怜的小偷而丧生，我们难道不会痛心吗？不，王，我们毫无必要去打这一仗'。

"所有的大臣都表示赞成饲马官的话。格萨尔窘迫不已，一时又找不出反驳的理由，所以也没有象往常那样坚持己见。

"'是的，'格萨尔道，'这是达孜和托东之间的事，托东是有罪的。既然你们坚持不支持托东，我们只好等待神的旨意。今晚大家到大堂守夜，神会告诉我们怎么做的'。

"当晚，大伙熟睡之后，骑着白狮的玛那内女神(9)爬上格萨尔的屋顶，呼唤着格萨尔王：'所向无敌的王啊，听着，'玛那内女神说。

"正在等待的王万分高兴，暗想，这不是我所期待的旨意吗！

"'托东的行为不应妨碍你下定决心'女神继续说，'达孜侵犯了你的国土，抢掠麾下的臣民，你应当让你的兵士和朋友洗清这一耻辱。达孜国珍宝稀贵，牛羊无数，林国太穷，你应该用达孜国的牛羊，放满林国的牧场，这才是头等

重要的理由，告诉你的将士吧，我和众神与你同在，随时保护你们'。

"说完，玛那内女神消失了。

"次日清晨，格萨尔将神灵的旨意告诉大臣们。

"众将官确信有了神的赞许和保护，也就赞成征讨达孜王，从而夺取富有的达孜国的珍宝和牛羊"。

探骑飞马向达孜王报告格萨尔的大军向达孜国开来，达孜王迅即召集了七十万兵士御敌。他除了依赖兵力之外，还将胜利希望寄托在某种奇迹之上。于是这部史诗开始了神奇的叙述部分。

"离达孜国城堡不远，有一个阴森可怖的地方，只有很少几个法师才敢上去。实际上，这是一个陡崖，崖上有一石洞，洞口伸出一块石头，除此并无什么特别的东西。

"相传很早以前，多雅也钦[10]的一个弟子长期在山洞拜火。许多年后，他的身躯变为一座顽石。因此，在神力驱动下，从山顶滚下一块石头，正好落在洞口跟前，堵着洞口，不让人们随便偷看洞中的秘密。

"每到夜晚，这块石头周围射出红光，相传这是一个永不熄灭的火库，会向山下喷出火蛇。

"苯教徒[11]认为，现在达孜王的一个远祖与火窟中神秘的隐士有过秘密的协定，答应在危难之时降火在他周围，用一堵不可逾越的火墙帮助这位远祖。因此，达孜国的每一个臣民一降临人世，都要举行祭火的仪式，以免受到这条火墙的伤害。

"达孜王象他的祖先一样虔诚地尊崇这位谁也没有见过的隐士，信赖这尊神奇石人的护佑，全然无视他的前辈谁也

未曾得到过这种虚构的保护。

“其实，谁也未曾料到，从前有两个魔鬼发出誓言之后，又有两位神也立下誓言，抵消了这两个魔鬼的誓约。

“其中一个魔鬼想灭绝人种，库拿就是他的化身；另一个魔鬼则想成为火墙保护下的富翁，后来转世成为达孜王。

“其中一位神祈求过：‘让我铲除这个企图消灭人类的恶棍吧！’由于两个魔鬼有着友情，所以另一位神又补充说：‘让我用这个恶棍的皮去扑灭他朋友的火墙吧！’

“格萨尔王正是通晓这段传说，才让士兵们剥下了库拿的那张皮的”。

格萨尔得到神的另一个旨意，他“手持库拿的皮和战旗，飞马冲上达孜城堡对面的一个山头，如同雄鹰展翅”。

“从山头上，格萨尔居高临下，看到平川上密布着达孜王的人马，高高的城堡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旌旗，台阶上燃烧着柏树叶，芬芳的烟幕在神象周围萦绕，排排长号发出阵阵长鸣。

“装饰着三齿叉和金顶的房上，站着脸色阴森可怕的达孜王，面向隐士从前居住过的山洞，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只见他右手一挥，瞬时间，山洞前的怪石向山谷滚了下去，所到之处，窜出条条火舌，说话间就在城堡四周形成一堵火墙，截断了通向对面那座山的小道。

“达孜的士兵在火海中毫毛未伤，趁着烟幕向前行动。达孜王在高高的城堡上渐渐沉入梦乡；巨鹰般的格萨尔依然屹立在山头上，目光炯炯，注视着前方。

“此时，格萨尔的人马早已作好准备，到了黄昏降临，

他们一声呐喊，向敌人方向进发。众将官身先士卒，身后的兵士个个头戴插满小彩旗的盔甲，马鞍上嵌着华丽的金皮和铜片。

“格萨尔远远听到他的人马在黑夜中向他靠近。

“达孜王自信他的城堡有火墙的保护，固若金汤，牢不可破，傲慢地下令兵士撤回城堡。夜，万籁俱寂，只有火焰在黑暗中发出可怕的亮光。

“我们的英雄格萨尔飞骑奔下山包，借助神的力量，冲进火海，在火焰中泰然挺立。只见他展开库拿的皮，向火舌抛了过去。然而，人皮并没落下，而是在颤动，卷缩着，似乎要逃离烈火。

“看来，化身为库拿的魔鬼与转世为达孜王的魔鬼昔日的友谊还没有断绝，库拿的皮还不想扑灭保护达孜王的火墙。可是，没有持续多久，人皮还是慢慢地降落了，先是慢慢地，最后终于迅速地向火墙扑了下去，只见烈焰直冲天际，刹那间就把库拿的皮化为灰烬。突然，黑暗中响起一阵炸雷声，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顿时浇灭了熊熊燃烧的魔火。

“格萨尔的人马冲下山包，在夜色中团团包围了城堡……

“到了次日清晨，格萨尔的人马从四面发起进攻，达孜王的军队进行了垂死的抵抗。

“东门，德钦飞石击中昆琪的脑门；西门，雅拉一箭射中了吉托丹的脑袋；汤杜在南门被格萨尔的士兵刀劈两半，吉沙纳在北门被刺穿胸膛。格萨尔的人马冲入城堡，逢人便杀，达孜王和他的儿子无一幸免”。

对于交战的双方来说，胜者搜集战败一方的武器，剥下

死者的衣物，统统运回国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格萨尔的士兵将达孜国的财宝牲口抢劫一空，胜利返回林国。

不言而喻，对此类悲惨的历史故事津津乐道的民族，面对着前进在雪山之乡大地上的毛泽东的军队，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同样可以想象，毛泽东的军队也绝不允许格萨尔的战斗场面有机会重新出现。

如同在亚洲其它地方一样，西藏也流行这样一种迷信，相信有朝一日将会降生一位超凡的伟人，他会在这个日益混沌的尘世间建立起秩序和正义。

不管藏族人民日思夜盼的是一位何等面目的救世主，而我们却实在从未曾见过一个厚道的救世主。为了建立自诩公道的统治，救世主们采用的手段历来都是严酷无情的，甚至是凶残的。

我在一个名叫昆班的寺庙居留期间，曾听到过当地藏民的一种传说，说有一个俄罗斯（或蒙古）的将军在率兵南下时，他的士兵个个都是能踩水过河的巨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个个刀枪不入，棍棒难伤，真是神乎其神。更奇妙的是这些士兵非同常人，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

安多的藏民们看来都在诚心期待着这群诗意般的士兵从天而降，来解救他们。

也有人日夜盼望成吉思汗再现，相传他并未死去，只是神鬼莫测地遁去，后来一直隐居在天边一块不为人知的地方。

即使真象人们传说的那样，不管成吉思汗在哪里度过了

他宣告死去以后的这几个世纪，他作为一个灭绝人性者的本性，恐怕依然没有改变吧！如果相信这些虔诚的成吉思汗的信徒，他转世之后，恐怕仍旧以屠杀人类为其生涯吧：

"正义受践之时，不公抬头之日，我将再生，我将显灵。我会扶持所有善良百姓，消灭人间一切恶棍，恢复正义"。

这是谁说过的话？是毗瑟挐借其化身克里西拿的嘴说出来的，而伸张正义的使者，恐怕应是身骑白色烈马持军刀的卡尔奇了！

藏族人有一种意识，认为再生显灵的应当是战功赫赫的格萨尔——他们的民族英雄。相传他也没有死去，只是神秘地隐世了，他也会象其它救世主一样，以摧枯拉朽的武士姿态回到藏族人中间。

今天已在西藏重新扎根的新中国的领导人，会不会想到利用盘踞在藏族人头脑中的这种关于救世主的怪诞想法呢？也许他们早已想到了吧？他们不正是自称为艰难时世的正义先驱，肩负着格萨尔和其它神灵与英雄的重任吗？在正义抬头之前，野蛮的"惩罚"在西藏无疑令人畏惧，却无法动摇藏族人的坚强意志，他们会象格萨尔传中所歌颂的那样，坚决地、不屈不挠地进行反抗。

更重要的是重返西藏的中国人，看来也绝不会采取荒谬的过激行为。目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仍然是符合传统观念的。不错，一些显贵喇嘛的寺院以及富有头人的住宅已被占用，作为军队营房或者干部的住所，有的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处所；屯集在寺庙或旧官员库中的粮食或被发放给普通百姓，或被充作军粮。

小小的藏军已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还颁布了一些有关贸易与宗教方面的政策。所有这些变化都并不令人吃惊，全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我们本国司空见惯的做法。

中国武装力量重返西藏所掀起的波澜，也影响到尼泊尔和锡金等其它喜马拉雅国家。锡金是一个原始森林密布的小国，我曾在哪里住过多年，对我显得格外亲切一些。在这个国家里，也掀起了一场进步的运动，运动的领导人达什·泽林（音译）想改变马哈拉加（音译）地方政府的过时做法，试图用印度方式选出一个议会，取代这个英国人统治下的象征性的傀儡政府。

运动的领导人还颁布了一些纲领，提倡全民动员起来参加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高这个文盲占大多数的国家的文化水平。

这些纲领引起了印度政府的不满，它拒绝让锡金在其附属国中独树一帜，坚持在选举议会代表的问题上，锡金只能与“落后部落”同等待遇。

印度派出的公使取代了英国公使，在其监护之下，马哈拉加地方政府得以维持下来(12)。

这个小小的国家虽然曾公开宣告独立，但这只是一个标签而已，反而使印度政府跟以前的英国政府一样在锡金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锡金宣告独立的第一个结果，是对外国人关闭了所有的口岸，控制严格的程度并不亚于西藏。读者也许没有忘记，第一次大战时的锡金，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国家，外国游客不绝，许多地方甚至建有专供游人住宿的平房。瑞典的传教士曾深入到与西藏交界处的拉成河及其沿岸村庄，我本人亦曾

在锡金的几年中游览过许多地方。

现在，即使接近这块土地也会遭到禁止，已经有外国人被逐出噶伦堡的先例……。

中国武装力量向西藏中心县份进军，使这些地区的贵族们普遍感到不安。根据以往纷争的教训，他们怎能不去猜这些军队的所作所为呢？换了他们，理所当然是要抢劫烧杀一番了。

一部分贵族觉得前景并不乐观，于是开始外逃，实际上他们也没有逃得很远，只是刚穿过边境线就在印度领土上逗留下来。这些出逃的藏民主要住在噶伦堡，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并不象异国他乡。这里的人民与他们语言相同，是藏族的后裔。再说，他们在这里也觉得离尊贵的保护人达赖喇嘛并不遥远，他正在拉萨静候事态的发展，一定会指明他们的去向。

好几个月已经过去，噶伦堡的人口猛增，这些逃来的人没有往常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日益困难。而且，他们在这里也得不到过去的优待，很快就被视为外国人，被迫要他们去履行繁琐的手续。藏族人至今仍对公民证、护照等觉得新鲜，认为只有不受欢迎的人才需要办理这些证件，现在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去登记。

仍在拉萨的政府命令这些藏民不要甘心忍受这种欺负，然而，他们又能依靠什么来自卫呢？我们这些欧洲人和美国人，当无视“人权”的税率这种奴役性的东西强行加在我们自己头上时，难道我们又进行过自卫吗？

因此，这部分外流的藏民只好重返家园。这时，西藏已被正式划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在内部事务方面与其它省份

拥有同等的权力。

年方十八岁的达赖喇嘛也流亡过一段时间，确切一些说，他是在其周围的人的挟持下于解放军抵达拉萨前外逃的。同行的有一大批各阶层的官员和侍从人员，一个数千条骡子和大批捎夫组成的行李队伍，满载着从布达拉宫带出的金银珠宝。

这批流亡者要向何处去？他们无疑对亚洲的政治势态一无所知，才如此想入非非，竟然想去祈求英国的干预。他们完全不知道一件重要的现实：在世界上，人们认为他们的家乡是一块落后的、没有现代文明和强大武装的地方。

现在，早已不是各世达赖喇嘛在中国和蒙古受到崇拜的年代了。

这位年青人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人入侵西藏时（一九零四年）曾逃亡内地。他固执地要求，为了向他表示尊敬，不能让一个达赖喇嘛从门洞下钻过，他沿途经过的城门都要拆开。

开头，中国当局同意他这种荒谬的要求，后来当达赖动身返回拉萨时，才觉得这种要求过于荒唐，所以没有按这种方式向他表示尊敬。据十三世达赖的家人说，这件事情曾使他大发雷霆。

此后不久，十三世达赖在中国军队进藏前曾逃往印度，英国人不失时机地向他表示亲热。

这些毕竟都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这一次，印度政府向年青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暗示，如果他希望在印度避难，他仍然会受到隆重的欢迎，并给他指定居留地。但是，他必须克制一切政治活动，既不允许在喜马拉雅各国以及与西藏接壤的印

度北部地区活动，也不准在一度流亡过的噶伦堡活动。

故此，达赖以及随行人员只好在西藏南端的城镇亚东滞留下来，静候事态的演化。

然而，惊人的事情并没有出现。派回拉萨的代表乖乖地在谈判桌上的文件上签了字，达赖的亲随被警告不要采取任何对抗行动，提出的条件也全都遭到拒绝。

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驻在拉萨，并向达赖提出，他们随时都可以携带布达拉宫的珠宝返回拉萨，也可以象班禅曾长期流亡中国内地那样，逃到印度去过富翁生活。

在亚东，农民们渐渐开始觉得，他们尊贵的保护人以及那帮乌合之众和大群牲口，成了他们的累赘，他们难以长期无偿地供养这帮人。因此，农民们一反往常的恭顺，开始埋怨起来。

理智告诉达赖及其随行人员，应当返回拉萨去，只要节制自己不作各种无益的反抗，他们的生活仍将是舒适而安逸的。

达赖的“同胞”班禅喇嘛比达赖小七岁，同样也有一半的汉族血统。他很快就回到了日喀则行宫，根据在北京签定的协议，他在西藏对拉萨有一定的管理权。

这个协议结束了亲英的拉萨集团与亲汉日喀则集团之间的敌对状态，这种内部纷争曾使班禅喇嘛长期流亡内地。现在，这场政治闹剧的两位主角都已去世，年轻的继承者深深感到，西藏成为中国一个省的事实，已经使这场争吵变得毫无意义了。从此之后，他们两人再也不用互相提防。

北京方面十分理智，竭力在两位活着的大喇嘛之间进行调和，为了表明这种好意，中国官方还在拉萨举行的一次盛

大宴会上安排两位大喇嘛并肩平坐在一起。

读者将会发现，在西藏这个地方，出席会议的座次问题是多么微妙，各人座垫的高低又是多么重要。达赖集团的显贵们，就这个问题与中国政府代表曾发生过十分有趣的争执。

这帮显贵们提出，在任何场合，达赖喇嘛的座垫都应高于中国政府代表的座垫，北京当局却置若罔闻，坚持公开露面时让这两人平起平坐，以示同样显要。

中国政府的这一要求实在也不过分。如果藏族人还记得在中国王朝时期，达赖喇嘛要在皇帝面前叩首称臣的话，那么，应该说这是一种很谦逊的要求，而且可以说是给藏族的一种特权。不过，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取代皇朝驻藏大臣的英国来使或常驻代表，的确对大喇嘛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尊敬，但说穿了也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实际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已。

那时的英国人，都是在布达拉宫或其它地方以地地道道的欧洲方式会见达赖的；达赖喇嘛高高在上，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他的英国对话者只能谦卑地坐在一张矮椅上。

如果藏族人在北京面前仍想保持这种气派的话，那他们这次可是大错特错了。在北京的指示下，强硬的政府代表坚持己见；坐欧洲式的椅子也好，坐中国式的太师椅也行，或者是按照西藏习惯坐垫子也罢，这都无关紧要，但胜利的新中国的政府代表无须抬头仰视现代西藏的首领。

双方为了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艰难的讨价还价，最终还是以藏族人的让步而告终。

在新政权建立初期，类似的趣闻并不稀罕。

虽然一些误听传闻的人可能坚持成见，但中国革命并不能归纳为一场推翻一切上层建设的变革。相反，在许多方面，甚至从新近颁布的政策条文，也能看到这场革命多少带有传统的烙印。

看到如“圣人”所望，农民们按照新颁布的土地法而真正成为社会建筑中的基本单位，孔夫子的后代们难道还不感到心满意足吗？

土地法颁布不久，首府拉萨及其附近的贵族显贵都按命令列队下地，令人想起了过去皇帝在农忙时节乔装成农夫下地干活的传说。

藏民们也许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吧，但这次，他们可真是大开眼界了。过去游手好闲、习惯于受人叩拜的这些显贵，在目瞪口呆的拉萨人面前排成长队，扛着农具下地干活了！这些精彩镜头被拍成电影，不仅在西藏广为放映，还拿到其它地方向农民进行宣传。

在如何开发西藏的问题上，颁布的有关措施并没那么惊天动地，但却具有更为严肃的实际意义。

西藏的地下埋藏着金矿，但开采工作至今仍只限于几条河的流域。今天，据说在西北某地已发现了真正的金矿床，煤和铀等其它矿产，有的也可能已经探明；一些勘探人员正在紧张工作，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苏联人。大约在三十年前，曾在英国学习的一名藏族青年打算在家乡开展地下勘探，当时，这件新鲜事引起了乡民的强烈抗议，迷信的藏民认为，挖掘地下会使地力枯竭，造成土地贫瘠。我想，今天的藏族人当然不会旧戏重演，继续反对勘探地下。

令藏族人赞叹不已的事物，莫过于看到解放军被派去从

事和平事业。今天，在他们家乡，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这种感人的场面。

中国人决心充分利用广大的土地，改变西藏过去那种必须从印度进口粮食及其它商品的局面。他们认为，精心修筑的灌溉网，将会改良无数一直不能产粮的土地，因此，一队队的解放军正陆续被派往参加劈山开渠的工程。

有的部队则忙于修筑公路网，可以展望，西藏的交通将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使藏族人摆脱闭关自锁的状态。

正在日新月异的不仅仅是圣城拉萨。中国人还模仿德里的做法，准备在老城附近建起一个现代化的新拉萨，备上一个机场，作为政府的所在地。

飞机来到了拉萨！世世代代与世隔绝的拉萨城里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是一种何等壮丽的变革啊！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拉萨似乎更为“闭塞”了，以前，人们是在西藏周围的“雪墙”面前畏而却步，但那毕竟只是大自然设置的障碍，而今天，看到旅游者所面临的那堵更不友好的人为的屏障，谁又还能不动声色依然前往呢？

中国人重返西藏激起的浪涛，还未完全平静下来，很快就降下了帷幕，遮住了这台以世界屋脊为背景的精彩节目，迷人的净土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偶尔才引起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国瞄上一眼。

叛乱并没有发生，仅仅上演了一出喜剧，可爱而稚气的西藏人民，只有希望这出喜剧能够继续演下去。

在社会各阶层中发生的种种可笑的事情，究其原因不正是这种稚气的传统习俗吗？读者看了此番概略的介绍，也许在接触到新中国的宣传时，更能把握住自己的反应吧？

当然，这里描述的西藏，多多少少与其真实面目已经有所偏离，活生生的西藏，毕竟是位于世界屋脊之上，而不是在我的介绍之中。

同样无疑的是，当飘荡在雪山顶上的乌云散开之时，读者们便会欣赏到白雪覆盖的山顶发出的光芒，英明成熟的观察家们，也会从众多日常小事中探究到那个活生生的西藏，看到她的潜力，领略她的辉煌。

注释：

①达维·耐尔此书写于1951——1952年。

②汉藏之间的纷争可参看拙作《在辽阔的中国西部的未开化地区》序。

③1841年，尼泊尔人再次侵略西藏西部地区，在汉族人的帮助下，藏族人击退了尼泊尔人。到了1884年，尼泊尔人试图卷土重来，藏族人妥协，应允向尼泊尔纳奉年贡，其数目与尼泊尔人向中国政府缴纳的年贡相当，此外，尼泊尔人还获得派驻一位商业领事和一支卫队的特权。

④读者将从下文看到，印度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喜马拉雅山各国才陆续完全或部分向旅游者开放。

⑤《在拉萨和西藏中部的日日夜夜》，S·C·达斯写于1902年，旅行时间为1881——1882年。

⑥以下有关格萨尔的内容引自作者翻译的《林国格萨尔传奇》，罗什出版社再版。

⑦格萨尔的业绩并不是在虚构的地方创造的，这些地方在地图上均能找到，羌国位于现今云南省丽江一带，与羌人发生战争的麻尔康（Markham）国即现今的干托克。我在康

地时曾参观过林国城堡，据传即为格萨尔的城堡，当时由一位自称是格萨尔义子之后裔的头人居住。

⑧达孜（Tazjg），波斯国王或波斯附近地区的一位君王。

⑨玛那内是格萨尔的保护女神。

⑩今天苯教徒仍把多雅也钦奉若神明。

⑪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旧教信徒，汉族人把苯教徒与道教徒等同看待。

⑫后于1973年被推翻，改为政府总理制。

# 世界屋脊

（美）A·汤姆·格兰菲尔德 著

何桂金 译

**编者按**：汤姆·格兰菲尔德博士，加拿大汉学家，曾攻读于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和纽约大学，现任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国外藏学界，格兰菲尔德博士是敢于仗义执言、追求真理的一位学者。著有《现代西藏的诞生》（中译本由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其他许多关于西藏现代生活的论文。他在写作过程中，曾采访达赖喇嘛，汤姆斯·劳威尔、黎吉生、帕塔逊等人和我国许多知名藏学家。也曾到美国、英国、印度、中国以及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进行调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传统西藏的政治结构和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地位。并从战后国际关系角度论述了西藏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对七十年代出版的三本反共反华的所谓“藏学名著”进行了批驳。他的另一篇文章《利用宣传与公共关系发动政治攻势》，对西藏流亡集团在海外与西方议会勾结，争取“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过程予以披透。

本文译自《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会刊》第九卷1977年第一期。

# 一

西方学术界并不十分关心西藏的历史和政治形态，这是不足为奇的。大部分是一片荒凉的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百七十万人口，处在平均海拔一万二千英尺以上的高度，又受到世界上最恶劣的那种气候的困扰，能有多少重要性呢？加之地理上的隔离由于官方的排外政策而加剧（这种排外政策是西藏地方官员或北京的汉人造成的，以此为依据的历史描述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事实上，除了那些最能吃苦耐劳的人和那些最坚定的政府外，西藏和外界完全隔离了。

虽然西藏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个自治区之一，西藏人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1]之一，但他们和他们居住的整个地区情况特殊，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课题。西藏的地势使中国内地和拉萨之间的交通极为不便，使西藏人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种形势反过来又导致了高度集权的、极其强大的两头政治的地方政府的发展，这就是十六世纪以后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政府。

一九一一年，皇权在全中国范围内被推翻了。在连续发生的政治动乱中，出现了很多军阀（督军），成了他们那个地区的专制统治者。这种过渡在西藏比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简单，因为那里的统治者早已建立了坚如磐石的、暴虐的政治机构。还有，英国政府，特别是它在印度的官员，认为清朝的灭亡是达到它十几年来想取得对西藏行使宗主权目的的时机。一九一三年，英国和西藏统治者串通一气，违背软

弱无力的中国政府的意志，在拉萨和其它贸易中心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办事处。[2]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殖民帝国被迫解体以后，它对西藏事实上的宗主权才结束。西藏统治者希望能承认他们"独立"。但这不可能，因为英国是西藏事实上的宗主国时，西藏从未否认过中国的合法宗主权。还有，不管谁声称统治中国，任何时候中国人都一致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它可能受到外国的影响。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中国又一次有了强大的中央政府，第二年重申了它在西藏的主权。

西藏独特的一个方面，是（佛教传入以后）存在一种极少受外界影响的神权政治和文化，一种在佛教教义和当地善行[3]相结合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神权政治。

佛教最先于七世纪由下嫁给了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中国和尼泊尔的公主传入西藏。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西藏佛教，即人们为了与佛教其他更常见的形式相区别而称为的喇嘛教，在十至十二世纪之间出现了现有的寺院形式。[4]正如塔西所说：

有了权利，寺院就成了一种经济和军事组织：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有自己的武装，互相掀 战争。结果形成了以这些组织为中心的新的政治集团。宗教的职权和寺院的权力使俗人把自己的命运和寺院的命运连在一起。俗人名义上是大寺院的保护人，实际上依附于大寺院或受大寺院控制。[5]

人数极少的贵族，包括俗人和僧侣，建立了他们对大多数人的专制统治，并以玄奥的理由奠定了西藏封制建度的基础。经过几个世纪，僧侣加强了对封建制度的控制，特别是喇嘛教的格鲁派（黄教），逐渐把所有权力集中在十四个达赖喇

嘛和七个班禅喇嘛手中。[6]

随着法王统治制度的建立，寺院的权力更大了。他们和中国元朝的统治者联合，使寺院取得了处理西藏地方僧俗事务的专有权。后来，格鲁派提出活佛转世的神奇理论，使任何一个贵族家庭都不能用世袭的方法垄断权力，但要把控制权长期掌握在僧侣中的杰出人物手中。另外，寺院还在内部建立了封建等级，以加强寺院外现行的制度。[7]

既然寺院不纳税，不服役，可以把他们看成独立的封建领主，因为他们有土地，有农奴向它们交税，为它们服役，有权履行一切职责（审判等）。有时一个寺院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堡，和其他封建领主一样，通过贸易和放债进一步增加收入。除此之外，它们还有一个独特的收入来源：应私人邀请做法事的报酬。……寺院内保持着社会等级，允许有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通过私人交易或做法事所得的私人收入而增加。有钱的僧侣拥有财产，把贫穷的僧侣作为仆人。……陷入贫困的低级僧侣通常无法完成谋取高级职位所需的长期学习，常常甚至是一字不识。[8]

西藏人和外界经常进行的唯一重要联系就是和蒙古人、汉人的联系。对外界其余的人说来，这种差不多是完全与外界的隔离引起了许多被认定为西藏佛教神奇特点的传说，使那些最坚定的外国人急于跨越边界进行更周密的考察，到很少有外国人去过的地方旅行。据报道，二十世纪以前大约有四十个外国人访问过西藏，但只有少数人看见了“寓言中有名的”拉萨。[9]这些西方考察者的记述使读者非常神往。事实上，旅行者们的报道是研究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10]总的说来，来自中国、西藏和尼泊尔的资料不多，

而且，即使具有必需的语言技能的人，也不容易理解。

一九五〇年，共产党控制了西藏，社会变了，但没有中国其他地方彻底。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承认西藏情况特殊，并把它作为特殊情况来处理，没有触动它的社会结构，既和统治者合作又和广大劳苦大众合作。改革进行得非常缓慢，但是，就是这样缓慢的改革也受到统治集团的抵制。因此，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一步，公开保证无限期推迟改革……"(11)尽管北京特别努力，以达赖喇嘛的一个弟弟嘉乐顿珠为首的一部分统治者，一九五六年以前就谋取到了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的支持，为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袭击中国进行军事训练和提供军事装备。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二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又一个暗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2)一九五九年暴动流产后，达赖喇嘛和统治集团的大多数人逃离西藏，在印度组织了"流亡政府"，直至今天仍然完全控制着西藏的难民，奉行喇嘛教，进行世界范围的反共反华宣传。另一方面，在中国其他地方完成社会革命十年之后，西藏开始了全面的社会革命。

## 二

现在，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旧的封建制度和宗教制度不能恢复。西藏"独立"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那末，人们为什么对西藏还有兴趣呢？一种答案就是西藏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交界处，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和潜在爆发性的地区。考虑到现在中苏、中印之间的敌对态度，还有印苏联盟，

敌对行动可能会在这一高山地区爆发，这不会是第一次：一九六二年短暂的中印战争就是在西藏西部和西南边境一九一三年英国殖民政府单方面硬性划定的边界上打起来的。(13)一九六二年冲突以后还没有达成任何长期的妥协，实际上一九七五年出现了更大的事件。(14)苏联通过对西藏进行反华宣传，鼓动叛乱，对这一地区的形势一直高度紧张起了它的作用。(15)同时，印度军队征集了数以千计的西藏人加入所谓“印度边境警察”，并答应在适当的时机“用来解放西藏”。(16)

其它国家从来没有忽视在西藏和西藏周围涉及亚洲三个军事大国的潜在的军事敌对行动。如前所述，台湾政府在一九五六年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一九五七年起，就在招募、训练和装备反共的西藏难民，并把他们偷偷空运回西藏，妄图发动游击战争。(17)事实上，就在一九五九年流产的叛乱前夕，中央情报局将在科罗拉多州黑尔营受过反革命战争训练的几个西藏人空降回他们的故乡。(18)这些事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没有受到报刊、电台和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它们往往不加思索地承认达赖喇嘛和西藏难民的处境，认为所有对中国统治的反抗都是地方性的，没有受到外界的援助。其实，西藏被认为是中国的“匈牙利”，甚至是中国的“越南”。(19)

在这段很多人还不明真象的时期出现的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文件之一，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出版的一个小册子《武装力量谈348：西藏——世界屋脊》。(20)该小册子是“供指挥员用来向其部属进行教育的”。(21)那完全是偏袒一方的文件，对西藏社会甚至西藏的边界都缺

乏准备性了解。它还指出一些刺激人的兴趣的问题：美国政府为什么感到非把遥远的西藏的情况告诉全体武装人员不可呢？[22]可能会有意外的打算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吗？会是一条把中国军队从朝鲜引走的新战线吗？在适当的文件公布之前，这将仍然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历史性脚注。

最近的报刊、电台往往忽视西藏，不屑提及。中国抗议纽约设有代表达赖喇嘛的"官方"办事处，抗议给一个打算在美国巡回演出的西藏难民的文化团体颁发签证，就是最近的例证。《时代》杂志把这件事说成是"蠢事"而一笔带过，其它报刊、电台都没有报道。[23]

学术兴趣没有多大提高。一位人类学家告诫学者们不要丧失兴趣。他说："有关西藏社会的文献得了慢性宗教消费不良症。西藏佛教的'伟大传统'往往占据了研究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学者的精力，而象社会组织这类问题普遍受到忽视。"[24]他还可以加上，象政治、历史和现状这类问题也受到忽视。东方教派——欺骗性的或其他的[25]——目前在西方的迅速发展和研究西藏佛教的传统学术倾向，使研究仅仅集中在这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的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现在在西藏本土正在消失。还有，既然佛教是西藏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是那个社会的许多残酷的表现形式的受益者，那末人们可能会问，在西方，人们应该研究和教授的是什么：是"圣书"中唯心的教义还是封建的西藏实行奉行的宗教？[26]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显得深奥，但是，当人们真正注意到中国人正在努力消灭的东西，即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用来安抚、镇压和迫害广大西藏平民的神秘的宗教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变得重要了。

希望读者现在明确西藏的重要性。现在很少人关心西藏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因此从一九七〇年以来西方只出版了很少几本论述这些方面的书。我认为这里评论的三本书最重要。而且，由于作者在研究西藏的人中的信誉，包括业余的和专业的，这些书流传很广。不能把它们简单地看成是反共文人的作品，而必须认真研读。另外，由于对非宗教问题研究不足，遗憾得很，这三本书还是可能获得材料的优秀代表。

这三本书有一些有趣的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反映汉人的书，都用过分简单的极端的政治观点来描述汉藏关系。还有，它们几乎都没有脚注（只有佩塞尔的书有几个）和很少的参考书目。这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因为所有这三本书中说的事情据说都是作者或作者的相识亲身经历的。但是，正如我下面要说明的那样，这些作品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个人报道的范围。读者没有机会进一步研究书中的论断，接受或不接受由读者决定。还有一种令人遗憾的意向（诺布的书没有那样明显），就是作者不切实际地把西藏人刻板化。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些“专家”，我们就会认为西藏人总是高高兴兴，笑容满面，无忧无虑，不受社会和政治形势的影响，政治上幼稚——希望别人不干扰他们而平静地生活。这种戏剧化的描写使我们回想起印度支那战争的头几年美国宣传机器对越南农民的描写。最后，既然这几本书的一个共同的明确目的是指出中国人的错误和过度行为，作者都避免深入描写一九五〇年前西藏社会的性质，因此，他们忽视了按惯例进行的严格的阶级划分，忽视了大多数人（二百至二百五十家除外）所处的农奴的境遇，忽视了西藏法律允许的酷刑，忽视了西藏奉行的佛教思想的压迫性和残忍的迷信等等。

## 三、《一个四十岁的傻瓜》

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〇年，乔治·帕特森作为医务人员在西藏东部供职。他在那里学会了康巴人的方言，交了许多后来帮助他工作的朋友。（顺便说一句，这些康巴人是经过训练并装备起来准备从印度和尼泊尔的基地袭击中国的西藏人。）帕特森在支持他们的事业方面一直很有创造性，写了许多攻击汉人的文章和书籍，最近又主张在中印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一个由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查尔邦）、不丹、锡金、尼泊尔和西藏（也许还有拉达克）组成的喜马拉雅山国家的联邦。

作为使人激动的真实惊险故事，这本书对一般读者有感染力。但是，这本书的内容有很多问题，很难着重只谈几个。简言之，这本书是写帕特森成功地欺骗印度和尼泊尔当局，使他们允许他和另外两人组成的拍摄组一起把一股康巴人一九六四年袭击西藏的情况拍成电形。我认为最使人吃惊的不是袭击本身，而是作者的傲慢和他不断地想炫耀自己。

> 所以，在我看来，我不得不再一次亲自负起把印度——扩大而言——和西方从它们特有的愚蠢造成的恶果中拯救出来的责任，就像我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九年试图做过的那样。（第11页）

这种态度在书的前半部他教训印度和尼泊尔当局怎样治理他们各自的国家时非常突出，人们怎样解释这种出自一个自称是西藏人的"朋友"之口的家长式的语言：

> 对西藏人就象对马一样，一旦被驯服了，缰绳

就可以放松一点。（第103页）

不管西藏人觉察了这种态度或康巴人希望不向外人泄露任何情况，帕特森没有获得他们的完全信任，这是很清楚的。例如他显然不知道他们一直得到、在袭击的时候还正得到外国政府的秘密援助。

虽然我们可以不管他根据自已的意见所作的过分戏剧化的描写（“西藏叛乱已经由康巴人发起并接近成功。”第8页。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但作者对亚洲那一地区的事件的分析使我们怀疑他在这方面是“内行”。这两个例子本身就足以说明：

> 中国〔一九六四年〕已经在准备侵袭尼泊尔北部，已经在通过贸易和宣传进行侵袭。……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武装入侵。（第205页）

> 如果中国真正在谋求联合国的代表权（虽然我自已怀疑这一点……），那末她在六个月之内将不得不认真考虑达赖喇嘛提出的在撤兵的条件下返回西藏的要求。……第一，因为联合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基础就是中国在西藏的侵略活动……（第60页）

袭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读者去推测。袭击队在西藏边境一共步行了十二个小时，在伏击地埋伏了九个小时等候伏击，袭击四辆中国卡车二十分钟，然后用十二小时尽快逃回尼泊尔。虽然我不想低估在世界那个地区行走的艰难，但是，袭击并不象书的护封所说的那样，“……证明中国人声称西藏人希望汉人进驻他们那个国家是胡言乱语。”无疑汉人进驻西藏受到了抵抗。事实上，最令人惊奇的是帕特森的书根本没有提及西藏境内的康巴人的普遍支持。如果

这次袭击是对十七年中进行的各种袭击的准确描写，那些人们会认为，袭击者甚至根本没有和西藏的民众接触。帕特森只证明对中国进行小型的骚扰性袭击是可能的；他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证明（一）西藏叛乱远远没有平息，（二）康巴人是可能进驻西藏的任何中国占领军的对手……”（第14页）

## 四、《西藏的秘密战争》

米歇尔·佩塞尔的书是这三本书中最难评论的一本。我几乎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作了注释，如要全部讨论，得写一篇很长的论文。佩塞尔是一个法国人类学者，会讲藏语，但喜欢用英语写作。他从未到过西藏，他是向在印度噶伦堡避难的上层藏人学的藏语，他的著作主要是根据那些人的叙述写成的。(29)他的值得称赞的目的是向人们说明一九五〇年以来西藏发生的事情；该书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只有那些被他的观点说明了的问题才能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

和帕特森一样，佩塞尔常常失去自制而肆意夸张：

> 这样，〔一九五九年〕拉萨叛乱就成了不只是对中国入侵的全面反抗。同时，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那样，一个民族起来反抗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极端的政治。这是一场双重革命：首先是早该进行的反对贵族特权和寺院大住持的宗教专制的革命，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冷酷的专制的革命；兼有匈牙利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性质。（第126页）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佩塞尔重复帕特森的观点，认为

中国是决心征服南亚和东南亚的侵略国家。[30]但是，他还愿意承认毛泽东给中国其他地方带来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变化，虽然他似乎认为只有在中国本土这种变化才有效益。[31]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类学者，有些地方佩塞尔说话明显地过于简单，使人怀疑他是否了解或有意无视他那个领域的其他人类学者的著作。例如：

> 出乎中国人所料，他们发现西藏社会尽管有"封建的"现象，但并不存在象中国存在的那种"阶级仇恨"。西藏似乎没有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第53页）

> ……不管西藏看起来多么象封建制度，但它不是实行压迫制度的国家。（第53页）

> 尽管西藏的穷人无疑比富人生活更艰难，虽然惩办罪犯还是用古老的办法，如鞭打、戴手枷和项枷，偶尔还有切肢等，但西藏所有的人都受到极大的尊重而不管他们的地位怎样。在西藏伤害牲畜都被认为是罪过。（第53——54页）

西藏社会"看起来"象封建制度，因为它是封建制度。佩塞尔愿意承认一九五〇年前的西藏社会是极端残酷的社会，甚至承认人数很少的俗人统治集团和佛教僧侣统治集团应负主要责任。佩塞尔的独特之处是他竭力为西藏社会辩护，莫明其妙地用"尊重"来弥补鞭打和切肢这种不足。

在另外一些地方，佩塞尔没有进行研究而完全错了。例如他说，虽然达赖喇嘛流亡在印度，但他和外界没有接触。[32]

事实上，达赖喇嘛一伙通过无线电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33]在另一处，作者声称苏联在一九六〇年恢复了理智，认识到中国人正在西藏施行暴政，因此在联合国问题上改变了态度。[34]那段时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佩塞尔似乎没有考虑到。

人们很容易怀疑佩塞尔通篇站不住的分析。例如佩塞尔声称，在整个五十年代，拉萨没有一个藏族官员支持康巴人的反汉活动，这就说明汉人分化这个国家的努力成功了。[35]即然佩塞尔没有提出任何文献证明这种说法，人们很容易认为，康巴人没有得到拉萨的援助是因为康巴人没有做任何值得支持的事情，或许他们认为康巴人的行动必然要失败，或者甚至因为他们对汉人进驻西藏并不象佩塞尔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不满。

几乎完全没有提出文献证明是该书的最大缺陷。例如，佩塞尔讲了一些康巴地区和康巴人的历史，但他甚至没有列出"主要参考文献"供读者进一步研究。书中详细描写了人物、穿着、战地情景、气候情况等，还描写了数不清的军事交锋，好象佩塞尔哪里都在，包括北京："在北京，林彪和他的参谋长们焦急地认真研究中国新地图……"（第70页）事实上，佩塞尔甚至希望我们相信他有办法了解中国的军事预算。[36]另外还有我查找过而没有查到的声明、证据，其中一条说汉族官员叛逃到西藏持不同政见者那里，[37]还有一条说一九五六年有八千中国士兵从新疆逃到了苏联。[38]这本书主要是为一般读者而不是为学者写的，佩塞尔应该知道，对有争议的问题至少要为自己比较离奇的言论提出最低限度的文献证明。

遗憾的是，一个具有学术功底的人不能写出比较准确而较少有争议的东西。实际上，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只能同意最近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一个记者的意见。他告诫我说："……他〔佩塞尔〕的任何论述都必须极谨慎地对待。他的书似乎是大部分已经在其他地方发表过的材料的改头换面的概述，他的许多新颖的材料都是最令人厌烦的夸张和概括加上经过一番加工升华为事实的毫无根据的谣传。"(39)

## 五、《西藏的红星》

达瓦诺布的书在几方面和其余两本书中不同，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作者是一个藏人，是用西方语言论述西藏问题的为数很少的人之一。诺布也很特殊，因为就笔者所知，他是到目前为止曾经生活在西藏的共产党时期而在中国国外著书出版的仅有的三个西藏人之一。(他一九四九年出生，一九六一年逃离西藏。)他现在是新德里出版的反对传统观念的难民刊物《西藏评论》的编辑。他写这本书的意图似乎"仅仅是阐明西藏真实发生的事情。"（第10页）这也是佩塞尔写他那本书的目的。虽然诺布的书是这三本书中最好的一本，但归根结底，他只是比佩塞尔稍微成功一些。

既然达瓦诺布逃离西藏时只有十一岁，所以这本书是根据别人特别是他母亲的叙述撰写，再加上个人的评论和解释而成的。(40)读者很快就会感到作者蔑视"那些过去写过书并巧妙地回避西藏封建性的西藏人"，（第9页）有意要攻击那些有关西藏的最神圣的神话。例如，"……僧侣的学问，如果他们有的话，除了对他们自己以外，很难对任何人有好

处，而且，除了临时的僧侣，他们都是占有者和注重实利的人。”（第22——23页）还有，他受的现代教育（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是英国和印度的教育）使他不相信宗教。例如，他认为他父亲年纪轻轻就过早夭亡不是因为他过去的“卡马”（藏语，“罪孽”，“罪过”之意——译者），而是因为穷人缺医少药。(41)诺布解释旧文化的“神秘”成分解释得最好。他在第二章以俗人的观点对西藏旧有的对人死后而进行的法事作了出色的描写。(42)遗憾的是这类材料不多而论证不足。

诺布的论述有很多矛盾，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43)在一个地方诺布把西藏的旧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第9页），在另一个地方又说成是“自由社会”（第141页）。他有意谴责一些比较荒唐的迷信：喇嘛口念“治病”的咒语把痰吐在头上就能治病（第31页），西藏人相信病是由恶运、“羯磨（Karma）”和魔鬼引起的(第41页)。在其他地方他自己似乎又相信其中的很多东西：喇嘛能先知先觉（第103页），中国共产党统治不可避免是由于西藏人共同的“羯磨”的缘故（第154页）。

该书在叙述汉藏关系的历史方面最糟，似乎纯粹是改头换面地重复“达赖喇嘛情报宣传处”炮制的宣传。诺布维护关于冷战的离奇说法，如说西藏是中国将来向南亚扩张的“跳板”；(44)一九五九年的暴动“是因为走投无路而引起的自发的反抗”（第155页）。不用说，他没有提到台湾和美国暗中的援助。

作者的其他解释也有问题。在一个地方他赞扬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新技术和平分土地、财产，但“……怀疑他们的

最终目的”。（第212页）作者把修建公路的卓越规划说成是为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西藏[45]，而根本没有考虑这些努力给西藏带来的经济效益。

诺布的研究中最后一个突出的地方是没有报道在印度的西藏难民现在的情况，作者本人也是一个难民。很清楚，作者是为数很少的会讲英语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名人之一。虽然以前没有人深入而独立地研究西藏难民[46]，但最近一次短暂的研究[47]确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在印度南部一个难民定居的村子里，据悉那里进行了成功的整顿，除了其他东西以外，还发现旧的封建组织仍然存在，虽然有一些改变，但还是“家长式的僧侣统治”而不是法律在那里起作用。[48]大多数难民完全隶属达赖喇嘛和指定的代表[49]，藏民和非藏民不得往来，“……让难民知道哪些情况完全由达赖喇嘛的政府控制”，[50]还有，寺院正在开始重新起着传统作用。[51]

总之，《西藏的红星》是个人的论述而不是真实情况的写照，但是同意本书观点的人把它作为后者来宣传是可能的。考虑到作者的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他未能趁此机会对形势进行更现实主义的研究令人感到失望。

## 结论

中国要在西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仍然是需要她付出最大努力的工作之一。一九四九年，西藏是全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也是最迷信、最反对改革的地区。在中国其他地区完成改革整整十年之后，这里的改革事实上才开始，甚至那

时也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交通仍然是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只有四条蜿蜒盘旋的公路把西藏和中国的其余部分连接在一起。几乎每一样东西都要用汽车长途转运，既花很长时间又花很多燃料。另外只有两条航线，都受到常常无法预料的天气的影响。有消息说要修建一条铁路，拉萨和加德满都之间要开辟航线，但还没有得到证实。西藏遭受外国干涉的敏感性和边境上敌对的难民区都只能加剧西藏的困难。必须克服双方的种族主义态度，必须破除一切迷信，如挖地怕惊动地下的“魔鬼”，任何事情都不采取行动而只是祈祷等。还有，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不同，没有卷入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对西藏也没有明显的影响。共产主义在一九四九年是谣传，一九五〇年（达赖喇嘛被迫和共产党人谈判的时候）是潜在的可能，一九五九年是推动全面改革的真正的杠杆。

至今几百年来，西藏都与外界隔绝，使我们对这个地区及其社会的了解非常不够。认真研究西藏可能使我们深刻认识中国怎样处理民族关系，关于五十年代西藏和内地一体化的材料可能给我们提供关于北京将来怎样把资本主义的台湾融入共产主义的中国的线索。我们可能知道更多有关中印关系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怎样起作用的情况。这些，还有其他许多情况，现在都无法了解；使人失望的是书的内容，就象这里评论的几本书那样，偏激而多有争议，把那些和他们的论点不符合的事实省去了。因此，研究西藏的人得在达赖喇嘛“派”或身居中国的人对西藏情况的解释中进行选择。前者主要研究属于一伙人的观点，难民对所谓暴行的控诉，佛教社会的毁灭。后者集中讲述旧封建制度的恐怖和使西藏

进入二十世纪的技术进步。虽然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几十个西藏难民的会见，使我的观点更接受北京的观点而不是达赖喇嘛的观点，但是中国描述事件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倾向只能使研究西藏问题的人感到失望。一九五〇年以前西藏社会的性质和一九六〇年以来西藏人取得的物质方面的成就都有大量的文献说明，但在三个重要的有争议的方面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研究，西藏的"独立"，汉人在西藏的活动和汉人的动机。

西藏"独立"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双方都能轻易找出历史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使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解释历史事例的问题。[52]这主要决定于人们认为什么才能构成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中国人的看法和他们对历史记载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达赖喇嘛的所谓"流亡政府"，这里只要这样一说就够了。另一方面，美国允许难民在纽约保留"西藏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是"根据外国代表注册法作为达赖喇嘛的代理人"正式注册的。另外，还应该注意到，在四十年代末期共产党将必然成为内战胜利者已经很明显的时候，西藏的统治阶级才提出西藏"独立"问题。其实，在英国是西藏事实上的宗主国的整个时期，西藏统治集团从没有对中国合法的宗主权公开表示怀疑，中国的宗主权是英国在国际条约中承认了的。

大家都同意"汉族沙文主义"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五十年代。[53]考虑到长期以来汉人表现出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优越感，这也难怪。尽管有强大的政治教育和中央政府的最大努力，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消灭这种态度。二十六年后，政府的努力已经明显改变了这种态度，但家长行为这种

小事尽管越来越少，无疑还继续存在。除优越感之外，汉人还被指控到处采取暴力行动，拐骗儿童，严刑拷打，大量绝育，等等。[54]达瓦诺布虽然承认“我从来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士兵的任何不端的行为”[55]，但他还是维护这些说法。事实上，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告诉我们，根据他的看法，暴力行动是地方官员造成的，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56]总之，达赖喇嘛从小就和所有人隔绝而只和少数顾问接触，从来没有亲自看见过任何暴力行动。如果相信传说的这些野蛮行为，人们就得相信，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领导人把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对现实不满的汉人争取过来了。同样还是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在西藏这个高度敏感的边境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主义和行动。残存的优越感或个别的事件和普遍的酷刑有很大的区别。那些相信中国是扩张主义者，相信中国如果不征服整个亚洲也要征服印度的人，还会相信中国人在西藏背信弃义。但是，笔者不相信这种指控，除非拿出具体的证据。

西方对西藏的了解少极了。要引起这方面的学者的兴趣和扭转不重视的情况，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九五〇年以前和以后这个社会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基本情况。住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难民，现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既不甘心流亡，也不愿意住在共产党领导的西藏。[57]中印边境的形势没有东北中苏边境的形势紧张，也没有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海峡两岸的形势紧张，但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最近发生的印度吞并锡金领土这样的事件只能使形势紧张。

希望这篇文章能促使就这些课题开展一些学术活动，不

管这种努力开始时多么微不足道。进一步希望最近一些人访问西藏表明更多的人将被允许访问西藏，甚至延长停留的时间。(58)

虽然目睹西藏还象历史上那样困难，但这个地区没有必要再是“世界屋脊”上与世隔绝的神秘地方了。继续存在的有关西藏的荒诞说法可以被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际的具体描述代替了。

**注释**

(1)关于包括他们住地在内的全部民族，请参阅《中华民族》第3页，香港钱初（音译）出版公司出版，1972年。

(2)关于英国卷入西藏的情况，最好的研究是：阿莱斯特·兰姆《英国和中国中亚：通向拉萨的道路，1767—1905》，伦敦劳特里奇和基根·保罗出版，1906年；阿莱斯特·兰姆《麦克马洪线：关于印度、中国和西藏的关系的研究，1904—1914》，伦敦劳特里奇和基根·保罗出版，1966，两卷。

虽然不如前两本好但参考文献、附录和地图都非常有用的是多萝西·伍德曼《喜马拉雅山边境，对英国、中国、印度和苏联竞争的政治评论》，纽约和华盛顿，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出版，1969年。

也有价值的是彼得·弗莱明《进入拉萨的刺刀，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的第一次全面报道》，伦敦鲁珀—哈特—戴维斯出版，1961年。

(3)关于普行的真实而简短的描写，请参阅R·A·斯坦《西藏的文明》，J·E·斯特普尔顿·德赖弗译，第229—247页，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1972年。

(4)吉乌塞佩·塔西《雪原西藏》，J·E·斯特普尔顿·德赖弗译，第30——33页，加尔各答、孟买和新德里，牛津和IBH出版公司出版，1967年。

(5)同上，第33页。

(6)罗米·科斯拉《西藏建筑学的始末》，载《建筑学会季刊》，1972年冬第4期，第9页。

(7)皮德罗·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治形态》第23—25页，西雅图和伦敦，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

(8)R·A·斯坦，见前引书第140页。

(9)关于这些旅行者（1327—1950）的名单和有关参考书目，请参阅《博物馆》，新泽西州纽阿克市纽阿克博物馆协会出版，1972年春一夏第24期，第2—3页。

(10)把江改川口《在西藏的三年》（马德拉斯神知学协会出版，1904年）和亚力山德拉·戴维一尼尔《我到拉萨旅行》（伦敦哈珀兄弟出版，1927年）比较一下很有好处。前者是一个日本佛教徒，她强调她声称目睹过的"虚无的"方面：超自然的行动，天上的行动，等等。这两本著作说明了试图确定环境和文化现象的普遍性所遇到的困难。旅行者的记述是个人的、零星的经历，通常是旅行后很久才写成的。

(11)T·D·奥尔曼《世外桃园的红星》，载《远东经济评论》第27页，1974年2月11日。

(12)克里斯·马林《西藏密谋》，载《远东经济评论》第30—34页，1975年9月5日。

(13)阿莱斯特·兰姆《麦克马洪线》，内维尔·马克思韦尔《印度对中国的战争》第39—64页，纽约潘西恩书局出版，1970年。

(14)《纽约时报》，1975年11月2，3，4日。

(15)亲自和刚从西藏归来的韩素音博士的交谈，还有米

歇尔·佩塞尔《西藏的秘密战争》第224页，波士顿和多伦多小布朗出版公司出版，1972年。

(16)克里斯·马林《西藏密谋》，第34页。

(17)参阅史蒂夫·韦斯曼《西藏的最后纷乱》，载《太平洋研究和世界帝国电讯》，1973年7—8月第4期第5页。

(18)戴维·怀斯《谎言政治：政府的欺骗、保密和权力》第252页，纽约文得吉书局出版，1973年。

(19)参阅哈里·戈尔德堡《西藏—亚洲的匈牙利》，载《劳联—产联，美国工会主义者》1959年5—6月号第16—17页，第32页；乔治·帕特森《远方归来》，载《远东经济评论》第20—30页，1973年4月23日。

(20)国防部长办公室部队情报教育处《武装力量谈348：西藏——世界屋脊》，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印，1950年。

(21)同上，第1页。

(22)史蒂夫·韦斯曼的文章有文献引证，是对美国卷入西藏历史的最好、最深入、最全面的研究。

(23)A·汤姆·格伦费尔德《中国希望别人不要干涉西藏》，载《外事通讯》2：6，第1—2页，1976年4月1日。

(24)梅尔文·C·戈尔茨坦《农奴制和流动性：对西藏传统社会"借人"制度的考查》，载《亚洲研究杂志》30：3，第521页，1971年5月。

(25)关于欺骗性东方教派的传播问题，请参阅艾吉哈南达·巴拉蒂《传说中的西藏：暴行的起源和持续》，载《西藏社会简报》第七卷第1—11页，1974年。

(26)汤姆·格伦费尔德《对"给编辑的一封信"的回答》载《新中国》1：4，第6页，1976年1月，还请参阅P·V·卡拉《西藏走向不再神秘化：摘要和评论》，载《种族与阶级》16：2，第145—156页。

(27)请参阅论述西藏旧封建制度的性质的好文章，梅尔文·C·戈尔茨坦《一个藏民村的税制和结构》，载《中亚杂志》15：1，第1—27页，1971年6月，梅尔文·C·戈尔茨坦《农奴制和流动性……》见前引书；梅尔文·C·戈尔茨坦《西藏的社会等级、一妻多夫制和家庭结构》，载《西南人类学杂志》27：1，第64—74页，1971年春；梅尔文·C·戈尔茨坦《西藏传统政治制度中集权和分权的平衡—论西藏宏观制度的性质》，载《中亚杂志》15：3，第170页—182页，1971年8月；梅尔文·C·戈尔茨坦《西藏财产的周转：再生、土地和政治》，载《亚洲研究杂志》32，第445—455页，1973年3月。

关于西藏传统的司法，请看下面的事例，参阅丹·F·亨德森《西藏论丛：萨克雅（西藏）凶杀案的处理》，载《美国人类学家》66：5，第1099—1105页。

一个男子被发现在邻居的门前死了，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没有人看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既然死者和邻居长期不和，邻居受到怀疑。死者受害的那天，他二人曾手持镰刀打架。死者的哥哥把邻居拉到“法院”要求“赔钱偿命”。被告声称无罪。既然控告人不能证明被告有罪，轮流审讯时两人都挨了“几十皮鞭”（通常三鞭可以见血）。这样还是断定不了，于是法官就叫人杀了一条牦牛。把刚剥下的牛皮拿来，带血的那一面朝上，用在上面掷骰子的办法来决定谁说的是实话。被控告的邻居最后赢了，被宣告无罪。在这个案子中，控告人很幸运，没有因提出“诬告”而受惩罚。

韩素音博士的书无疑将描写旧西藏存在的一些更离奇古怪的迷信，如让产妇在牛棚里生产，让农民吃“活佛”喇嘛的粪便治病等。

(28)乔治·帕特森《一个四十岁的傻瓜》：“……中国人在西藏处于很容易受攻击的地位，而且害怕印度和西方盟友

会用提供武器弹药的办法利用这种易受攻击的情况。”（第26页）“我听说过神秘的供应渠道……”（第153页）

(29)米歇尔·佩塞尔《西藏的秘密战争》，第157页。

(30)同上，第8页。还有“……中国人打算不仅解放西藏，而且解放尼泊尔、不丹、锡金，过几年最后解放印度。”（第28页）

(31)同上，第8—10页。

(32)同上，第10页。

(33)克里斯·马林《西藏密谋》，第30页。

(34)米歇尔·佩塞尔《西藏的秘密战争》，第179—180页。

(35)同上，第94页。

(36)同上，第170页。

(37)同上，第203页。

(38)同上，第88页。

(39)克里斯·马林，私人信件，1976年4月16日。

(40)达瓦诺布《西藏的红星》，第11页。

(41)同上，第186页。

(42)有五种安葬形式：土葬、火葬、把尸体抛入河中的水葬、把尸体肢解后喂岩鹰的天葬（这是最普遍的形式）。参阅米歇尔·佩塞尔《野马：遥远的尼泊尔王国》，载《全国地理杂志》128：4，第59页，1965年10月。（西藏有天葬、地葬、水葬、火葬和塔葬五种葬仪。“西藏的大佛们如达赖、班禅，死后用香料药品腌乾其尸体装入塔中，塔的外面镶饰着珍贵的金玉珠宝，这是一般人不能享用的‘塔葬’。参阅黄奋先生《西藏情况》第95—96页，地图出版社出版，1953年。——译者）

(43)达瓦诺布《西藏的红星》，第11页。

(44)同上，第115页。

(45)同上，第113—115页。现在有四条公路从中国内地的四川、青海、新疆和云南通向西藏。参阅《滇藏公路通车》，载《北京周报》第28期，第23—24页，1976年7月9日。另外还有两条固定的航线，从成都和兰州到拉萨郊外五十公里的机场。参阅《兰州和拉萨通航》，载《北京周报》第39期，第30—31页，1975年9月26日。

(46)关于对西藏难民营的官方看法，请参阅《流亡的西藏人，1959—1969年》，印度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办事处编印。

(47)梅尔文·C·戈尔茨坦《印度南部的西藏难民：印度边界的新面貌》，载《西藏社会简报》第9卷，第12—29页，1975年。

(48)同上，第19页。

(49)同上，第19—20页。

(50)同上，第23—24页。

(51)同上，第27页。

(52)关于对这一问题的带有高度法律性和学术性的观点，请参阅艾尔弗雷德·P·鲁宾《西藏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载《中国季刊》第35期，第110—154页，1968年7—9月。

(53)梁乃民（音译）《西藏，1950—1967》，香港联合研究院出版，1968年。这是一本文集，有189篇选自中国的有关西藏的文件的英译本，其中几篇指责干部的沙文主义态度。

(54)关于对被称为暴力行动的非常全面的记述，请参阅《西藏问题的统治》，日内瓦国际律师委员会编印，1959年，《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内瓦国际律师委员会编印，1960年。

关于国际律师委员会的历史，请参阅史蒂夫·韦斯曼的文章；关于该委员会怎样进行采访，请参阅乔治 盖尔《和喇嘛同游理想国》，载《每日快报》（伦敦），1959年11月26日，也可以参阅费利克斯·格林《无知的内幕：关于中国的情况美国公众是怎样受骗的》第224—246页，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有限

公司出版，1964年。

(55)计瓦诺布《西藏的红星》，第109页。

(56)戴维·豪沃思编辑《西藏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第104页，伦敦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1962年。

(57)据最近报道，年轻的西藏流亡者，其中很多人从未到过西藏，正在考虑采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游击战术把汉人从西藏驱逐出去。参阅一个记者的文章《西藏人的战斗号召》，载《远东经济评论》第24页，1976年3月19日。

(58)到西藏旅行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住房不足，拉萨只有一个小宾馆。译员不多，一个只懂西方语言的旅客需要两个译员：一个把藏语译成汉语，另一个把汉语译成西方语言。生活条件很艰苦，海拔两英里以上的高度可能危及健康。据韩素音博士估计，每二十个汉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达到在西藏生活的健康要求，而且还有生理方面的困难。(1976年3月13日在纽约市和韩素音博士交谈）虽然这个估计可能偏高，但最近詹姆斯·施莱辛格的旅行就不得不因健康的关系留下两个成员，而且到达西藏时，这个小组发现陪同的汉族官员比西方访问者更难适应高山反映。（查尔斯·贝诺特1977年1月28日在纽约市的公开讲演）

# 英国在西藏的扩张

（苏）节昂列夫 著　张方廉 译

**编者按**：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大英帝国是最早侵华的西方国家；在西方列强侵华的地理方位上，我国的海陆边疆地区首遭其殃。位于我国西南边疆的西藏，雄踞亚洲中心，战略位置重要。在中国近代史上，英帝国主义不仅是最早侵华的西方列强，也是最早侵略西藏的西方列强。继英国之后，在本世纪以来，帝俄、美国甚至日本都对西藏存过种种野心，进行过各种各样的侵略或干涉活动。

节昂列夫在本文中叙述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过程，揭露英国对西藏不仅有政治野心，而且有经济阴谋，同时还对英俄两帝国对西藏的争夺历史进行了叙述。

本文摘自《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一、二章。

## 一、英国侵略西藏之发端

### 英国侵入西藏的初步尝试

欧洲国家在西藏进行扩张的响导先是传教士。其中最早的一个显然是1624年（明天启四年——译者）左右由印度潜

入西藏的葡萄牙耶稣会教徒安东尼·德·安夺德。接着，又有几名传教士到达西藏，但他们在1652年统统被地方当局驱逐了。从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译者)起，天主教托钵僧团的僧侣在西藏大肆活动。1724年(清雍正二年——译者)，该托钵僧团教会竟在拉萨获得修建教堂和住宅的地皮一段。

传教士的正式活动并无成效。例如到托钵僧团所设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的基督教徒总共只有11人，而还多半是在尼泊尔出生的。教会"惨淡经营"十六年的结果只此而已。但是，在送往罗马的札记和与教皇的面谈中，这些僧侣却不断将各种有关西藏政务、商情、民间风习、交通、军队和最大僧侣封建主的个人品性等情况详加报导。传教士在西藏宣传的主要目标在于抬高喇嘛教的作用和喇嘛教领袖的权势，削弱中央政府的俗权，以便在西藏封建主中促成分立活动。

传教士的活动激起全藏的不满。至1741年（清乾隆六年——译者），他们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不久之后即不得不完全退出西藏。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英国政府首先在西藏推行强硬政策，目的在于扩大英国对西藏的势力，使其成为本国资产阶级的牺牲品；因自18世纪70年代起，英国政府能够利用距中国西藏地方不远的（印度）孟加拉省而得到侵略西藏的便利条件。

早在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译者）3月，东印度公司伦敦总管理处即已委托该公司驻印度代表搜集关于欧洲商品能否经过尼泊尔在西藏和中国西部找到销售市场的情报(1)。过了两年，公司董事会就提议派遣军事考察团前往西藏边境。1773年果然有一个军事考察团被派往不丹。不丹人坚

强抵抗英国殖民军队，不幸遭到失败。第一个所谓英国“使节团”的前往西藏，就是战胜不丹的后果之一。

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译者）5月13日，孟加拉总督华伦·哈斯丁斯，仰承自己的主子英国资本家的意旨，派遣一个经过充分准备的侦察队前往西藏。在给该队队长波格尔的指示中，规定必须查明拉萨与西伯利亚之间的大片土地及其交通情况。侦察队受命搜集通往拉萨各条道路的情报，记明西藏地形、各种道路和居民的情况，并设法缔结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商约，如有可能，就争取在拉萨设置英国商务代表机构( )。正如1783年派往西藏的英军司令忒涅步兵上尉所写的那样，英国人之所以竭力向（中国）这个边陲地区渗透，是因为借此可以同清朝帝国建立关系，而不致象其他方法那样足以引起“中国对外人从海上渗入的一切毒害常常不惜采取武力抵抗政策”(3)的疑惧！

波格尔率领的侦察队只到过日喀则。该队签订正式商约的企图落了空；因西藏地方当局原无签约的权力，而且一般对侵占印度的英国人深怀疑惧。但该队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反动的封建主，并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据英国历史家证实，波格尔的西藏之行，在这一方面是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意义的”。英国当局拉拢了几个西藏的封建主。波格尔居然能使那些封建主对于扩大越过中印边界在西藏地方进行的贸易发生兴趣。

波格尔给英国当局带回关于西藏南部的各种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再一次证实与这个神秘边区建立关系的重要性。孟加拉和与中国接境的各国商人都满载黄金、细羊毛、麝香等贵重商品从西藏结队而归。

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译者），英国派遣由忒涅上尉率领的第二个侦察队前往西藏。忒涅正式受权要求签订商约和准许英国商人在西藏从事贸易。忒涅及其随行人员在日喀则逗留达两个月之久，利用这段时间搜集边区的各种情报和测量行军路线。

忒涅把英国当局的丰厚"礼物"送给他们所结交的封建主，换取他们同意与英国商人扩大贸易。

忒涅侦悉中国中央政府和拉萨地方当局屡屡阻挠英人与西藏建立经常的关系[4]，中国知道英人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作"西藏的主人"。和上次的情形一样，这回驻藏大臣又发表了清朝皇帝禁止让忒涅和其他外人入境的诏书[5]。

西藏封建主之间从来没有巩固而持久的亲睦关系。封建的分立不断造成分歧和因宗教纠纷而分裂愈甚的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自从殖民国家初步尝试扩大其对西藏的影响以来，一个反对中央、屈从外人的集团越来越明显地分化出来了。这个集团与其余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在西藏统治集团当中，逐渐成为压倒其他一切分歧的主要矛盾。

西藏封建主的这种分化是由于经济的利害关系不同。参加反中央集团的首先是这样的一些封建主，他们的庄园靠近印度边境或是出售外国最需要的原料的。

在外国资本侵入西藏以前，日喀则和西藏西南部的封建主主要与边境各国通商，而拉萨和西藏东部的封建主则与中国内地各省及蒙古、新疆，甚至远与俄国属地进行贸易[6]。促成这种分化的不单由于各自领地的地理位置（这当然不能忽视）和向有的联系，而最为重要的却是由于西藏不同地区某些专供市场需求的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例如，西藏西南的

许多农场出售山羊羢毛，其最要主顾是克什米尔和印度；至于中部和东部的农场，则出售中国内地商人收购的大宗绵羊毛。中国内地是西藏麝香的基本主顾，而由西藏越喜马拉雅山的输出则是硼砂和苏达。

西藏的宗教封建主从源源不断的香客方面获得极大的收益。显然，中国内地各省、新疆、蒙古以及俄国的喇嘛教徒都把自己的礼物和积储送往拉萨，而作为喇嘛教第二个中心的日喀则却只能收到喜马拉雅山附近各地喇嘛教徒送到西藏的部分礼金，因为这些教徒也和前者一样，总是竭力想把礼金献给拉萨的。另一方面，把西藏西部的一个湖泊（玛那萨罗瓦湖——译者）和开拉斯山视为圣地朝参的印度人却常往后藏，很少去拉萨。由克什米尔和喜马拉雅山附近各国接踵而来给达赖喇嘛献礼（贡品）的定期使节团是西藏南部人民的一个沉重负担，他们须在由边境至拉萨的全程上，供应成百上千的骡马运送礼品和使节团随员携带的货物。

至于班禅喇嘛及其左右亲信的封建特权，则因达赖喇嘛受到北京王廷的偏爱、占据西藏地方政权的首位而大遭损害。

外国统治集团有力人物的诱惑促使（促其实现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部分西藏封建主倾向异国。

忒涅旅行归去后，英国统治集团企图在西藏树立英国势力的野心益发不可遏止了。

18世纪80年代的末叶，英领印度当局唆使尼泊尔的廓尔喀部落侵犯中国的西藏。他们的如意打算是：如廓尔喀人获胜，即可通过该部落的领袖扩大英国对西藏的影响(7)。

在西藏人民处境艰危的时候，有些亲英的封建主竟驰书

英国当局，明白表示他们希望英国武装力量开到西藏[8]。如果考虑到驰书人曾扬言不愿看到驻藏大臣请求抵抗廓尔喀人入侵的中国军队开进西藏的话，那末，西藏部分封建上层帮助英国统治集团实行侵略阴谋，借以从中渔利的意图就是昭然若揭的了。

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译者）10月，廓尔喀人侵占日喀则。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清廷马上派兵入藏，驱除敌人。1792年秋，这支由中国各族人民，其中包括汉族和藏族人民的军队开入西藏[9]。

廓尔喀人在几次会战中都遭到痛击。中国军队尾随敌人，一直追到尼泊尔境内，使敌人在加德满都近郊一役遭到彻底失败。廓尔喀王不得不无条件投降，自承为中国皇帝藩属。清廷曾经采取各项措施，修筑邻近印境的工事，防范西藏边境再受外敌的侵略。

廓尔喀人的失败并未使英人停止扩张活动。英国当局加紧派遣以从事侦察为主的间谍潜入西藏。例如，1802年（清嘉庆七年——译者）派克拉佛德上校，1808年派韦勃中尉和拉彼尔队长，稍后又派克尔帕垂克上校等多人相继入藏[10]。

1814—1816年（清嘉庆十九年——二十一年——译者），英国侵占尼泊尔。同时，它又开始觊觎向为西藏藩属的锡金（哲孟雄）。英国资本主义向中国全国猖狂进攻。

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译者），英国政府借口哲孟雄居民无数公开表示敌意的事件之一，强把哲孟雄南部并入（印度）孟加拉。

经过十年以后，即中国与英法联军作战（1857—1860年）失败之后，英国军队又侵入哲孟雄的其余地区。

1865年（清同治四年——译者），英军侵入中国属地不丹，强迫地方当局接受将不丹归属英国的锡涅丘利条约。

关于英国侵略者在亚洲这一地区的行径，卡尔·马克思早在1853年即已写道：“英国冲破了人种的、地理的和英领印度的政治界限，就是天朝大国现已不复是英国侵略矛头横冲直撞的天然壁障。英国在亚洲已失重心，永无止境地向前冲去。”(11)

英国资本家依靠侵占区的仆从政府制造边境冲突，侵犯中国领土。例如早在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译者），他们唆使扎穆国王古利亚布·辛加的军队侵入西藏西部，占据恩加里·科尔苏姆地区。中国军队收复印度河和萨特里日河的上游地带，但拉达克地区却沦入英人之手(12)。

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译者），印度总督加尔丁指派了一个“藏边划界委员会”。该会委员斯特拉契队长和库宁汉少校等人托词确定边境线鬼鬼祟祟地遍游藏西全境，借以研究它的地形和自然地理。结果，竟以斯特拉契队长所获得的资料制成一幅包括藏西大部分地区的地图(13)。与斯特拉契委员会同时在西藏“进行工作”的尚有从南面偷入国境的英国间谍胡克尔。胡克尔制成一幅哲孟雄和东尼泊尔的山系图，详细记明由哲孟雄至西藏春丕谷（由印度至拉萨的一条最良好的道路即须通过春丕谷）的各条山道。由大吉岭至拉萨的一切道路都是英国驻大吉岭的专员坎柏尔和其他英国间谍注意的目标。

从19世纪40年代中叶起，传教士重新又在西藏居民之中出现。但是，他们现在不能不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于中国内地各省的藏族居住区，只要能够短期混入西藏地方也就感觉

益满意了。在新的情况下，教会工作的性质和方针都是越来越公开地敌视汉族人民。例如，某一从1861年到1873年"担任"传教士位置的A·捷戈丁，在论"基督教感化西藏人的方法"时，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相信，归根结蒂，不能不让克虏伯先生和沙斯波先生（军火大王——著者）发出全能的声音。到了那个时候，西藏人和汉人都会俯首贴耳，一切都会很快完结。"(14)

尽管西藏人和传教士屡起冲突，并随之引起捣毁房屋，驱逐教士，乃至杀害个别教会人员等情事，但后来传教士的活动还是继续下去。

但英国侦察人员大体却不能满足于在邻近藏边的地区出没，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混到西藏境内。中国中央政府和拉萨地方当局坚决执行不让欧洲人入境的政策。由于西藏封建主中亲英分子的积极活动，西藏与外人的隔离加强了(15)。

按照英国国会关于1871—1872年印度情况的报告，英国当局原来打算在即将与中国签订的一项条约中提出开辟由印度至西藏的道路这个问题(16)，但并未放弃用其他方法达到这个目的的企图。

1871年（清同治十年——译者）7月，英国当局致函西藏当局要求"建交"，但被原封退回了。1872—1873年，由印度方面策动与西藏通商的各种企图也毫无结果(17)。在中英两国缔结烟台条约(18)的时候，英国政府就抓住这个首先碰到的良好机会，保留有派遣所谓科学性质的调查团前往西藏的权利，条约中有专门涉及西藏的一条"另议专款"："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

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及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

紧接于伟大太平天国起义后缔结的1876年（清光绪二年——译者）中英烟台条约，是中国封建主义在鸦片战争中频遭失败，业已证明其无力抵抗英国资本主义以后的年代里签订的。这个时期，英国资本积极为自己的商品在四川、云南、贵州和其他各省“打开”销路。

但是，由于西藏人民的抵抗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对，英国政府不久就放弃了根据条约派遣调查团的意图。英国统治集团已能使用其他的方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情报。英印测绘总局的一个秘密部门经常把业已取得英国国籍，并受过特别训练的印度秘密谍报人员送往西藏。英国政府在大吉岭设有一所专门训练间谍的秘密学校，大多数英国间谍都是从这里潜入西藏的。间谍的训练由测绘总局一位高级职员蒙特戈麦里上校和他的助手、学生负责主持。

间谍送来的情报由英国驻（印度）加尔各答的专家详加研究，对外决不泄露[19]。

英国统治集团从其间谍方面获得关于西藏的各种详尽报告，如各种矿产、经济资源和政治机构；西藏人民日常生活、文化和宗教；西藏军队和统治集团的倾向等等。但侦察所得的结果，对于英国当局最为重要的却是一幅摄制准确，明记各种道路、堡塞和城市的全西藏行军路线图。

英国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着着准备进犯西藏的。

缅甸的沦亡也与英人深入中国有密切关系。1885年，《泰晤士报》在题为“上缅甸与英国在东方的利益”这篇论文中写到：“拥有富饶的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肥沃的掸邦高原的上缅甸，其价值决不限于本身，它还可以成为与西藏东南部、四川、云南西部等处居民进行规模宏大而获利丰厚的商队贸易中心。”(20)

在1886年3月英国殖民协会的会议上，报告人布赖斯在传达与英国政府侵占缅甸有关的各种计划时，就其个人的意见，抨击政府在中国内地各省扩大英国势力尚不够迅速；但他也指出，英国政府当时积极经心于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确系“前途光明的预兆”(21)。

中国历史家刘贯一写道：“英帝侵略西藏，乃旨在吞并西藏。”(22)接着又说：“英帝不仅要吞并西藏（当时缅甸尚未为英国占领），曾想通过西藏，再进而侵略中国内地。”(23)

西藏问题曾在1875年4月举行的第11届皇家地理学会的会议上加以研究。参加会议的人一致主张把西藏变为在中国内地各省推行扩张政策的前进基地。

例如，前充大吉岭区专员（1840—1862年）的坎柏尔在讲到由印度通往中国的各条道路时曾指出，亏了旅行家和英国侦探的努力，关于由印度经西藏至中国的道路情报是非常丰富的(24)。坎柏尔认为必须加紧进攻西藏。其他与会者，包括英印测绘总局秘密部门负责人蒙特戈麦里在内，都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为了阴谋从印度境内继续向中国推进，英国当局在通往

藏边的地区修了一条具有军事、商业意义的战略要道。1879—1881年，敷设由大吉岭至喜马拉雅区的铁路。这条铁路把哲孟雄境内的大吉岭和印度境内的铁道网联结起来[25]。该路全长约51英里，但其建价甚昂，意义很大；因为大吉岭起了阴谋中心作用，英国在西藏的一切扩张活动都要由这里直接领导。[26]

## 强迫"开放"中国与印度方面的国外贸易的1888年战争

资本主义瓜分中国的进军是由英国领导的。卡尔·马克思写道："在不列颠的大炮之前，清朝的威名扫地以尽。"[27]

外国资本的侵入使中国各族人民的处境每况愈下。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证明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群众斗争是何等的有力。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上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之内，中国的资本主义结构开始形成，但因它是买办资产阶级优先发展和外国资本充斥的一种畸形发展，所以这种资本主义结构并不能使中国发展工业，而只能变中国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附庸。与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同时，这种情形还意味着在变中国为半殖民地。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译者），英国当局决计派遣一个考察团前往拉萨，其目的在于为印度方面的英国商品"打开"中国的市场。考察团团员所负的使命除与中国西藏地方建立通商关系以外，还须踏查西孝咸宜的则利拉山道和研究修建铁路的地段。

关于派遣考察团一事由孟加拉省长授权他的参赞马考烈负责与西藏地方当局交涉。中国中央政府，由于烟台条约的相应条款（全文见前），不能不同意正式准许派遣考察团的要求。但西藏地方当局却拒绝与英人进行谈判，甚且不让英国“使节”进入西藏。这时，英国当局已决心使用武力，派遣一支配有3,000驮畜，几门山炮和少数武装齐全的步兵，总兵力共计1，000人的部队驰往大吉岭。尽管英人正在秘密完成进军准备，但西藏方面仍然知道这个消息。为了阻击这种有准备的进犯，西藏地方当局开始巩固防线，并调派兵力不过百人的小部队驻守由哲孟雄至西藏必经之道的隆吐山[28]。

中国作家谢刚论到西藏人民之所以抗拒外人勒索的原因时写道：“……印度人民被奴役、压迫的悲惨命运，当为西藏人民所熟悉，因而西藏人对未来的可能遭遇便怀有莫大的恐惧，于是掀起了强烈的反抗。”[29]

西藏人民对英人侵犯西藏的合法抵抗和他们不忍目睹外国军队入驻拉萨[30]的决心，是由于英国政府的各种威胁激起的。英国报纸却极力诋毁西藏人民的抵抗为“侵略”，号召进军西藏，占领西藏[31]。

西藏地方政府一面组织抵抗英人的侵略，一面呼吁中央政府增援。但反动的清廷，正如中国作者胡如雷所指斥的那样，并未给西藏人民什么帮助[32]。清廷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走上投降屈服的道路。

在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译者）签订关于缅甸和西藏的缅甸条约时，英国政府迫使中国政府负责促进越过中国边界、在西藏地方进行的边境通商。该约第4款写道：“烟

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于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33)

缅甸条约第4款说明英国政府无论如何要侵入西藏。而清朝政府因为害怕英人前往拉萨，所以竭力争取废除烟台条约载明可以派遣英国使节入藏的规定(34)。

缅甸条约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继续进攻的条件下，即在承认安南为法兰西的保护国，并准许法国商人能在云南经商(35)等一系列屈辱事件之后，强迫中国接受的。

清朝应允扩大英藏贸易，是和不愿与英人发生任何关系（当然包括通商贸易关系在内）的西藏人民的心意相违背的。不论什么谈判，不论什么威胁，都不能使西藏人民屈服。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译者）3月12日，印度总督命令英军开始对西藏发动军事进攻。驱使英人进攻西藏的正式理由，表面上彷佛是因为西藏人民在隆吐山构筑堡垒(36)，尽管英国并吞哲孟雄并未得到任何人的承认，而西藏与哲孟雄之间根本也没有边界可言，但英国政府却非法地认为隆吐山和整个哲孟雄都是属于英领印度的。

问题并不在于隆吐山。英军司令部决计利用西藏设防隆吐山、抵抗英国侵略一事，作为进犯西藏的借口(37)

根据英国官方的资料，为了进攻西藏所使用的兵力计有：皇家炮兵营、第32步兵团、提尔比希尔团第2营、孟加拉步兵第13团，共计为1，600人(38)。统率全军的是格累姆上校。

驻守隆吐山的西藏地方军队的力量薄弱，不能抵抗英国

这么大的兵力，所以西藏地方当局决计放弃隆吐山防地，撤出防军[39]。殖民者，首先是印度总督，异常高兴，因为英军占了隆吐山这座堡垒，即可保证他们沿着通往西藏的道路继续向前推进[40]。

西藏守军未经战斗即从隆吐山撤退，放弃了该处的防御工事，使英军司令部不能再以虚构的理由，作为进犯西藏的借口。

但英国当局不愿意和平了结，他们仍然准备继续进军。至1888年5月中旬，进军的准备一切就绪：轻重车辆均已调齐，搬运重物的苦力均已集中起来。英国侵略军分为两个纵队，由格累姆和米特契尔上校各领一队向前挺进。米特契尔纵队并未与西藏地方部队接触，他所"讨伐"的是支援其西藏兄弟的哲孟雄居民。格累姆纵队行军二日之后，始与据守防御阵地、为数共120人的西藏地方部队遭遇。西藏地方部队经过一次敌我兵力悬殊的战斗之后，死亡百人以上，才退出阵地。

事变的经过，说明英人绝对无意于放弃他们原来的侵略计划。当时，西藏已加强对敌人的抵抗[41]，申言其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保护自己的生命，捍卫自己的领土[42]。

西藏地方当局拒绝英军司令部举行谈判的建议，只是要求他们不再挑衅。但英国政府决计进行补充准备，以便确有把握地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原有的兵力是不足以深入西藏的。1888年6月，《泰晤士报》写道，用这么小的讨伐队远征西藏，使其不得不在远离自己的基地携带一切必需供应品的情况下，转战于敌方的山岳地带，这是只会招致全军覆灭的[43]。

除此之外，英军司令部尚在等待秋季的降临，因为军事专家认为秋天之所以最宜于进军，不单由于那个时候的天气比较良好，而最为重要的，恰如英印联军总参谋部军官荣赫鹏所写的那样，是届时谷物尚未收割，“对英军多少有些帮助，而强夺了这些谷物，对敌方居民又是一个极沉重的打击。”[44]

1888年8月5日，加尔各答传来英国武装部队准备出发的消息。据英国方面的资料，奉命集结远征的军队达2，300人，并配有大炮9门[45]。

同年9月30日，加尔各答盛传英军已击破藏人的坚强抵抗，占领仁进岗，继续向春丕谷挺进。据《泰晤士报》报导，在这几次战斗中，西藏人伤亡不下1，000名。

但抗英浪潮日益汹涌，增援部队源源开赴前线。西藏地方军队总数已增加到15，000[46]。西藏封建主中渺小的亲英集团，绝不能阻止西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面对着人民运动的怒潮，英国当局不能不放弃深入西藏的野心，而满足于和清廷举行谈判、商订和约。和约于1890年在加尔各答签字[47]。

在1888年的战争期间，西藏人民显示了为祖国作战到底、不获胜利决不干休的英勇而又果决的楷模。西藏士兵立誓不与殖民者“共天日”，始终相信自己的人民。对于西藏人民的这种英雄气概，就是敌人自己也不能不啧啧称道。他们事后承认，正因西藏人民的抵抗，才放弃远征西藏的[48]。有一名为瓦德尔的英国军官，曾经记述以下这件使他深受感动、却又大惑不解的个人勇敢范例：当两名携带武器的藏人被英军团团包围起来的时候，尽管已经告诉他们缴械不杀，但他们却拒绝投降，在尚未被打死以前，一直奋战不已[49]。

英国政府这次不能不把自己的军队撤回哲孟雄。其所以如此，除了西藏人民日益坚强的抵抗以外，还因为英国当局深恐其他国家，首先是利于保持西藏领土不受侵犯、利于西藏不被英国（沙皇俄国在亚洲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侵占的俄国，积极插手干涉。英军直接后方的骚动，尤其是哲孟雄居民的抵抗，对此也起了不小的作用[50]。

英国资本主义前此在亚洲所攫取的利益迄今尚不能完全控制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缅甸居民仍在顽强抵抗。从中国夺去的哲孟雄也不甚稳固。除此之外，英国统治集团目前把在经济上控制西藏、从而由西南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任务，摆于从西藏进攻中国的首要地位。当时英国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讲到需要有一条由印度直接通往西藏的道路，讲到应当为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取得在西藏全境自由旅行和居住的权利[51]。

英国统治集团认为，商业扩张将来会帮助他们占领西藏土地，奴役西藏人民，好象过去曾经帮助他们征服印度一样。列宁在其《帝国主义笔记》中，着重指出商业对于资本家的扩张活动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并引证英人锡利所写的话说："我们是怎样征服印度的？难道不就是我们和印度通商的直接结果吗？"[52]。

1888年战争之后，中英两国政府接着就举行外交谈判，经过长时期的折冲，清朝当局被迫承认英帝国主义者侵占哲孟雄。他们向英国当局提出几点建议：确认分水岭一带山顶为哲、藏之间的预定边界；西藏人民可以使用山顶南面作牧场，但一兵一卒却不准越过哲、藏边界地段[53]。

1889年9日，驻印英国当局收到这些建议，并对之加上

相应的注释，证明其蓄意要迫使中国继续让步。英国政府拒绝允许藏民到分水岭南面牧放畜群，也不同意一兵一卒不得越过中国边界的规定。这一点就表明英人的“阴险毒辣”；因为据一位英国官员说，承认了那个边界，“如果将来我们(英国人——著者)认为有必要派兵越过边境惩治西藏人的时候，那就让中国人有抗议的权利。”(54)英国当局屡次要以军事行动维护英国的权利相威胁，一再提出不管双方谈判的政治结果如何，先要签订通商条约。英方的提议充分说明英国统治集团在上述期间极端重视和西藏通商，无论怎样要打开西藏的门户。1890年3月17日，清政府被迫在加尔各答签署关于向为中国领土的哲孟雄和西藏的条约。

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在接获该约的副本之后(55)即以内阁的名义通知驻印英国当局，说英国政府对于条约的各款十分满意(56)。

英国当局和中国政府签订的此项条约完全符合于力图在西藏打稳基础的英国资本家所悬的目标和所定的任务。《泰晤士报》写道：“藏印条约的结果是确认英国视哲孟雄为附属国的要求。”(57)西藏的藩属，亦即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哲孟雄，就是这样成为英国领土的。

藏印条约是在列强大举进攻中国和农民起义（著名的“扬子江流域大暴动”）再接再厉的情况下缔结的。

英国政府之所以需要侵占哲孟雄，是为了要保证它有一个便于继续进攻中国的桥头堡。英国当局进而采取这种攻势的祸心早已包藏在该约第1款里了。这一款的词句模糊，并未规定准确的边界，使英人大可向中国提出新的要求。

总之，英国迫使中国签订的1890年藏印条约，只是具有

临时性质而为英国资本家今后取得清政府在西藏方面的让步之张本。

该约中有三款保留条款，即：第4款关于扩大英国在中国界内西藏地方的通商问题，第5款关于牧场问题和第6款关于英国当局与西藏地方当局之间正式联系问题。中国的西藏公民不得使用分水岭的南面作牧场这个条件，便把哲、藏之间的分水岭作为中英两国在这一带的边界了。中国政府提议的一兵一卒都不得侵犯哲、藏边境地段的第3款条文，被易为互相尊重边界的含糊词句。

藏印条约是英国在西藏方面进攻中国的新阶段的开端。

藏印条约正式批准6个月之后，英国政府即指派代表，与中国当局谈判该约的保留条款(第4款，第5款和第6款)。1891年1月16日，北京当局把中国方面的提案送交英方代表。

中国的提案中规定：自由使用牧场，西藏地方当局须通过中央政府始能与外国进行交涉和厘订西藏界内通商的课税办法。

英国当局力求保证其本国资本家能控制西藏市场，也就是说能获得垄断利润，竟拒不接受中国的建议[58]。

英国统治集团要求英商在西藏帕里城城厢及其近郊经商不纳捐税，听任英国臣民自由出入市场与藏人进行交易，以及在取得相应的许可和英国当局发给经过清朝官员签署的护照之后，即能在西藏全境自由往来。同时，英国臣民的生命财产须受到切实的保护。英方代表要求英国臣民有权在西藏购置土地与建住宅、商店、堆栈等，并要求能任意指派英国官员前往西藏，清朝当局应予以行动和交涉所需的一切条件。

英方的提案规定嗣后还要重新审订通商章程，其目的是

为了要把它加以“改进和延长有效期限”[59]。同时，英国当局明白告诉清朝当局，他们认为要满足藏民仍在分水岭南面牧放牲畜的愿望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代表对于这种条件并未严加反驳，只是一味以可能由于西藏人民的反抗招致种种窒碍相推诿。可是，英国全权代表保尔却悍然叫嚣说，仅仅由于“我们客气，才使我们没有坚持开辟江孜”作为供英国臣民自由贸易的商埠[60]。

清朝当局既然不能不在西藏境内为英国通商开辟一个商埠，所以提议以亚东及其全部建筑物作商埠之用。总理衙门恳切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反对这个提案[61]。

接着是一个长时期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英国当局一味坚持自己的要求，而清廷则要求英方让步。双方争辩最烈的是关于印茶输藏的问题。据英国商人看来，茶叶应该是他们控制西藏市场的唯一产品。因此，他们竭力争取立即与西藏进行茶叶贸易。

不惜尽情压榨印度农业工人劳动的英国企业主，利用西藏与印度毗连，打算把廉价的大吉岭茶叶售予西藏，[62]这样做法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早在1886年8月，一位俄国外交官即已从北京发出报告说，按照英国人的想法，大吉岭茶叶若能向西藏大量倾销，即可把四川茶叶从西藏市场上排挤出去，[63]英人李顿指出说：“大吉岭茶叶会破坏拉萨及其邻近各地的中国茶叶贸易，这是毫无疑问的。”[64]居涅尔在其所著的《西藏地舆志》一书中，回溯到西藏茶叶贸易对于英国和印度的巨大利益时，着重指出说，英人在这种交易上，把“实际的政策和商业的重要性”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了[65]。

但英国当局在茶叶贸易问题上却遭到中国当局的坚决反

对。中国茶叶的输出量，在那几年当中正在直线下降：1885年—1888年为2亿1千5百万担；1893年—1896年为1亿8千1百万担；而1897—1900年仅为1亿5千2百万担[66]，从1885年到1900年，中国对英国的茶叶输出额减少了五分之四[67]，英国攫夺西藏茶叶贸易的影响何等重大，那是中国政府深深知道的。因此，尽管总理衙门受到英国当局的极大压力，但仍然争得五年之后再彻底解决印度茶叶的输入问题[68]。英国政府同意这种折衷办法，无非是把它看作一种暂时的让步。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张伯伦写信给印度总督说，这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为了急于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所作出的一个让步[69]。

这种折衷解决的办法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是由于清廷无力抗拒当时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和全国的反对怒潮；而英国当局则希望先巩固在中国其他地区，首先是在满洲的既得地位，以阻止帝俄在满洲扩大势力，所以也没有坚持，他们认为可以稍缓再"逞其大欲"于西藏。

谈判终于在1893年12月5日宣告结束，双方在大吉岭签订一项"通商、交涉、游牧章程"[70]。这个章程不是一个独立的条约，而是视同1890年藏印条约的续约。

关于大吉岭"通商、交涉、游牧章程"，中国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其《中国民族简史》一书中写道："1893年的藏印续约使西藏成了英国的半殖民地。"[71]这是清廷的投降政策一手造成的[72]。

大吉岭章程使英人在西藏享有极多的权利。这种用命令口吻写成的条款，说明英国政府已经把中国视为可以在其领土之内任意胡行的国家。章程规定把中国的一个新地区——亚东及其近郊——供英人使用。英人获得任意通过哲、藏分

界线的权利和免税贸易的权利。中国政府负有保障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可侵犯的责任。章程第6款实际赋予英国臣民以治外法权：他们身处西藏，而其所作所为却只对其本国的法律负责。章程当中的极多模糊不清之处，也是最合英国资本家的心意的。把其中的任何一款加以曲解，即可造成英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造成英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提出新的要挟。

由此可见，英国当局在西藏发动的1888年之战，是从英领印度方面打通中国市场的侵略战争。这次战争的起因和它所造成的后果，亦即“通商、交涉、游牧章程”的签订，即雄辩地说明这一点。但爆发这次战争的历史时代，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因而使它具有独特的二重性。缔结通商条约和用通商条约保证战胜者在战败国市场上比其他国家享有优先权利，从而使侵略者对此比侵占土地更为满意的时代业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由于竞争日趋激烈，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不拼命争夺殖民地和“经济领土”的。因此，与缔结商约的同时，英帝国主义还使其对哲孟雄的侵占合法化，并竭力取得与中国政府签订这样一个西藏通商“章程”。这个通商章程应是英帝国主义将来侵占西藏的保证。

英国资本在西藏的积极活动，引起其他各国，就中也有美国，一定的反响，早在1888年，亦即英国军队武装侵入西藏的第一年，美国驻华公使馆职员罗克希尔（嗣后升为驻华公使）曾秘密游历西藏高原的东北地带。罗克希尔所注意的是人烟最稠密的城市和居民点、西藏各地的管理制度和比邻各部落的政治区划等等。

1891—1892年，罗克希尔重新又往西藏高原的东北地带

旅行一次。他在这次旅行期间，进行了地形测量。他不仅研究山隘、测量经度和熟悉中国这一地区的各条重要道路，而且还搜集有关西藏地方部队的各种情报[73]。为贯彻美国资本家对华政策，罗克希尔在其一部著作中，确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条世所周知的事实[74]，以反对英国所宣传的谬论。

应当指出，罗克希尔竭力贬抑俄国调查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波塔宁在研究西藏方面的作用[75]。

美国人尼科尔斯企图继罗克希尔之后前往西藏，他在打箭炉住了几年，而后勉强到达昌都。但西藏地方当局没有允许他到拉萨去。

## 二、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经济侵略

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的签订是英国政府的极大胜利。吕振羽写道："英帝国主义以这种不平等条约作基础，便一面扩张势力，一面离间藏汉关系。"[76]

英帝国主义者打算用什么方法实现自己的计划呢？首先使用的方法就是加强商业扩张。按照藏印续约的规定，亚东于1894年3月1日被辟为商埠，供英人自由贸易。《泰晤士报》在评述此事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希望说，西藏人即可买到曼彻斯特的布匹和伯明翰的制造品[77]。

藏人需要的商品的确很多，其中大半是由中国其他各省运到西藏的。占首要地位的是茶叶，其次是棉织品。英国驻成都领事霍集估计1883年的茶叶贸易总值为15万到20万英镑[78]。总值次于茶叶的输入项目主要是四川生产的青白布，再其次是成都生产的丝织品。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每年经打

箭炉运往西藏的棉织品，总值约为93，000卢布（按每两等于两个卢布的行情计算；一两含纯银3[illegible]至39克），运往的绸缎，总值约为43，000卢布[79]。

根据霍集的统计，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年，由中国内地各省运往西藏的货物总值，每年达1，053，491两，或2，10[illegible]，932卢布[80]。俄国旅行家拉迪金估计，中国内地货物仅运往昌都一处的即年达100万卢布[81]。

1897年入川的英人李顿估计，从西藏运往中国内地各省的货物总值为1，870，000卢布。按照李顿的计算，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年，西藏与中国各省之间的商品交易总值共计2，085，000两，但根据《季宪报告》则为4，500，000两。有些作者估计，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的商品交易总额比通过中印边界的西藏地区内的全部交易额高出4倍以上。

由于能够榨取高额的商业利润，英国商业资本源源流入西藏。在经哲孟雄至春丕的商道开放之前，尼泊尔商人与西藏进行交易，获利常达百分之百以上。在西藏及其比邻各省的市场上，原料的价格非常低。西藏羊毛的价格比英国低4倍，皮革的价格低11倍左右[82]。

经过内地各省运到西藏的商品价格往往很高。例如，一双靴的价格，在西藏比在中国沿海各地贵两倍，绸缎的价格贵一倍。

英国商业资本之所以源源流入西藏，不单由于有和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不发达地区进行那种特有的不等价交换的机会，而且英国商人还向往于对西藏人能够进行公开诈骗的前景。

从下表(表1)[83]看来，由1889年到1895年(即6年之间)，

经亚东成交的贸易额已增加3倍以上。

单是贸易额的增长还不足以表示贸易的性质。但表中的数字仍可说明在这个时期之内，输出几乎全是落在输入后面的。

表1

| 年代 | 输出 | 输入 | 总额 |
|---|---|---|---|
| 1889/90 | 131,458 | 149,254 | 280,712 |
| 1890/91 | 199,788 | 180,293 | 380,681 |
| 1891/92 | 203,131 | 618,146 | 821,277 |
| 1892/93 | 229,117 | 351,519 | 580,636 |
| 1893/94 | 331,613 | 358,799 | 690,412 |
| 1894/95 | 447,802 | 701,348 | 1,149,150 |

单位：印度卢比

英国商人究竟把什么商品输入西藏，究竟从西藏输出什么商品？试以1899年为例（表2）。

表2

| 输入西藏者 | | | | 从西藏输出者 | |
|---|---|---|---|---|---|
| 商品名称 | 金额 | 商品名称 | 金额 | 商品名称 | 金额 |
| 棉织品 | 313,585 | 玉蜀黍 | 23,125 | 绵羊毛 | 581,944 |
| 毛织品 | 136,209 | 棉毛织物 | 8,188 | 麝香 | 116,024 |
| 丝织品 | 91,728 | 粗纱 | 7,642 | 牦牛尾 | 42,628 |
| 五金 | 74,461 | 捻纱 | 6,393 | 羊皮 | 14,183 |
| 中国帽子 | 49,214 | 毛线 | 256 | 骡马等 | 31,823 |
| 烟草 | 32,486 | 其他 | 19[illegible],629 | | |
| 珊瑚 | 26,721 | | | | |

单位：印度卢比

由此可见，输出的是原料，而输入的则几乎全是轻工业品和半制成品[84]。

同时，差不多有一半的输入品是布匹，约有73%的输出品是羊毛。英国在西藏通商的初年即已表明，它一面要在这里推销自己的纺织品，一面要为自己的纺织工业榨取原料。对于羊毛的特别需求，使它想把西藏变为大英帝国的农业原料附庸。

尽管经亚东成交的交易额每年都在增长，但在1894—1895年仍只占英国对外贸易总额的0.016%左右[85]。甚至即使英国商业资本能把经过西藏南部边界、每年约值25万英镑[86]的欧洲商品交易全部攫夺到手，英国的整个输出额也只会增加0.1%多一点点。但是，英国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却硬要其政府担负攫夺西藏市场的任务。例如，布拉德福德商会理事会，关于英藏贸易问题于1895年11月21日上书英国政府，认为可以把英国轻工业品售予西藏，借以换回金、银和各种矿产品，也可换回羊毛、生皮、毛货等。该会理事着重指出，布拉德福德地方所关心的主要是山羊毛和松软羊毛。他们在信中写道，西藏羊毛应当成为英国进口货物的重要项目，而绝对的贸易自由、运输便利、以及一条以大吉岭为起点的铁路，均可促进西藏羊毛输入英国。

布拉德福德的资本家明明看到，在最近五年之间，经亚东成交的贸易额一直在上升；但仅此还不能使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要求政府竭力争取准许英国臣民在拉萨定居和在西藏全境从事免税贸易。

信中最后写道："理事会深信必能在西藏获得一个对大不列颠极为重要的'新市场'，他们（理事会理事——著

者）急切地盼望大英帝国政府竭尽全力，或者与中国皇帝缔约，或者与大喇嘛直接缔约，抑或采取任何政府认为适当的其他办法，务期打开西藏的门户。”(87)

既然与西藏的贸易，特别是西藏市场的容量，是如此微不足道，那末，英国垄断资本家究竟在西藏找到了怎样一个“对大不列颠极为重要的”、那怕是多少能显著改变英国对外贸易差额的市场呢？毫无疑问，除了西藏市场本身以外，英人所垂涎的还有中国内地、新疆、蒙古等处的市场，他们不仅要从中国沿海各地，而且要通过西藏迈向霸占这些市场的道路。

在上述期间，英国的对外贸易日见沉滞。主要原因是其他各国的竞争。从1883年到1897年，英国货物的输出额不仅没有增加，甚至多少有些缩减。例如，英国货物输出的总额，1883年为239，798，000英镑，1892年为227，077，000英镑，而1897年亦仅为234，200,000英镑(88)。英国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输出，情况更加不妙：从1885年到1897年，对印度的输出完全没有增加，总额一直死钉在6，000万英镑上面不动(89)。当时，其他外国输华的货物逐年增加，而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却日见减缩。从1885年到1896年，英国输华货物的总额减少1亿4千7百万英镑(90)。英国在华贸易对其余各国在华贸易的比重已由1836年的50%下降到1900年的11.7%(91)。

英帝国主义者已把霸占西藏市场与其对整个中国的长远计划联结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无怪乎印度事务大臣哈米尔顿爵士接到布拉德福德商会的来信之后，简直不让英领印度当局有喘息的机会，责令他们无论如何要扩大英藏贸易。

英帝国主义不仅需要西藏作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作英国工业所需原料和各种矿产的来源，而且需要它作继续进攻亚洲，首先是进攻中国的一个前进基地。

可能发生这种疑问：为什么英国当局选定西藏作这样的前进基地？英国扩张政策选择这个目标的原因系按照以下一条总的线路：从印度出发，经过西藏，即可侵入中国最富饶的省区。被其奴役的印度是英帝国主义进窥中国最适当的桥头堡，因为它与西藏是壤土相接的。与其他捷径相比，这一方面可以少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竞争的阻挠，而且按照英帝国主义者的如意打算，也可以少受到中国人民的抵抗。除此以外，英国工业和英国设在印度各工厂的产品，均可无需经过中国当局为了从洋货征收"厘金"，由沿海一直设到甘肃、四川等省途中的无数税卡。最后，西藏距中央政府最远，从而与封建中国内地的关系最疏，使英国殖民者认为它是实行其传统政策——借逐步蚕食个别地区，进而鲸吞整个弱小国家——的良好对象。

在进攻中国的现阶段，英国统治集团决计先削弱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关系，然后再将其吞噬。英国资本屡试屡验的一种手段——不平等的贸易——这次想必也能发挥其固有的效用。

中国国境内的印、藏边境贸易逐年扩大。例如表3就可说明亚东的进、出口情况（按年计算，单位印度卢比）(92)。

在西藏广大人民日益贫困，经济事业极端停滞，因而造成市场容量狭小的情况下，外国贸易额的增长，不能不是由于把向来由中国内地各省供售的商品排斥于西藏市场之外和

表3

| 年　　分 | 输　　入 | 输　　出 | 总　　额 |
|---|---|---|---|
| 1896 | 561,395 | 781,269 | 1,342,664 |
| 1897 | 674,139 | 820,300 | 1,494,439 |
| 1898 | 718,475 | 817,851 | 1,536,326 |
| 1899 | 962,637 | 822,760 | 1,785,397 |

印藏贸易的登记总值（按年按卢比计算）计[93]：

1896/97…………………2,098,520

1897/98…………………2,252,460

1898/99…………………3,359,960

削减西藏原料供售各该省的结果。但因西藏与中国内地各省的贸易缺少最基本的统计，所以不能引用有系统的资料来说明它随着外国贸易，即英国贸易的增长而日渐削减的真象，虽然有些个别的事实，证明这种削减过程无疑是存在的。

例如，1897年，西藏羊毛的供应大大地减少了，而打箭炉的羊毛价格即腾贵起来[94]。20世纪初年，中国香料工业和医药卫生所广泛使用的麝香运到打箭炉的数量减少了，于是麝香的价格也相应地提高了。如1898年经重庆输出的麝香为46，677盎斯，1901年降为46，342盎斯，至1903年更降为43，696盎斯[95]。麝香价格便扶摇直上。1898年输出的麝香总值为582，629两，而1901年增为842，845两[96]。当时仅有的山羊绒毛都输出到印度和克什米尔去了[97]。

同时，英国货物充斥于西藏市场的各个角落。为了实地调查研究，曾于1899—1902年间遍历西藏邻近各省的拉迪金报导说："近年以来，每年都有总值约4万到5万卢比在拉萨不能脱售的英国货物运往打箭炉和昌都。"(98)1900年访问过西藏的崔比科夫在书中写道，拉萨市场上，"畅销由英国本土和英领印度输来的呢绒、鼹皮、细棉布、粗白布、搪瓷器皿等廉价英国商品"(99)。

迄90年代之末，运往打箭炉的黄金数量已大为减少：由8，000盎斯减为4，000盎斯，即减去了一半(100)。随着经由印度的英藏贸易的扩大，印度卢比流入西藏的数量日增，这样就引起打箭炉市场上的物价腾贵和全藏生活费用一般的上涨(101)。英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初步成果就是如此。

虽然英国经亚东成交贸易额逐年扩大，但英国政府对此尚不满意。英国统治集团乘日本于1894年猛扑中国，发动帝国主义时代初期的一次大侵略战争的机会，竟又在西藏问题上展开外交攻势。这次攻势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加紧蹂躏中国，帝国主义者竞相在财政上奴役中国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发动的。英国当局要求清廷准许英国臣民在帕里自由贸易，实际无异于要求把春丕谷割让给英国(102)。

起先，英国当局向中国西藏当局提出废除帕里所征出、进口税的要求(103)。但这是徒劳的，因为已经查明，货物免税的规定西藏人一向切实执行；至于帕里所征的什一税，按照当地习惯，是一种地方税，英国政府决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提出任何抗议(104)。

然后，又来了一个新花样。英国当局利用哲、藏之间并无确定分界线的关系，大声喧嚷，诬赖西藏士兵侵犯了一处

的边界，要求立即划界。英国全权代表竟在既无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临场，又无西藏地方人士参加的情况下，开始在他们片面划定的分界线上竖立界碑标志。这种横行霸道的作法激起全西藏人民的抗议，因为连一位英国官员也自己承认，设置界碑的本意，无非要把西藏一部分领土划归哲孟雄，即划归英国[105]。

清廷驻藏大臣，在关于片面划界一事送给英领印度政府的一封紧急公文中，说明西藏人民对于这种行为极端不满和西藏三大寺院的喇嘛决意停止划界。清朝政府虽然深感英国侵略西藏的威胁，但因无力抗拒英国当局的压力，所以每每仰仗西藏人民本身的抵抗，来应付英人的阴谋诡计。的确，西藏人民对外国殖民者的深仇旧恨已随英国扩张活动的加紧而日益强烈起来。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当局一致抵抗英国向西藏渗透。英人擅自设置边界界碑的行为，说明它可以随时在旁的地方重演甚至变本加厉。西藏人民竭尽全力，反对有损主权的划界活动[106]。

结果，英国政府不得不暂停划界，召回划界代表，并将随同代表前往的武装部队撤回甘托克。

但当地英国官员却劝告英国政府不要停止旨在攫夺新土地的中、英边境的划界活动，劝告英国政府诉诸武力。他们在致政府的书信中写道，划界委员返回甘托克将被藏人视为不列颠当轴的失败，鼓励他们采取更加“恣肆的”行为和要挟，坚决主张占领西藏的春丕谷，将其变为英国的保护国[107]。

不过英国政府却并未敢实行军事占领。它知道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那样做是会引起种种严重纠纷

的。此外，英国统治集团考虑到，使用武力只会驱使西藏人民更加反抗英国，只会激起全藏及其邻近各省的反英情绪，凡此都不利于他们强占西藏市场和在最富庶的华中和华西建立英国独霸的局面。因此，伦敦当局仍然遵循开展英国在西藏方面的商业扩张这条路线行动。

印度总督根据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哈米尔顿因受上述布拉德福德商会来信的影响拟成的那个紧急指示，打电报给伦敦方面说，照他的看法，如果能把哲孟雄北沿一片“争执的”土地“让”于西藏，那就会“给商业以推动力量”。同时，这位总督终于承认西藏欲得这片土地而甘心是有理由的，何况这片土地“对哲孟雄毫无价值”(108)。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译者）3月2日，哈米尔顿裁可印度总督将原属西藏的土地“让”于西藏，借以换取促进英国商业的建议。在印度政府1896年3月4日致孟加拉省英国当局的一封书信中，充分暴露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所采政策的真意所在。从这封信里可以得出结论说，印度政府最为注重的是发展贸易，划界问题只是节外生枝而已。英国当局打算作的“让步”，目的在于“促进友好关系”和改善通商条件，那就是说，改善英国扩张活动的条件。同时，却不让西藏有摸清英国实力的可能，要不断用新的军事进攻威吓他们(109)。英国统治集团深信这种威胁不会遭到清朝政府方面的反抗。中日战争已把清朝政府的军事弱点给帝国主义者看得清清楚楚了。

1896年8月21日，印度事务大臣哈米尔顿向英领印度当局索取有关英藏贸易的各种情报。印度当局向他汇报了贸易额增长的情形和继续扩大贸易所应采取的步骤。尽管他们任

证能够增加英国在中国界内西藏地方的交易额，但究竟尚未取得使英帝国主义者感到满意的成果，即尚未完全霸占西藏市场。妨阻英人实现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是西藏和中国内地居民的一致反抗。1898年8月27日，直接执行英国对藏政策的孟加拉省英国当局报告说，西藏不仅阻挠英国臣民向藏境渗透，而且连哲孟雄人也不轻易放过，这对亚东商业的发展大有妨害(110)。

西藏人民对英国侵略阴谋的坚强抵抗并不是孤立的。它和1895年即已在全国掀起的人民大众反对外人，反对反动政府的起义交织在一起。1896—1898年，农民起义的浪潮在全国各地汹涌起来。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直隶、安徽、浙江、四川等省一时均为农民起义所席卷。“打死外国强盗和卖国官吏”的口号越来越响遍中国全境。农民起义鼓舞了竭力抵抗殖民者的西藏人民，大有助于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致胜利。给外国强盗以坚强的抵抗是藏族人民对其祖国人民在19与20世纪之交震撼全国的反帝斗争的一大贡献(111)。西藏人民一面奋起抗拒外敌，一面对清廷无力抵御帝国主义进攻西藏和对外国执行投降妥协政策表示愤慨。

清廷无力遏止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进攻。1897年，清廷将青岛租让于德国，这样一来，就给各国旨在瓜分中国领土的所谓夺取租借地之战开了一个恶例。1898年2月，中国政府被迫向英国保证，绝对不把长江流域的任何地区“抵押、租借、割让于任何其他国家”(112)。这就意味着承认中国这片最富饶的广大地区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113)。

1898年10月，正在着着准备重新进攻中国的印度事务大

臣哈米尔顿，要求印度政府告诉他，“过去多年的经验有没有提醒他们可以采取什么实际办法保证有更良好的通商条件，那就是说，比1890年和1893年两次条约所能保证的更良好的通商条件”[114]。

为了答复此项询问，英领印度当局把一封由新任总督寇仁(一译寇松)签署的公函送往伦敦。函中否认中国界内的英国贸易有任何进展，表示希望开放西藏的帕里城供英国贸易。寇仁主张停止和中国谈判西藏问题，力陈可以不必理睬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15]。

按照寇仁的这些建议，英国当局否认了双方代表原已取得协议的一切划界规定，他们预想撤除按西藏提出的线路作为哲藏边境的界线，并将通商的商埠由亚东移往仁进岗。参加划界委员会工作的，有中国特派代表李某和西藏地方代表天布伦·王普、商·洛赫等人。此事由于英方坚持开辟帕里供英人贸易，于1898年10月11日陷于停顿[116]。

1899年6月2日，印度事务大臣通知寇仁说，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首相索尔斯柏里认为必须打开与西藏直接交涉的途径，必须取得他们的同意，让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帕里城。与此同时，英国驻防甘托克和大吉岭的卫戍部队竟大修战备，并将通往哲孟雄北沿（双方“争执”最烈的边界地段即在这个地区之内）甲岗的一条军用公路翻修为现代化军用公路。

为了与拉萨当局建立联系，竟利用一个业已取得英国国籍的不丹间谍乌真·卡集，让他把驻印英国当局一封绝对机密的函件送交达赖喇嘛。他们在这封信里申述英国政府可以缔结一项优惠的条约，保证西藏不受“中国方面”的侵略[117]。

函中临了要求达赖喇嘛辟帕里为商埠；为此，他们应许达赖以“甲岗旧边界”为边界。但英国政府并未从这个单独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的阴谋中捞到什么。达赖喇嘛对于这封信也和对英国当局的其他信件一样，干脆没有作答。

英国政府直接向西藏地方政府提议举行谈判，说明它已决计不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英国当局早就估计到清廷在拉萨的地位并不稳固，西藏部分封建主之中背叛祖国的分立意图日见增长，而这主要是帝国主义谍报机关在西藏活动的结果。

英帝国主义者急于要在西藏达到他们的目的。照他们看来，把印度平原经过西藏的中介与四川连结起来，使西藏化为英国资本的“势力范围”，与其不久以前在长江流域建起的同样“势力范围”融合为一，这样就可先巩固英国在华中的地位，然后再在亚洲发动新攻势的大好时机业已成熟了。

19世纪之末，英国船舰开进中国最大河流的长江上游，英国首相索尔斯柏里鼓励海军官兵尽可能地溯江上驶(118)。英人在长江流域的上游一带详细调查各种矿产，搜集各种情报，其中也有政治性质的情报，并进行修建铁路的地形测量(119)。

1899年6月，英国驻华武官布朗陆军上校给索尔斯柏里爵士呈送一份有关长江流域各种问题的报告。

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内地渗透常常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英国派驻重庆的间谍头子一夕数惊，不断把这类消息报告他们的上级首长(120)。

从以上所述的种种看来，可以作出结论说，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活动，至19世纪末叶即大为积极起来。随着资本主义

的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对殖民地剥削的性质和殖民地本身在英国经济当中的意义都有所改变。英国已彻头彻尾地成了最大的殖民国家，具有殖民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民族压迫和民族冲突。在英国国内，全部政权均已集中于财政寡头之手。其在外交政策方面，则一味追求殖民地的和对外的扩张。在实行这种政策的期间，英帝国主义不断与其他帝国主义者，首先是帝俄和法、德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冲突起来[121]。

英帝国主义扩大殖民地统治的野心不仅遭到其他具有同样野心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而且还碰上英国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势难遏止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英帝国主义者企图奴役的各族人民的抵抗[122]。

英国侵占西藏如能得逞，势必大有助于英帝国主义巩固其在亚洲的地位。英帝国主义者靠了这一侵略活动，将可一举解决它本身的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是能在中国这部分地区根深蒂固；其次是能保证它在长江上游的独占地位，那就是说，能巩固英国在长江流域和西藏比邻各省中的独霸地位[123]。

按照英国统治集团的深谋远虑，西藏所占据的那种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后可用来窥伺新疆、蒙古，然后远略俄国。中国这部分领土，无论就它的东部与中国内地相毗连来讲，也无论就它位于中、俄边境的地位来讲，都是具有极大意义的。除此以外，俄国境内也有很多的喇嘛教徒。西藏为喇嘛教的主要中心，其在宗教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为英国资本家的侵略目的服务，可以帮助英国资本家使许多被其奴役的民族安于奴役，这样就会大大地有利于在印度建立“秩序”。

但英帝国主义在亚洲这一地区的政策，其主要目标在于打击俄国。英俄两国在中国的角逐使它们在中近东、伊朗、阿富汗等处的冲突更加剧烈起来。

英俄在亚洲方面的矛盾渊源甚久，但直至英国征服印度，接着就从印度边境向北面加紧侵略活动之后，双方的矛盾始完全形成起来。

英人那种计划周详地、再接再厉地要接近俄国边境的意图，不断威胁帝俄的殖民利益，不断愚弄俄国统治人物。1897年9月24日（12日），斯塔利大使从伦敦发来报告说："英人已如此深入，那么，承认印度作自己的领地的边界，对他们来说，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124]早在1889年，《新时代报》评述英国在克什米尔构筑工事时就指出："克什米尔的地理位置必然使俄国关心到英国的新收获不至损害我们在中亚的利益。"[125]当时的报纸也大声疾呼要注意西藏，以免遭到克什米尔那样的命运。

英国政府惯于把它在亚洲，尤其是把它在西藏的扩张计划，用防卫上的必要作掩护，为此，还捏造一个耸人听闻的虚伪口实："俄国威胁印度"。各种文件、史料、事实不仅在在可以证明绝无此种威胁，而且还可以有理由断定，英国好战集团当时正准备由印度侵入俄国的版图。

的确，为了深信英国当局的诚意，英印联军军官马克格列戈尔少校呈送给英国政府的"报告"是唯一值得一谈的[126]。这份报告不外是一个完整而详尽的准备对俄作战计划。马克格列戈尔少校计划要封锁俄国的一切港口，妨阻俄法两国接近，并与德意志、奥地利、土耳其结成共同对俄的进攻联盟。他劝告政府"摧毁俄国在亚洲的商业"，遮断俄

国与中国的陆路贸易，离间俄国与邻国的关系。马克格列戈尔写道："在战争当中可以不择手段，就我们的意图和目的说，我们必须把现在视为殆已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事实无可掩盖，我们与俄国要在战争中一决雌雄。"作者在结束其报告时说出这样的话："不到把俄国从高加索和土耳克斯坦驱逐出去，俄印之间的问题绝不会真正解决。"[127]

再如，柏尔上校的文章也含有利用印度进攻俄国的计划[128]。这位战略家计划在由伊朗至中国的辽阔战场上施行袭击。英国军事专家把夺取土库曼人居住的广大地区作为英军进攻的直接目标。

这些侵略计划在俄国传开以后，引起俄国当局相应的反响。例如，英国驻彼得堡的武官瓦特尔斯上校即曾报告其上级说，马克格列戈尔的报告"使俄人深为不安"，因而于1891年派遣一个由伊奥诺夫少校率领的考察团前往帕米尔。原来在这以前，荣赫鹏队长曾经由印度率军到该地去过。瓦特尔斯写道："俄国当局猜想荣赫鹏队长是奉命为印度夺取该地区的。"他在报告的煞尾作出结论说，"帕米尔问题"是马克格列戈尔的大著和荣赫鹏队长的旅行引起忧虑的结果[129]。1896年，财政大臣一再向沙皇报告英人深入西藏和控制西藏的"固执意图"[130]。

有些著名的英国军事专家否认印度有受俄国方面威胁的危险，认为俄国武装部队深入印度领土是绝无可能的。例如，加恩上校在一本英国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俄国能侵入印度吗？"的文章中写道，涉嫌有侵入印度之意图的俄国人未必真能怀有这种进攻的阴谋[131]。1898年，当时著名熟悉印度和阿富汗情况的专家格里芬对于印度是否安全的问题作

了肯定的答复，并且补充说，近几年来，英国在印度的实力已加强到如此的程度，使俄国这一代人不能希望讨到什么便宜[132]。

断言俄国有侵入印度的危险的是英国统治集团的虚构，其目的在于掩蔽他们在整个亚洲，特别是在西藏进行扩张活动。

20世纪给西藏人民带来新的考验。其中最严重的是英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 三、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 武装侵略的准备

英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西藏地方的武装侵略是在20世纪初年经过准备而后实行的，其目的在于吞并西藏全境。

20世纪以经济危机揭开序幕（1900—1903年），英、德、俄、美、法和其他许多国家均为这次危机的阴霾所笼罩。危机使各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使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反帝斗争剧烈起来。列宁写道：“‘企图捞一把’，希望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以及对附属国或受欧洲‘保护’的各国人民独立民主运动的畏惧，这就是整个欧洲政策的两个动力。”[133]在这个时期之内，资本家由于争夺半殖民地、半附属国，最重要的是由于争夺中国的斗争特别尖锐。中国人民在义和团的领导下，爆发了一次强有力的反帝大起义，作为对帝国主义强盗着手瓜分中国的回

答。为了镇压这一起义，英、美、法、德、俄、日等八个国家的联军开进中国。

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激起中国各族人民的愤怒浪潮。1900年正在西藏的俄国旅行家崔比科夫曾亲眼看见西藏人民——拉萨居民——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举行一种独特的群众示威行列，西藏各大寺院和各大居民点均举行宗教仪式。据西藏人看来，这是能够阻挠中国的敌人的(134)。另一目击者——日人河口慧海——也作过同样的报导(135)。英帝国主义者在西藏南部边境的种种挑衅(136)和英国间谍在西藏内部的阴谋活动，使西藏人民不能给自己的汉族兄弟什么重大支援。

英帝国主义在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群众运动方面最为积极。《泰晤士报》在1900年6月6日写道，“英国应在东亚起领导作用”。同年8月，英国政府竟声言无意放弃其在中国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137)。

英帝国主义竭力利用镇压起义来瓦解中国边疆和中央政府的依存关系，瓜分中国，强占长江流域富饶的土地。当时，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尔夫曾写信给俄国驻法大使说：“自中国事件发生之日起，英国那种越来越显示它有独霸长江流域的野心的尴尬行径，确能作为英国政府对中国这一地区有某种阴谋的表现。因此，凡是在中国南部有直接利益的国家之间的任何协议，只要它的目的在于阻止英国实现其自私自利的计划，都能得到我方的完全同意。”(138)

深恐英国在中国巩固其地位之后会损害俄国资本的利益，俄国政府出面反对英国瓜分中国的计划。

英国政府本来就反对迅速结束在中国的冲突，竭力拖延

与中国政府开始和平谈判；而在谈判既已开始之后，其所最为关心的是从中国方面取得最大的让步。

就西藏而论，英帝国主义者在这个边区的阴谋活动变本加厉，是外国干涉和镇压中国人民起义的直接后果。英国政府认为中国中央政权已软弱不堪，竟无视清廷，力求与西藏地方当局直接建立关系。但英人的一切尝试均归失败。由于顾虑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达赖喇嘛把英国当局写给他的信都一一原封退回。

1901年与中国签订的“议定书”（指辛丑条约——译者）使中国半殖民地的从属地位每况愈下，同时也使各国在远东的竞争剧烈起来。英国布尔（即南非洲的布尔人——译者）战争（1900—1903年）之后，情况业已十分明显，如果再次发生武装冲突，那完全可能是由于瓜分中国而起，至时英国军队会落到经不住与另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的军队发生冲突的境地。因此，英国内阁不能不放弃其举世周知的“光荣孤立”政策，寻找同盟者(139)。在以自由竞争为主的资本主义完全为垄断资本主义所代替，而当时国际间的矛盾又极其尖锐的情况下，英国执意物色盟友，无非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正因本身的力量不够保持既得的地位和对远东人民实行新的侵略，才迫使英国与日本缔结同盟条约。

当时，英日同盟的矛头首先是指向俄国的。与此同时，这个同盟的结成也是为了侵略中国。因为这是对俄作战在外交部署上最重要的阶段，所以英日同盟条约规定，为了维护各自在中国的“特殊权益”，缔约国家互相承认有权采取措施，甚至干涉中国的内政，借以保护这些权益。在1902—1905

年这段时间内，即在日俄战争酝酿和作战的时期，英日两国的外交政策都取决于这部条约[140]。

日俄战争之前，英日同盟的侵略性质明白表现于英国开始侵略中国西藏的政策上。1903—1904年的英国武装侵略即是这个政策的后果。这个政策又充分表明英日同盟以反俄、侵华为目的，因为英国政府刚一与日本结成旨在反对俄国的军事、政治同盟，即能放手侵略中国的西藏。

英国报刊称英日同盟条约为英国远东政府的“主要工具”。1905年1月，英国《双周评论》杂志坦率地写道：“有了日本的支持，英国在北京的地位顿形重要，在其他的好处之中，尚有保证我们能以远征西藏。”[141]

俄国政府密切注视英人在西藏的种种活动。俄国统治集团完全明了西藏的重要意义，从印度方面看来，它是“亚洲的咽喉之地”；他们也完全明了英国在西藏加强阵地，会给帝俄在亚洲方面造成多么大损害。在俄国亚洲方面的利益经常受到英方威胁的情况下，俄国政府认为必须反对英国在西藏方面的计划。俄国政府曾经拒绝英国首相索尔斯柏里于1898年提出瓜分中国的建议[142]。

俄国的这种立场，在客观上是和力求不使西藏变为英国殖民地的西藏人民的利益相吻合的[143]。

1901年8月，印度事务大臣劝告英领印度当局不要在西藏问题的行动上引起“纠纷”，并且提醒他们，西藏是“属于中国的”[144]。

西藏地方当局深知英人侵占西藏对俄国也是一种危险，所以请求俄国政府援助，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均已成为外人侵略的对象。1900年，一位出生于外贝加尔湖布里亚特人家庭

的西藏喇嘛多尔济耶夫（即德尔智）去俄国访问。过了一年，达赖喇嘛又派遣一个人数不多的使节团前往俄国。西藏人的两次俄罗斯之行，使英国殖民集团人的黩武分子，如英领印度当局，有所借口，坚决主张立即武装侵入西藏。

俄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既然客观上与中国的利益相符合，当然怎样也不能使英帝国主义者满意，因为这种政策妨碍他们统治西藏。和日本结成情投意合的同盟，使英国侵略集团终于能够为所欲为了。在英日同盟条约签订以后还不到几天，英领印度当局即已驰函伦敦，详细说明他们在新条件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各种建议。他们劝告政府占领西藏。列名这封信的人认为那种想和西藏当局举行谈判的企图是“永难实现的”，提议立即采取那种务要能够造成“满意后果”的行动。他们以为迫使西藏屈服的“最有效”而又“最简单”的方法是占领西藏的春丕谷。经过再一次列举彷佛是西藏使英人所受的一切“委屈”之后，他们结束这封信说：“但愿这种情况尽可能快地和尽可能不再动摇不定地告一段落罢。”(145)英国统治集团中最好战和最急躁的份子，其中包括首相巴利弗尔爵士、陆军部和以寇仁为首的英领印度当局，以实现英国最大侵略目的适当时机业已到来，说服那些主张逐步占领西藏的人士，侵略西藏的准备工作从此开始。

英国直接在西藏执行侵略政策，一手准备1903—1904年武装略侵的是热烈拥护英日同盟的寇仁爵士和赖有英国殖民机构无数官员赞襄的英领印度政府的大员。早在1893年，寇仁即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在印度的北部开始进攻。他在文章里写道：“我想再也找不出一个英国人，他对不仅

应当保护印度不受实际的袭击，而且也应当保护它不受可能的进攻这一点会有所争辩的。”[146]他把进攻伪称为防卫印度的手段。列宁在《帝国主义笔记》中作了如下的一个旁注："寇仁爵士把波斯、阿富汗、西藏、缅甸，称为印度这个堡垒的'外濠掩蔽堤'[147]。"[148]与寇仁爵士相当的尚有荣赫鹏，以及积极参与侵略活动的瓦德尔等多人。例如，瓦德尔在1905年吹嘘他和他的同僚的"先见之明"时写道："多年以前，我们有些熟悉真正情况的人就认为必然要向西藏推进；我们曾经指出1888年和1895年两次使节[149]所收到的成效，同时，说明有撇开中国的中介，直接与西藏地方打交道的必要。1898年，我们更详细地指出这种必要是无可避免的。”[150]瓦德尔自画自赞所代表的利益不仅正是从那般充当英帝国主义辩护士的学者的皮相说法的见地出发，而且还再一次证明1903—1904年的武装侵略是英国帝国主义政策合乎规律的延伸部分，而不是象英国资产阶级作家及其在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应声虫至今所一口咬定的那样，说什么它是由外部的某种情况造成的。

以与西藏为比邻的印度作准备1903—1904年侵略的基地，是很容易展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武装侵略的。英国政府从英国殖民地印度境内发动的一切殖民战争，其准备和实行所需的经费，是从这个国土富饶，但却毫无权利、度着饥饿生活的印度人民身上榨取而来的。例如，1904年3月，某一名为列德蒙德的英国国会议员，因为害怕要自己掏腰包，所以很激动地在大会上质问，这笔侵略经费究竟将由什么人承担？当时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布罗德里克对此答复得很简单，但是很清楚，他说，"这个使节所需经费将由印度支付。"[151]

英国当局对于这次侵略事先作了周密的准备；他们已经据有哲孟雄这个进攻的良好桥头堡，军事档案库里藏有顺利实行侵略所必需的、经过仔细挑选的各种情报。英国政府逐年扩充印度的常备军，而英帝国其他各处的武装力量也无不如此。南非在战前编定的军事预算为2，000万英镑，到面临武装侵略西藏时即增为3，000万英镑。(152)

哈米尔顿大臣于1903年8月在英国议会报告的各种数字充分证明印度军队的经费不断增长(153)。

例如，1902—1903年，拨给印度军队的经费约占英帝国军事预算拨款总数的57%，而1903—1904年，即占67%左右。

为了最有效地利用印度军队一年多似一年的预算拨款，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军事专家，屠杀布尔人民的刽子手基特契涅尔爵士，在侵略西藏即将开始之前奉派到印度来了。这位制定臭名远扬的新攻势防御计划的基特契涅尔，在印度武装力量之中，施行旨在改进军队组织、训练和使其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的各种改造工作。除陈旧的武器都已换成新式武器外，军事运输和交通也都已改组完竣。

英国当局在实行侵略之前即已在中印边境，特别是哲、藏交界地段积极展开活动。1902年，开始修建由大吉岭通往哲、藏边境之则利拉的一条公路。修建这条道路的时候已经估量是要在上面行驶炮车和载重车队的。大家知道，修建一条连结锡利古里与大吉岭的短短铁路是花了巨额经费的(154)。英国当局之所以肯慨然解囊，是由于把希望寄托在将来骇人听闻的庞大利润上。急于侵略的各种打算，使英国当局把在克什米尔修建铁路的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来了。正如当时所

盛传的那样，由于克什米尔铁路的敷设完竣，英人即有三条通向西藏、并设有基地的冲要道路：右翼在萨地亚，正中在哲孟雄，左翼在拉达克。此外，他们还控制了几条次要的道路，如由西姆拉顺着萨特里日河走的道路，以及通过尼泊尔和不丹的一些道路。“一旦遇有必要，英印联军即可靠这些道路比较快速地轻取全藏。”(155)

英国当局严格禁止钢、铁和一般宜于制造武器的各项金属由印度输往西藏。他们封闭了通往哲孟雄的道路，凡非政府官吏或英军勤务人员一概不准通过。

与军事准备齐头并进的还有政治上的种种部署。在直接转入武装侵略的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执行人，为了要在国际舆论和英国人民之前极力为英国在亚洲方面的侵略行为找借口，重又加紧散播“俄国威胁印度”的神话。英国半官方报纸《泰晤士报》，英领印度政府机关报《先锋报》、《印度时报》、《锡兰时报》等均擅长抨击俄国，捏造俄国“侵略”阴谋和西藏当局“无信无义”等谰言。与此同时，它们还大放烟幕，彷佛将来的“使节”只有和平目的，只有商业性质，而英国当局确有爱好和平的诚意似的。据侵略的组织者看来，这些烟幕当可使中俄两国政府消释疑虑，使汉藏人民放松警惕，从而便于英国资本家在西藏完成预定的任务。英国随后在西藏推行的全部政策，证明在各种和平词令的外皮下，原是藏着侵略内核的。

叫嚣俄国有侵入印度的危险，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激起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运动日渐壮大的俄国革命高潮成为沙皇政府不得不寻求与英帝国主义合作，而不使英俄关系尖锐化的原因。甚至在英国布尔战争方酣的时候，大多数国家的社会

舆论和报纸刊物都主张各本国利用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从"在其他情况下，不得不与大英帝国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攫取政治利益，但俄国也没有乘人之危。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经俄国外交大臣穆拉乌耶夫说明如下："当前总的政治情势，实无使帝国政府方面采取紧急的、非常的措施，如用协议的方式为我国海军取得一些停泊港，或者供军事占领获得任何领土或战略要害之类的必要。"(156)海军大臣提尔托夫、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财政大臣韦特均赞同穆拉乌耶夫的意见。这个意见并且还得到沙皇本人的认可(157)。

1901年8月，印度事务大臣哈米尔顿爵士曾致函印度总督寇仁，嘱其准备对西藏"采取重大步骤"，至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译者）4月初，复授权寇仁作好准备，派兵进窥中国边境(158)。部队长所奉到的命令是由哈米尔顿拟定，并得到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同意的。此项命令为在西藏境内制造各种性质的暴行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其中载明可以使用武器对付非武装的西藏人民(159)。英军应将西藏人民从他们自古以来即在其间牧放畜群的甲冈地区驱逐出去（好象它原不应属于西藏似的）。关于该地区究应归属何方的问题，英国政府不仅拒绝中国方面提出的，而且还拒绝英国官员提出的一切和平解决建议。如拒绝孟加拉政府官员博尔季朗所提制定有关使用该区牧场章程的建议，即其一例。博尔季朗认为英军于此场合出现即足已"证明"英国政府系"强占"该区这一理由不为英政府注意，因为"经国务大臣同意，已决定实行既定方针"(160)了。英国当局扬言，他们认为"阻止破坏边界比实行划清边界"更为重要(161)。

问题的这样提法，是侵略者所需要的。举行谈判和实行

划界，结果只能对中国有利，因为甲冈地区原是属于西藏的[162]。

甲冈地区是西藏人世居之地，在西藏经济上的作用很大。据英国派驻该区的司令官怀特证明，从他到达该地区之日起，6,270只绵羊和737头牦牛中，哲孟雄人所牧放的仅绵羊1，143只和牦牛80头，其余牛羊则全是属于西藏人的[163]。

1902年6月26日，英国武装部队在怀特的指挥下开入甲冈。西藏官员、全部西藏人和西藏士兵，统限于24小时以内全部撤出这个地区。西藏人在英军使用武器的威胁下，不得不屈从此项命令，从英国当局垂涎已久的这个地区之内撤退出来。

1902年8月，中国政府通过英国驻华外交代表萨道义向英国当局声明，这种行动实在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因为关于英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及其目的未尝获悉。

中国政府要求立即命令英军司令，在特派前往肇事地点讨论争执问题的官员到达以前，切勿继续采取军事行动[164]。英国当局原已暂时停止西藏境内的军事行动，因为继续进军的一切准备尚不充分。

英国政府从怀特方面获得极详细的报告，其中包括紧接哲孟雄境的西藏地区内的各种情报，直至每天的气温度数，以及从军事运输便利着眼的山道记载和大宗照片[165]，英国当局采纳了怀特所作出的结论。按他的结论说，一经占据甲冈，从这个地区无论向哪个方面进军都没有困难，所有山顶和通往西藏的山道都很平坦，而其北坡均向西藏平原倾斜，其间尚有一条由帕里通向江孜的道路[166]。

英国当局从英国武装部队这次的进军中，为此后的武装侵略获得一个适宜的出发地点和各种性质的军事战略方面的

情报。由此可见，这次以追求上述目的为主的进军，乃是1903—1904年大举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一种准备措施。

为了准备舆论，英国殖民集团竟不惜玩弄外交权术。

1902年7月18日，《中国时报》披露了一个条约全文，俨然是中俄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密约。这个约文经许多报纸，主要是在中国和印度发行的英文报纸，辗转刊载。据这些报纸报导，好象约中载明中国政府自知力量薄弱，愿将在西藏所享一切权益转让于俄国(167)。对英国政府关于曾否缔结此项条约的质询，中国政府肯定声明：绝无其事。清帝和清廷的其他大员均向英国公使萨道义表明，“象这样的条约从未成为中俄两国政府之间的讨论对象”(168)。

《中国时报》的煽动性报导，马上被英国利用来重新宣扬俄国威胁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的谰言；宣扬诬赖西藏的谰言，彷佛它受了俄国间谍的教唆，正在准备对印度(!)作战。英国政府早先就屡次叫嚣过全属子虚的什么来自俄国方面的威胁。远在1859年，卡尔·马克思即曾揭发英人企图“在妨阻俄国计划的虚伪借口下。开始其对中国的第三次战争”(169)。

## 侵略军侵入西藏

直接组织侵略西藏的工作于1903年1月正式开始。1月8日，英领印度当局把一份关于西藏问题的详尽报告送给伦敦的哈米尔顿爵士(170)。报告人写道，认为西藏气候凛冽、人烟稀少、不宜于军事行动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着重指出，必须根据西藏与印度接壤这一点来树立英国在西藏的势力。

这份报告一再表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只是“宪法上的拟制”，同时，报告还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均对英国统治集团的各种要求坚决不愿让步；而且，报告人还申诉说，中国政府常以“喇嘛愚昧”，西藏人常以“中央政府任意否决”互相推诿[171]。

报告人断言清廷的正副驻藏大臣似乎只是两名“公使”，而维护“中国主权之拟制”的中国士兵不足500人。他们建议向中国政府声明，英国可以同意谈判，但谈判需在拉萨举行，声明英国“商务使节”将在适当的时机前往拉萨。报告当中提出建议说，谈判不仅涉及象哲孟雄边界这类“细微”问题，而且要谈到英国与西藏未来的关系问题，以及派遣英国代表常川驻在拉萨的问题。因为“使节”预定是要派遣英国武装部队随行的，所以报告人指点说，“西藏的武装力量不值一顾，预料不会认真抵抗”。与此同时，报告还有以确表英国的和平意愿来掩护其侵略行动的意见。报告人写道：“同时，应当使中国和西藏政府相信我们的使节完全是商业性质的，我们对西藏已放弃一切政治性的计划，我们并无宣布西藏为保护国或永久占据某一部分地区之意；相信我们的意图只限于希望打破封锁，这种封锁目前妨害西藏与印度之间的整个通商事宜和建立两个比邻而又友好的国家所应有的关系。”[172]印人达斯·塔拉纳特在其所著的《英国在西藏的扩张活动》一书中，称这个报告是英国对西藏政策的主要基础[173]。

1903年3月21日，哈米尔顿爵士通知驻印英国当局派遣武装“使节”占领拉萨；设有必要，可诉诸武力；届时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机构，也不过是“对西藏政府所作所为的合法

报复”而已[174]。从英帝国主义者的眼中看来，西藏人民是没有权利反抗把自己的故乡变为殖民地的。

但英国政府还不敢公然武装侵略，因为恰恰和哈米尔顿所写的一样，“近几年来，中国在与欧洲各国关系上的地位业已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以致在决定对尚能认为是中国之一省的地区采取行动时，不能不考虑那些业已发生变化的条件”[175]。这位大臣并未否认有把西藏作为保护国或占据其一部分领土的可能性。他只是预先提醒提醒，这些方策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必要的。英国政府原想马上动手侵略，但它懂得英领印度政府按其指示所布置的方式侵入西藏，会被世人认为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攻击，所以授意要使“这种行动（即武装侵略——著者）能以强辩为是由西藏方面的预谋行动所引起的”[176]。

侵略者之所以要激怒西藏人，主要是为了在俄国政府面前给自己的行为辩护；而况关于英国外交部于1903年4月11日所作的声明，英国内阁已收到俄国政府保证俄国没有人去西藏的复照，所以尤其有此必要[177]。与此同时，俄国驻伦敦的大使宾肯多尔夫，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屡次在英国外交部剀切声明，如果英国在西藏实行侵略计划，俄国方面是会毫不迟疑地采取重大步骤的[178]。关于这一点，他还写信给英国外交部官员兰斯顿说，俄国当局“认为西藏是清帝国的组成部分，对西藏的不可侵犯性深表关注”[179]。因此，尽管日俄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已非常明显，尽管英国多方怂恿日本进攻俄国，但英国政府仍不断掩饰自己的意图，不断为准备进犯西藏辩解。英国政府竭力使俄国大使相信它没有侵略西藏的意图，只是希望调整有关边界和通商关系的一些争议

问题。正是在这种衷心爱好和平的辞令掩护下，英国政府开始其武装侵略西藏的。

事先，英国统治集团曾要求西藏当局除亚东以外，还加辟江孜为商埠供英人贸易，并使英人在西藏享受各种特殊权利。经过仔细侦察哲、藏边境地形之后，他们在1903年6月间派遣一支强大的部队，号称“和平使节”的强大部队，由荣赫鹏少校率领，闯入西藏境内，直趋干坝，借以支持原先提出的无理要求。除已侵入西藏境内的军队外，英人还陈兵西藏边境和其他军事要地，遇有必要，即可支援先头部队。

英人在距干坝不远的地方遇见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罗布藏和佐朗巴（应为大仲译罗布藏称勒和代本汪曲结布——译者），要求说明英军开入藏境的理由何在。英军司令部拒绝作任何解释，不顾藏人的抗议，命令所部士兵继续前进。

英军于1903年7月7日开抵干坝，在该地布置防务。英国军事人员抢夺藏民的畜群，掠取藏民的燃料和食物。居民对于此种暴行稍加抗拒即遭到残酷的惩罚，并纵火烧毁他们的房屋(180)。英军司令部每天都在附近派出侦察小组，从未疏忽将应行注意的预兆传报给具有亲英倾向的某些反动封建主(181)。

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均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与英人举行谈判，坚持英国军队撤出西藏。

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的各种要求和申请一概不予理睬。后续部队源源开入藏境，增援军队和武器弹药不断运往与西藏接界的各边防据点。

英军深入西藏和英国当局的种种军事准备，使西藏地方当局不得不开始准备自卫。有少数的西藏地方军队奉命开往

干坝。西藏地方当局这种自然的和正当的举动竟被英国政府用来作为进而实行有计划的武装侵略的借口；英人大肆宣传，仿佛西藏有广泛的军事准备，仿佛荣赫鹏的“和平使节团”已受到威胁似的。

1903年10月1日，印度事务大臣电告寇仁，说英国政府裁可占领西藏的春丕谷，并沿着新的方向深入西藏，直取江孜。他请求寇仁把关于这个决定的意见报告政府[182]。英领印度当局经过匆匆研究之后，就把取道春丕谷远征西藏的详细建议送往伦敦。他们业已算出这样一次远征所需要的人力、武器和运输工具的数量，并确定预计结束军事行动所需要的时限。寇仁和他的僚属决定，英国武装部队，其中只需包括三个步兵营，两个工兵和爆破兵连，携带大炮四门和机枪二挺，即可在四个月之内使西藏唯英帝国主义者之命是听，树立英国在西藏的势力，把西藏变为英国的殖民地。远征的总代价预定为183，000英镑[183]。殖民者把什么都计算到了。他们注意到严冬将届，他们估量到各种偶然情况。他们唯一计算不到的是西藏人民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打乱了他们的一切计算，给他们的计算带来决定性的修正。西藏人民不久即迫使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根本改变他们的计算，一切项目都须大大地追加，这在很大的程度内促使侵略者的计划在西藏遭到破产[184]。

接到远征西藏的裁可之后，寇仁和英领印度政府的其他成员均大为繁忙起来，哲孟雄全境成了一个密集的兵营。由加尔各答和印度其他城市供应的粮秣、弹药武器，源源运到这里。所有这些军需品均集中于英国侵略军第二梯队的驻地锡利古里。

寇仁把尼泊尔王召唤到德里，责令他供应几百头牦牛运送辎重，并拒绝承担1856年条约规定的遇有外敌侵袭，尼泊尔应援助西藏的义务[185]。

英国当局征集巴耳提斯人、格鲁阿利人、尼泊尔居民、哲孟雄的列普卡人和布霍提人、不丹居民等搬运辎重。据瓦德尔证明，英人参加这次武装侵略的总数，一开始就多达10，000人[186]。

1903年11月6日，英国政府命令英军开始从另一路线越过中国边境的西藏地区，经春丕谷直扑江孜城[187]。进攻方向突然转变加倍地说明这一进军的军事性质。英人不从干坝深入西藏，而另派强大部队取道春丕谷。其所以如此，是他们预料在旧方向上要遭到抵抗：当时西藏仅有的一点兵力都奉命集中于干坝一线[188]。诚然，西藏地方部队人数既少，又几乎没有什么火器，但在没有设防的地区行军当然要比较安全得多。除此而外，由印度经春丕谷至西藏中心的道路，是一条最方便的道路。

1903年12月11日，英军开始越过新的边境地段，经过一天的行军抵达仁进岗。麦克唐纳奉派为侵略军的司令，他是出征以前始获得将级军衔的。荣赫鹏很快就晋升上校，仍旧担任侵略军指挥官的职务。

是年12月22日，英军进入瞰制由印度至西藏的一条冲要道路的西藏军事重镇帕里城。侵据帕里之后，英军经过极大的困难始占领这个地区的几个可以通过的山谷。据英国军事专家看来，要在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这些山谷是会付出重大牺牲的。

英军司令部这次使用的方法是突然袭击。据《泰晤士

报》特约记者从前线发来的消息说，英军侵入春丕谷是“西藏绝未预料到的[189]”。能以抗击英人的部队仍在干坝严阵以待，并不知道英军已另寻途径。瓦德尔时常想起麦克唐纳将军“行军经过宜于防守的地区”，老是严守秘密的[190]。他称英军司令部留守干坝的部队为“仪仗护送队”。

由此可见，一切派兵增援干坝的军事行动均不外虚张声势，借以使捍卫西藏的战士注意不到英军司令部所选定的主要攻击方向。

在英人侵占帕里，挂上英国旗帜以后的几天内，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几位官员赶来帕里，向英军司令部了解英军入侵的原由和目的。来员之中有地位很高的大员，如拉萨市长、西藏地方军司令和一位班禅喇嘛的亲信，还有代表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三位大喇嘛。但英军司令部竟拒绝和他们谈话。

英国政府尚在施放烟幕，掩饰其在西藏的行动。虽然侵藏英军已越过春丕谷，英国内阁也曾经扬言英国“使节”已抵达更宜于和中国代表举行谈判的所在，但英人在帕里方面的举动显然证明这种说法是骗人的。对于下院一位议员质询英国政府的远征曾否得到中国政府认可这个问题，原充陆军大臣、当时方改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布罗德里克，拒绝公开答复，因为中国方面当然没有这种认可，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认可。他说，在西藏举行谈判已得到中国的认可，但确定谈判必须在什么地方举行，按照他的看法，却是“英国的权利”[191]。

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断言某一国家有权自行确定在他国国土之上与其执政当局举行谈判的地点这个说法之毫无根据，是不待证而自明的。英国政府的这种举动只是证明它完全无

视中国的主权而已。

英军入侵西藏，使北京的统治集团十分震惊[192]。中国当局屡次向英国政府要求制止英国武装部队在西藏境内的活动，但每次都毫无结果。当英国侵略军侵占帕里的时候，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一再向荣赫鹏表明，驻藏大臣马上即来此谈判，请求不要前进，但他们所得到的答复却是："我往拉萨去"[193]。

英国在西藏方面的武装侵略立即引起许多国家的社会舆论和政府当局的注意。英国已着手攫夺中国这部分领土固然毫无疑义；而英帝国主义嗣后有关西藏的各种计划也是昭然若揭的。1903年7月，《新时代报》写道："总之，英人决计使西藏屈服于自己的权势之下。他们已嫌印度小了，因而想把它的疆界向北方扩展。由于期望以后独占长江流域，所以英人正抓紧时机，经心于有对中国'尼罗河'发源所在地区内猎取权利的保证。"[194]1903年11月，《俄罗斯荣军报》曾引述德国报纸《克尔尼舍·采依通格》关于英国这次侵略所发表的意见。该报写道："自欧洲各国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以来，中国南部即受到大英帝国的垂涎，万一这个天朝大国遭到正式瓜分，华南各省必然归属于英国；在那种情况下，西藏即应成为联结英领印度与归附英国王笏的华南各省之间的环节。"[195]另一在上海发刊的德文报纸《东亚航运保险协会会报》指出说，英国最大的野心主要是对直接靠近英人在长江流域重要商业利益范围的西藏东南部[196]。俄国外交代表克列姆根据英国报纸的言论和本人对英领印度当局心情的理解，于1904年1月从孟买发来报告说："从英国人的观点看来，这样的一个时期，即英人在西藏的势力已根深蒂

固、已把西藏建成一个有良好交通道路与印度相联结的根据地的这样一个时期，业已为期不远，届时将可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什噶尔，与信仰佛教的蒙古和西伯利亚发生关系，然后通过喀什噶尔即能影响俄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克斯坦。控制了西藏东部还可使法国在云南和四川的势力趋于瘫痪。”(197) 按照某些人士的看法，强占西藏是英国政府为了要在“从印度边境直至太平洋岸”整个地区上建立统治权力所需要的。

这类意见都是有确实根据的(198)。当时英国报纸无不各怀鬼胎，紧紧盯着毗连西藏地方的几个中国内地省区。许多文章都露骨地表示必须扩大英国对这些省区的影响。例如，《先锋报》在其某一期的报纸上谈到喀木（原西康省的大部分地区——译者）是人烟最多的“西藏地区”，谈到喀木对于扩大英国贸易的重要意义(199)。《印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法国扩大对云南和四川的影响，获得云南的铁道建筑权，这是英国利益所不能忍受的(200)。《现代评论》刊载了乌拉尔和季朗合写的一篇论文，公开说到占有西藏对于占有全中国的重要性。英国军事专家纷纷从军事观点发表文章，说明这些省区的作用。在西姆拉一次官方集会的报告中，马尼菲尔德上校特别谈到一条经过敦煌把西藏和土耳克斯坦与中国腹地联结起来的道路在战略上的重要性(201)。他着重指出的有一句俗话：“谁占有敦煌，谁就占有中国”。英国当局终于派出许多间谍到这些省区去。上面提到的马尼菲尔德上校即时常在这些省区来往。在这次侵略之前，英国官员霍集早已就在这些省区之内工作，把关于道路、地势、城市和居民点、官署、资源、人口、经济以及毗连西藏东部的各地的贸易等详尽情报，送交英国政府(202)（这位官吏从前就

到过这里，即在1888年中国西藏一哲孟雄边境冲突开始之前不久曾到过这里）。

由此可见，英人在西藏方面的武装侵略，不仅对于藏族人民，即对中国各族人民也是极大的、直接的危险。

英人之所以能够执行这种政策方针，是由于英国政府早已料到它的侵略行为不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

法国原在中国享有各种权益，但这时正忙于和英国举行重要谈判，双方于1904年4月8日缔结了矛头首先指向德国、并为协约国打下基础的英法条约。

至于美国方面，它的远东政策原是鼓励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强取豪夺的。美国政府也一直企图和英国统治集团共同煽起俄国与日本的冲突。

英国统治集团也明知清朝政府不能给西藏地方以军事援助，满想会很迅速、很轻易地打垮西藏人民（显然对西藏人民的抵抗力量估计不足）。

英国内阁深知一个强大的俄国根本上是英国实行侵略中国的主要障碍，而以在西藏方面为更甚。所以英国当局一直拖延到确信日俄战争业已迫在眉睫时，才进军拉萨。有些政界和外交界人士认为，英国竭力怂恿日本与俄国开战，其目的之一是希望乘机"攫夺西藏"。正如俄国驻印外交代表于1903年10月从孟买发来的报告所写的那样，英人早已期待俄国和日本之间的火拼。他们满以为战争之后，当俄日两国尚待重新恢复元气的时候，英国即可安安稳稳地解决本身所要解决的一切帝国主义的切要课题，届时不仅可以在长江流域，而且可以在全中国站稳脚步[203]。

现代中国历史家刘贯一一再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帝国主

义乘日俄战争，俄国无暇妨阻的机会，开始其在西藏方面的武装侵略。[204]。

英帝国主义者丝毫不知羞耻，居然欢呼日俄战争的爆发。《泰晤士报》写道："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明白，日本是在为我们，是在为一切国家作战。"[205]可谓恭维备至了。

日本背信弃义，突然进攻俄国的消息也受到美国资产阶级的狂热欢迎，其原因可由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来说明。总统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后的第二天，即写信给他的儿子说："战争已经开始，当然，这对俄国人是非常不幸的，但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次战争的意义，我个人是会满意日本获胜的，因为日本正在为我们进行赌博。"[206]

## 西藏人民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

英国侵略者刚在西藏土地上迈了几步，就遭到西藏人民的坚强抵抗。驻在干坝的英国武装部队，由于害怕西藏地方军队，几个月以来不敢前进一步[207]。假如携有大炮和机枪的上万英军通过则利拉侵入西藏境内，算是行军之中的一次"轻易通过"，那末，他们一到仁进岗就遭到居民的抵抗和仇视。瓦德尔不能不指出，虽然英国武装部队多方威慑居民，"但绝不能说他们的行为是过于恭顺的"[208]。居民拒不供应粮秣和运载牲畜。据《每日邮报》的特约记者报导，又有上千名苦力和两支部队增援英国人[209]。由于这些情况使侵略者困处帕里达半月之久。

在由帕里至江孜的途中，装备窳劣的西藏地方部队——

约计士兵和喇嘛1,500名——在古鲁镇挡住英国军队的去路。尽管敌人占压倒的优势，但他们并不后退。英国军队使用按军事艺术全部规则所进行的特种战术，把古鲁守军团团包围起来，然后用连发炮、机关枪、连放步枪对准他们轰击。瓦德尔写道："大多数的西藏人倒下去了。我方的子弹和山炮榴霰弹还象倾盆大雨似的飞泻而出，在他们的头上爆炸……同时，我们善骑的步兵毫不留情地追击那些已经距离很远的西藏人；他们遗留在道路上的尸体长达数英里。"(210)不过，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西藏士兵已经表现出真正的英雄气概。英国记者坎德勒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回忆道："如果我说，我很赞赏西藏人的骁勇和刚毅，那末，我希望别人不要把我误认为是亲藏派。"(211)例如，在路透社的一次电讯中，曾经报导约有十二名装备很差的西藏战士，扑向麦克唐纳将军及其左右军官所在地的一次攻击战。他们遭到手枪的射击。几名已越过围墙的藏兵英勇地饮弹而死。有一个持火绳枪的老头子竟爬到一堆尸体上，跪下向英国士兵射击。他的身体被射得象蜂窝一样……

西藏守军终于冲破英军的包围，开始撤退，虽然沿途毫无阻塞，但他们却冒着"真正弹如雨下的追击"(212)，徐徐后退。

古鲁会战发生于1904年3月31日。据英国官方的报导，西藏守军伤亡的共计628人；而英人方面根本无甚损失。路透社4月1日的电讯写道："在荣赫鹏上校所部远征军昨天和1,500名西藏人的接触中，西藏人生还者大约只有一半左右。关于他们的失败应当归咎于武器不足，而不是缺乏勇气，这一点在他们战斗的时候已经非常明显。有些人负伤达八九处之

多，尚在拼命进攻。”[213]经过残酷的炮轰之后，英军始能占据这个居民点。

西藏人在古鲁遭到的屠杀，揭露了英国侵略者的真正面目。西藏抗英战士英勇抗击敌军数倍于己的优势兵力，博得一般人对他们的同情。英国记者坎德勒在概述世界舆论对于这次事件的不良反响时承认说：“可能没有一次英国胜利，是象热泉事件（他这样称呼发生“战斗”的地方——著者）这样引不起热情的了。”[214]

大多数国家的报纸对于侵略者在古鲁犯下的屠杀罪行都有所评论。《俄国荣军报》写道；“英人声明英国使节不具有侵略性质，而只具有纯粹的政治性质，但其行动就是这样开始的。”[215]《俄罗斯时报》则干脆称古鲁冲突是“残杀”，是“射杀手无寸铁的人”。[216]

甚至有些英国报纸和刊物也不得不顺应舆论，谴责英军司令部在西藏使用的方法。官方报纸《标准报》过去曾热烈欢呼出兵西藏，这时也不胜惋惜地说：“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不能从用连放枪和连发炮残酷扫射仅仅手执刀剑的不幸者这样的业绩中，获得什么荣誉。”[217]

4月10日，侵略军又在“红衣大士峡”遭到坚强的抵抗[218]。经过雨点似的炮弹轰击之后，英军强行攻占了西藏人的阵地。在这一天的战斗中，西藏地方部队的损失约计200人。英军方面也有很多受重伤的。两天之后，英国侵略军即已进抵江孜城。

侵略军肆行劫掠居民的粮食，损害庄稼，抢夺牲畜，丝毫不顾西藏人民的宗教情感。英国军官在寺院酗酒过夜，甚且拿喇嘛神象当玩具取乐。“博学的”瓦德尔单是从一座寺

院的藏经楼里，客气点说，就已“没收”西藏经典450卷。英人砍伐庭园的林木和树丛，拆毁庙宇和房舍，夷平凡是他们认为能妨害炮弹射击或能供防守之用的整个村庄[219]。例如，侵略者在由图纳至江孜的途中，就破坏和焚毁了许多寺庙。有几个西藏人活活地在庙里烧死了。侵略者强迫居民白白地给他们劳动，任意侮辱藏民的人格[220]。妇女、老人、儿童等和平居民均因慑于暴力，逃往山间去了。例如，帕利特村的居民就是全村出走的。

荣赫鹏是侵略军胡作非为的鼓励者。他企图用威胁和挑拨离间的伎俩，瓦解人民的抵抗。他按照英帝国主义者的传统政策——其实质可以简化为“分而治之”这个反动口号——竭力唆使藏族人民反对汉族人民[221]。与此同时，他还继续推行既定政策，极力离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关系，目的是要造成西藏统治人物间和西藏僧侣间的分裂[222]。

这位侵略军的头子力图在西藏抗英战士的队伍中造成混乱局面。例如，英军到达江孜之后，他就发表声明，彷佛西藏的一切抵抗均已于1904年4月12日完全停止，无论西藏的将领、士兵、人民都不希望继续作战[223]。

此项煽惑人心的声明，正是在西藏平民纷纷投入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正义战争的那几天之内发表的。

西藏抗击侵略者的战争是一种解放战争。西藏人民从事这次战争是为了抵抗英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奴役西藏人民和变西藏为其殖民地的进攻。英军破坏他们在西藏境内所见到的一切工事，并在各居民点悬挂英国旗帜。所有这些情况都使侵略者的真意毕露，绝无任何怀疑之余地。至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将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这在古鲁会战之后

也是明明白白的了。何况英国政府中的殖民集团对此还大加鼓励。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公开在英国下院声明说："目前远征所达到的目标（即逼近江孜）正是3月31日会战的结果。"(224)

他还这样说："应当把西藏处于英国优势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一点视为绝对的原则，这是为了要使西藏人本身信服所必不可少的。"(225)英国《旁观者》周刊写道："应当把西藏纳入我国政策的轨道。"(226)英国官方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宣布说："我们应当开入拉萨。"(227)鉴于西藏所面临的危险异常重大，所以拉萨当局竭力加强防御力量。1904年初，汉口盛传为西藏军队购买马匹、粮食以及有几名官员因秘密勾结英人被达赖喇嘛撤职的消息。由农民匆匆组成的增援部队奉命开往江孜一带，但军队的人数仍然不多。根据显然经过瓦德尔加以夸大的资料计算，西藏分驻边境各地的守军共计8，500人(228)。

英军司令部深为忧虑，所以越来越乞灵于阴谋诡计，想借此摧毁人民的抵抗意志和在西藏守军当中造成混乱。例如，他们竟不断使用绑架人质这类方法，甚至连前来英兵营举行谈判的代表也被其捉住当人质。英军刚一逼近江孜，荣赫鹏即下令要拘留该城主官作人质。嗣后，在他正要冲击炮台的前夕，竟把当时正和他进行和平谈判的许多满藏官员统统拘禁起来。

1904年5月5日，西藏守军猛扑盘踞在江孜的英国兵营。他们迫使英人退出他们所据守的大部分阵地，占领炮台、帕拉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庄，把英军团团包围，迫使他们改取守势。

差不多和这次攻击同时发生的尚有克哈罗道口（位于距江孜45英里，通往拉萨的道路上）的一次大会战[229]。大队英军与隐蔽在自己筑起堵塞道路的许多石垒后面的藏军激战达六小时之久。英军试图从正面进攻，但被守军击退，同时还损失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然后，一面用大炮和机枪猛轰阵地，一面迂回到藏军的两侧，经过白刃战始夺得这个阵地。

在克哈罗道口的藏军军营中发现一份“三勇士协议”的文件。这份文件是藏人不惜生命、誓与侵略者战斗到底的誓师词[230]。西藏保卫者打得既坚强，又勇猛。英军未敢越过克哈罗前进，被迫折回江孜去了。不料从“克哈罗之役”返回的英军竟把困处江孜城内的英军从复灭途中挽救出来。

英国政府手忙脚乱地从印度抽调生力军增援江孜。布罗德里克声明说：“政府业已决定，不管什么生力军，只要印度政府认为必要，均可调往江孜去。”[231]

1904年5月17日，印度事务部副大臣哈德维克在上院宣称，“英国正与西藏交战”[232]。政府大员的这种露骨声明，再一次证实所谓荣赫鹏“使节”的和平性质只是暂时掩盖英帝国主义者对西藏的真正意图而已。哈德维克往下说道：“在我们尚未用军事力量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地位以前，英王陛下政府关于战后解决这个问题究将采取何种确切形式，不拟承担什么确定的责任。”[233]

这时，西藏境内打击侵略者的游击活动已开始蜂起，使侵略军的处境大为不妙。在英军逼近时就已抛弃家园、避祸深山的农民，此时都参加了游击队。勃兰迭尔上校奉麦克唐纳的命令，对凡有村民参加游击活动的村庄，施行多次旨在

惩戒的突然袭击。侵略者惩治不幸被其俘获的游击队员是非常残酷的：不经审讯即一一枪杀；所在村庄则先遭洗劫，然后被焚为灰烬[234]。尽管侵略者如此灭绝人性，但游击活动从未停止。例如是年6月间，驻扎在与英国侵略者赖以和印度保持联系的交通要道相距20公里的尼鲁村中的游击队，曾在袭击护送辎重的大队英军的战斗中，使敌人受到极大的损失。

英国侵略军长期困在江孜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的。他们龟缩在西藏军队的包围圈内，多日与根据地断绝联系，得不到一颗粮食的接济，硬呆在藏军的火力之下挨揍。只有到了5月24日这一天，当由印度驰来增援英人的部队已在中途与西藏正规军和游击队发生过几次大战的时候，被困江孜的英军才参加其中的一次奈宁寺战斗，被围的侵略军司令部才试图冲破包围圈。5月26日，英军进攻帕拉村，经过11个小时的激战，并击毙藏军约150名，始将该村占领。侵略军把由村这一头至村那一头的整个村庄统统破坏和炸毁。破坏村庄的“作战”是由彼得逊少校和谢巴尔德上尉指挥的。在这次以白刃战作结束的战役中，再一次显示西藏战士的勇猛和果敢[235]。

英人占据帕拉庄园之后，又重新采取守势。他们显然还不能认为自己的力量已超过藏军到可以继续进攻的程度。谁都知道，没有十足的优势兵力，英军司令部是永远不敢出动的。英军的官兵曾经不能不长期藏匿地下和蜷伏在“兔子窠里”。在英军被围的营地上，到处都掘有战壕网，到处都筑起障壁和其他掩蔽工事。

侵略者处在如此危急的境地，以致他们的前敌指挥官荣

赫鹏上校竟从江孜的英军大营出走，悄悄溜往南方，溜往麦克唐纳将军早已潜伏在那里的春丕去。6月6日，荣赫鹏到达位于通往印度边境的大道之上、由英国侵略军防守甚严的康马营地，但次日凌晨，游击队即来进攻这个营地，使上校先生不得不赶快逃到卡拉卓，然后转往春丕，托早已集结在该地的英国武装部队的保护。

英军在江孜被围达两个月之久。麦克唐纳将军结果在6月26日才率领大批援军露面。1904年6月，《泰晤士报》曾经吐露这支侵略军的兵力。据该报的报导，这支军队包括：计有官兵2,800名的四个土兵团，400名皇家狙击兵，一个250人的英国山炮队，一个100人的土兵山炮营和一个200人的土兵山地步兵连。除来福枪、手枪和其他火器不计外，尚有12门大炮和几挺"马克辛"式机关枪。军队之中没有一所野战病院。据《泰晤士报》显已缩小的资料，这支军队的官兵总数计为4,600名。此外，尚有3,800名搬运夫和同等数量的运输人员。这支军队共计有11,500人以上。另有7,500头运输牲畜，700辆大车和950辆双轮车供军中使用(236)。

不久以后，又续派一个山炮连和两个皇家狙击兵连开往西藏(237)。尽管有这么雄厚的兵力，但英军司令部却迁延复迁延地不敢继续进攻，因为大英帝国的士兵只有在自己的人数超于敌人两三倍的情况下，才肯参加战斗。被强迫征入英军的印度士兵往往拒绝执行命令。尼泊尔苦力也屡次掀起暴动。从侵略战争一开始，就有哲孟雄人、列普卡人和由其他几个民族中征来的士兵参加英军。侵略军的队伍也在江孜被围的期间大大减少了。英帝国主义者对西藏人民发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其不受一切英国士兵的欢迎，尤其不受印度士

兵的欢迎，原是不言而喻的。

7月1日，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到达江孜，准备进行谈判，英国政府也正是表面上为了这个谈判才派遣荣赫鹏率军入藏的。不丹大臣亲英分子乌金旺曲出来充当中介人。他把达赖喇嘛任命西藏地方政府的两位噶伦——大喇嘛和宇妥噶伦——为全权代表、前来与英人举行谈判的函件交予荣赫鹏。代表之中还有给达赖担任秘书工作的大仲译和三大寺的代表。拉萨方面的驻藏大臣则诿称缺乏交通工具，没有到江孜来。但侵略者并不真正需要谈判，他们需要的是冲往拉萨。荣赫鹏在谈判尚未开始时，即要求藏军撤出江孜炮台，并掘毁所有的工事。他向拉萨当局的代表提出许多殖民地性质的协议条件，如在西藏设立真正的英国代表机构，承认英国对西藏享有政治特权，偿付巨额赔款，同意英国军队占据西藏部分领土，辟江孜、日喀则、拉萨、噶大克为商埠等等(238)。

随后，荣赫鹏竟托词代表团的职权似乎并未完全按照外交上的细致手续予以确定，拒绝继续谈判，究其实，则是麦克唐纳已作好猛攻炮台、继续进军拉萨的准备。经过四小时的激战之后，英人攻占了江孜寺院，随后，侵略者分兵占据江孜西面和北面的十二个村庄，则城寺虽经整天防守，终亦沦于敌手。战斗的结果，英军占据了通往拉萨和日喀则两方面的道路，遮断据守炮台和城厢的西藏人去河滨的路径，从而断绝了江孜城的饮水来源。

7月5日，英人开始炮击城厢和炮台。至次日拂晓即下令猛攻。勇敢的守军坚决捍卫该城每一寸的土地，他们与英人进行逐房逐屋的争夺战。晌午，城厢陷入敌手。当日下午，侵略者冲进墙垣工事原已多半被击毁的江孜炮台。他们在炮

台里面所见到的只是直到最后关头仍然坚守阵地的守军尸体。江孜升起英国旗帜。炮台被工兵彻底破坏。居民逃散，寺院和城厢均寂无人声。

侵占江孜以后的几天之内，英军司令部即命令全军向拉萨推进。侵略者如此匆忙，是为了不让守军有在沿途构筑新工事的余暇。

西藏地方当局又作了几次与侵略者进行谈判的努力。其中有一次是在雅鲁藏布江的渡口举行的。拉萨的代表团要求英军司令部不要进入拉萨——这是一座禁止欧洲人前往，以免遭到冒渎的城市。这种要求并未引起注意。7月30日，最后一名英军已渡过雅鲁藏布江，全军以强行军的步伐向拉萨急进。及至西藏人民视为神圣的城市业已在望的时候，拉萨的代表团又要求荣赫鹏不要开进数万居民均焦灼不安的拉萨城，但英国侵略者终于没有考虑他们的愿望。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译者）8月4日（3日——译者），即侵略战争开始以来的14个月之后，西藏的首府拉萨为英军的官兵所侵陷。侵略者尽情偷窃西藏人民许多世纪积累起来的珍奇宝物。诚如一个英印报纸的记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洗劫西藏的关系，英国国内竟成立了许许多多的辛迪加(239)。《每日纪事报》的记者写道，英国远征军劫掠无数寺院，把掳获的细软经各山道捆载至印度。这些捆载而来的东西使军官们的太太和朋友皆大欢喜，而他们的室内陈设看来和四年以前洗劫北京（在义和团起义时期）之后的情景一模一样(240)。

1904年8月，英国国会的一位议员在会上质问布罗德里克，曾否注意有大捆大捆显然是从西藏寺院劫掠而来的细

软、佛象和其他珍物源源运往大吉岭，质问布罗德里克是否打算下令禁止远征军队抢劫拉萨的寺院和藏经楼(241)。布罗德里克对此拒绝作公开的答复。

侵占拉萨之后，英国侵略者并未得到他们所想望的安谧。商店被迫停业，英军处于无柴少米的境地。只是由于尼泊尔领事的努力，才帮助他们多少解决了一些补给问题(242)。感到粮食不足的英国人肆行劫掠居民和寺院。荣赫鹏为此派出大批军队，以刺刀作为他们勒索的后盾。例如，麦克唐纳于8月9日报告印度总督说，昨晚征得荣赫鹏的同意，决定对哲蚌寺举行“武装示威”。示威的目的在于强迫西藏人把粮食和燃料供应侵略军。结果，果然得到一些粮食(243)。用这种方法征集粮食是得到印度总督批准的。

侵略者不得不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居民屡屡袭击英国士兵和军官。例如，《泰晤士报》曾经报导一个西藏人猛扑两名英国军官的消息，这位爱国志士后来被英人捕获，受尽折磨，死后还将其尸体悬挂通衢示众(244)。

侵略者对于自己所处的“政治真空”状态也感到懊丧。《泰晤士报》于8月10日那天写道，唯一办事可靠的要人大喇嘛受了降调处分，宇妥噶伦又正在卧病，而西藏地方政府的其他噶伦都不能说服“仲达”必须和英人取得协议。该报说：“这样一来，整个局势都在群龙无首的迷宫里乱转。”(245)

的确，英国侵略者不单激起西藏农民和喇嘛的反抗，而且也激起西藏封建主的反抗。至于流寓西藏的汉族人，他们的心理当然是深恨英人的。西藏阵亡的战士当中有许多是与藏族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外国殖民者的汉族人(246)。中国军事大员马某早在4月4日即已驰抵古鲁，以拉萨驻藏大臣

的名义要求，英人撤回亚东。至4月底，荣赫鹏又收到驻藏大臣的亲笔函件，其中又提请将英军撤回边境。当然，所有这些努力都不值得侵略者的一顾，——英国当局所一意推行的政策是否定中国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7月26日，印度事务大臣打电报给印度总督，同意和西藏缔结“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条约[247]。

在荣赫鹏与西藏地方当局长期谈判的期间内，英国侵略者总是尽量想获得更多的东西，而地方当局则多方抗拒。开始，西藏地方当局拒绝英人所提出的一切重大条款，仅仅同意把商埠由亚东移到仁进岗。他们拒绝支付赔款，声明不是西藏应当给英国支付赔款，而是英国应当赔偿西藏所受的损失[248]。

8月19日，西藏地方当局把第二次答复英方要求的文件送交荣赫鹏。文中表示，如果与哲孟雄交界的边界线通过甲岗，即可同意偿付小额赔款，开帕里为商埠，并承认英国能在西藏扩大影响[249]。

英国侵略者使用各种伎俩逐渐取得许多让步，特别是从各大寺院绑架许多人质，暗示只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签订条约之后才能释放。

西藏统治上层未能团结一致，也使侵略者获益不浅。例如，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力人物噶丹池巴罗生嘎尔曾和宇妥噶伦即是具有亲英倾向的。英国大军云集和缺乏武器，使某些封建主放弃抵抗之意。但其中也有象擦绒噶伦（嗣后被英国间谍野蛮杀害）这一类的人，他们始终没有和侵略者妥协。

1904年9月7日，即英国侵略者侵陷拉萨一个月之后，噶丹池巴罗生嘎尔曾和另外几名上层喇嘛终于在荣赫鹏口授的条

约上签字，那就是所谓英藏条约。据各种史料证明，侵略者是在布达拉宫四周架起大炮之后，才得以使这几个西藏上层签字的[250]。英帝国主义者对于他们无权和西藏地方当局缔结条约这一点——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力为此——并未感到惶惑。中国中央政府曾严禁驻藏大臣签署这个条约。

英国侵略者为了在西藏物色几名声望相当、能够在条约上签字的人，竟整整花了一个月的功夫。在英军侵入拉萨以前，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即已带领几名亲信离开西藏，并未指定代理人。这个“条约”的所有条款只是责成西藏人如何如何，并无一条是对方应负的责任[251]。

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从荣赫鹏坚持以英文约文为凭这一点已可窥见。占领军还迫令藏人签署以下的补充声明，附入英藏条约：“西藏政府允许英国派驻江孜的官员监管英国商务，遇有必要时，可径往拉萨与中国和西藏高级官员商谈在江孜与西藏官员用公文或面洽所不能解决的重要商务事宜。”

这个无视中国权利的英藏条约，亦即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一次新进攻。

第1款使西藏在西藏与哲孟雄的边界问题上屈从英国当局的意旨，完全丧失其在约定作为边界的分水岭南坡牧放牲畜的权利，而须负责按此款建立界石。

按照该约的第2款，西藏地方当局应立即开辟江孜和噶大克为供英人贸易的新商埠，并须斟酌在其他城市开辟同样的商埠，准许英国商务代表常驻西藏境内。

第3款，英国当局对中英两国政府于1893年签订的“藏印续约”的不满之处，保留有修改的权利。第4款规定西藏

当局不得向英国商人征收任何税课。第5款，西藏地方当局应随时养护旧路，修建新路，以便利英人贸易，并须保持与英国当局的经常通信，负责递送公文函件。

第6款和第7款规定西藏应偿付50万英镑的巨额赔款[252]和英国军队占据春丕谷。英军司令部将赔款的清缴期限规定为75年。这实际无异于永久占据西藏这一部分最肥沃而又有良好道路与拉萨相通的土地，并使西藏地方当局处于英国财政附庸的地位。第8款规定西藏当局须削平一切炮台山寨，使由印度边境至拉萨的广大区域成为不设防地带，从而使英国政府获得英军能以畅行无阻的保证。最后，第9款规定西藏无论在外交、内政上对英国均处于附属地位，不经英国政府先行应允，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将西藏土地割让、出卖、租赁、典押或以其他方式出脱予任何外国的权利，没有允许外国代表进入西藏境内的权利，没有让予特权给外国的权利等等。附入条约的补充声明使英国当局能以自由监督此项殖民"条约"一切条款的履行情况，恣意干涉西藏地方的一切内部事务。

英国侵略者能够深入西藏腹地，闯进拉萨，强迫西藏接受这种奴役条约，它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

1903—1904年的英国武装侵略西藏，是封建中国频遭军事失败中的一次失败。正因这些军事失败，帝国主义国家才不但侵占了中国四邻的许多国家和它原先的藩属，而且还夺去了中国本土的一部分。可见西藏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不单是为了争取本身自由的斗争，并且也是为了捍卫整个中国独立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写道："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

迫。”[253]但西藏人民在这次斗争中却缺乏支援。中国中央政府并未公开给西藏地方以军事援助，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早已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夺去一些土地，迫使它偿付巨额赔款，勒令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约。按照这些条约，列强获得在中国驻扎海陆军的权利，获得领事裁判权，并将整个中国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254]；当时的清廷实际已成帝国主义者所玩弄的傀儡。

1903年12月，《新时代报》就英国侵略者侵入西藏一事推论到中国一般局势时写道："可见，英人侵入西藏境内即是蹂躏中国的主权；不过，现在还有谁重视中国的权利，中日战争之后，连比利时人什么之类的都在中国浑水摸鱼。"[255]

英国政府完全无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权利。清朝当局常常处于既成事实的面前而莫可如何。例如，1904年5月，当英国侵略军已奉命向拉萨进军的时候，英国外交部副大臣皮尔西伯爵在下院声明，认为没有把预定向拉萨进攻一事正式通知中国政府的必要[256]。更进一步说，英国现与西藏作战，事实上就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这一点却是英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的。不过，当1904年7月11日那天，一位下院议员质问"我们是否正与中国处于作战状态"时，布罗德里克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否定的答复，——他信口胡诌，来了个所答非所问[257]。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屡向清廷官员表明，彷佛俄国方面已危及西藏，担保自己对西藏绝无恶意，绝不超出扩大贸易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殷切希望能保持其对西藏统治权力的中国中央政府便执行消极抵抗侵略的政策，期望英俄因西

藏发生冲突而好坐收渔人之利，其所采取的拖延战术即是以这种“抵抗”为基础的。当英军越过边界，直入西藏境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据清廷官员梁范（译音）说，这个大清政府顿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梁范说：“四年以来，驻藏大臣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现在，英国竟“乘中国处境艰危之际，如此断然行动，欲再继续运用老办法，不可能了”(258)。

荣赫鹏在英藏条约签字之后所发表的演说，即是这个政策的后果。这位英国军官在演说中大声说：“我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保证英国将严格遵守这个条约（该约并未课英国以任何应行遵守的责任——著者），但我必须预先警告诸公，我们也会要求你们同样严格地履行这个条约。任何破坏，无疑是要加以惩罚的；任何妨害商业，任何对英人的傲慢无礼或凌辱行为，均属破坏条约之举。为此，我们定要要求赔偿。”(259)这些话是故意说给当时参加“庆典”的清廷驻藏大臣听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决定西藏战争的结果如此？“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260)，但战争的结果也系乎武器良窳、士兵成份、防卫组织、战术战略，而最为重要的还要看西藏和全中国的生产发展程度和交通运输状况如何。英国侵略者之所以能打败西藏人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西藏的经济极为落后。西藏地方当局有什么可以抵挡那些正规的、训练有素的、富有殖民战争实际经验而又武装得应有尽有的英国军队呢？除了勇敢的西藏人民本着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而发为个人的大无畏精神以外，几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西藏地方的“正规部队”总共只有3,000人，连那些落后

的作战方法都不大熟练。西藏地方部队仅有的武器是火绳枪和几门早已过时、缺少瞄准装置的旧式山炮，他们完全没有在山地作战情况下所绝对不能缺少的炸药；反之，英国军队却拥有全付的最新武器。在英国疯狂侵略、西藏人民危难万分的时期，仅仅手持大刀长矛、完全不懂军事技术为何物的农民源源应征入伍。据《泰晤士报》驻荣赫鹏军营的随军记者报导，西藏地方部队只有8%多一点的人持有旧型欧式步枪[261]。从这里可以明白，为什么西藏保卫者与英人作战的时候竟受到如此大的损失。1904年8月1日，布罗德里克承认仅仅在五次战斗中，藏军伤亡即达1,065人[262]。这个数字还显然是估计过低的。中国作家刘贯一在其所著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一书中，认为在英国武装侵略时期，藏军伤亡超过4,000人[263]。而英人总共仅损失数十人[264]。

侵略者的暂时胜利，促进了西藏的封建分裂。西藏没有一种能以领导牧人和农民从事斗争的社会力量。在封建制度的条件下，由于没有进步的阶级，首先是由于没有工人阶级，所以西藏没有一个能以率先从事解放斗争的政党，而西藏农民又得不到必要的领导。指挥与侵略军作战的是封建主。虽然其中有些人在战争当中连性命都牺牲了，但他们所追求的毕竟只是各自的私利。西藏封建主竭力维护剥削农民的各种可能性，不愿与外人分享这种权力。除此以外，西藏封建主已被英帝国主义弄得四分五裂，其中出现大批背叛祖国的奸徒。

西藏的喇嘛教教长达赖喇嘛，当英人逼近拉萨时即已逃出西藏。他远离西藏，一则是为了保全个人生命，再则是为了寻求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支援。达赖喇嘛之所以担心自己的

生命，是由于他当时是西藏封建主中反英最力的人士之一。

达赖喇嘛宁肯远走蒙古而不去内地各省，说明他没有指靠清廷的支援，只希望得到青海、蒙古，说不定还有西伯利亚等处喇嘛寺院的帮助。

曾经和达赖喇嘛详谈其因何被迫出走的科兹洛夫写道："侵略者的强暴行为和英人在印度绑架土国国王作人质、授予条约、令其亲自签署的无耻伎俩，使这位喇嘛教教长不能不离开拉萨。"(265)达赖行抵库伦（现名乌兰巴托）后即发表声明说，他之所以来到库伦，是"为了便于联系，主要是便于和朝廷联系"(266)。他在驻在库伦的期间，不断痛斥英国侵略军是强盗，是凶手，称拉萨的驻藏大臣为懦夫，为叛徒(267)。

中国中央政府当局对于西藏地方政府首长的这种专擅行动深致不满，因为这种行动可能引起各种纠纷，显然对清廷是不利的。据一位俄国外交官员于1904年11月从北京发回的报告说，"此间对达赖喇嘛不满"。按照这个官员的说法，各方责备"他拒绝缔结无关宏旨的商约，使国家蒙英人入侵之祸"。达赖喇嘛甚至受到清朝皇帝明令免职的处分(268)。

西藏与印度以及与中国原先的藩属尼泊尔、不丹、哲孟雄等国比邻的地理位置，也对侵略者有利。这些已成英国领地的地方"统治"集团，都成了侵略者的帮凶。

尼泊尔王不仅没有援助西藏，而且把尼泊尔全国的一切资源完全交给英军司令部支配，听其广泛利用。许多能够出入拉萨或侨居藏境的尼泊尔商人和官吏，都是英人公开的代理人。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多方协助侵略者，把重要情报供给他们，帮助侵略者掠夺西藏人民的食粮。不丹大臣乌金旺

曲等人均忠实地为侵略者作走狗。

1904年9月23日，英国侵略军，在西藏人民伤亡者亲属切齿的诅咒声中和全体人民的仇视下，离开拉萨，沿着通往印度边境的道路而去。英国士兵连一名都没有留在拉萨。英国政府在战火重燃的威胁下，不得不匆匆从拉萨召回其军队；因为一旦战衅复起，在英军远离印度后勤基地、严冬即将届临和西藏人民决不对敌屈服等情况下，除了侵略者失败以外，战争是不会结束的。《每日邮报》的记者对西藏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分析：喇嘛教僧侣分为许多派系，而最活动和最不安分的一部分僧侣都是站在达赖喇嘛一边的。例如，拥有喇嘛6,000之众的色拉寺，即属于拥护达赖喇嘛者之列。其他寺院虽不如此一致，但达赖喇嘛的信徒却到处都很多，并且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荣赫鹏签订条约的原来是一些软弱而在西藏并无声望的人(269)。

侵略者从西藏走开，绝非出于自愿。他们由于匆忙的关系，竟未执行英国政府责其签订通商章程的命令，那就是说，竟未执行解决这次侵略的重要课题之一的命令。只此一端，即可证明。寇仁根据英国内阁的既定方针(270)，早已预先谆嘱荣赫鹏，不得到西藏当局准许英商在西藏境内经营商业、不纳税课的权利，不得到在西藏东部开辟商埠、供英人贸易的权利等等，切莫收兵。但荣赫鹏拒绝执行此项命令，并将西藏人民抗拒甚力和此时不宜为英藏条约再提补充要求的情况，直截了当地明告这位总督(271)。的确，在侵略军逼近拉萨时，向东退却的3,000—5,000名西藏地方部队现又开始采取攻势(272)。麦克唐纳亦已根据侦察报告——藏军已在距英国军营不远的地区集结的消息，通知其所属的英军司令

部。是年9月23日，西藏爱国志士手刃了几名与侵略者积极合作的卖国奸细。

从拉萨退却的英国军队，在越过印度边境时即显出一副狼狈相。所有士兵都生了冻疮，有些人被耀眼的雪光弄瞎了眼睛，有些人倒毙在暴风雪里，用担架抬着的病号不计其数。

尚有相当数量的英军留在西藏南部作占领部队。有一个支队驻江孜，有几个营的兵力占据春丕谷。藏西的噶大克则由罗林队长率军驻守(273)。遇有必要，还可抽调紧接藏边的甘托克和纳汤两地驻防英军，驰援留驻西藏境内的英国部队。

尽管侵略军已被迫撤出西藏，但英国统治集团对侵略的结果，仍然深感满意。布罗德里克在议会声明说，与西藏签订的“条约”使英国的通商权利、收取赔款和长期占领春丕谷获得保障(274)。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纷纷发表论文，赞扬不列颠人在“世界屋脊”上所建树的“功勋”，其总的精神可以归结为《泰晤士报》的一项宣告，即号召英人尽量利用按照“与藏人所订条约”英国取得的优越地位(275)。

英王在1905年2月14日的演说中，表示对英藏条约完全满意(276)。在英王尚未发表演说以前，早已设置一种特殊勋章，酬奖参加侵略的全体人员，以示“永志我军在远征期间，备历艰辛，恪守军令”之意(277)。

那末，为什么英帝国主义者对于实行侵略所得的成果竟会不尽满意呢？原来是因为，据布罗德里克1905年2月16日在议会报告，他们不能不拿出用于侵略西藏的812,730英镑(278)。侵略有助于英藏贸易的扩大，有助于英人独霸西藏市场。英国帝国主义者几已完全垄断经过印度边境的全部对藏

贸易。例如1902—1903年，经过印度输入西藏的棉织品，英国占六分之五，而印度出产的仅占六分之一[279]。其他进口项目也可看出与此约略相同的比例。由西藏输出的原料主要是供英国加工用的。

## 四、英俄对西藏的争夺

1903—1904年的英国武装侵略，并未使英国帝国主义集团力求在西藏树立英国政治霸权的企图如愿以偿。虽然英藏条约第9款的规定已使西藏完全隶属于英国，但严重局势不允许英国占领西藏，英国政府研究不能不在1907年的英俄条约中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并在1908年春季撤出英国占领军。在国际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的年代里，西藏人民的抵抗，在中国、印度和东方其他各国解放运动的鼓舞下，竟成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无法克服的障碍。

英人的武装侵略一开始就激起全世界舆论的不良反响。

俄国、德国、法国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报纸一致谴责英国殖民集团在西藏的侵略行动[280]。1903年年底，孟买即已传出消息说，“由于英人侵犯西藏的和平生活”，已在印度引起极大的骚动[28]。尤其焦急不安的是印度北部的佛教徒。印度舆论纷纷谴责侵略西藏的活动。1903年11年28日，加尔各答的《甘露市场报》发表一篇论文，题为“远征西藏对印度有何影响？”文中申诉印度并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可是它不仅不能不维持本国的庞大武装力量，而且还不能不维持由“异国”（指英国——著者）派遣来的72,000名士兵。该报抨击英国当局为自己的侵略活动辩解所举出的理由是毫

无根据的。文章的结尾作出结论说："大英帝国的所有问题"以及与解决这些问题有关的一切重荷，无不责成每年饿死2,500,000人的印度承担。这个国家今天竟在"派遣远征军队去侵略从来不知外国压迫为何物的人民"(282)。印度民族会议不断表示反对进行侵略(283)。

英国政府在西藏的行为，即使在英国本土也未得到一致的好评。《新时代报》的记者从伦敦发出消息说："公众并不同情远征，深恐陷入新的艰苦战争，激起中国和亚洲各族人民反对英国。"(284)

英国报纸，在舆论的压力下，不能不常常省出篇幅，刊载个别批评言论。早在1903年12月间，《每日新闻》即已发表曾任英领印度政府要职的亨利·柯东接见该报记者的一篇谈话。关于派遣武装部队前往西藏的问题，柯东对记者说道："所有这些号称和平性质的小商务代表团都不外是军事进攻，其唯一目的是兼并土地。"1904年6月12日，柯东发表一封致《泰晤士报》的公开信，谴责该报记者散播挑拨性的谎言，仿佛俄国代表于1901年12月返回拉萨时，即已携有俄藏之间缔结政治协定的条约全文(285)。同月24日，他在一个社团的集会上提出一项议案，指斥英国政府在西藏的行动方式之不当。议案指出，政府为"进军西藏"辩解所举出的各种理由都是毫无根据的。对藏贸易微不足道，顾虑俄国阴谋更是庸人自扰。远征军事需要把西藏并入英国版图始能结束，而被征服的地区必须有20,000英军经常驻守。这样一来，英国就会激起中国与自己为敌，使它终于会站到俄国方面去(286)。

英国政府的政策遭到许多国会议员的激烈反对。英国李

庞侯爵于2月26日在上院表示，由于远东的纠纷扩大（日俄战争），希望暂停远征西藏[287]。1904年4月，反对党议员吉卜逊·博尔指斥说："贸易远征也不外是一种军事行动；这是未经一个友好国家的许可，违反这个国家的愿望，擅自武装侵入其国土的行动。"[288]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又叱责英国政府在西藏方面的举措是一种"粗劣的错误"；正因这种错误，使英国难以与俄国"就两国在世界各处的利益"达成协议[289]。

当英国下院于1904年4月中旬就武装侵略西藏一事举行辩论时，自由党议员弗列尔表示，赞同英国以1904年4月8日英国和法国所缔条约为兰本，与俄国签订关于亚洲的条约[290]。

英国政府的对藏政策遭到英国统治集团部分人士的严厉指责，因为这种政策深深妨碍与俄国缔结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德国所迫切需要的条约。自由党领袖剑白尔班纳曼（嗣后任英国政府的首相）、葛雷（嗣后任剑白尔班纳曼政府的外交大臣）和自由党上院领袖斯宾塞爵士等多人，为夺取政权就利用"西藏问题"攻击保守党内阁。这一斗争直至1905年年底保守党内阁垮台，始告结束。

1903—1904年的英国武装侵略，的确在俄国引起极强烈的反对，的确妨害英俄两国的接近。俄国统治集团完全明了，一旦英国势力在西藏根深蒂固会造成怎样的一种局面。伊格纳齐耶夫伯爵写道："英国对于西藏的方针是现实的，远大的；这个方针是为由印度侵入华南铺平道路。"[291]

例如，《新时代报》在1904年5月间的一篇社论里写道："就最近各报所如此纷纷议论的改善英俄关系而论，我们认

为远征西藏一事实在是它最重要和最突出的障碍。在英人尚未停止其显然针对俄国的军事示威以前，绝无可能谈什么亲善的话。”(292)

英藏条约在俄国统治集团中激起的反抗最为强烈。俄国政府向英国内阁声明，这个“强迫西藏”签订的条约破坏现状，破坏“门户开放”原则，可能“对远东的一般局势发生极不利的影响”。声明之中一再表示，俄国政府“对于这一改变西藏现状，造成干涉中国内政各种新借口的英藏条约只能持否定态度”(293)。

俄国这种态度促使中国政府决定不承认英藏条约。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发表声明，指出英国占领西藏是其继续扩大侵略中国的张本。此项声明使美、法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在中国享有权益的国家惴惴不安。例如，美国驻英大使绍阿特，早于1904年7月间奉其本国政府的命令，向英国内阁探询英国在西藏的意图。

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英国政府只好决定把英藏条约的某些条款加以修改，使其酌量减轻一点。临到快要批准该约的时候，代理印度总督安普特希耳于1904年11月6日发表减轻英国原先定的赔款总额，废除该约的补充条款（按照该补充条款，英国官员可自由出入拉萨）和付清三年应缴赔款后即中止占领春丕谷的声明。所有这些都算是英王最大的“仁慈行为”！英国政府迫不得已，竟将“西藏冒险事业”的责任推在寇仁爵士身上，把他从印度召回英国。1905年2月14日，当英国议会开始就1903—1904年武装侵略的后果进行辩论时，兰斯顿侯爵不得不在大会之上使出全身的机智，竭力为保守党的政府解脱。他说荣赫鹏在西藏的一切行为只是从狭隘的

英印观点，而不是从广义的英国观点出发的[294]。

英国外交大臣为政府辩护的发言很少令人信服之处。剑白尔班纳曼（未来的英国首相）在其发言中着重指出，与激起社会舆论和政府多人不良反响的英藏条约有关的各种“误解”，当然不是由于荣赫鹏的过失而起。他接着说道：“荣赫鹏上校深知促其决心完成任务的原因，显然认为长期占领春丕谷只是应当取得的最低收获而已。”[295]至于寇仁爵士，那末，他也不过是执行伦敦方面发布的各项命令。正是首相巴利弗尔爵士认为寇仁系其侵略政策的热烈拥护人。大家知道，当时英国政府一反向日的传统，把寇仁充当印度总督的任期延长两年，以便他在亚洲为英国开疆拓土，并对驻某些国家的英国公使殷殷指示，要他们在有关亚洲各种问题的行动上，务必与寇仁的步调一致。

为了缓和各方对英藏条约的不满，同时也是为了巩固武装侵略的成果，英国政府开始与中国政府举行西藏问题的谈判。开始，英国当局要求北京政府事实上放弃其统治西藏的一切权力。[296]。

俄国政府获悉英国提出新的要求时，即命其驻英大使宾肯多尔夫向英国内阁提出一项新的声明。在这个声明当中，俄国政府促其注意英国曾向俄国保证，决不破坏西藏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政治地位的原则。俄国政府给宾肯多尔夫大使的指示中着重指出，任何违背上述保证的行为“都会成为英俄之间达成友好协定的重大障碍，而缔结此项协定，则是大不列颠政府所如此汲汲以求的”[297]。同时，俄国政府所依据的理由是西藏为中国领土，一旦“脱离中国，即变成与印度相连的边区，英国就可在那里恣意行动，为所欲为”[298]，

英国政府懂得，如果在西藏问题上坚不让步，对于和俄国接近一事就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在当时英德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英国一直是在力求和俄国接近的。因此，英国统治集团决定暂时放松进攻中国的西藏，并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作了一些让步。英国政府不得不看风使舵，改取这种战术也是由于西藏人民坚决不肯履行英藏条约所订立的条款。1905年9月初，印度总督向英国政府诉苦说，西藏“尚未履行条约所规定的各种条款”，而对于要求他们履行条款的复函竟使用“与相互友好关系不能相容”这类词句(299)。英国驻西藏的商务官员鄂康诺报告说，西藏当局刻正改建和从新扩大江孜炮台，对英国货物抽取税课，拒不削平江孜与拉萨之间沿途的炮台山寨，断绝一切经干坝与印度进行的贸易，不时破坏与印度方面的电信联系和截留英国驻藏官员的函件(300)。

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促成西藏人民与英国侵略者进行决斗、取得胜利的最要因素。与西藏反英活动相呼应的巴塘事件即是这种斗争的反映。

四川西部的巴塘和理塘两城，向为英帝国主义垂涎的对象。英人早于1901年获得各该地的石油和煤的开采权，窃据各该地的重要经济地位。英商设立的中英公司，取得使用该处土地50年之久的权利，任意剥削在其矿山矿井从业的当地居民。

巴塘事件是从1905年4月间开始的。当地的喇嘛，在一般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捣毁外国教会的房舍，打死传教士和一些执行媚外政策的清廷官吏(301)。

巴塘事件是四川西南和云南西北所有寺院发生骚动的

信号。

尽管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也无法完全抹煞这些事件的反帝性质，但他们却竭力想把它说成是反对汉人的暴动。可是，达赖喇嘛却能证明这些骚动无一不是由于那些企图使当地居民屈从自己意旨的外国人、傲然出现于人民之间所激起的。这些外国人被起义的义民打死了[302]。英国领事台克满认为巴塘暴动是“英人在拉萨设立教会”的结果[303]。1905年11月，昌都开始爆发一系列性质更为严重的骚动[304]。

各地居民的行动全是反击英国殖民集团在西藏推行蓄意奴役西藏的政策的。

西藏成了英国各种考察团必到之地。布留斯上校、赖雅尔德上尉、菲茨泽拉德和弗拉则军官之频频来访，都是怀有军事战略目的。1905年7月，俄国驻库卢全权代表的助手，对西藏各地金矿最感兴趣的卡利维尔特越过中国边境进入西藏。1905—1906年两年之内，曾有几名英国官员从印度西北部喜马拉雅山附近几个土国跨进西藏西南地区，详细勘查金矿。

英人来西藏者愈多。他们多半都是商人。英人的贸易政策依然是靠了设法削减中国内地各省与西藏的交易额，借以扩大英国货物的输入量。例如，拿1904—1905年同1902—1903年相比，输入西藏的棉织品几已增加50%，茶叶增加1倍[305]。

为了满足英国臣民的需要，英国当局在西藏各地占据最便于利用的地段，借其修建收购站，在西藏各大居民点设立邮政局，并在计划敷设铁路的地区进行地形测量。

西藏地方当局在春丕谷的职权全被英人剥夺。管理这个

谷地的柏尔声明，藏人在春丕绝无任何权力[306]，在其答复由于这种声明引起西藏方面抗议的回信中，竟说英国政府不承认西藏当局有“提出这类问题”的权利[307]。

侨居西藏的英国人竟强迫当地居民为其服务，强征农民的食粮和燃料，践踏禾苗，任意在西藏牧人的草场上牧放自己饲养的牲畜。

1905年年底，剑白尔班纳曼的自由党政府在英国执掌政权。这个政府在推行殖民政策方面较为圆滑，大体在1906年3月以前即已和中国政府谈判西藏问题。俄国政府认为这是重申其本国立场的适当机会，它授权其驻英大使表示深信英国政府“在与中国签订有关西藏的条约时，无论如何不致违背自己在西藏问题方面曾经作出的确切诺言”[308]。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于1906年4月27日由双方在北京签字[309]。按照该约第2款的规定，英国政府应允不占并藏境和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政府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

中国外务部侍郎于1906年11月6日致函四川总督说：“虽然不是藏印条约的所有补充条款都已得到英国的认可，但主要目的却因英国承认西藏为我国领土业已达到。”[310]

英国外交副大臣因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出席上院声明说：“该约包括我方应允不侵犯西藏领土和不干涉西藏政治。我方将不再力求获得英藏条约第9款所列各项特权，亦经该约予以规定。”[311]由此可见，英国业已被迫在立即侵占西藏的计划上，向后退却一大步。

中英两国代表于1906年4月在北京签订的关于西藏的藏印续约，是英国政府受了俄国的压力所作出的重大让步。

1906年4月29日，《新时代报》以中英藏印续约为题，发表一篇社论，用富有含蓄、但并不模棱的词句指出这一点。该报略叙条约内容之后，就接着写道："上述各种规定均与英藏条约第一次草案所列各款大不相同。按照原约第9款的规定，英国已获得远为广泛的各种权利。"往后，该报即直截了当地反映俄国统治集团的意见说："新的中英藏印续约无疑是顺着本报一向坚决主张的那种政策迈进一步。"(312)

严重的局势使英帝国主义者在西藏问题上不得不对中国让步。德国的侵略日亟和英德的矛盾日甚，故使英国政府要谋求与其将来对德斗争的盟邦俄国获致协议。而亚洲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蜂起，也使英帝国主义不能不和俄国团结起来予以镇压。

1906年5月，英国大使尼科逊访问俄国外交部，提出"为了在英俄相互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正式协议"举行谈判的建议(313)。同时，尼科逊表示，希望谈判从西藏问题的讨论开始。沙皇政府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建议。当时沙皇政府，和向来的情形不同，在镇压革命运动和梦想征服巴尔干，征服近东方面，都需要有一个盟邦。

俄国驻英大使宾肯多尔夫受权向英国内阁说明俄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俄国政府重申，"不干涉西藏的政治仍应视为具有约束力量，不仅如此，还应避免采取足以间接造成类似干涉的任何步骤"(31 )。

同月30日，英国大使提出英俄条约草案，其中有五款是完全关于西藏问题的。草案的第1款载明，双方应允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应允不破坏西藏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和不干涉西藏的政治。从这一款的内容看来，英国政府业已同意俄

国政府一向坚持的那种对藏政策的基本原则。

草案的第2款责成俄国承认，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英国非常关怀西藏的对外关系不致遭到任何其他国家的破坏。第3款和第4款规定，缔约双方承担不派遣各自的代表去拉萨，不在西藏获取修建铁路、安设电报、开采矿山以及与此相似之其他权利的责任。俄英两国政府应允不为本国，不为本国国民强取任何利益[315]。

俄国政府提议将该约草案第2款的条文修改为："俄国和英国遵循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的原则，应允关于西藏事务的联系，必须经过中国政府。"[316]

为了对抗英人享有访问西藏的权利，俄国政府提议基于俄国佛教徒的宗教要求，应保持他们和达赖喇嘛及西藏其他佛教大师直接交往的权利[317]。这些建议确已为该约第2款打下基础。

俄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依然和从前一样。这个政策的实质具见于俄国政府1906年5月30日向沙皇提出的报告，其中说明俄国政府在这个问题方面的目的是防止英国吞并西藏[318]。至于英国方面，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同意俄国的建议。它认为这是一种临时让步，并未失去一旦时机到来，终于会吞噬西藏的希望。例如，1906年12月3日的俄国政府公报载明，当英方答复俄国询问"英人实际如何理解西藏领土"的时候，尼科逊只是"作了一个非常含糊而又不着边际的表示"。对于俄国当局提出以中国人自己认定的四界作为西藏领土的建议亦未获得正式答复[319]。

英俄同盟由于1907年8月31日在彼得堡签订相应的条约正式结成了。1907年的英俄条约划定缔约国家在伊朗、阿

富汗和西藏的殖民利益。虽然这个条约的矛头是指向德国的侵略，但它同时也是两国互相勾结，反对亚洲各族人民由于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影响而激起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列宁在《帝国主义笔记》里把英俄条约的本质刻画如下："1907年：俄国与英国缔约（8月31日）：分割伊朗、阿富汗、西藏（准备对德作战）。"(320)

关于西藏问题谈判所得的结论已在英俄条约中特立一节加以说明(321)。两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意尊重西藏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应允不干涉西藏的政治。英俄均放弃在西藏获取特权，同意只有经过中国中央政府始与拉萨发生联系。英国接受俄国从春丕谷撤军的要求，承认俄籍喇嘛教徒有朝参拉萨的权利。

总之，英俄条约关于西藏之规定说明英俄两大殖民国家，未经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不顾中国的主权，擅自商妥双方此后对中国部分领土的政策(322)。但是，1907年的英俄条约关于西藏的部分，却限制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野心，表示英国在外交策略上已从占领西藏的计划方面继续后退。尽管在1905年8月12日签订英日同盟新约的时候，英国坚决要求日本承认它有权在印度边境附近地区采取任何方策，从而保证获得日本支持其在印度的邻国进行侵略活动，但英国政府现在毕竟还是向后退了一步。

日本统治集团原已不断给过英国这种帮助。例如，日本报纸《日日新闻》关于英藏条约发打所见说，英国在西藏占据优势地位对中国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好象西藏就没有落入对中国怀有敌意和侵占中国领土的其他国家之魔手的危险。当时日本报纸竭力主张中国承认英藏条约，仿佛这个条

约倒是中国利益较好的保障[323]。

1907年英俄条约的"西藏部分"成了英国议会反对党议员寇仁爵士、兰斯顿侯爵等多人长期抨击的对象。他们对于因停止占领春丕谷而使俄国已在西藏获得与英国相等的权利，准许俄国香客朝参拉萨，尤其是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深表不满[324]。

英国政府虽然不能不放弃将西藏并为自己的属土，但仍想紧紧把住由于1903—1904年武装侵略所取得的优势地位。英帝国主义无意放弃侵略中国西藏的政策，尽管方法不同，但仍将执行这种政策。这从国会关于缔结1907年英俄条约的辩论看来，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1908年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在下院声明说，在英俄条约当中，"我们仍然贯彻了前政府的政策"，而在一个议员批评政府涉及西藏时，葛雷竟打断他的发言，厉声叫道："西藏务须履行英藏条约"[325]。

英国政府开始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展开外交攻势。纵然英国政府不愿意认真对待它自已在相应的国际文献中所已承认的中国对西藏领土的主权，但在英俄条约缔结之后却不能不顾及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已按照英藏条约的规定支付赔款，英国政府于1907年年底终于和中国政府在西姆拉开始了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是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英方出席的是驻于印度总理外交事宜的德恩和英国驻华领事团的官员韦尔敦。

中国方面提出的通商章程草案未能满足英人的欲望。据张荫棠说，英人无视中国的权利，要求英国官员可以不经中国行政当局的中介径与西藏官员发生联系，坚持任命领事级

的特派代表驻西藏，并立即解决茶叶贸易问题[326]。

1907年11月底，张荫棠将德恩交给他的通商章程草案输送中国外务部。从这个草案可以看出，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英国代表已不能不对中国方面作出一些让步。他们已放弃立即解决印茶输藏问题的要求，放弃任命英国领事级的特派代表等要求[327]。

英国统治集团所以作出这些让步，是因为西藏人民对于他们的政策抵抗甚力，觉得马上和中国签订商约有利。西藏居民拒绝将各种产品售于英人，藏人与英人时常在市场上发生很厉害的冲突，甚且双方都动用武器[328]。1907年7月18日，英领印度政府致函伦敦，希望靠签订通商章程来排除藏人的抵抗和中国驻藏官吏不愿执行英方要求的障碍[329]。

1908年1月，中国当局付清强加于西藏的最后一期赔款，当即根据原约，要求英国终止占领春丕谷，撤走英国占领军。对于这种正当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竟无理搪塞说，只有签定使英国政府满意的通商章程之后，英国始能从春丕撤军。

1908年1月22日，朱尔典公使将其最近声明和要求北京当局电令张荫棠"以友好态度完成谈判，切勿再事拖延"的情况，报告伦敦[330]。

1908年4月20日，中国全权代表张荫棠和英方代表韦尔敦在加尔各答签订了"西藏通商章程"（即"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译者）。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汪曲结布也在这个章程上面签了字。

新的"西藏通商章程"规定，1893年所订章程的各项条款凡与新订章程不相抵触者，均一律继续有效。江孜商埠的

界限亦经划定。英国臣民有权在商埠之内租赁土地，供建筑房屋、堆栈之用。此种建筑用地，应由中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与英国商务委员商妥后指定。英国商务委员和英国臣民只在指定地段内享有兴建房屋的权利，各该地段的管理权仍操于中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之手。商埠的治理权应归中国官督饬西藏地方官管理。驻商埠的商务委员和边界官均须有适当的品级。凡是商务委员和地方官不能解决的问题即送由印度政府和拉萨地方当局核办。遇有印度政府和拉萨地方当局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则移请中英两国政府核办。

汉人或藏人与英国臣民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纠纷，须由中国全权代表与英国全权代表共同审理。但在西藏境内犯下罪行的英国臣民则应引渡给英国商务委员，由其按照印度法律审讯和处罚他们。通商章程规定，英国臣民和派驻商埠的商务委员应严格遵守通商的路线，不经许可不得越过商埠的范围之外，以及循着西藏内地道路由噶大克往返于亚东和江孜（这一条不适用于印籍商人，他们仍准依照向例从事贸易）。

英国臣民在指定通商的商埠内享有贸易自由的充分权利；他们可以雇用藏人从业和服务。藏人侨居、经商或旅行印度者亦予以同样权利。

在中国尚未把警察的实力增厚到足以保护英人的生命和财产以前，英国驻藏商务委员之下仍然设置武装警卫队。

茶叶（印茶——译者）入藏抽税问题延未解决[331]。

尽管1908年4月20日签订的“西藏通商章程”远未满足英人原来提出的一切要求，但它仍然不失为侵略和奴役西藏人民的一种武器。英人获得治外法权，获得租赁土地建筑

房屋、堆栈、旅舍的权利。西藏地方当局负有保护英国利益和英人生命财产的责任。西藏境内还驻有英国武装部队。

但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在中英两国代表所签订的此项“章程”中，完完全全被确认了。这个“章程”的签订，说明英国政府已被迫放弃武装侵占西藏的企图。

1908年6月，《泰晤士报》在评论英国政府这种迫不得已的措施时不胜痛心地说道，现在，中国又在西藏地方获得优越的权势(332)。

“西藏通商章程”签订之后，英国占领军随即从春丕谷撤退(333)。

英帝国主义想把西藏变为一个便于大举进攻中国内地之桥头堡的阴谋，就这样未能实现。

**注释：**

〔1〕萨曼（S.Cammann）：《越过喜马拉雅山的贸易》1951年，第25—26页。

〔2〕《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议事录》，第19卷，伦敦1875年版；《西藏旅行记和西藏与孟加拉之间的贸易》；马克翰（C.Markham）：《乔治·波格尔出使西藏和托马斯·曼宁旅行拉萨故事》，伦敦1879年第2版，第8—9页。

〔3〕忒涅：《出使西藏班禅宫廷记》，伦敦1806年版，第13页。

〔4〕同上，第245页，第253—254页。

〔5〕居涅尔：《西藏地舆志》，第1部，第1册，海参威1907年版，第49页。

〔6〕虽然地方统治集团和封建主多有亲自从事商业活动的（最常见的是雇用专人担任），但在西藏与其他国家和中国内地所进行的贸易上起主要作用的却是汉族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尼泊尔、克什米尔和不丹的商人也多有在西藏经营商业的。

〔7〕从7世纪起，尼泊尔即归西藏统治，嗣后为中国的藩属。至18世纪中叶，有些尼泊尔的封建公国遭到廓尔喀人的袭击，尼泊尔的整个中央谷地不久即为其所侵据。英领印度当局马上看出与廓尔喀部落好战领袖建立友谊的一切利益。英国殖民集团抱定方针要利用廓尔喀人为自己在亚洲的这一地区实现侵略目的。

〔8〕萨曼：《越过喜马拉雅山的贸易》，第115页。

〔9〕据史料证明，中国军队从内地开入西藏是军事史上最艰苦的一次行军，就它的复杂困难程度而论，比汉尼巴率军通过阿尔卑斯山有过之无不及。

〔10〕居涅尔：《西藏地舆志》，第53页。

〔11〕《马恩全集》，第9卷，第195页。

〔12〕库马尔在其所著的《英美对克什米尔的阴谋》（译自英文，莫斯科1954年版）一书中写道，英人认为古利亚布·辛加是“其实行扩张意图的可靠工具”（第22页）。

〔13〕斯特拉契：《西藏西部的自然地理》，伦敦1854年版。

〔14〕居涅尔：《西藏地舆志》，第60页。

〔15〕这是由于当时有一名藏官阴谋策划，想借英人之助，使西藏脱离中国，以致西藏境内多次发生严重骚乱迹象引起的。

〔16〕苏联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17〕英国外交部史料组第70号袖珍书《西藏》伦敦1920年版，第37页。

〔18〕1876年的烟台条约规定新开辟四个商埠和长江六个港口，供英人贸易；规定英人在云南的最优惠条款和有权派遣考察团前往西藏。

〔19〕桑得堡（G.Sandborg）：《西藏侦察记》，伦敦1904年版，第153页。

〔20〕《泰晤士报》，1885年10月10日。

〔21〕《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第21册，1886年版，第223—224页。

〔22〕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北京1951年版，第5页。

〔23〕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北京1951年版，第5页。

〔24〕《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议事录》，第19卷，伦敦1875年版。

〔25〕《东印度（铁道）行政报告……》，伦敦1908年版。

〔26〕《泰晤士报》说到必须有象哲孟雄这样的前进基地时写道：“如果想在已经觉醒的中国取得优势地位，我们就需要能够控制通往这个国家的各种冲要道路。”（1885年10月15日）

〔27〕《马恩全集》，第9卷，第311页。

〔28〕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29〕谢刚：“十九世纪末叶西藏民族的反帝斗争”，载《大公报》副刊—《史学周刊》，第78期，1952年7月10日。

〔30〕例如，1904年7—10月一期的《帝国与亚洲评论》季刊即直书不讳地说这个“使节”必须到拉萨去（第28—43页）。

〔31〕1904年2月，印度事务部副大臣埃尔在议会斥责西藏人民1888年的抵抗运动时倒说了一些老实话，他说，英国政府派遣使节去西藏的意图，竟使“藏人得到组织防御的借口”。

〔32〕胡如雷："英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锡金事件'"，载《光明日报》，1953年7月25日。

〔3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53。

〔34〕有些史料证明，清廷为了废除派遣使节的规定"所付代价"，不仅是允许扩大印藏贸易，而且还同意断绝缅甸对中国的藩属关系。

〔35〕俄国学者米纳耶夫（N.U.MhHaob）于1886年写道："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开放门户。带着货物的商贩将从两个方面混入中国，其一是从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来，另一是从东京溯红河而上。还有从印度、从阿萨姆来的不速之客，他们时时窥探升堂入室的道路，强行混进西藏这个谜一般的佛教世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资料）。

〔36〕《泰晤士报》，1888年3月9日。

〔37〕印度参谋部机关报《先锋报》说到与这个"使节"有关的一些阴谋时，竟在该报的一篇论文里公开叫嚣即将占领春丕谷。

〔38〕《泰晤士报》，1888年3月9日。

〔39〕关于西藏地方军队已自龙头山撤退一事，英国当局曾于是年3月2日报告国会（《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324卷，第192页）。

〔40〕《泰晤士报》，1888年3月30日。

〔41〕谢刚："十九世纪末叶西藏民族的反帝斗争"，《大公报》副刊——《史学周刊》，第78期。

〔42〕胡如雷："英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锡金事件'"，载《光明日报》，1953年7月25日。

〔43〕《泰晤士报》，1888年6月15日。

〔44〕荣赫鹏：《印度边界上的战争》，圣彼得堡1889年版第29页。

〔45〕《泰晤士报》，1888年8月24日。

〔46〕《泰晤士报》，1888年8月24日。有些史料所举出的数字比这更大（18,000—30,000人）。

〔47〕谢刚："十九世纪末叶西藏民族的反帝斗争"，《大公报》副刊一《史学周刊》，第78期。

〔48〕《有关西藏的文件》，伦敦1904年版，第4—5页。

〔49〕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圣彼得堡1906年俄文版，第80页。

〔50〕哲孟雄人对占领军的抵抗，迫使英国当局经常要派遣武装部队到这个小国的各地进行"讨伐"。当英国当局试图驱策哲孟雄王帮助英人进军攻打西藏时，哲王即以哲孟雄向系西藏藩属为由，断然拒绝，并不与已抵哲境的印度总督举行谈判，就逃到西藏去了。

〔51〕《泰晤士报》，1888年10月5日。

〔52〕列宁：《帝国主义笔记》，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33年版，第597页。

〔53〕《有关西藏的文件》，伦敦1904年版，第4—5页。

〔54〕《有关西藏的文件》，伦敦1904年版，第4—5页。

〔55〕该约的英文原文可参看《有关西藏的文件》，第6—7页。

〔56〕该约的英文原文可参看《有关西藏的文件》，第7页。

〔57〕《泰晤士报》，1890年3月28日。

〔58〕英人没有允许特意前来大吉岭谈判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沙塔参加这次的谈判。

〔59〕英方提案的详情可参看《有关西藏的文件》，第9—10页。

〔60〕《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0页。

〔61〕同上，第11页。

〔62〕同上，第13页。

〔63〕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64〕李顿：《川北旅行记》，上海1892年版。

〔65〕居涅尔：《西藏地舆志》，第2部第2版，第71—72页。

〔66〕“担”系中国衡量单位，等于60.5公斤。

〔67〕沙金特（A.Sargent）：《中英商业和外交》，牛津1907年版，第271页。

〔68〕大吉岭谈判刚一开始，英国政府即声称“茶叶贸易问题是使谈判获得满意结果的最大障碍”。

〔69〕《有关西藏的文件》，第20页。

〔70〕此项续约的英文原文可参看《有关西藏的文件》，第22—23页。

〔71〕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第134页。

〔72〕清廷对英国当局的投降政策，使青年的达赖十三（生于1876年）顿萌西藏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索取更多权力的念头，他后来的分立倾向就是这种念头导来的。

〔73〕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125页。

〔74〕罗克希尔：《1891年和1892年旅行蒙藏日记》，华盛顿1894年版。

〔75〕罗克希尔：《喇嘛之乡》，纽约1891年版，第86—89页，第116页和11页。

〔76〕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第135页。

〔77〕《泰晤士报》，1894年5月4日。

〔78〕英国《国会文件》中国部分，1884年，第2号。

〔79〕《英国驻成都总领事霍集旅行藏东边境报告》，伦敦，1905年版，第79—80页。

〔80〕同上，第80页。

〔81〕《俄国地理学会汇报》，1902年，第38卷，第4期，

第448页。

〔82〕西藏银币的行情不以银价跌落而变动；因此，在这几年之内，西藏内地市场的物价也无甚变动。

〔83〕《有关西藏的文件》，第95页。

〔84〕《金融和工商业通报》，1900年9月，第37期，第524页。

〔85〕1895年，英国对外贸易额为6亿8千万英磅。

〔86〕居涅尔：《西藏地舆志》，第2部，第2版，第81页。

〔87〕《有关西藏的文件》，第51—52页。

〔88〕《大百科全书》，第4卷，"大不列颠"条，圣彼得堡1903年版。

〔89〕维斯宁：《不列颠联合王国和英人的商业利益》，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37页。

〔90〕沙金特：《中英商业和外交》，第251页。

〔91〕魏子初：《英国在华企业及其利润》(疑系魏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三联，1951年版—译者)，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页。

〔92〕《金融和工商业通报》，1900年9月，第37期，第524页。

〔93〕《英领印度贸易表册》，第22册，伦敦1902年版，第110页。

〔94〕居涅尔：《西藏地舆志》，第2部，第2版，第132页，第8附注。打箭炉(康定)系西藏与中国本部货物交易的主主要城市。

〔95〕盎斯系衡量，等于俄国药剂重量的29.86克，等于英国药剂重量的28·85克。

〔96〕居涅尔：《西藏地舆志》，第2部，第2版，第132页，第6附注。运到重庆的麝香绝大多数是由西藏来的。

〔97〕同上，第5页。

〔98〕《俄国地理学会汇报》，1902年，第38卷，第4期，第448页。

〔99〕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西藏圣地》，彼得格勒1919年版，第163页。

〔100〕居涅尔：《西藏地舆志》，第2部，第2版，第132页。

〔101〕同上，第33—39页。

〔102〕英国驻哲孟雄政治专员怀特（White）在致其首长的报告中写道“商埠应立即向北面，向西藏内部的谷地移动，因为那里的范围更大，更有扩张的余地”（《有关西藏的文件》，第28—30页）。

〔103〕1885年6月25日印度政府写给伦敦方面的信（《有关西藏的文件》，第24页）。

〔104〕1895年11月24日诺兰（Nolan）的报告（《有关西藏的文件》，第55页）。

〔105〕《有关西藏的文件》，第37—38页。

〔106〕怀特写道，“春丕谷居民满怀敌意，正竭尽全力使条约不能生效”（《有关西藏的文件》，第30页，附件二）。

〔107〕《有关西藏的文件》，第44页，附件4；第56页，附件2。

〔108〕《有关西藏的文件》，第52页，第16号。

〔109〕同上，第58—59页。

〔110〕同上，第73页，第24号。

〔111〕早在1895年12月，孟加拉当局即已提请用武力摧毁西藏人民的顽强抵抗。

〔112〕《关于1896年—1905年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集》，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299页。

〔113〕1898年8月，俄国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从喀什噶尔

发来报告，谓英人对“中国—坎巨提—克什米尔边界地区”又有新的阴谋。当时，英军驻在这个地区以内的共有27，500余人。

〔114〕《有关西藏的文件》，第74页，第25号。

〔115〕《有关西藏的文件》，第74页，第26号。

〔116〕同上，第99页，第27号。

〔117〕同上，第120页，第27号。这说明在英国统治集团的心目中，中国之于西藏已经是一个外国了。

〔118〕《关于中国事务通信续集》，第1集，伦敦1900年3月版，第13页，第17号函。

〔119〕同上，第38页，第42号函的附件二。

〔120〕他们在报告当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占有这些地区的巨大意义。英国武官写道：“乍一看来，这个地区好象比中国其余各地要贫瘠一些，但实际却恰恰相反：长江流域的土地比大清帝国其他各处的土地都要富饶得多。”他反复提到西藏邻省的丰富物产和西藏本部的原料资源。

〔121〕在19世纪最后的12年间，由于各国的群起角逐，英国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地位极其动摇不定。俄国、法国和德国均对北京政府有很大的影响，美国驻华官员也甚为活跃。诚然，英帝国主义仍在中国保有坚强的阵地。英国最重要的的“利益”范围是上海和长江一带。1894年的中日战争，为远东国际关系的发展和瓜分中国为各自垄断的“势力范围”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122〕大家知道，90年代之际，印度西北边境的起义运动接踵而起。为了镇压这种起义，英国当局须随时准备讨伐。如1891年，1892年，1894年，1895年，1897年均曾为此兴师动众。1897年秋，加尔各答爆发伊斯兰教徒的起义，不久即蔓延到全国各地。1898年年中，兴都库什部落之中掀起很厉害

的骚扰；斯瓦特河流域等处的动乱也几乎是与此同时发生的。

前面已经提到席卷中国几个省区，并以“长江暴动”闻名于世的多次农民骚动。激起骚动的原因之一是辟重庆为商埠，为外人深入中国内地大地敞开了门户。长江流域是英国资本大利所在的“范围”。起义遍及安徽、江苏、湖南、四川等省，随后又蔓延到甘肃和新疆。

缅甸人民不断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英国的政策越来越引起尼泊尔、不丹、克什米尔、哲孟雄等处的人民，以及住在中国周沿、深受英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许多亚洲小部落的深刻不满。

〔123〕由于中国和欧洲的陆路贸易均须假手英人，这就成了美国资本获得额外收入的一大财源。

〔124〕《红色档案》杂志，1926年，第19卷，第55页。

〔125〕《新时代报》，1889年，第4837号。

〔126〕《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1891年版，第43册。这个报告作于1884年，但俄国到后来才知道它的内容。

〔127〕同上，第44册。

〔128〕《印度防务的帝国规模》，载《英国皇家公益联合报告书》，第154卷。

〔129〕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130〕见谢明尼科夫著《沙皇制度内幕》，列宁格勒1952年版，绪论第24页。

〔131〕《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第72册，1898年版，第57页。

〔132〕《帝国与亚洲评论季刊和东方与殖民地纪事》，1893年7月号。

〔133〕《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5—196页。

〔134〕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西藏圣地》，彼得格勒1919年版，第186页。

〔135〕河口慧海：《旅藏三年记》，1909年版，第297—298页。

〔136〕俄国著名亚洲探险家科兹洛夫，在定期考察中国期间，曾从护送商队的藏人方面获悉英国武装部队于1900年春天即在西藏境内发动过一次这样的挑衅。

〔137〕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138〕《红色档案》杂志，1926年，第14卷，第23页。

〔139〕1904年的英法协约签订之后，英国始完全从"光荣孤立"中"脱退出来"。

〔140〕关于英日同盟，可参看加尔彼林著的《1902—1921年的英日同盟》（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47年版）和《英日关系史》。

〔141〕"信守与国家生存的问题"，载《双周评论》，1905年1月号。

〔142〕《外交史》，第2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45年版，第127页。

〔143〕印人阿赫麦德·沙赫(Ahmad Shah)于1897年自藏回印，他在自己著的《旅藏四年记》（柏纳里斯1906年版，第73页）中写道，西藏人民认为与英领印度为邻是"其安全受到威胁的唯一源泉"。

〔144〕《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22页，第38号。

〔145〕同上，第126页。

〔146〕寇仁："腹背受敌的印度"载《十九世纪》杂志，1893年8月号。

〔147〕外壕掩蔽堤是堡垒外壕前面的凸出部分，在出击或反攻敌人阵地之前，可以借其掩护集结有生力量。

〔148〕列宁：《帝国主义笔记》，1939年版，第393页。

〔149〕英国作家均称1903年入侵西藏的侵略军为“使节”。

〔150〕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39页。

〔151〕《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32卷，第496页。

〔152〕《泰晤士报》，1903年1月23日。

〔153〕《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27卷，第847—848页。

〔154〕不仅修建铁路，即养护经哲孟雄至西藏的各条公路也所费甚巨。例如，1902年10月间，通过齐斯特河河谷的一段公路为大雨所冲毁，单是修复这条冲坏的公路，即需250,000余卢比。

〔155〕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156〕《红色档案》杂志，1926年，第18卷，第16—17页。

〔157〕《红色档案》杂志，1926年，第18卷，第5页。

〔158〕《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30页，第45号。

〔159〕同上，第131页。

〔160〕同上，第136—137页。

〔161〕同上，第139页。

〔162〕为了确实证明这一点，可以征引几个英国要人的意见。雷沙赫区的专员英人诺兰（No lan）早在1898年12月即已写道，边界刚刚只能到藏人所指定的那个地方。“他们肯定中国官员早于1795年即在甲冈、东结拉竖立界标，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一直经心保护这些界标，并曾记入土地册籍。除此以外，他们尚可以他们与哲孟雄牧人商得的协议和竖在甲冈的石碑碑文作证”（见《有关西藏的文件》，第80页）。另一英国官员库宁汉写道：“冲突的经过旨在证明藏人对甲冈地区确有权利；要否认这些权利，那不仅是笨拙的，而且是不公平的”（见《有关西藏的文件》，第58页）。

〔163〕《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68页，附件2。

〔164〕同上，第141页，第51号。

〔165〕《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67—170页。

〔166〕同上，第168页。

〔167〕《中国时报》，1902年7月18日；《有关西藏的文件》，第49号，第140页。

〔168〕这个声明的真实性，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官员列萨尔于1902年12月2日发往彼得堡的一封密电可以证明。列萨尔除报告英人在西藏肆行无忌，派怀特率军入侵，以及中国当局的抗议外，并且表示自己的意见说，俄国最好与中国人采取这样的一种共同行动，借此也许能维持西藏的原状……但在当前的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未必能够达成而已（见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从这段电文可以得出结论说，俄国统治集团鉴于英国攫夺西藏和有关攫夺西藏的行动对俄国利益的威胁，只能希望与中国采取共同行动，反对英国对西藏的侵略活动。

〔169〕《马恩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2部，第268页。

〔170〕《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50—156页，第66号。

〔171〕《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54页。

〔172〕《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56页。

〔173〕达斯·塔拉纳特：《英国在西藏的扩张》，加尔各答1927年版，第58页。

〔174〕《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85页，第78号。

〔175〕同上。

〔176〕《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85页，第78号。

〔177〕同上，第188页，第84号。

〔178〕同上。

〔179〕同上，第187页，第83号。

〔180〕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档案。

〔181〕《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05年，第125页。

〔182〕《有关西藏的文件》，第213页，第120号。

〔183〕《有关西藏的文件》，第218页。

〔184〕1903—1904年的武装侵略实际耗费1，000，000英镑左右。

〔185〕《泰晤士报》，1903年11月20日；《有关西藏的文件》，第158页。

〔186〕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63页。

〔187〕《有关西藏的文件》，第294页，第132号。

〔188〕西藏有两种军队：一种是清廷的驻防军，人数不多，实际是驻藏大臣的卫队；一种是西藏地方的民兵，员额共3，000人。表面上，清廷驻藏大臣是这两种军队的统帅，究其实，西藏地方部队均由藏族军官指挥。由于清廷驻防军人数过少，无力保障中国的边疆西藏地方免于外敌的侵袭，所以保卫国土的责任仍由西藏地方部队承担。

〔189〕《泰晤士报》，1903年7月25日。

〔190〕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64页。

〔191〕《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34卷，第1167页。

〔192〕《新时代报》，1903年11月27日（12月10日）。

〔193〕《有关西藏的文件》，第309页，第165号。

〔194〕《新时代报》，1903年7月2日（15日）。

〔195〕《俄罗斯荣军报》，1903年11月14日。

〔196〕《东亚航运保险协会会报》，1903年，第5期。

〔197〕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198〕1904年春，英国驻华公使曾要求中国政府，准许英国指派官员一名，常川、驻南京，管理长江流域事务（见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199〕《先锋报》，1903年10月10日。

〔200〕《印度时报》，1903年11月5日。

〔201〕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202〕《霍集旅行藏东边境报告》，1905年8月。

〔203〕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204〕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9页。

〔205〕《新时代报》，1904年1月27日（2月9日）。

〔206〕多布罗夫：《美国在日俄战争时期的远东政策》，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2年版，第141页。

〔207〕关于这次侵略的经过，英国皇家公益联合会在该会1905年6月的报告书中刊有一篇简短的具有军事专门性质的报导。

〔208〕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67页。

〔209〕《新时代报》，1904年1月8日（21日）。

〔210〕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122页。

〔211〕坎德勒：《拉萨气象》伦敦，1905年版，第109页。

〔212〕《俄罗斯时报》，1904年3月26日。

〔213〕《新时代报》，1984年3月20日（4月2日）。

〔214〕坎德勒：《拉萨气象》，第111页。

〔215〕《俄罗斯荣军报》，1904年，第68期。

〔216〕《俄罗斯时报》，1904年，第85期。

〔217〕同上。

〔218〕西藏保卫者的这支人数不多、装备窳劣的部队之所以能够坚强抵抗英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善于利用妨阻英军前进的西藏自然条件。

〔219〕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154—156页。

〔220〕干涉军的指挥官均曾熟读象《印度国境上的战斗》这一类的“书籍”。据作者自述，这本书是在印度国境上作

战的方法概要。书中写道："出征的目标是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如果不能与敌人在战场上遭遇，那就必须对敌人最重要和最富庶的地区实行破坏，以没收牲畜、践踏禾苗、烧毁房屋等等，加倍报复敌人顽抗的罪恶……要进行这样的出征，就应当选择气候条件最适宜于英国士兵，并且可以推想谷物尚未收割，牲畜正在四野牧放的季节。"（见荣赫鹏著《印度边界上的战斗》，俄文版，第23页）

〔221〕《有关西藏的文件》，第230—233页。

〔222〕《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05年，第125页。

〔223〕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185页。

〔224〕《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33卷，1904年4月13日。

〔225〕《新时代报》，1904年4月6日（19日）。

〔226〕《旁观者》周刊，1904年2月13日，第247页。

〔227〕《泰晤士报》，1904年5月9日。

〔228〕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报，第191页。

〔229〕关于这次战斗的详情，可参阅奥特雷著（W。Ottly）：《随着骑马的步兵出征西藏》伦敦，1906年。

〔230〕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191页。

〔231〕《新时代报》，1904年5月4日（17日）。

〔232〕《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35卷，第18页。

〔233〕《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35卷，第18页。

〔234〕《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05年，第159页，第145号。

〔235〕目击这次战役的瓦德尔写道："在这次会战期间，西藏人的果敢、骁勇和防察手段……都应该使那些说西藏人似乎不能打仗的荒谬误解，永远消除干净。他们的骁勇是无与伦比的。虽然他们多半只配有不合用的陈旧武器……但他们却在工事附近利用掩蔽，打得非常出色。当他们一行15人，骑着黑色的骡子，在40名步兵的护送下，从要塞冲出援救其困在

帕拉村的兄弟，遭到弹如雨下的迎击，几致全部牺牲的时候，西藏士兵所表现的那种极大的个人骁勇，真是难于形容的”。（《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193页）。

〔236〕《泰晤士报》，1904年6月10日。

〔237〕同上。

〔238〕《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05年，第22页，第66号，

〔239〕《域外东方》杂志，1933年，第3—4期，第131页。

〔240〕达斯·塔拉纳特：《英国在西藏的扩张》，第55页。

〔241〕《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40卷，第11页。

〔242〕《泰晤士报》，1904年8月12日。

〔243〕《有关西藏的 文 件 续 编》，1905年，第209页，第240号。

〔244〕《泰晤士报》，1904年9月2日。

〔245〕同上，1904年8月10日。

〔246〕《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05年，第139页，第92件。

〔247〕《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05年，第43页，第107号。

〔248〕同上，第51页，第127号，

〔249〕同上，第54页，第134号。

〔250〕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档案。

〔251〕英文原文可参看：《有关西藏的 文 件 续 编》，1910年，第1—2页。

〔252〕西藏每年的现金收入数额等于127,000银两（约合250,000银卢布）。除此以外，札什伦布区还纳86,900两的实物租税。

〔25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9月 第一版，第593页。

〔254〕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汉文版第2卷，第591—625页）一文中，详细说明帝国

主义列强采取各种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255〕《新时代报》1903年12月6日（19日）。

〔256〕同上，1904年5月8日（21日）。

〔257〕《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37卷，第1204页。

〔258〕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259〕《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05年，第271—272页。

〔26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第一版，第180页。

〔261〕《泰晤士报》，1904年6月17日。

〔262〕《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39页，第268页。

〔263〕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11页。

〔264〕瓦德尔证实西藏士兵武器简陋时写道，英军死亡人数不多，主要是由于藏军枪上的引火线在战斗的时候被雨水淋湿或被大风吹灭所致（见瓦德尔：《拉萨和拉萨的秘密》，俄文版，第198页）。

〔265〕科兹洛夫：《西藏和达赖喇嘛》，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82页。

〔266〕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267〕同上。

〔268〕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269〕《新时代报》，1904年9月27日（10月10日）。

〔270〕关于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可参看：《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第58页，第141号和第64页，第153号。

〔271〕《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05年，第68页，第169号。同上，第241页，第306号。

〔272〕同上，第266页，第350号。

〔273〕由印度通往噶大克的道路共有三条，英人早就计划

要利用这几条路与中国和俄国土耳克斯坦进行贸易。

〔274〕《新时代报》，1904年9月8日(21日)。

〔275〕《泰晤士报》，1904年10月14日。

〔276〕《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41卷，第3页。

〔277〕《泰晤士报》，1904年10月14日。

〔278〕《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41卷，第306页。许多议员指责布罗德里克把这次远征实际花去军费的数字大大地缩小了。

〔279〕同上，第140卷，第459页。

〔280〕1904年5月，《新时代》报写道：麦克唐纳将军和荣赫鹏上校遇有机会就要强迫执拗的达赖喇嘛作出使英国完全满意的让步，签署束缚自己手足的条约，保证英国能在西藏树立优势。英领印度的政治家深信，这种优势只能由英国独享，其他任何国家不能染指。

〔281〕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282〕《甘露市场报》，1903年11月28日。

〔283〕《新时代报》，1904年12月17日（30日）。

〔284〕同上，1904年5月1日（14日）。

〔285〕《泰晤士报》，1904年6月12日。

〔286〕《新时代报》，1904年8月11日（24日）。

〔287〕《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30卷，第1132页。

〔288〕《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33卷，第117页。

〔289〕同上，第140卷，第464页。

〔290〕《俄罗斯时报》，1904年4月4日。

〔291〕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292〕《新时代报》，1904年5月23日（6月5日）。

〔293〕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294〕《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41卷，关于1905年2月14

目的辩论。

〔295〕同上，第141卷，第134—135页。

〔296〕他们不同意从中国收取强加于西藏的赔款，拒绝与中国政府商讨关于在西藏境内开辟商埠的问题。

〔297〕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298〕同上。

〔299〕《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10年，第20页，第26号。

〔300〕同上，第41页。

〔301〕《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10年，第18页。

〔302〕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303〕窦赐孟：《一个领事官的游记》，1922年，第20页。

〔304〕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305〕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306〕《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10年，第25—26页，第39号。

〔307〕同上，第25—26页。

〔308〕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309〕英文原文可参看《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10年，第51页。

〔310〕国立中央军事历史档案库档案。

〔311〕《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58卷，第372页。

〔312〕《新时代报》，1906年4月16日（29日）。

〔313〕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314〕同上。

〔315〕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316〕同上。虽然此种约束并不涉及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地方当局的联系，但该款条文却着重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和英国在西藏并无特殊权益。

〔317〕同上。

〔318〕同上。

〔319〕同上。

〔320〕同上。

〔321〕列宁：《帝国主义笔记》，俄文版，第621页。

〔322〕英俄同盟涉及西藏的条文可参看国际条约总编。

〔323〕在条约签定之后，俄国政府经由其驻北京的外交官员波科齐洛夫向中国政府提出相应的照会，说明该约可保障中国的利益，完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对此，北京政府曾复照表示谢意（见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324〕《新时代报》，1904年9月12日（25日）。

〔325〕《英国国会辩论报告》，第183卷，关于1908年2月英国国会在英王发表敕语之后举行的辩论。

〔326〕同上，第184卷，第492页和554页。

〔327〕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328〕1907年11月，俄国驻华外交官员关于德恩提出的通商章程草案这样写道：英国的提案显然是按照中国方面的提案，本着和解的精神拟定的（见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库档案）。

〔329〕《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1910年，第75页。

〔330〕同上，第119页，第196号，第3节。

《有关西藏的文件续编》第145页，第231号。

〔331〕参考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144页。—译者。

〔332〕《泰晤士报》，1908年6月12日。

〔333〕1908年3月，张荫棠将英军自春丕谷撤退的情形电告北京。1907年夏，英军驻在西藏的尚有旁遮普第62团的8个连的兵力。

# 美国、西藏与中国

（美）N·C·霍尔 著　成军 译

**编者按**：本文回顾了自清末以来美国人进藏从事阴谋活动的历史。着重叙述了美国人自二战以来卷入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以及历届美国政府对西藏政策的变化与原因。译自《西藏评论》1978年1月号。

1972年中美签订的上海公报，是两国关系转折的标志。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公开的政治对抗之后，以"和谈"和"武装冲突的消失"为主要特色的新时期的基础已奠定。公报本身是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互相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建立新关系的肯定。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互不干涉内政。美国接受中国的这些原则，最起码地引起了人们对美台关系前途的注意，而美国介入中国的另一部分的又一章最后悄悄地消失了。

美国对外政策导致了偷偷摸摸地训练并供应西藏康巴人同驻西藏自治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公开的游击战，美国

这个很少被人知晓的这一章成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障碍。显然，对中国国内事务的这一干预必须解决，达到美国和中国都不感到为难地步为止。因而，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给康巴人的后勤支援就停止了。这无疑是同中国进行成功的高层会议的先决条件。

美国介入西藏游击战系历史的最新插曲之一，它可追溯到清朝末年。美国在其介入和处理西藏事务的历史上，虽然一向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有时又把西藏视作一个自治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态度同把中国人和西藏人的愿望均置之度外的美国政策一起，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和中藏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官方政府一级介入西藏并非常事，而有时介入西藏及其周围也得服从于更大的美国对中国政策。

但是，还有包括使者、科学考察以及其他无官职的平民等的美国非官方的介入西藏。这种人尽管为数不多，但不管其本人是否愿意，却充当了指导中美关系和中藏关系的重要的代理人。

美国早期介入西藏的历史，主要是科学探险和传教的历史，而这种直接的接触或是通过中国、英印政府和西藏政府进行的接触是不多的。可是，有许多例子证明：美国人在一些事件中以非官方的身份起到了促进中藏关系的作用。

第一个进藏的美国人叫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他是从中国由东部入藏的。洛克希尔曾是美国驻北京的博学的公使，在其逗留西藏四年期间尽力研究了西藏。洛克希尔通晓汉语，可以通过记载西藏情况的中国历史和文学著作直接

了解西藏。为了作旅行准备，他还开始学习藏语。经过这样准备之后，他于1838年辞去了外交职务，踏上了旅行的征途，其旅行的目的地是抵达西藏的首府拉萨。

这次他虽然没有能抵达拉萨，以后的历次尝试也没有成功，但是他踏遍了西藏东部和中国的边境地区，确定搜集了许多科学的和人物志方面的资料。况且，他是根据中国资料第一个写出有关中国和西藏关系的权威的著作的美国人。他的著作沿袭了西藏是宗主国中国属地的说法，虽然洛克希尔没有写明美国对西藏地位的立场，但可以肯定它是按中国的解释行事的，而他的著作还代表了美国对西藏地位的非官方主张。

1908年，洛克希尔再次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并在山西五台山同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了短暂的会见。在美国和西藏的首次官方接触中，据说为达赖喇嘛成功地返回拉萨并巩固其政权而寻求援助。十三世达赖是在此四年前，因英国人派荣赫鹏率远征军以武力逼迫西藏人谈判时逃离拉萨的。可是，据西藏政府文件所记载，达赖喇嘛是应中国政府之邀去谈判中藏边境争端的。同洛克希尔的会见，给达赖提供了探明美国支持西藏立场的机会。

不管会谈的实质是什么，达赖喇嘛从把西藏视作从属中国的美国那里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1903年1月8日，寇松勋爵说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纯属虚构”，“是一种互利的政治钟爱”，美国驻大不列颠大使约瑟夫·乔特（于1904年6月）在答复寇松的这一说法时，向英国提出：“对中国在西藏享有宗主权的驳斥是毫无根据的”。

虽然美国政府此时对西藏不太感兴趣，但是，在美国，

有那么一些私人团体和个人，对到西藏进行传教，或者到这块神密的地方进行研究和考察性的冒险，却颇感兴趣。一些美国人为达此目的进行精心研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

最著名的也许要推1904年派出的传教士新教徒艾伯特·L·谢尔顿博士。虽然谢尔顿向西藏人的传教工作局限于中国统治的居有藏族的边陲地区，他在中国人和西藏人中间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声誉，最后使他获得西藏地方当局的准许而去西藏旅行。

谢尔顿终于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评价。住在这动荡的边境地区的中国人和西藏人不时发现可利用谢尔顿设立的良好机构来调停纠纷。1916年在巴塘的中国官员就通过谢尔顿跟一伙西藏匪徒谈判。中国人之所以很需要他，一则由于他在西藏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二则由于他还精通藏汉两种语言。显然，由于中国人禁学藏文，在此情况下，翻译总是需要的。

两年之后，中国人再次邀谢尔顿帮忙，这次出面邀请的是军方。那时，西藏人和中国人正在边境公开交火。在1918年，后勤供应困难的中国受到西藏人的步步进逼。谢尔顿和他的传教同事美国人J·C·奥格顿一起代表中国驻巴塘的军队在敌对的人们中获取粮食。

在同西藏从外交上彻底解决问题之前，中国的刘文辉将军还请谢尔顿设法安排停火，鉴于谢尔顿仅仅充当没有谈判权的中间人，所以用谢尔顿自己的话说，他“只是想方设法把西藏人和中国人弄到一块，让他们按自己的条件谈去”。后在同一年（即1918年），谢尔顿的同事奥格顿同英国领事官埃里克·泰克曼一起起草了正式的临时停止敌对行动的和

平协定。

谢尔顿虽则起到了一个医生和中藏关系调停者的作用并取得了成功，而饶有兴味的是西藏人对基督教福音传道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积极反对”任何取代其传统佛教喇嘛教的企图。

谢尔顿博士及美国在前藏边境的传道历史未能善终。1922年谢尔顿在临近西藏边境的地方被西藏匪徒所杀。谢尔顿当时一直在那里等候渴望已久的赴拉萨的批准手续。要取得这种批准手续是个特殊待遇。由于他在(康区)前藏给藏兵伤员看过病，他满有信心得到批准。他还写信给达赖喇嘛商量，他去拉萨后将教几个年轻僧侣学西医。谢尔顿逝世之后不久，由于中国人统治的这个边境地区继续动荡，政局不稳，越来越危及了外国的传教活动，于是整个传教活动也就停止了。

美国在由东方入藏的道路被堵死之后，几乎在同时启用由南经喜马拉雅的通道进拉萨。威廉·M·麦戈文，是一位亚洲语言（包括汉语和藏语）学家和大乘佛教权威，在其《化装去拉萨》一书中谈到：尽管西藏政府和英印政府都不让他和其他西方人去西藏首府，他还是装扮成一个锡金家奴的样子到了拉萨。

麦戈文进拉萨时已弄得筋疲力尽，疾病缠身，他想向西藏政府官员暴露其真实身份。可巧他的心腹至交是一位落落大方，具有现代思想的亲西方官员，而且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纳姆根·查荣。麦戈文到达拉萨的消息传出之后，引起了由亲汉的拉萨僧侣领导的大骚动，当时，查荣敦请藏政府为保护外国人出来说些话。为确保其人身的安

全，麦戈文被禁锢了起来，（虽然他偶然化装跋步拉萨城）同时还取得了这样的谅解：一旦麦戈文完全恢复旅途的劳顿，他就离开西藏。

麦戈文根据其在拉萨呆的六个星期和1922～23年旅途往返的体验，认为迄至1912年西藏虽然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但目今却已经“取得独立”。作为一个美国人，在访问西藏之后，持有这种观点还是第一次，当然这并非最后一次。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政治形势，但是却和美国官方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的政策背道而驰。

1930年，这是在麦戈文擅自赴拉萨之行的大约七年之后，美国博物探险家苏衣德姆·卡廷被邀去拉萨，这是卡廷三次旅藏的首次。卡廷通过同达赖喇嘛适时的通信，包括通过互赠礼物而获得去藏的许可。卡廷和达赖成了密友，虽然十三世达赖于1933年去世，但卡廷先后于1935年和1937年又被邀赴藏。他的夫人陪他去了拉萨，成了第一个被官方邀去西藏首府的西方女性。

可是，卡廷不光起到科学考察者的作用。小罗威尔·托马斯曾说过，十三世达赖喇嘛“有时请求卡廷出使华盛顿，而这种使命可能会导致西藏和美国建立更直接的联系。”达赖喇嘛还向卡廷表示希望美国支持国际佛教事业，保护西藏的宗主权。很明显，卡廷和达赖喇嘛只是对有限的、个人的、非官方的接触表示满意，卡廷只是一个平民，不过受美国不承认也不准备承认的政府的委托讲讲话而已。要逾越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同西藏的接触，首先需要通过中国做工作，要服从于美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观点，特别在（1912～1950年）西藏事实上独立时期，虽然美国也许已

经发现中国的宗主权用处甚微，甚至是个障碍，但是，美国也知道同西藏进行任何官方的接触，会因此而改变西藏的地位，会严重影响到中美关系。

因此，美藏关系最初阶段之特色可以说是完全消极的，这个阶段要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藏之间的接触从没有达到引起中美关系纠纷的程度。可是，亲密的美藏关系的前提已经确立，这主要是为数不多的美国平民努力的结果，这些人是自愿这样做的，或者象谢尔顿和奥格顿有时应中国当局的请求行事的。这些人是继1908年洛克希尔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官方接触之后，包含在整个美国介入西藏的活动之中。

美国倾向于把西藏让给英国及其宗主国中国，实际上要做任何其他的安排亦无切实可行的基础。而同日本战争斡旋以及随之而来的事件需要有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同西藏的直接关系。

1942年，轴心国似乎将其全力倾注在中亚细亚，德国人从非洲推向了苏伊士运河，而日本通过印度支那和泰国威胁着印度。如果说轴心国完成了迂回包抄，那么对协约国来说西藏则具有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况且更急需予以考虑的是十分明显的同盟国在西藏的利益。在日本人占领缅甸，关闭缅甸公路之后，中国要维持对日持久作战也需要从印度寻找一条新的补给线路。

美国和中国认为建立一条经由西藏的背夫可行的陆路的可能性是值得加以探讨的（当时西藏摩托化运输是不可能的）。随之同拉萨的西藏政府进行了官方接触，对开辟贯通西藏的补给线的可能性直接进行了考察。

据认为，虽然这一赴藏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但由于去

拉萨的道路艰险，无法派遣外交使节。因此，在经过西藏政府批准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伊里亚·托尔斯泰上尉和布鲁克·多兰于1942年被派往拉萨。

托尔斯泰此行基本上具有双重目的。国务院希望跟西藏人建立友好关系，而山军部则想找一条陆上补给线路。托尔斯泰一行在西藏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在拉萨逗留了三个月之后，又绕道中国旅行。此行虽然进行顺利，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它却成了影响中美关系的间接的原因。

西藏作出的决定是反对经由其领土运输军用品。已从中国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的西藏主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守中立。西藏人还注意到补给道路的开通会使中国的影响卷土重来；他们和英国人都对美国人在西藏的扩张并不热心。

可是，中国对开辟通往西藏的道路特别热心，中国希望由此恢复在那里失去的影响。西藏的这种不妥协态度引起了蒋介石于1943年命令刘文辉将军和马步芳将军从中国的西南侵略西藏，当时马步芳接收的武器是美国援助用于抗日的武器中拨给的。然而马步芳没有经过真正的战斗，就和平地解决了其战争物资新来源。

前英印驻拉萨代表团长黎吉生在评论这一事件及其对中藏美关系可能带来的麻烦时说：

“1943年，中国对西藏的威胁已引人注目，美国驻重庆大使却认为中国威胁的危险被夸大了：由他们向中国人施加某些压力以免误用军事补给似乎是可能的，因为中国人必须依靠其盟国提供这种补给。鉴于拥有宗主权的已不能保证从其所谓的属地取得和平过道的权利，这一事件也许是促使美国政府对宗主权的性质加以反省的原因。”

很明显，中藏关系并不是可喜的，至少可以说，十分清楚，中国所说的宗主权很少有实际意义。事实上，美国政府在让托尔斯泰出使西藏时发现，它必须从西藏政府，而不是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许可，而这种外交上的交涉只能通过印度政府才能顺当地进行。

然而，托尔斯泰之行的结果表明：西藏补给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宗主权遇到的困境以及西藏保守中立，都暂时显得不怎么重要的了。美国陆军当局所作的形势分析提出了下列解释：

“虽然中国人声称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但西藏人对中国人持敌对态度，是会反对这一计划的。由于在西藏没有粮库，背夫必须背上自己的食粮。一个苦力从印度经西藏到中国旅途中所耗费的粮食比他背的东西还要多，故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当贯穿缅甸的雷多公路成了一条可作通往中国的道路的时候，为了避免进一步给其中国政策带来麻烦，美国能完全避开西藏独立和西藏中立的争端。

可是，很明显，托尔斯泰和多兰被说明赞成西藏独立的事业，他们向其上司暗示：美国应该绕过中国政府支持西藏。中国外交部抗议托尔斯泰和多兰“已答应美国支持西藏从中国独立的愿望。”虽然，这种允诺是不太可能的。美国再次向中国政府保证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同年（即1943年）美国拒绝了英国关于承认西藏可与其他国家交换外交代表的权利的建议，提出：

“美国政府铭记不忘中国政府早就公言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早就声言中国宪法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

分。对这两种声言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异议。”

尽管美国政府不时重申其有关西藏的中国政策未变，可是在大战期间继续把西藏作为似乎是独立的或中立的加以处理。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的事件，揭穿了美国事实上是承认西藏独立的，而美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不过是一纸空言。而美国的政策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以利战后东亚的友谊和稳定，需要维护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中华民国自1912年以来虽从未控制过西藏，但它们主张维持满清帝国统治的地位。这样，美国虽有承认西藏独立的机会，并帮助实际存在的政治局势合法化，可是，这种选择一直从未认真地加以考虑，因而有意加以回避。

尽管美国持此种官方态度，但尚有理由认为，美国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行动（如托尔斯泰的行动），至少起到了使西藏人相信美国对西藏独立的暗中支持。托尔斯泰和多兰的个人同情也使西藏政府官员误认为是美国政府对西藏的官方支持。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之间在西藏问题上似乎发生分歧，并已影响美国对西藏事业的看法。

虽然国务院对维持同西藏的友好关系至少在名义上是感兴趣的，但它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对于中国政府的意见比战略情报局更留意。结果，当国务院获悉西藏政府需要一个远距离广播设备时，它拒绝加以考虑，其理由是中国无法控制广播设备的使用，因此会给中藏关系增添麻烦，因而影响到中美关系。

而美国战略情报局不同意国务院的立场，似乎更倾向于支持西藏。美国战略情报局急于巩固托尔斯泰之行建立起来

的立足点，部分地出于对西藏人的好客表示感谢，它不顾官方的反对，于1943年下半年设法送去一套无线电转播设备。同年11月30日，一架运送援助物资的美国空军飞机在拉萨附近坠毁，机组人员全部死亡。事件证明：从美国观点看，这一事件对西藏的影响是好的，对西藏人来说，电台是他们寻找支持的标志。

美国和西藏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为西藏政府谋求对其实际上的独立获得法律上的承认的过晚的企图，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1946年5月31日，一个西藏亲善代表团带着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信件和礼物拜访了美国驻新德里大使。这是为了巩固西藏和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正式拜会，但是，在讨论美官员访问拉萨的提议时，美国务卿艾奇逊回答说，（美国）同西藏人的友谊是好的，但美国官员的访问会使西藏人和中国人引起误解。

西藏人很快认识到，为使国际上承认其政治独立地位，他们必须给外界留下这么个印象：它与附属于宗主国的属地是有所不同的。1947年10月，在藏政府深谋远虑的财政部长孜本·夏格巴的指导下，派出了一个商务代表团去中国、印度、美国和英国。该商务代表团表面上想建立起贸易关系并获得金银通货以支持他的货币，而实际上代表团最迫切的目标是想在国际上获得对西藏独立的承认。

1948年初，商务代表团在美国呆了四个月之后，再次集中研究了西藏从宗主国中国获得独立的问题，西藏人拒绝使用中国护照，而美国则发给了他们特别签证，这种签订只发给美国还没有承认的国家的公民。此外，西藏人显然不要中国人任何帮助，也不要中国人参加，由他们自己同美国缔结

协定。中国人提出了抗议，提出如果让西藏人这样取得独立的地位，这就会使内政造成严重的困难。国民党中国政府对整个事件特别关切，它一再得到美国的保证：美国对中国和西藏的立场没有变，也决不会变。

不久，在对待西藏人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来了，（西藏）代表团表示希望谒见杜鲁门，而中国顾问坚持认为谒见时他应在场，而美国对此表示了同意。为了不再屈从于中国的宗主权，西藏人只好决定不见总统。

西藏人受了挫折，他们未能获得在法律上承认其事实上的独立（美国对西藏事实上的独立是确认的，从没有怀疑过），而只是在让美国不再继续作中国对西藏享有法律上的权利的保证方面取得成功。况且，这种法律上的权利被神密地由宗主权变成了主权，这意味着在政治上更依附于中国。

可是，西藏没有和美国断绝关系。1949年，夏格巴劝说藏政府允许广播员罗威尔·托马斯父子访问拉萨。据小罗威尔·托马斯说，他们之所以受邀，不仅由于他们可宣传西藏是独立的，并想继续保持独立，而且还因为西藏害怕中共而寻求美国的保护。他们和以前到过西藏的美国人离开西藏时深信西藏是独立的一样，但是这次他们还认为西藏若要保持独立则需要外国的军援。

西藏官员请求托马斯父子想办法弄清一旦西藏遭到中共的进攻时，美国能否给予援助。托马斯父子对西藏独立事业作了许多同情宣传，并尽力劝说美国官员去保护西藏。而他们所得到的答复却是：美国要是给了西藏军援，美国就要对支持西藏独立负责，由于政治上的和后勤方面的原因，这是美国所不愿干的事情。

虽然托马斯父子不得不承认他们寻找美国官方支持的失败，但他们仍被北京的中共政府视作干涉内政的帝国主义分子，称小托马斯是华盛顿派遣的“在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高级特务”。当然，无论从共产党中国人的观点和国民党中国人的观点看，都是把托马斯先是在西藏悄悄地“鼓动”，后在西方大肆鼓吹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行动，看作是彻头彻尾的阴谋活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不仅把西藏并入了中国这个“祖国”，而且官方还提出指责：“……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渗入了西藏；所谓的1949年独立宣言是由英国特务和美国特务策划的，实际上西藏人渴望而且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摆脱外国的羁绊。”

在西藏人接连不断地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萨瓦尔多于1950年11月20日向联合国之提案被否决之后，美国政府作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萨尔瓦多“结束外国势力侵略西藏”的提案，说他支持印度的立场，并认为在该地区的有势力集团作出和平解决的保证已为时不远了，当时美国在表面上是不介入中藏事务的。

可是美国代表在加尔各答非正式地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长兄当采仁波且进行了会谈。达赖喇嘛授权给其兄同外国签订秘密协定。达赖喇嘛在靠印度边境的亚东等侯进一步发展的消息，以决定是回到拉萨和中国人共事呢，还是逃往印度？据此还制定了一个计划，说如果达赖喇嘛在西藏或在抵达印度之后公开谴责“解放西藏的十七点协议”时，那末美国就应在联合国支持西藏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给西藏提供财政援助（后又讨论了军援）。可是，达赖喇嘛被在拉萨

几大寺的有势力集团劝回了拉萨，该计划完全落了空。

美国对西藏的这种尝试性的支持，除了起了为反对可以看得见中国共产主义威胁需要保持亚洲之声外，还是否有其他用处，是值得怀疑的，西藏是否独立，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美国官方仍然承认中国有关西藏的说法，不管是国民党中国人对西藏的说法，还是共产党中国人对西藏的说法。何况通过印度同西藏进行小额贸易，没有必要使政府直接介入西藏。西藏出口到美国的主要仅限于牦牛尾巴和羊毛（作圣诞老人的胡须和织车毯用），对美国人来说没有多大用处，但美国买走了西藏所出口羊毛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在中共进入西藏时，美国经济参赞打电报给在北印度的西藏贸易中心噶伦堡，通知西藏商人说：为了按不和任何共产党国家及其卫星国贸易的政策行事，美国将停止所有同西藏的贸易（过去一直是转手贸易）。这对西藏来说显然是个经济灾难。这十分清楚地表明：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考虑西藏及其独立问题，均从属于美国整个对华外交政策的。

当时，官方把西藏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在1956年初在西藏康区发生武装反抗，再次促使美国人非正式地介入西藏时，美国对西藏独立仍不太感兴趣，可是为了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考虑了某些干涉形式。

在此前一年，康巴领导人拉普加·彭达桑同美国的一个代表进行了非正式的密谈，彭达桑是可望组织大规模反华叛乱的有势的康巴领导人。在密谈中充当翻译的乔治·帕特逊自称，这个代表团的代表是要寻找叛乱所需的援助，看美国能给多少。美国要彭达桑确信美国的同情，但要他先向印度寻找援助，即使从印度那里得到援助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在

西方正式承认西藏独立之前，首先要印度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对西藏独立的主张表示支持。彭达桑还被告知，假如西方首先承认一个独立的西藏，那将和共产主义集团相对抗，这样也会使西藏丧失独立机会。因此，彭达桑没有得到比表示最起码的同情更多的东西；而美国再次避免直接支持西藏独立，以确保维持与台湾的良好关系。

1956年，在康区爆发的战斗很明显地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其有关西藏的政策。美国和台湾的国民党中国人在获悉西藏内部存在武装反抗的消息之后，他们开始确信有给西藏游击战提供某些支持的可能性。

就美国来说，它决定由中央情报局来给予这种援助。戴维·怀斯在评论这一事变时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官员被中国人对西藏的压迫弄得焦虑不安，但却爱莫能助。可是，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在游击战爆发时，断定局势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想的机会；情报局将以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秘密援助的办法来袭扰中国人。"

起初，中央情报局通过乐于充当中间人的台湾国民党中国人给康巴人安排援助。一个以台湾为基地的叫做民用航空运输的团体被用来向西藏人空投供应。国民党中国人在当时就开始在台湾训练康巴难民。康巴难民受训的课目是现代游击战术以及伞兵战。后来，其中一些人被派回西藏执行敢死空投任务（一旦被捕就服毒自杀）。

中央情报局并不以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供应而满足。从1958年开始，它在科罗拉多州中部的落基山脉的训练营地开始了它自己的训练计划。落基山脉这个营地的气候和海拔同西藏差不多，它比台湾提供的亚热带气候的（营地）好得

多。1959～1962年期间，大约有170名康巴人在这偏僻的海尔营地接受了训练。在美国国内训练反华叛乱分子并把他们派回中国，这当然是件冒险的事。因此，在1961年，尽管采取一系列保密措施，但绝密的消息仍有泄出的危险之际，国防部请求《纽约时报》不要发表这个消息，说："它将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紧张局势加剧到危险的程度。"

为应付这种不测，并作为对猪湾大失败的消极反应，美国决定结束在国内训练康巴人。在1961年，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决策把训练工作最后迁到尼泊尔之前，一些西藏人在美国托管的战略性领地塞班岛接受短期的训练。

鉴于早在1957年中央情报局就已开始支援西藏游击战，由此可以推断中央情报局的供应和训练在1959年3月10日的拉萨起义以及接着的西藏叛乱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证据表明中共对美国插手西藏"地方民族主义"是了如指掌的。1958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印度公使的照会中说：美国同蒋介石集团在噶伦堡正同西藏反动派相勾结，为了达到把西藏地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的罪恶目的，他们正在积极策动和组织潜伏在西藏的一小撮反动分子进行武装叛乱。

然而，中国人却不一定明瞭美国所给援助几乎每次都是很勉强给的，决没有达到能支持西藏独立的程度。西藏自己在寻找独立之路。美国在1958年底前才向叛乱分子空投首批武器，当时它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满足西藏人的一再呼吁。1960年在决定利用尼泊尔西藏边境地区偏僻的木斯塘地区作为最初的游击基地时，重新安置在那里的大约二千名康巴人期待着美援。1961年当美援送到那里的时候，康巴人已是食

不果腹的了。

可是，只要西藏能在冷战方面起着牵制中共的作用，这种秘密援助就会继续进行，所以西藏有时虽然对美援的数量和次数感到失望，但从美国得到援助，激励着他们从中国独立而战斗。

西藏人在为从中国人那里取得自由而战，但美国只认为这仅能起捣乱的作用，只满足于制造一些使中国人疲于应付的苦恼和麻烦。恰如一位美国分析家所说，对西藏的游击活动最大的指望就是进行袭扰，想通过这种抵抗而改变西藏的状况纯属妄想。

到六十年代后期，中央情报局逐渐从其直接支持作用中脱身，当时由印度秘密机构来取而代之已成为可能。可是，中央情报局虽然不再直接插手游击活动的后勤供应，但是迄至1972年初和叛乱分子公开决裂之前，情报局还断断续续地给与叛乱分子财政和物质方面的援助。

1971年随着中美缓和出现之后，很明显国务院必须修改其对西藏的官方政策，以便和其新的中国政策相一致。在新的中国政策中，不管是单独进行还是勾结台湾政府进行这种敌对活动，都是没有位置的。所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央情报局就停止了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所有援助。

美国还停止了其有关西藏的反华宣传。在美国总统访问北京之前仅一个月，美国新闻机构拍摄完了一部描写达赖喇嘛1959年出走的影片（拟分发给国外使馆）。国务院怕激怒了中国人而危及即将进行的总统之行，因此无限期地扣压了这部影片。

虽然美国终止了其对西藏地方的所有的直接援助。西藏

仍通过其在美国的西藏难民及其活动对中美关系施加影响。比如：1975年下半年，中国对西藏歌舞团拟访美提出了抗议后，给西藏歌舞团发签证的美国驻瑞士大使馆就设法吊消了这些签证。而西藏人被允许去美国是达赖喇嘛驻纽约的西藏办事处斡旋的结果，这个办事处本身亦是中国抗议的幸存者。

1976年3月，在纪念西藏起义十七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福特以及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表示了个人的祝贺。可是，让西藏独立问题影响到中美关系似乎不太可能，过去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比西藏独立问题更重要。

1977年，卡特总统声称对人权的关心，引起了西藏人的种种反映，他们希望美国官方重视西藏的自由和独立，尽管美国公众对西藏的兴趣复炽，然而西藏仍然没有得到卡特官方的重视，最近国务院重申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对西藏的政策立场是："没有一项政策和行动是基于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假设之上的，无论从哪方面，美国都没有把达赖喇嘛当做西藏政府。"

美国国务院十分明白对达赖喇嘛的官方立场会对中美关系所起的消极作用。因此，达赖喇嘛虽曾表示他对访美感兴趣，但国务院却十分怠于发给他签证。达赖喇嘛本人也不想因他坚执访美而让美国政府为难，这样，除非政治气候发生变化，达赖要成行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美国介入西藏的短暂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认为西藏不是中国当然的一部分，不管是满清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即使在国民党时期，当时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在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但美国仍坚持其对西藏地位的传统解释，

有意拒不在法律上承认西藏政治独立的建议，何况就实际的政治关系和商务关系而言，美国并无足够的理由承认一个独立的西藏。

美国对西藏采取的官方措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服从于更为重大的中美关系的考虑的。有时，西藏的政治地位从属于使盟邦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战后目标的。而在1950年至1970年美国与中国公开对抗时期，美国则在冷战中有计划地利用西藏民族主义，以武装反抗来袭扰中国，瓦解中国。

美国在西藏解放后介入西藏，起到了使中藏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更加激化的作用，这同国民党时期美国在中藏争端中起调停者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肯定，美国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支持延长了中藏之间的军事对抗。可悲的是它还使西藏人产生了错觉，西藏人认识到他们和他们的民族愿望被冷战的把戏所左右而为时过晚了。

# 美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

克里斯·穆林 著　张植荣 译

**编者按**：西藏和平解放后，帝国主义对西藏的野心不泯。它们改变过去直接武装干涉的手法，采取秘密方式，派遣特务，培训分裂分子，然后偷渡入境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其中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它们在五六十年代对我国西藏地区一直进行着秘密的颠覆活动。这些阴谋活动一直到中美关系于1972年解冻之后才被敏感的西方记者所知。下面三篇文章都为作者亲自采访所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克里斯·穆林曾亲赴达兰萨拉采访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一系列当事人。而且达赖本人对作者的观点表示认同。日本记者高桥1962年曾随大白峰远征队进入尼泊尔，1977年9月偷偷进入木斯塘采访。T·D·奥尔曼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访问过拉萨，记下了他对"文革"中西藏的印象。这三篇文章反映了在冷战时代美国、印度、苏联甚至台湾都加入了对西藏的阴谋活动之列。

本文译自《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第89卷36期。

十多年前（1961年12月——译注）在美国科罗拉多的一条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若是一般的车祸也就无所谓了。然而，人们惊奇地发现整个出事现场周围被军队包围得水泄不通，不久后，采取保安措施的原因披露出来：这辆公共汽车上坐的全是西藏人，其中还有一些人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美国地盘上。多年后，西藏人在美国接受游击战训练的事实被披露出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解放”西藏计划的一部分。但这些西藏人如何潜至科罗拉多受训的经历一直是个谜。

本文揭露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所采集材料依据于对当事人的一系列访问调查。我的采访表明，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图谋始于1956年底，止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前夕。这种观点得到印度情报部门的证实。

调查表明：

1957年末至1961年底，中央情报局用降落伞向西藏空投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并训练了很多游击战人员；

1958年早期，达赖喇嘛出逃的前一年，美国人试图劝说西藏当局公开呼吁美国干涉西藏事务；

1959年3月下旬，外界认为出逃的达赖喇嘛失踪了，事实上他一直与中央情报局保持着无线电联系；

1960年至1971年期间，中央情报局在尼泊尔西北部的木斯塘山谷（Mus tang Ualley）资助并训练了一支2000多人的部队。这支部队时常深入藏境进行骚扰活动。

美国情报机关与拉萨当局的最初联系始于1942年12月。那时，伊利亚·托尔斯托依（Ilia Tolstoy）和布鲁克·杜兰(Brooke Dolau)——二位服务于美国战略研究所的人，

访问西藏。战略研究所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他们此行的目的在于劝说西藏政府允许建立通过西藏东部的从印度到中国的军事补给线。支持蒋介石的抗日战争。达赖喇嘛政府拒绝了这种要求，正象它以前拒绝了英国人提出的同样要求那样。然而，这二个美国官员在拉萨受到热情接待。在他们离开拉萨前夕，他们要求美国在西藏为拉萨当局建立第一座长波电台。

美国与西藏的第二次正式联系在1949年8月。那时，美国旅行作家挪威尔·汤姆斯(Lowell Thomas) 抵达拉萨。这时，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西藏当局终于警醒起来，担心西藏很快会被共产党中国吞并。西藏政府通过汤姆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信，吁求美国的军事援助。

1949年10月，汤姆斯离开西藏。11月1日，他拜访杜鲁门总统。他在1950年5月10日从纽约致达赖喇嘛的信中记述了拜访杜鲁门总统的结果。该信援引总统的话说，杜鲁门希望组织“世界上的精神力量反对不人道的势力”，总统还说自己就此问题曾与达赖联系过。这封信保存在拉萨博物馆。汤姆斯在信中还说：“我告诉总统，去年夏天我在你们的外交局与你举行了会晤，讨论了对西藏独立的威胁及你切需援助的问题。我问总统能否向你的军队提供现代化武器和足够的军事训练顾问。总统不肯做出肯定的、积极的承诺，他只是对贵国的问题予以同情”。

1950年10月，中国军队向西藏东部的昌都挺进，彻底摧毁了当地的藏军。一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谈判，西藏当局与北京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共产党同意对西藏采取缓慢的统一进程及社会改革措施，西藏当局则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在后来的四年里，西藏人与中国其

余部分处于不稳定的共存状态。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综游中国，历时十八个月。沿途所见所闻，令其耳目一新。二位大师还与毛泽东主席建立了私人友谊。自1952年起，大量西藏儿女（主要为贵族子弟）被送至北京的民族学院接受教育。他们不再是挑起仇恨，而是要在北京政府中竞谋职位。

共产党在西藏开始了一系列的战略公路建设。他们付出比当地劳务费更高的报酬，轻而易举地征招了大量的西藏民工。共产党还迎合西藏的贫苦大众，帮助收获，发放衣物。同时，共产党没有采取措施干涉寺庙和富人的事务。

但是，1955年，摊牌的时刻来到。事件发生在理塘。此地在缅甸东北部，距拉萨有3个月步程。共产党突然间开始向那些自印度经商回藏东的商人征税，并逮捕了许多地主，还把地主和寺庙的财产统计列表。理塘寺是西藏东部最大的寺庙，拥有5000多名僧侣和113座小寺庙。这些小寺庙的定居者并非西方人眼中地道的僧侣。因为其中很多从事私人商业，还有许多人持有枪械，经常与敌对的寺庙发生暴力冲突。有人说，在汉人来此之前，理塘简直象“蛮荒的西部”。1955年底，理塘的地方政府要求八名高级僧侣交出理塘寺的财产帐目表，以便征税。地方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然而，僧侣们作出的反应是其中一个僧侣拔出手枪打死了汉人，僧侣们逃走了。回到寺庙后，僧侣们召开各村头人大会，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反抗共产党。

根据参与这次事件的一名藏人的回忆，理塘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藏历火猴年正月26日，即1956年2月底。战斗在藏人进攻中国军营中开始。藏人的进攻被打退后，汉人包围了理塘寺。理塘寺由2000名僧侣守卫。他们手头拥有303条从

印度进口的莱福枪，并配有一些旧式的由日本、德国、中国和俄国人制造的枪械。

守卫寺庙的藏人坚持了26天。最后汉人派去了两名接受过北京教育的藏人前往谈判。汉人表示对西藏的改革方案至少推迟三年，如果这个条件都不接受，汉人将用飞机轰炸寺庙，西藏人对飞机这东西前所未见。汉人在寺庙前进行了空袭扫射表演。只给那些负隅顽抗的藏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晚，他们发动了突围，冲出汉人的包围圈。许多人死于战火下，有一部分人则逃了出来，最后到了拉萨。

在这次逃往拉萨的康巴人中——外界对西藏东部人的称呼——，有一个富商，名叫贡布扎西·恩珠仓。因为几个月成功无望，他向西藏政府游说，要求他向外部世界吁请援助，反对汉人。但是，自高自大的拉萨贵族并不认为藏东存在什么大不了的战争，虽然此时已有几千名康巴难民到达首府拉萨。但是，达赖喇嘛的内阁作出了一个在西藏内部解决的方案。它没有吁求外界的援助，而是在全藏内发起一场献金献宝活动，从而为达赖再修筑一座金制的御座，依此来消除他们认为的即将灾害西藏的不祥之兆。总共收集了120公斤黄金与宝石。用它铸成了一个御座，并于1957年7月贡献给达赖喇嘛。

与此同时，贡布扎西与其他康巴叛乱领袖决定采取实际行动。通过达赖喇嘛哥哥嘉乐顿珠的联系，他们与美国人接上了头。嘉乐顿珠此时住在印度的噶伦堡。他与贡布扎西有许多生意联系。嘉乐顿珠在妻子（是汉人）的帮助下取得了台湾的援助。1956年，台湾一直协助康巴人训练游击人员，并在理塘及其他地方空投武器与给养给那里的叛乱分子。台湾

的选择具有讽刺意义。蒋介石与毛泽东都持同一立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一直坚持这一立场，毫不动摇，1965年，台湾便中断了与西藏流亡当局的联系。

西藏与美国的直接勾结似乎是由美国人倡议的。美国人对嘉乐顿珠指出，向台湾寻求援助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台湾还得向美国求助。因此，西藏人应该直接与美国人接触。美国人与西藏人的第一次积极行动发生在1957年早期，嘉乐顿珠首次安排了由六名康巴人组成的小分队接受军事训练，学习使用现代化武器，操作无线电台。然后将这批人空投回藏，组成抵抗运动的核心。在美国受训的首批藏人中，有一个曾这样描绘他被征募的过程："有一天，贡布扎西问我能否从飞机上跳下来。我从未听说这样的事。但只要能够帮助西藏独立，即使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他还告诉我，有个地方可帮助我学会使用机械，有了这东西，一人可当二千人。我们都不知道美国。只是在朝鲜战争中我们从中国广播中知道美国是中国的敌人"。按照中央情报局一贯作法，这六个藏人向训练基地转移的经历完全是一次间谍活动。他们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什么时候，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甚至对印度人保密。一天夜里，有人通知他们单独走出噶伦堡。正在他们步行途中，一辆小汽车停了下来，将他们一一接走。开车的司机不是别人正是嘉乐顿珠。小汽车把他们带到西里古里（Siliguri）郊外，这里距东巴基斯坦边界步行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得到一个指南针，向着那边界进发。在边境，他们受到两名巴基斯坦军官和一名会汉语的美国官员及一名藏族翻译的迎接。在此，他们领到长长的缠头巾和旁遮普大裤，装扮成锡克囚犯通过东巴基斯坦。在达卡

附近，他们躲在一间屋子里过了二天，然后登上飞机，五小时后抵达一个他们不知其名的国家（泰国？）。在这里，他们穿上美军制服，与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土登诺布一起奔向了这次旅程的最后一站（土登诺布1975年在美国任大学讲师）。目的地到了。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四个月，就象在美国管辖的关岛上一样，受训是辛苦孤单的。

一抵达美国的训练基地，迎接他们的六名美国人训道："中国也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我们要帮助你抵抗中国。我们的关系要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而不只是二、三年"。其后的四个月，他们学习如何认识地图，如果使用无线电台。使他们失望的是，受到的武器使用训练太少。他们认为，在跳伞训练中被视为菲律宾人，最后一月只有6次跳伞。1957年秋，受训结束。他们登上一座由美国驾驶的小飞机，被空投回藏，每人配有一支手枪、一支小型机枪，一部旧式日本制电台，相当于132美元的藏币、两小瓶准备被俘时吞服的毒药。起飞之前，他们接受了仔细检查，身上的制服、装备，以及药瓶上的商标——一切具有美国标志的痕迹均被消除干净。

他们乘载的飞机分二步行动，首先它在拉萨南面空降了两名受训的藏人。剩下的四个人中有三人被空降到理塘，第四人在最后一刻因精神紧张不敢跳伞，只得经陆路回藏。在理塘空投的四人中只有一个叫旺堆的回来了，在拉萨南面空降的两人潜回拉萨，与贡布扎西取得联系。这时他已在康巴人中组织起西藏抵抗运动。他们通过贡布扎西会晤了达赖喇嘛的管家帕拉·土登维登，会晤于1958年1月在达赖夏宫罗布林卡举行。帕拉说，要求西藏政府援助康巴人是不可能的，因为

内阁中有一半的官员支持汉人。帕拉还说，他早已与达赖喇嘛讨论过这些问题。他向他们赠送了一些宗教遗物，并说这是达赖喇嘛的礼物。这次会晤后不久，帕拉给他们写了一封言辞委婉的长信，要求他们转交给美国。信中说，即使美国向西藏投下一颗原子弹，反叛中国也是没有希望的。

1958年初，拉萨的局势日益紧张起来。根据1951年的十七条协议，汉人已在拉萨市有了相当的势力，这时，他们逮捕了500名前国民党士兵。谣言四起，又说他们还要拘留康巴人。遵照贡布扎西的命令，无线电台向美国发报，询问如果战斗打响美国能否帮助康巴人。美国回电说，西藏政府应该直接向美国求援。于是，贡布扎西带着无线电发报员于1958年5月试图与帕拉举行进一步的会晤。但帕拉拒绝见他。在这种情况下，贡布扎西决定丢开拉萨当局及其追随者，在西藏的东南地区洛卡（Lokka）开展抵抗运动。无线电发报员也决定与他同行。

美国人对贡布扎西的行动大发雷霆，认为无线电发报员不应该离开拉萨。美国人发出了措辞严厉的信件，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与西藏政府保持联系。直到1958年底，在康巴人的一再吁求下，美国人才表示空投第一批武器。美国人没有与康巴人协商，就通知说空投首批武器的地点可能在一个叫珠古拉玛塘（Dragu Lama Thang）的高地。康巴人指出，未来的空投地点被游牧部落包围着。但是，中央情报局的头头们仍不肯改变决定。康巴人被通知准备30头骡子去运武器，而且只准一个人前去押运。很显然，中央情报局里无人知道，一个人是无法管制30头骡子的。第一批武器空投下来时，令康巴人非常失望。这些武器数量与他们希望的相去甚

远，只有100支英制莱福枪；20挺半自动机枪；2门55毫米迫击炮；60枚手榴弹，每支枪配300发子弹。

三个月后，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已决定逃离拉萨，他逃往印度的旅程历时二周，外界就他在旅程中的命运有各种猜测。然而，只有美国认为这些猜测毫无必要。后来披露出来的材料表明，达赖出逃的最后两周里，——此刻，全世界新闻都集中于喜马拉雅山脚下——达赖喇嘛一行一直通过东巴基斯坦与中央情报局保持着无线电联系。达赖及其由1000名康巴人组成的卫队逃至洛卡时，前一年底（1958年底）逃出拉萨的那位无线电发报员加入了达赖的行列。1959年3月底，中央情报局向西藏空投了第二批武器。但这批武器是否是在达赖出逃期间或抵达印度时空投的，尚不清楚。达赖本人曾否认在他出逃期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空投援助。但他确认，他与美国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系。

达赖喇嘛出逃之后，美国才开始加紧措施促进西藏内部抵抗运动的发展。1959年底，第二批在美国受训的康巴人被空降至西藏一个叫南错卡（Nam Tso Kha，位于羌塘地区Chan Thang）的地方。这次空降没有成功，年底这批康巴人安全地返回噶伦堡。1959年底，在卡罗拉多的哈尔营（Camp Hale）建立了一个严格的训练计划。这个训练计划如此的保密，起初连康巴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在美国受训，一份材料表明，1959年至1962年，约有170名康巴人在哈尔营训练基地通过受训。大多数人都被分成六人一组的小分队空降回藏。从军事意义上讲，这完全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些人被空投回藏后十之八九没有音讯反馈回来。空投绝大多数是在西藏东端的昌都附近进行。最大的一次空投于1960年发

生在查拉皮谟（Charra Pemoa）。最后一次空投于1961年底发生在昌都东南部的芒康（Markham），共有6个人空降下来。但全部杳无音息。另有26个在哈尔营受训者被送至尼泊尔东部的木斯塘。他们从那里协助组织了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第二阶段阴谋活动。哈尔营对西藏人的训练于1962年关闭了一年，后来可能因为培训在木斯塘的人员而重新开放。1964年，这个训练基地最终关闭了。

到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之时，印度政府可能还无法得知所发生的事。虽然中央情报局的组织活动大都在印度领土上进行。有材料证明，印度人曾几次照会北京，抱怨中国的飞机侵入东印度领空。中国人拒绝了印度的指责，并指出那架可疑的飞机来自泰国方向。印度坚持己见，继续抗议北京。据说周恩来曾告诉印度人说，印度可以打下一架飞机，亲眼看看。印度没有这么做，但缅甸真的打下了一架可疑的飞机。那架飞机坠毁在泰国境内，并发现是台湾来的飞机。蒋介石为此向泰国政府道歉，但此类飞行并没有停止。种种迹象表明，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对西藏的干涉甚至超过了美国。另有报道说，有大量的西藏人在关岛附近的塞班岛（Saipan Lslaud）受训。

至1960年，情况清楚地表明，支持西藏东部的叛乱运动是一场灾难。于是中央情报局决定创建一支几千人的军队，从尼泊尔向西藏西部发动袭击。被选定的基地在偏僻的木斯塘山谷，这里的居民大都是藏族人，他们与世隔绝，住在27000英尺高的安拉帕拉山（Annapurna）和达里格里山（Dhau ligiri）上。在战略意义上讲，这里是理想的建军基地。因为这里离西藏的新藏公路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就

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而言，这里最遥远了。被选来指挥木斯塘的康巴人的头子叫巴巴叶什（Baba yeshi），以前是个僧侣，此人不识字，但聪明过人，极端残忍。美国人通过中央情报局驻新德里的办事处指挥行动。他们同意了在木斯塘的训练计划并表示向那儿的400人提供援助，还表示如果训练计划成功，美国还将援额扩大到2100人。尼泊尔政府不知道本国领土上有一支康巴人的军队，直到1962年前后，才由中国人告知有一支康巴人的军队活动在尼泊尔境内。直到1974年夏之前，尼泊尔对康巴人在木斯塘的行径一直置若罔闻。至1960年底，2000多名康巴人潜至木斯塘。但是美国的援助还没有到来。当1961年下半年美国空降第一批援助物资时，许多康巴人已死于饥饿。一些人不得不靠煮皮靴充饥。兵额减少了。第一批空投的物资有两飞机，包括供475人使用的枪支、药品、食品和相当于1252美元的卢比现钞。另外还有四名经过中央情报局在美国训练的康巴人与物资一起空投下来，美国为木斯塘训练了26名康巴人。还有12人绕印度步行到达木斯塘。

由于空投物资推迟了时机，中央情报局主张康巴人立即着手行动。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61年底。200名康巴人向新藏公路上的中国汽车发起偷袭，有6个中国人被杀，一个康巴人也死于枪弹下。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拒绝相信康巴人发动了偷袭。康巴人的士气因此一落千丈。此后不久，他们时来运转。康巴人从一个中国官员手中获得了一卷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大跃进给中国人造成了困难。这是西方情报机关第一次了解到中国的困难。从此以后，中央情报局给康巴人的津贴增至每月5000卢比。所有的津贴都是由住在大吉岭的嘉乐

顿珠转交而来的。1964年开始津贴又增达每两月22500卢比。此时，印度人已卷入进来，活动中心似乎由大吉岭转移到新德里。津贴被从新德里带到尼泊尔的博卡拉（Pokhara），转交给那里的康巴人。他们在这里买来各种供给。

康巴人的袭击零星地继续了八年。最后一次是在1969年秋天。起初，康巴人骑马八天就能进入西藏。然而，1963年以后，中国人开始巩固边防。至1967年康巴人已不可能再对西藏发动袭击了。1964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英国作家乔治·帕塔逊（George Patterson）说服一伙康巴人带他和两名摄影师在一次袭击中一起进入西藏。帕塔逊将这次袭击过程录成影片，在各国广泛上映。中央情报局勃然大怒，甚至在新德里对康巴人停付了六个月的津贴。

与此同时，尼泊尔政府感到难以继续否认在木斯塘发生的事实。自1962年初起，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就一直建议双方联合行动解决康巴问题。第二年，英文报纸《祖国》建议，应该对康巴问题做点什么。1964年，许多匿名电话向加德满都报界泄漏消息说，在城里发现了隐藏的中国武器，于是谣言传来，担心中国可能参加了颠覆活动。然而谣言很快被识破。因为人们发现那些枪支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美国大使馆。同时，几名康巴人在加德满都附近被捕。他们带着无线电台，后来发现这是美国外交官落基·斯多恩（Rocky stone）给他们的。此后不久，斯多恩被尼泊尔驱逐出境。尼泊尔政府还禁止美国国际援助团使用其专用飞机场。后来有二批武器被空投至木斯塘，其中有高射机枪。这两次空投发生在1965年和1966年。

六十年代末，美国逐渐对康巴人丧失了兴趣。但是印度

在康巴问题上的卷入与日俱增。印度将整个部署交由情报局调研处执行，并由总理办公室监督。印度建立了一个藏军兵团——印藏边境警察部队。这支部队成为印度军队的一部分。有几千名藏人被征募入伍。印度向他们许诺，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可用以“解放西藏”。这支部队主要被用来在漫长的印藏边境上巡逻。一些人也被用来参加孟加拉战争，约有四十人死于战场。印度人对印藏军队的训练主要集中在新德里以北100英里的德拉丹（Dehra Dun）；空降训练则集中在印度空军基地阿格拉（Agra）。起初，美国人参与了训练。考虑美印关系的状况，据说有位名叫凯因（Kane）的美国人一直在印度训练西藏人。1966年，西藏游击人员大部分由木斯塘转移到德拉丹。巴巴叶什被告知派300名追随者到训练基地受训，1967年底，在新德里的一次会晤中（三个美国人参加了这次会晤），嘉乐顿珠命令巴巴叶什把他的人马减至470人。但巴巴叶什拒绝了。

巴巴叶什的拒绝在康巴人与其他西藏流亡者中引起一场激烈而持久的冲突。他们离开西藏之后，各派就美国人援助的津贴分配发生争吵。依照原来的计划，美国人同意援助充足的津贴，保证木斯塘的军队每人每天有3卢比的零花钱，如果普通的康巴士兵能够分到比那可怜的配额还多的东西，他们肯定会十分高兴。中央情报局的大量资金没有落到普通战士手中而是中饱私囊。嘉乐顿珠指责巴巴叶什没有准确的帐目。巴巴叶什则攻击嘉乐顿珠，说美国人援助的津贴比他实际接受的数额多得多。达赖喇嘛的居间调解所获甚微。

1969年，一位新领袖被派往木斯塘取代巴巴叶什。他叫旺堆，是贡布扎西的侄子。他是最初被派到美国受训后空投回藏

的六人中的幸存者。一场残酷的内讧发生在忠于巴巴叶什的康巴人和旺堆的追随者中。1971年，巴巴叶什及其120名追随者向尼泊尔人投降，他们与尼泊尔合作，并得到了一些钱财和土地，于是在尼泊尔定居下来。

一切平静下来。随着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首次访问北京，中央情报局的津贴来源停了下来，而印度提供的津贴则接上来了。在旺堆领导下，康巴人停止了对中国人的袭击，开始投资小商业。1974年夏，尼泊尔军队根据巴巴叶什提供的情报，袭击了木斯塘，他们轻易而举地解除了那些康巴人残余分子的武装。只有旺堆带领大约40人逃走。他们在尼泊尔躲藏了一个月，最后向印度逃窜。在逃窜中，他们仅能与两三处联系上。在逃至印尼边界时，印度军队正等在那里，准备帮助他们越过边境。但是，尼泊尔人也等在那里。在越境的战斗中，旺堆及其四个追随者被击毙，有一人则被尼泊尔人活捉。其余的残兵败将逃至印度边境，投入等在那里的印军怀抱。康巴战争结束了。

# 几乎被人遗忘的西藏冲突

T·D·奥尔曼 著　刘敬师 译　张植荣 校

《藏语词典》出版于1957年。由于采用拉丁字母而不是罗西亚文字（Rhotia Script）的写法，因此其内容引不起语言学家的多大兴趣。对学习西藏艺术、文化和宗教的学生来说，这部词典也不能提供多少帮助。但是，这部词典是一场目前正在淡忘的西藏冲突的历史见证之一。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这一期间，在印度东北部的“前缘地区基地”活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支持、资助和全面指挥了这场冲突。

接管西藏以及事后西藏仍活生生存在这一事实，似乎明显地说明共产党搞了“侵略”，似乎也成了中国的大规模冷战宣传的失败之例。公众仍然记得，无情的红军把受人尊敬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赶出家园，后来中国又沿英国强加的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不宣而战”地对印度发动了攻击。但是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这些说法有所不同。

在西方，1951年中国人的暴力行动被看作是捷克斯洛伐克或朝鲜式的共产主义侵略。事实是，汉人进入西藏在战术和后果上类似于英国的荣赫鹏1904年对西藏的探险。暴力的威胁和进步的许诺双管齐下只是为了赢得一个外部力量的最高权力机构——达赖喇嘛的朝廷——对入藏的承认。与此同时，西藏的僧侣统治原封不动，允许西藏人管理他们的内部事务。但是1904年的那个英国人与1951年的汉人不同，他并不满足于在拉萨打住：荣赫鹏闯入西藏的首府并向西藏贵族提出自己的要求。

根据1951年的协议，达赖喇嘛的精神权力和大多数世俗权力得到了承认，西藏一小部分封建贵族的权利也同样得到了保持。尽管西方对“征服”议论纷纷，但事情最终表明，1951年汉人在西藏确立的控制，其程度极为低微。

从1952年到1959年，中国人寻求把传统的神权权力机构——特别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转变成逐步使西藏现代化的机构。但是，甚至汉人最有限的改革努力也不可避免地招致西藏僧侣集团、看不惯传统自治权的部落团体和西藏200家富裕的贵族家庭的怨恨。

1956年，19岁的达赖喇嘛被反对中国改革意图的西藏贵族带到印度作长期访问，随后即在那里拖长关于西藏的根本改革的谈判，以此讨价还价，阻止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那些把达赖喇嘛团团包围的人不想进行任何改革。汉人——包括许多藏人——都希望社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包括废除农奴制。

最后，周恩来访问了印度，与达赖喇嘛的朝廷进行谈判。当毛泽东以一个革命领袖的名义，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公开宣布无限期推迟改革时，达赖喇嘛和他的随员终于返回了拉萨。但是此时其他力量已经进入了西藏，改变了西藏的力量平衡。这些力量包括印度，最重要的是美国。

1958年，康巴人在西藏东南部发动叛乱。据一些消息说，康巴乱民得到了来自印度阿萨姆和西孟加拉邦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支持、指挥和补给。这些间谍有时以基督教使团的面目出现，这导致后来阿萨姆邦政府做出了驱逐美国教团的决定。

根据美国的消息，美国这次煽动西藏的部落叛乱是它骚扰中国的总体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政策也包括支持国民党军

队和云南的部落暴民。正如一位前中央情报局（CIA）的间谍所指出的，“这种政策就是要在中国的背后制造混乱，使中共其他地区的侵略受挫”。

对于在西藏发生的事态，正如对在别的地区发生的事态一样，共产党不可避免要对此作出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受命行动，平息暴乱。中国人首先对武器、人员和贸易的活动进行了整治。反华的西藏分子受到逮捕。

就在1959年初——当中国人正着手恢复秩序时——有消息说，年仅22岁的达赖喇嘛被他的追随者首先转移到暴乱地区，然后挟往印度（这得到了印度和美国的支持），后来在那里，达赖的追随者单方面撕毁了1951年与中国签订的协议。

据参与这次行动的美国人说，达赖喇嘛离开他的首府是受中央情报局的策划的。美国的间谍飞入西藏数百英里对达赖喇嘛集团进行空中掩护，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和金钱，并扫射中国的阵地。他们给这次行动拍了彩色录相，这些录相后来在美国被许多人观看过。其中有人说，“显然毫无疑问的是，不是中国人要废黜达赖喇嘛，而正是美国人要使他倒台”。

指出这一点是有趣的：在达赖喇嘛的出版物中，并无一处是指责中国威胁过或伤害过他的。和1956年一样，1959年中国人显而易见的希望是：他最终会被说服，从印度返回拉萨。达赖喇嘛说，他希望同允许他返回西藏的北京进行谈判，他的家乡应该在中国内部享有更大的自治权。

• 译自1974年2月11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文章原题为《几乎被人遗忘的冲突》。

# 美中央情报局操纵西藏叛乱

（日）高桥照 著　欣华 译

**原编者按：**康巴族是山地部族，曾在一九五六年发生的西藏骚动中扮演主要角色，其后，帮助“活佛”达赖喇嘛出逃，进而隐藏在尼泊尔国内的边境地带木斯塘，使西藏国内的中国军队感到难办。这个康巴族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一事不太与人所知。但是，在西藏骚动过去二十多年之后，有个日本人搞到了“中央情报局的阴谋”的几乎全部内容。他就是前年在暗中进入木斯塘成为话题的“喜马拉雅流浪汉”高桥照。下面，我们介绍高桥先生挖掘出来的一个历史性镜头，即以喜马拉雅山区为舞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绝密计划。

## 在全境发动叛乱，有战斗力的精悍游击队

康巴族是好斗的民族，善骑射。达赖喇嘛曾把康巴族士兵作为护身卫队。

据说美国情报机关同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进行接触，最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名情报人员访问了西藏，要求准许通过西藏东部建设联结印度和中国的军用公路。结果，达赖喇嘛的政府没有批准。因为建设这条道路是为了加强对蒋介石军队的援助。

一九五〇年，中国开始解放西藏，并进军到西藏国内。这时，康巴族没有抵抗，甚至主动接受了解放。第二年五月，西藏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签署了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协定。

到了一九五四年，在昌都地区发生了暴动。导火线是急剧的土地改革。叛军反复对中国军队发起了猛烈的游击活动。开始时，康巴族叛军连战连胜。那里是险峻的高山和深谷。中国军队的坦克和飞机也不能发挥作用。但是，一旦中国军队正式增加兵力，康巴叛军就被逐出昌都地区，撤退到拉萨以南。

叛乱终于扩大到西藏全境。一九五九年三月，在首都拉萨，市民与中国军队也发生了冲突。动乱初期，康巴游击队得到台湾政府的援助。

康巴人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关系很深。同台湾的接触就是通过嘉乐的汉人妻子进行的。不久，美国就取代台湾而登场。

嘉乐在一九五七年初为了对六名康巴勇士进行游击训练，求助于美国人。六个人在印度的噶伦堡乘车，经过尼泊尔、东巴基斯坦，在日本的某个岛或者马里亚纳群岛上接受视图方法、无线电使用方法和跳伞训练。

（训练）时间约半年，然后分成两个组，乘飞机到拉萨和里嘎附近跳伞。

有两个人降落在拉萨附近。他们潜入拉萨，与达赖喇嘛的一名亲信碰头了。这名亲信把一封信托付给这两个人，该信说，由于反抗中国希望渺茫，“有效的办法是美国在西藏扔原子弹”。

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初对康巴人提供武器援助是在一九五八年的时候。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当拉萨市民同中国军队反复发生冲突达到最严重地步时，达赖喇嘛偷偷地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一千名左右的康巴人保卫着达赖喇嘛，其中包括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游击队在内，并用无线电台同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联络。

那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对康巴人进行游击训练，训练基地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中，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三年期间，有一百七十多名康巴人在这里接受训练。

美国中央情报局搞的训练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想象不到的是，也发生了被附近居民刺探到真情的事件，在荒僻的道路上，拉着康巴人的大轿车发生了撞车事故。为了这个极为常见的事故而出动了军队、封锁了道路，这使居民感到惊讶。

不久，居民中传说："坐大轿车的是西藏人，他们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对此开始投以怀疑的目光，而且，"中央情报局在干着某种勾当"的传说广为流传。

结束在科罗拉多训练的康巴人用降落伞在西藏境内各地着陆，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下参预各种秘密工作，但是几乎都没有成功。

**援助武器和资金，指挥本部设在新德里**

但是，康巴人没有放弃重建西藏的美梦。

从一九六〇年前后开始，游击活动的根据地搬到尼泊尔

的木斯塘。在木斯塘，集结了大约六千康巴人，他们开展了从那里越过国境袭击西藏国内中国军队的游击活动。

为了援助木斯塘的康巴人游击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尼泊尔成立了名为“亚利桑那直升飞机”的航空公司，提供武器和粮食等。“亚利桑那直升飞机”航空公司在登山队遇难时也进行过救助活动。

为了进入木斯塘，博卡拉变成了据点，那里设有游击队供应基地。

约六百名美国和平队以指导农业的名义，从博卡拉出发沿喀利干达基河上溯，进入木斯塘街道，实际上开展了情报活动。

第一次从木斯塘进攻中国军队发生在一九六一年，二百名康巴人在沿西藏国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军用公路上，袭击了中国军队的运输卡车。

指挥康巴人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新德里设立本部。给康巴人的报酬好象是通过住在印度大吉岭的噶伦堡，在博卡拉亲手交付。

从一九六三年起，中国军队强加了边界的警戒，到六十年代末，康巴人进攻中国几乎不可能了。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康巴人失去兴趣，印度人取而代之，开始参预。

在印度军队内创建了印度和西藏交界地区的边防警察，并雇佣了康巴人。

一九七四年，在木斯塘的康巴人之间发生了内讧。这一冲突是在以很早就是领导者的巴巴叶什（音译）为首领的集团与新兴的扎西旺堆（音译）为首领的集团之间发生的，根源是在军用资金的分配问题上发生了纠纷。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印度支持扎西旺堆，印度一个劲地用飞机给扎西旺堆集团输送最新式的武器和弹药。在中印边界战争中打败了的印度企图让木斯塘的康巴人起封锁中国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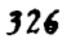
尼泊尔政府也没有放任不管，派军队前去镇压，但是一筹莫展。

这期间，扎西旺堆集团已把巴巴叶什追得走投无路并包围住。但是叶什向尼泊尔军队投降了，扎西旺堆一伙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据说扎西旺堆曾在美国受过教育，但最近了解到，实际上，他是最早由嘉乐介绍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并被派遣回来的六人中的幸存者。现在有的说扎西旺堆已被尼泊尔政府军杀死，也有说他生活在加尔各答——这两种说法都有。

还有过这样的传说：在这一骚乱达到高潮时，苏联也开始向扎西旺堆提供资金援助。如果这是真的，利用了康巴人重建西藏之梦的就成了美国、苏联、印度、台湾四个国家。被大国阴谋所愚弄的边境部族的悲剧正在于此。

译自日本《东京新闻》1979年12月24日，原题为《西藏动乱·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山地部族》。



# 西藏三十年

〔美〕琼·托伊费尔·德雷尔 著　陈尧光 译

**编者按：**琼·托·德雷尔系美国迈阿密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发表过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著作，在美国有“中国民族问题权威”之称。本文是他1981年3月为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第33届年会撰写的论文，原题《中国和西藏：30年的研究评价》。作者在文中是从西藏原是“国家”的错误前提出发，来评论西藏30年来在我党领导下的发展情况的。鉴于这种偏见在国外有一定影响，现选译此文供对外报道西藏情况参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将西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起，30年来西藏的政治局面和领导力量一直以两种基本类型为其特征：一是努力确保当地居民和领导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二是试图将中国共产党为汉族地区规划的各种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搬到藏族的地理环境中去推行。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实施的政策，曾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极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表现得极为愿意依靠西藏人自己来获得这一忠诚，并曾在文化和经济上相当容忍那

些同在中国本土上通行的做法大相径庭的做法；另一个极端是，中央政府坚持使汉人在掌权的职位上占大多数，并竭力将中国眼下的文化和经济形式强加给西藏。虽然没有一种分期方法能完全准确地反映现实，还是可以把中国在西藏的作为总括起来分成五个阶段：

一、1951年至1959年，自西藏正式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时起，直至西藏发生叛乱；

二、1959年至1965年，自叛乱敉平后进行改革时起，直至西藏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

三、1966年至1971年，文化革命时期以及紧接着的那段时期；

四、1972年至1979年，继续进行政治和经济试验的时期；

五、1979年至目前，进行激烈调整的时期。

## 1951年—195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西藏的头8年是一段相对容忍的时期，西藏原来的统治阶层中绝大多数都依然保持原位，中国本土上所实施的经济改革很少在西藏推行。在这一时期，西藏甚至还没有一个省一级的共产党组织，党的职能是由一个称作“党的工作组”的机构承担的。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称信守1951年的协议，答应不改变西藏现存的政治制度和不强迫推行经济或社会改革，喇嘛教的神权封建统治制度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虽然这类条文包含有不改变现状的意思，可是现实却证

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全部由西藏人组织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固然仍在执政，可是最高权力却掌握在那个几乎全由汉人组成的党的“工作组”手里。最后中国人答应培训西藏人——大概是指藏民群众而不是贵族——来自己“当家作主”。此外，中国人不久还布置成立了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虽然委员会的成员同西藏地方政府的成员有部分重复——例如，这两个机构的首脑都是西藏传统的神权领袖达赖喇嘛——筹备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仅止于世俗事务方面，这是和西藏地方政府不同的。光是这个机构的创立就引起了西藏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意图的怀疑。中国人企图将西藏政府的宗教职能同世俗职能加以分离的种种尝试已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划定迄今一直不明确的西藏边界所引起的敌意一样，那样划法会使被划到西藏当局管辖的边界以外的藏族居民多于被划在边界以内的。

按照1951年协议的其它条款所采取的措施——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发展西藏的农业、畜牧业、工业和商业，而西藏政府则同意人民解放军留驻其土地上——也都大大地促成了现状的不稳定。修建公路，据中国政府辩称，为履行其提高西藏的生活水平的诺言所必需，也造成了其他问题。许多西藏人并不把公路看作是带来繁荣的通道，而视之为便于汉族军民涌进来以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他们的途径。筑路工人也分属不同的两类人：一类是，被诱骗来为中国人干活的西藏人，他们的工资比当地一般人的工资高；另一类是汉人，他们是强制劳力。这两类人都促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西藏人是因为他们增强了的购买力无法为当地经济所吸收，汉人则是因为他们的到来造成了当地食物和住房的短

缺。

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在西藏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并迫切要求再采取其他改革措施。这就增强了许多西藏人对其征服者的愤恨。当某些中国人支持的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时——譬如当据称为优良品种的种子并未能在当地的寒冷和干旱的气候下发芽时——恶感便加深了。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学藏语一事也使西藏人恼怒不已。当地居民显然并不相信中国的善意，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判定，还必须进一步使他们放心。1957年毛泽东在他的著名论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亲口答应西藏至少在6年内不进行改革。即使过了6年后，也只有在群众的要求下才会进行改革。同时，筹备委员会下属的部门精简了，汉族干部调离了西藏。虽然这时候正是在中国本土开展反右派运动之时，在西藏却没有进行群众性的批判和清算。

中国安抚西藏的种种努力，不论如何诚心诚意，也难以持久。就在关于推迟改革6年的决定公布后没有几个月，党的工作委员会就“说服”西藏政府制定了一项重大改革：自此以后免除藏族干部对其领主的徭役负担。这一改革显然是由于一名领主的行为而被迫作出的。这名领主曾因其当上了干部的仆役拒绝承担徭役而殴打了他。对这一殴打事件若不加惩处，就会鼓励其他领主苛刻对待那些对党的话表示向往的农奴。反过来说，干部身份若能自动免除徭役，就能使当干部一事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这一事件成了检验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两者之间到底谁说了算的一个实例。

这一例子表明了双方在合作中各自具有的困难。总的说来，西藏地方政府是表面上同意中国提出的要求，而背地里则

设法违抗。传统政府对一些反抗活动不仅不加制止，有时反而暗中支持。对于被人民解放军捕获的破坏分子或暗杀犯，西藏政府据说一概赦免或仅判处轻微得出奇的刑罚。于是出现了一种别扭的僵局：中国人按照1951年的协议只能通过当地的权力结构进行统治，若无西藏地方政府的尽心协助便不能有所作为，而西藏地方政府却是很少乐于提供这种协助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则尚无足够的力量能将中国人驱之于西藏境外。

可是，西藏人的某些集团却在竭力增强实力，准备叛乱。当人民解放军有一次打破常规邀请达赖喇嘛去看演出的时候，暴动仓促地爆发了。有谣言说，他差一点被劫持，在劫持他之后就将推行全面的大改革了，叛乱肇始于拉萨市，然后迅速向几乎所有主要地区蔓延。只有原为班禅喇嘛居地的日喀则未受惊扰。班禅喇嘛历来都被认为比达赖喇嘛更加亲华。人民解放军轻而易举地平定了叛乱，不过，估计有10万名难民，包括达赖喇嘛在内，逃到了印度，从而令人对中国声称在西藏施行仁政一事产生了怀疑。

更为麻烦的，是那些并未逃离西藏，而是消失在地形崎岖的乡村地带的叛乱分子；要搜捕这些人几乎是毫无办法。他们既熟悉地形，又有当地居民的支持，对中国人进行骚扰时的情景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自己关于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游击战争所作的教诲。

## 1959年—1965年

平定叛乱后开始了汉人在政府的统治集团中担负更大责

任的时期。在此期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更进一步地改变得同中国本土的情况一致起来。中国政府认为叛乱已自动结束了它在1951年的协议中所承担的义务，因而便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而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了西藏唯一的行政机构。筹备委员会不像西藏地方政府，并不是全由藏人组成的；叛乱的结果是筹委会中增加了汉人的成分。有18名原来的藏族委员据称因参与叛乱而被免职，代之以11名藏族和5名汉族。被认为比达赖喇嘛更对中国人友善的班禅喇嘛，接替达赖成了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席。为了免得丢面子，中国人的宣传在叛乱结束后好多年都一直说达赖喇嘛是被劫持走的。

鉴于筹备委员会有了新的地位，增添了职责，便增设了6个部门。其中有的是在1957年当中国人答应6年不改革时撤消掉的，现在获得了再生。由于发生了叛乱，“6年不改革”这句话也就不算数了。在当年推迟改革、紧缩筹委会的编制时调回内地的汉族干部现在又回到了西藏。

经济改革几乎马上就开始了。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在1959年剩下的月份中，农民免除赋税，很多人还领到了免费发放的粮食和无息贷款。“三反两减”运动开始了，其内容是反叛乱、反徭役、反蓄奴，和减租、减息。

接着很快就重新分配土地。凡是同叛乱有牵连的地主和寺院，其土地一概没收；未参与叛乱的，其土地可予购买。当收地和分地的过程尚未全部完成之时，集体化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了。平叛后才几个月，各家农户便被组织在互助组内。虽然一开始的报道便说互助组的数目迅速增加，但即使是像互助组这样的轻微程度的集体化也并非毫无问题。1961

年4月，官员们答应西藏至少在今后5年内将保持处于民主革命阶段。在此期间将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不建立农业或畜牧业的合作社，“以便集中精力完成民主改革运动，领导西藏广大群众进一步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集体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导致生产发展，因而上面那句话相当令人吃惊地表明了失败。

不过，放慢集体化的做法，其结果证明对生产有利。农业和畜牧业据称都有了巨大增长。然而，最出色的成就却在工业方面，被描述为数年之内“从无到有”。据报道，在1964年已拥有50家工厂，几乎全都是195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一家纺织厂的全套设备从上海迁移到了西藏，它在这里可以利用本地区的水力电力资源。在这家工厂和许多别的工厂中，大多数工人都是汉人。由于在1959年叛乱期间有较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进驻西藏，而且经过1962年中国和印度在边界上的对抗又有更多的人进驻，因此在这一时期，西藏的汉族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长。这些人一般说来都不是心甘情愿地移居到西藏来的。西藏海拔很高，对此不适应的人会产生过敏反应，恶心和眩晕；孕妇容易流产，心脏较弱的人有生命危险。有的人始终无法完全适应；另一些人可能要10多年才能适应。即使是那些幸而还能适应的人对西藏的酷烈的气候和缺乏所习惯的可口食物，感到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汉族移民主要只同其他汉人来往，而不去了解当地情况，并且无视党的学习藏语的劝告，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些问题都会限制汉族向西藏移民的人数。可是进入西藏的人数也可以为报刊报道生产增加同藏民不断抱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短缺这两者之间的明显矛盾作出解释：生产确实

是增加了，可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不管怎样，到了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觉得把西藏的地位正式改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已经万无一失了。曾经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的班禅喇嘛证明同中国当局不够合作，他遭到了软禁，取代他的那个名叫阿沛·阿旺晋美的世俗贵族成了新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的首脑。阿沛的7名副主席中，有2名是汉人。

与此同时，党的工作委员会升格成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一名中国军队的汉族指挥员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全部是汉人。

## 1966年—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西藏的这第三个阶段，就像前面一个阶段一样，是以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开始的。这些改革旨在使当地的体制和做法更同中国汉人的一致。同时，由于文化革命的结果，中国汉人的体制和做法也正在改变得更符合正统共产主义的教诫。

1966年8月，好斗的红卫兵，其中多数显然是汉人，闯进了拉萨的主要庙宇大昭寺，捣毁了庙内的佛像。造反者们认为这些佛像和其他西藏的宗教文化物品都是封建遗毒，并且把他们对“四旧”的攻击扩大了范围。有一队人认为西藏比中国其他地区落后得多，就把旧传统和旧道德也列入单子，要破西藏自治区的“六旧”。

在袭击了大昭寺之后，红卫兵就被北京方面禁止破坏国家的文化财富。不过他们似乎被允许破坏封建社会的其他残余。1966年9月，新华通讯社报道说，过去拉萨各屋顶上飘

扬的祈祷旗已经都被五星国旗取代了，而且墙上和各家各户的神龛现在都用毛主席的像来代替那些“迷信的画”了。

1958年在中国本土广泛建立、但未引进西藏的公社制度，在1969年也引进了西藏自治区。次年，《北京周报》报道称，在西藏自治区的35%的乡镇建制中已经建立了666个公社。1971年是公社化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虽然难民的报告说到食物短缺，而且官方宣传也提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这些情况表明，这一运动并不是没有问题。

在文化革命“闯将”的攻击中，西藏自治区的汉族领导人首当其冲，因为“闯将”认为这些领导人对西藏的封建反动势力过分妥协。可是许多曾同中国人合作的西藏人也遭到了攻击，阿沛·阿旺晋美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年迈的佛教学者喜饶嘉措，据后来的报道说，他备受迫害折磨而死。由于许多调来西藏的低层汉族干部都想趁此混乱之机转回中国本土，强烈的个人恩怨就使意识形态问题搅和不清了。

当文化革命的混乱平息下来时，领导自治区党委的那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被调转到邻省去了。西藏的新领导人叫任荣，他是个在当地干过很多年的汉族军人，被认为是个稳健派人物。他既是新的政府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也是重建后的自治区党委的首脑。在党和政府的统治集团内，在任荣手下出现了一些新的藏族面孔，可是他们的年轻和缺乏经验似乎足以表明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大。

### 1972年—1979年

文化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的继承人林彪死后不久，对西藏的社会习俗采取了新的更为顺应环境的态度，在任用西

藏人担任西藏自治区的重要岗位方面也作出了更大的努力。这一情况最初是在1972年变得明显了，那时政府扩充了出版藏文图书的设备，并增加了藏语广播的时间。那一年开始，对喇嘛教也采取了更为开明的态度，文化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一些寺院庙宇得到了修复。1972年7月，采用了一项称作“四项基本自由”的新政策：宗教信仰自由、经商贸易自由、放债获利自由和雇用仆役自由，为了劝诱达赖喇嘛回国，也向他作出了提议。

这一时期，自治区的最高领导层非常稳定。虽然政府和党的最高职位由任荣一人兼任，而且调入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数以千计，可是要使统治集团西藏化的努力继续在进行。据报道，在1977年1月间，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中分别有61%和63%是少数民族，相比起来，周恩来于1955年为这两类数字所定的目标都是70%。不过，在党和政府及军队的金字塔上，越靠近顶点，西藏人所占的比率越低。

尽管如此，西藏人在西藏自治区获得体面职位的机会，确乎正在改善。1977年初宣布了对前叛乱分子的大赦，其中很多人是自从1959年叛乱以后就被关进监狱的。那些流亡在外的被邀请回来探亲访友，如果愿意则请留在西藏。向达赖喇嘛又一次作出了请他回来的提议；他同意派一个代表团代替他作一次视察旅行。

在经济方面，对流行于中国本土的型式作了些改动，以表示尊重西藏的条件。《北京周报》上描绘的一个模范公社在拥有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方面都比中国其他地区的公社要少。公社的组织方面是两级结构（公社和生产队），而不是

中国本土普遍皆是的三级结构（公社、大队、生产队）。此外，农业税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为基础征收的。

与此同时，在耕作和畜牧方面还采用了一些颇为惊人的革新。耕种了小麦，以之取代西藏人的主食青稞。政府兴办的养猪计划也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瓜果菜蔬，包括西红柿、胡椒、苹果、桃子、梨，也开始种植了。虽然官方宣传把这些种植物的丰收归因于党把先进科学的好处带给了感激党的恩情的西藏人，可是一位久居西藏的英国人曾在20年代时写道，所有这些种植物都曾小规模地种植过，主要是供当地的汉民食用，因为绝大多数西藏人对之并不感兴趣。这段期间还开始培育新疆细毛羊和种植茶叶，据说边境上的战士还在推广种水稻的技术。

宣传工具的典型的做法，是把所有这些试验都说成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在1974年，西藏这个很少有高级党政领导人来到的地方，接待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大寨的英雄陈永贵率领的代表团。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上批准访问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深表同情的外国客人对西藏的繁荣所作的美妙的描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宣传工具对陈永贵的访问的报道中并没有这类大肆赞扬之词。陪同陈永贵进行这次视察的任荣承认自治区的工作还有很多缺点，还远远落后于党中央的要求。同样地，像这样的说法："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些地方的农牧业生产没有上去，责任不在于群众，而在于生产条件。"（1974年12月1日拉萨电台广播）并不表明西藏的成就有什么值得特别骄傲之处。

经过陈永贵的访问之后，条件似乎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

善。1979年初，据说又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团来到了西藏，但是官方未作任何宣布。那年的五、六月份，大批汉族干部调进了西藏，看来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上的问题，对此另一种解释是，由于大量在文化革命中挨整的干部得到了平反，中国本土的干部已人满为患，调些干部进藏是为了缓解一下这一局面。

## 1979年至今

1979年秋天时，宣传工具已把它们早些时候的暗示讲得一清二楚，即：西藏的现实并不是外国客人和《中国建设》杂志所描绘的玫瑰色脸蛋的农民站在丰收的庄稼跟前的形象。收成低到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程度，该责怪的决不仅仅是气候条件不佳。冬小麦经过了1972年到1975年的几年好收成之后，吸尽贫瘠的土壤中的养分，产量逐步下降。到了1979年，由于未能对产量下降的原因提供对策，土壤很快就耗尽了养分。其中大部分土地若要恢复其活力，非得休耕相当一个时期不可。

小麦种植计划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因为西藏人喜欢吃他们传统的青稞，而对汉人强迫他们生产和食用小麦以及猪肉和蔬菜极为不满。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在被迫为居留在西藏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汉人生产食物，而不是为自己。中国人的存在差不多已肯定使得一种不稳定的、但是基本上还是有益的生态平衡，跌到了灾难的一边。这一论点已为曾在1980年分别访问西藏自治区的两个西方博物学家小组所确认。这两个小组都注意到了植物、野生动物和鸟禽的同时退化，并且描述了西藏正在经历的“生态上的苦

械”。

食物短缺更加剧了早已存在的、一般说反对汉人、特别是反对军队的紧张局势。代表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受到了西藏人的包围，他们往往流着眼泪倾诉着种种悲痛的经历。感到窘迫的中国人最后命令代表团缩短了访问。

这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难真相一旦公诸于世，中国政府就迅速行动起来对付主要问题。任荣于1979年8月被免去了自治区政府首脑的职务，而由一位西藏本族人天宝取代。从西藏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天宝不可能成为理想的选择。他生在四川，不在西藏，早年参加了共产党，在西藏自治区的日子很短。不过，他既是藏族，又是党中央委员，这一事实就具有一定的象征性价值。

次年5月，由必将接任中国共产党第一书记之职"的"胡耀邦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西藏。它的部分解决方案是免去任荣自治区第一书记之职。继任荣担任自治区党的首脑的阴法唐和继任荣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府首脑的天宝不一样，他不是藏族。然而他被任命为代理第一书记而不是正式第一书记，就引起了人们的猜测——不久可能任命一名西藏人来担任此职。这一猜测即使不对、也不会对中国人同西藏人的关系带来什么危害。阴法唐和任荣一样，是汉人又是军人。他是1950年随同最初的人民解放军占领部队进入西藏的，在西藏已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并且能说藏语。

挑选又一位军人来当第一书记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军民关系紧张，小规模叛乱时有发生所致。1979年9月，军队奉命撤出它在日喀则地区占用的一所寺院，数月后，西藏自治区的各部队都重新学习了对待西藏的政策。新兵们还要特

别听一些课程，以懂得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同时，政府宣布了计划，把在西藏的汉族居民的大约80%调回中国本土。到1980年底时，似乎迫切需要完成这一任务，以致于党中央从空军调派来两架伊尔—18飞机来帮助迁移。那些留下来的汉人则被敦促学习当地语言，和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

北京派来的这个代表团以这次访问为基础，还发布了一项布告以求恢复西藏的经济。其内容简要地说来包括：

——西藏在两年内免征农、牧业税，国家不派购农牧副产品。将鼓励生产队和个人将多余的农牧副产品自愿出售给国家。

——国家保证不向地方上摊派人员，也不征用当地居民的劳力。国家举办建设事业需用劳力时，可同有关公社或生产队签订合同。

——各级政府不准再就生产安排、产量定额和种植计划下达指令。生产队和个人有权自己决定该种植什么（包括青稞）以及怎样种法。

——保证生产队有权决定其成员采用集体的或个人的生产责任制。常年作业组和临时作业组都可以准许，在偏远的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

——重申有权拥有自留地、自留畜，和从事家庭副业。保证有权出售或交换从自留地、自留畜和家庭副业获得的产品。

——取消妨碍西藏同邻国进行边境贸易的规定。允许尼泊尔、印度、不丹、锡金和缅甸的边民自由进入西藏进行贸易。

虽然要期待这些政策见效显然还为时过早，可是1980年的收成看来已比1979年的有所增加，而调走一部分汉人一事也缓解了食物供应的部分短缺。尽管正在采取措施解救因中国进驻西藏所造成的生态灾难，然而要愈合心理上的创伤，却要花费更多得多的时日。代理第一书记阴 法 唐于1981年1月发表讲话时，提请大家注意政治上不稳 定的 严 重 问题："目前存在着许多破坏稳定的因素。有一小撮坏分子，趁着我们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调派大批汉族干部和工人去内地、并纠正左倾偏差之机，在各民族之间挑拨离间，破坏祖国统一，煽动宗教狂热，宣扬神谕天旨，散播恢复反动统治的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和进行复辟活动"。

出人意料的是，骚动最严重的地区竟是日喀则。这块班禅喇嘛的居地，在1959年叛乱时确曾是西藏唯一保持平静的地区。在种种社会骚乱中被捕的人之中，大多数是青年。

## 结　　论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西藏的最初几年，许多西方人士以及无疑地还有许多中国人都认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力量传入西藏，西藏人对作为西藏民族主义的凝聚力量的喇嘛教的信仰将会逐渐淡薄。而且，随着西藏一些游击战士日益年老以及人们深信叛乱并无希望，西藏人就会宽厚地默默接受中国人的统治。这两件事现在看来都没有发生。尽管有过几段时期进行了压制并且毁坏了许多庙宇，很多外界的观察家都确证西藏民族主义和喇嘛教佛教仍具有力量。反对中国统治的矛头看来已由年老的游击战士们和逃亡在外的人士传给了新的

更年轻的一代——这一代人都出生在中国统治时期，没有经历过任何其他统治。

撇开西藏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愿望不谈，要说他们的"国家"能在可见到的未来从中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那是不可想像的。为了使这一统治更顺利地被接受并减轻治理西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所付出的代价，中国政府有责任信守诺言，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公开承认，自从接管西藏以来对这一生活水平并"未有显著的改善"。它还必须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向西藏人表明，它将实现使他们"当家作主"的保证。眼下推行的政策肯定代表了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可是，正如从前述情况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类保证过去也曾提供过，却由于北京在意识形态方面或人事方面的变动而取消了，结果使得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面临了一场严重的信用差距。

# 红星照耀香格里拉

T·D·奥尔曼 著 刘敬师 译 张植荣 校

**编者按**：1974年，西藏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文革”给西藏带来了灾难。T·D·奥尔曼作为一名西方记者于该年初访问了拉萨，写下了这篇报道，登在《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2月11日)。该刊的按语说：“根据这位访问者的报道，西藏与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既取得了进步，也遭受了许多损失”。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西藏生活侧面。

译自1974年2月11日《远东经济评论》。

有报道说，布达拉宫和西藏首府的其他神龛和地面文物遭到共产党分子的洗劫、亵渎或者听凭其破败损坏。但是，对拉萨有最新的、直接了解的人们对此持嘲笑态度。

这些了解拉萨的人报道说，达赖喇嘛的宫殿，如拉萨著名的“tourquoise—roofed bridge”和“theGtsung—lag—khang”——西藏最神圣的庙宇——受到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的保护。大批喇嘛和尼姑住在这里。神龛上圣迹和艺术品——西藏的流亡者已经声称被毁被盗的东西——永久

地在此展出。

但是，自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逃离故土十五年以来，布达拉宫所发生的一切也许可以概括作为一个整体的西藏所发生过的一切。据那些最近才参观了的人说，布达拉宫被保护得一尘不染。但它再也不是西藏人生活的中心了。政权已经转给一个新的、不实行神权统治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强烈地倾向中国，曾经使西藏成为人类生活博物馆的巨大建筑物今天正迅速地变成过去的陈迹。

作为“禁城”而闻名几百年的拉萨长期以来谢绝非共产党的甚至非中国共产党的游客的惠顾，以至大多数人现在已基本上接受了那个地方五十年的生活写照。但是西藏的生活并不是一本完全合上的书。从那些仍然有权进入拉萨的极少数几乎使人感到不平的匿名者的第一手 描 述 中 所显露出来的，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栩栩如生的社会画面，与它的过去相比，这个社会目前更多一些公平，却少一些缤纷的色彩。

每年的这个时候，拉萨就冷得发抖。冬天的晚上，拉萨的温度通常降到华氏〇度或摄氏一13度。共产党开始使西藏现代化之时，水力似乎是最显然的电力来源。但是冬天西藏的河流冰冻了，因此水电供应便要减弱。也许将来某一天，整个西藏高原可以变成一面巨大的光屏来 收 集 太 阳能，但是，即使到那时，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西藏——和喇嘛的神权主义统治下的西藏一样——仍将是偏远贫困的。

一成不变的环境因素在每年较温暖的季节也要继续决定西藏的生活节奏。郊游季节，所有拉萨人就象他们的游牧祖先那样，锁上房子，跑到城郊去宴乐、饮酒、跳舞和狂欢。西藏庆祝他们家乡短暂温暖的好时光，然后醉醺醺地重返城

里，再次面对世界上最恶劣气候之一的残酷无情。

据那些最近目睹过西藏庆典的人说，拉萨的汉人并不参加庆典，但他们既不干预也不阻止这种事。

宗教仪式也打乱了西藏人的生活周期。共产党的统计数字说，西藏120万人中有20%仍然是出家人，但是喇嘛和尼姑正在变老，他们从年轻一代难以得到新成员。有人对我说："共产党忍受过去，因为他们相信未来"。

但是，象各地的年轻人一样，西藏的年轻人彼此之间的兴趣通常有甚于对意识形态的兴趣。他们平日大群大群地聚在拉萨的四个电影院，不仅看藏语和汉语的电影，也购买点心和无酒精饮料，并调情取乐。逛马路的一对对情侣在拉萨并不稀奇，而不象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男人们穿汉式服装，而女人们，不论老幼，仍然穿戴西藏的传统服饰。

但是，西藏精巧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现在再也见不到了。这个地方的大多数财富——游牧民族总是以一种变动的方式加以保存——已经被偷运出去。我听说，西藏的边境，特别是与尼泊尔和不丹的边境，决非完全禁绝了传统的走私。共产党声称，最有价值的金银珠宝已经被运出国外，支持在印度的西藏流亡者。

但是，对那些在旧的僧侣神权统治下从来买不起珠宝，买不起成群的绵羊和牦牛，买不起堡垒式的房子以及其他象征社会地位的东西的人来说，生活无疑是改善了。

一位到过西藏的游客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在重大的变革发生以前——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个在农奴的担架上出生的贵族，当时正在穿越高原的途中。他有着可想而知的娇嫩皮肤，覆盖着温暖的衣物和精巧的珠宝。围着他的农

奴们都是赤足，冻的发抖，神情憔悴，衣衫褴褛，这使人想起了被雄蜂团团包围的伟大的蜂王。至少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

藏语仍然是官方和教育用语，尽管现在所教的是技术本领而不是佛教经典。汉语被当作第二语言学习。一些非共产党消息灵通人士否认汉人已经通过汉族移民使西藏殖民化。政府机关仍掌握在藏族人手里，尽管汉人也拥有许多职位——也搞权力均衡。

我听说，西藏的一个问题是，那些古老的贵族家庭的成员，由于他们在社会和教育上的优势，仍然比例悬殊地占居着大多数官职。但除了水电工程之外，汉人在向西藏引进新生事物方面也得到了信任。

这些新生事物包括无论晴雨可以通车的连接各地方首府的公路，也包括连接拉萨同尼泊尔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公路，还有接通拉萨和四川成都的定期航班。把西藏东部各地和中国连接起来的铁路已经建成。现在，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前往中国学习先进的知识。

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似乎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得自土地和家畜的收入归合作社所有，而不再归(不居于产权所在地的)地主或僧侣集团。现代畜牧业正在提高牲畜的数量和质量。教师、医生和兽医——有的是藏人，有的是汉人——不再端坐在大城市里，而是跟着牧民跑。教师在帐篷搭成的学校教书。病者治病，无论人畜，可到随牧民迁移的可移动诊所。生活仍然很艰苦，但获得了进步却是真真实实的，想想二十年前，在西藏，甚至连天花接种也闻所未闻呢。

消息灵通人士都承认，西藏跟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也经历了大混乱。他们也承认，西藏的改革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地在传统生活方式上造成了许多变化。另有一位游客说，“你可以说，西藏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已经取得了进步，当然也同样遭受了一些损失”。

1959年美国通过了一个法案，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他们独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但也得指出，这个法案并没有提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也没有支持西藏流亡者所作的声明。流亡者认为西藏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自治区。

在自治的地位上，西藏似乎已经保留了大部分旧的东西。但同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西藏一千三百年的历史记录上，大多数人的需要而非小部分人的特权首次成为政府的行事标准。

但是也不容怀疑，作为这些变化的一个结果，西藏——象亚马逊河、蒙古和阿拉斯加一样——已经不再是一个僻远冷落的地区和独一无二的所在。

对新学校之所得和旧仪式之所失进行比较是困难的。但是，正如一位游客所意识的那样，对那些来自舒适生活环境、崇拜西藏文化的远客来说，也许他们的确要感到比那些从前遭受过艰苦生活的藏人失去得更多了。

# 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

（美）M·C·戈德斯坦 著

扬凡 译　植荣 校

**编者按**：戈德斯坦是美国一位人类学家和著名藏学家。他不仅懂藏文，而且讲一口流利的拉萨话。他编撰的《现代藏语》、《现代藏族文学》和《现代藏英词典》，以及他对藏族社会卓有成效的研究，使他成为北美藏学界的权威。六、七十年代他赴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藏人聚居区进行过长期的实地社会调查。80年代以来，他是第一个得到我国政府允许进入西藏作长期实地考察的西方学者。1986年至1988年，作者深入西藏西部牧区的帕拉乡进行了为期16个月的深入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戈德斯坦写了几本足见学术功底的著作与文章：长达900多页的《西藏近代史1913—1951》、《20世纪的西藏问题》、《西藏西部的牧民》、《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作者还打算在西藏进行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寺院经济等。这都是一些前所未有的研究课题。他吃苦耐劳、认真探索的精神令人敬佩，他客观公正的写作态度值得赞赏。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并且超出了学术界。

本文译自美国《亚洲概览》1989年6月号。

学者们比较注重从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变化入手来研究中国的改革政策。但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这方面的情况却涉及得很少；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由于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刚刚成为可能，没有任何已成的资料。我们对拉萨西北500公里处的昂仁县，帕拉乡这样一块传统的西藏羌塘高原牧区进行了考察，写成了本文，希望读者能从中国80年代后的改革政策对帕拉地区的冲击了解一下整个西藏50万牧民的生活变化。帕拉地区大约有650平方公里，1989年时共有57户人家265人，这些人分居在10个野营地上。这里的牧民放牧山羊、绵羊、牦牛和马，不从事农业。绵羊和山羊约占放牧头数的87%，牦牛占13%。

本文在形成中采取了一些象实地观察、深入采访等传统的方法，所用的数字都是经过系统计算的生物和生态参数。所有的采访都是在西藏进行的，有进行录音和记录的类似正式的采访，有单是收集资料的非正式采访。采访中没有任何限制，没有官方人员陪同。我们住在自己的帐篷里，根据需要随时对帕拉的营地进行采访。我们选择帕拉作为调查地区是因为这一地方符合我们调查的三个既定标准：1）相对偏远——它在主要的东西公路以北185公里；2）传统——它不是那种实施特殊发展计划的非典型地区（象西藏西部一样仍采取传统的生存方式）；3）海拔高——牧区主要营地海拔在4800—5200米之间（这是本文考察的人类理想的生理活动高度）。

## 一、历史回顾

清朝时期中国同西藏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正式的条约或

书面协定来规定下来。西藏很松散地从属于中国，用自己的官员和法律来管理自己。清朝主要通过派驻在拉萨的钦差大臣来把权力和影响渗透到西藏，而不是由中国的地方官员来完成。清朝灭亡后，大批的中国官员和军队被驱逐出西藏，1911年以后的50年里，中国和西藏一直都在寻求一种双方都满意的长久的方案来解决"西藏问题"，但一直没有成功。对西藏来说，这样一种方案意味着要有充分的自治权力，对中国则标志着再次宣称对西藏的统治。1949年，蒋介石失败后，西藏问题的解决比1911年无任何进展，虽然这时英国、印度和美国单方面坚持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但在同西藏交往时又把它看作一个主权国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着手解决西藏问题，两年后，打破了1911年以来的僵局。1950年10月，中国军队进军西藏东部，俘虏了那里的全部西藏军队，并且开始与西藏谈判。1951年西藏派出代表团到北京，终于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协议中，西藏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交换条件是在西藏继续保留达赖喇嘛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1951年秋天，中国军队和平进驻拉萨。

达成十七条协议是很不容易的，让它确实发挥作用困难更多。1951—1959年间，西藏传统政府和中国官员之间屡有冲突，1955—1956年以后，在边远地区的反抗愈演愈烈。最后，1959年3月西藏发生大规模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和许多西藏人流亡国外。从这一点来说，传统西藏社会瓦解，西藏处于中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 二、传统时期的帕拉牧区

1959年前，帕拉的牧民臣属于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生活在班禅的一个叫那加洛江（Lagyab lhojomg）的牧区的一块土地上。象农民一样，牧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块草原上，不拥有牧群，不得擅自到别的牧主的牧区。另一方面，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已的家畜，相对于牧主也有自己的权力。在书面协议中，不仅规定牧民有纳税的义务，而且写明只要牧民纳足税后，班禅就不能驱逐他们或拒绝他们进入牧场。经济上，牧民对班禅的义务主要是交纳酥油（喝茶用，也作为班禅在日喀则的最大的寺院的还愿灯的灯油）他们也交纳象兽皮、绳子、羊毛、牲畜和盐等。

在那加洛江，班禅负责制订法律维持秩序。他任命官员来受理一些地方上的案件。班禅和他们官员们每三年进行一次成人的人口普查，并依据普查结果来分配牧场（和税收）。每一家在一次人口普查之前对分到的牧场有使用权。

## 三、中国直接统治之早期（1959—1980）

中国政府用强硬手段平息了1959年拉萨叛乱，并没有采取措施马上在西藏实行集体化，而是采取把西藏逐步“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帕拉的寺院被关闭了，和尚们被遣返回家，政府任命了新的地方官员，这样，一个正式的牧民阶级就产生了。但是被新化成的富农或牧主代理人，财产未被没收，只有那些积极支持叛乱的前领导人例外。所有的人家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牧群并象以前那样经营。1959年前的债务被废除，1959年的契约按低息计算。

1961年早期，这种互相的相对温和的政策在帕拉实行。那些中农和贫农被编入互助组，几家为一组，共同管理牧场，共同放牧。经济政策中仍保留了一些个体家庭的特点，象收入方面就是。这一时期也对富农进行了区别对待，他们不能加入互助组，必须交纳高额的税金。但他们可拥有自己的畜群，也可雇佣贫穷的牧民，但要比中、贫农付更高的工钱。

文化大革命后对帕拉的日常生活的政治渗透更加激烈。1969年早期，由于政策规定要把牧区变成公社，年底，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富农的财产被充公。一夜之间，帕拉成立了两个公社。牧民们成了公社财产的主人，但实际上仅是服从公社领导人命令的劳动力。牧场的生产技术没有什么改变，但社会和政治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生产、销售的权力从家庭转移到了公社。象中国其他地方的农业公社一样，牧民靠劳动挣工分来生存。年底靠工分来分红。

在人民公社时期（1969—1981），不管是征用牧民的牧场，还是重新安置牧民到农业区，或是安置藏族或汉族农民到牧区，都没有去有意地减少牧区的面积。在帕拉地区，也采取一些措施，如灌溉、围起牧场等来提高产量，还在一小块地区建立了农业实验田，但全部失败了。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受到严重压制，牧民的传统文化还是表现出

来。破四旧运动（旧观念、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目的是抛弃传统的文化，建立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文化。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情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伦理的认同。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新的文化和经济自由之浪冲击着中国。1980年，中共派出一个高层的代表团去西藏调查，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掌权等事件的影响才波及西藏。实际上代表团是去考察21年来中国在西藏直接统治的结果。虽然中国已正式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关于意识形态和经济的错误见解，并承认它造成的危害，但是共产党第一任西藏自治区书记任荣仍在报告中说西藏的政治气候是很好的，仅存在着经济问题。1978年，香港的一个中介人向中共和西藏流亡人士建议该是双方谈判的时候了，这促成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住在香港）与中国代表接触，并达成邀请达赖派代表团去西藏自由考察的协议。北京自信1959年以来西藏的进步会影响这个代表团。

这一包括达赖的哥哥洛桑三旦的代表团先到达了青海的

安多地区，在那里，代表团受到超乎寻常的欢迎。北京为对达赖的支持而担忧，于是就通知任，如果代表团到达拉萨，将会发生什么。据他回答，拉萨的人民比安多的牧民、农民更加支持共产主义，因此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西藏的地方官员也确信如此，西藏的党委也召开市民的会议，规劝当地群众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向代表团扔石头或吐唾沫，拉萨人默默地接受了。相反，他们给予了代表团以超出他们在青海所受到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围着代表团欢呼，流着热泪，长跪在地，献上他们的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有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由于有北京的代表团陪同，任荣，一个对西藏人民不抱任何同情心的人，无法掩盖他的惨败。

当流亡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后，成员们私下向政府透露，他们为亲眼所见的在西藏的大规模的宗教和文化破坏而吃惊，他们抱怨那里贫穷、落后、物质不丰富。抛开文化不说，象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汉人的水平。这些使中共高层人士震惊。他们原来期望让代表团看一看20多年来中共统治下西藏的进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对话，以达成对中共有利的协议。面对这些强烈批评中共西藏政策的报告，他们被迫重新调查对西藏的政策。

北京派出了代表官员去西藏进行了大量的基本的调查，1980年5月，胡耀邦和万里赴西藏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感到惊讶，于是北京政府马上采取措施，把任调回北京，胡耀邦作了一个公开的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同其他省份相比，西藏人的生活水平相当落后。这意

味着必须大大减轻这一地区人民的负担，在以后几年里，西藏人民将被免去任何税收和收购任务。……所有的摊派必须被取消。将不派给西藏人民任何义务劳动。农民和牧民的产品可以按协商后的价格出售以满足互相的需要，不须向国家交纳收购任务。

——在这一地区经济领域内将实行特殊的灵活的适合本地条件的政策，包括农业、畜牧业、金融、贸易、商业、通讯、手工业等，以使西藏的经济能快速发展。

——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西藏进行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的改革。西藏人民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西藏的佛教、音乐、舞蹈、医药、戏剧等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都值得研究发扬，这项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

西藏的教育情况不好。考虑到西藏的具体情况，应该在该地区设立大学以及中等、初级的学校。由于一些文化遗产及寺院的佛经都被破坏，应有意识地去加以整理、保护、研究。汉族的官员应学习藏语，以免脱离群众。必须尊重西藏人民的习惯、风俗、历史和文化。

据说胡的公开讲话比对干部的讲话要温和得多。在对干部的讲话中把对西藏20年的统治比作殖民统治。胡的讲话，鼓舞了那些海内外提倡在西藏改革的人士。

1980年以后中共对西藏的文化政策基本上与其他地区的政策一致。总体上在两个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着差异：直到1990年才在西藏实行税收，西藏自治区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不执行中央政府一些违反西藏文化的政策。

## 四、新政策对文化体制的影响

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我们在帕拉考察期间，牧民们能自由地从事他们传统的宗教仪式。许多牧民家里设有香炉或是插有经幡。牧民们不再担心宗教性摆设会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达赖的徽章或公开摆有达赖的照片。摇转经筒，数佛珠、磕长头等都是很常见的。甚至在官方举办的一些活动，象夏季赛马会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可在一个权当寺院的帐篷里祈祷。

1987年12月的一个下午，几个牧民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到我们的帐篷里收听印度台的藏语节目，这一事实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带来的影响。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而我们的帐篷离一个中共干部的帐篷只有几米远，我们就问他们是否在乎那个干部听见没有，牧民们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听。"牧民们自由地到寺院或圣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萨旅行。许多人积极支持一些佛教活动的回归，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帮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时雇僧人超度亡灵等。

上面所说的这些传统的活动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开始，牧民们担心新政策是一个圈套，借以清除右倾思想。谁也不愿因为带头而被划为重点对象。牧民们就一步步地行动，来验证新政策的可靠性。当牧民们发现上面的官员（都是藏族）根本不在乎时，就大胆地行动起来，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牧民中巫师的出现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宗教活动不但中共、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都认为是不必要的。1981年冬天，帕拉的一个人重病后，就有一人扮作巫师，恍

惚自称他代表神来看病，以后的日子里，官方并未对这一事情追究。他和其他一些人就进一步推广一些传统的巫师活动。现在在帕拉遇到谁有病时，还常常有人请他去。

所有的这些变革都是一种"文化复兴"。"复兴"这个词是50年代安东尼华莱士提出的。当时一些民族开展崇尚国货，排除外来势力，自己拯救本国的运动，以摆脱原来的社会文化困境，"通过社会成员的有意识、有组织的斗争来建立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文化体制"。华莱士把这种运动叫做"复兴"。他认为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因为处于一种"认同的两难境地"，即两种文化，一种政治制度。他写道：

〔复兴运动〕：社会和文化压力所致。实际上是为了摆脱压力，建立一整套教义、神话和仪式的体制，以与现实的世界相吻合，并用来有效地指导行动。

西藏的情况基本上符合华莱士提出的复兴运动的条件。华莱士推断道，复兴运动发生时，人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文化的不合理性。这在西藏表现得很明显。当接触异己的中国文化时，牧民们被告知他们的传统的领导人是人民的无耻的敌人，他们的传统的价值信念是不道德的，是人剥削人的。他们被迫放弃他们原来对世界的认识，并积极地去接受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他们经历了一段道德信念上的艰难历程，当他们把这些信念付诸实施，去批斗那些以前是他们的朋友或亲属，但现在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时，更令他们难以忍受。

但是，从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来看，西藏的情况又与华莱士的模式不相同。因为西藏并非有意识、有组织地以个人或团体的形式去改变社会的反常，从而创立一种新的文化机制。

西藏的运动是一种自发的、分散的运动，社会成员对传统的文化经过一些再选择而形成新的文化。这种分散的运动的在帕拉遍及每个方面，他们重新忌讳狩猎野生动物、宰杀牲畜。佛教认为杀生是有罪的，传统上，牧民们把屠杀（还有在牲畜耳朵上作标记）同那些世代"不净"的阶层，即贫穷的和不信宗教的人联系起来。这一风俗遍传西藏，许多牧民不再宰杀自己的家畜。

我们在帕拉采访时，有一件事情说明了帕拉人是怎样把传统的教义融合到现在的文化体制中。一个以前贫穷的牧民（公社时期的一个干部）在挤奶之前就把一头羊给卖了，这违反了传统的观念。牧民们认为这将影响整个营区的产奶量。同营地的一个人（曾被划为阶级敌人）非常气愤，他斥责了卖羊者。最后两个人扭打起来。他们到乡政府去评理，贫穷的牧民控告富农瞧不起他，并把反动迷信强加于他。当地官员并未站在他的一边。相反，他对打架的两个人都处以罚款，这变相地允许了这种风俗。另一件事是一个妇女在挤奶时不小心用绳子把羊子勒死了，他们把羊的尸体扔到邻近的一个湖里，尽管是一个妇女不小心弄死的，也没有吃掉它。

在婚姻方面也体现了传统的习俗。大量的富农都喜欢找旧社会有社会地位和背景的人作配偶。所有的牧民都不愿意与"不净"的人结婚。同样，传统的行医习俗也流行起来，几个帐篷的年轻人经常自发地在一起象以前那样又跳又唱。象以前那样，每年夏天，牧民们又雇佣那些走20—30天（单程）来到这里的人，雕刻石块，做成玛尼堆，并铸泥制神像、建祈祷墙以及储藏处和住处。这不但划分了农民和牧民的社

会界限，也重申了牧民的生活价值。

80年代后对西藏的文化政策，使牧民们能重新继承他们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机制，按自己的意愿来认识世界，重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的自豪感。虽然牧民们深深地懂得政府决定着他们在传统文化上走多远，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又不一样（许多牧民对传统的宗教和价值观不是那么有兴趣），但是牧民们仍为这一转变而感到高兴。不过由于政府随时可以干涉他们，把异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们，牧民们在感情上确实有焦虑，担忧的倾向。这也阻碍了这一运动的积极发展。这也是新政策与实际效果不一致以及西藏对政策的反映不积极的原因。让牧民们忘掉共产党最初统治的20年还需很长的一段时间。

## 五、改革，生产和贸易

中国的新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藏的生产方式，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象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中国在西藏实行责任制。1981年秋天在帕拉开始实行。公社的所有的牲畜都分给了牧民。一夜之间，牧民又象1959年前那样拥有自己的牲畜，自由管理、生产、买卖。每个牧民从公社分到39头家畜，4.5头牦牛、27头绵羊、7.5头山羊。另外，每家可继续拥有在公社时期自己的家畜，这使人均拥有的牲畜头数量达到47.4头（4.7头牦牛、27头绵羊、10.7头山羊）。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至少直到1990年，中央政府一直免除西藏的税收和国家收购任务。居民也可自由地采取他们喜欢的方式去就医。

现在同过去一样，帕拉的牧场放牧牦牛、绵羊和山羊，

自已消费掉一部分产品，卖掉另一部分来换取必需的大麦和茶叶。由于大约50%的热量来自大麦和其他谷物，谷物的买卖就成了牧民生计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一般地，牧民们在冬天步行20—30天到东南部的农区去购买谷物，谷物商人则在夏天来到北部高原同牧民们做买卖。这些私人的贸易活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禁止过，但新政策实施后，很快就兴旺起来。羊毛是牧民的很重要的商品，山羊绒在传统上不占重要地位，但过去几年中，它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1988年，按官方比价，山羊绒比羊毛贵6—8倍。牦牛、绵羊、山羊都产奶，牧民们大量制作酸乳酪、酥油和干酪。

生产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是狩猎和盐的买卖。这两项都是补充性的活动，收成好时就很少有人从事。由于1981年以来经济情况的好转，大多数富裕的和中等的牧民都因为宗教原因而放弃狩猎，只有贫穷的牧民仍在从事这一活动。传统上，西藏的牧民是西藏地区和尼泊尔山区的主要产盐者。每年春天，一些帕拉的牧民就带上一群牲畜，走大约30天到西北部的一个盐湖去造盐。他们所产的盐大部分作为"盐税"交给班禅活佛，剩下的卖给农民。由于新修的公路开通到盐湖，大量廉价的中国盐输入，其他的产品价格又相对高一些，做盐生意的利润大大减小。许多牧民都放弃了这一生产方式。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新的市场经济使他们成为经营者、承包者，公社时期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区和县的官员们也不反对，相反，象下面将要谈到的那样，他们自己也成为经营、承包者，并通过多种方法来操纵市场，以获取最大的利润。

目前，在帕拉地区有5种贸易形式：1）在区、县级同政

府进行贸易。2）传统的贸易——在北部高原的边缘同农民进行贸易。3）同夏季到高原的农民或商人进行贸易，包括产品的买卖以及雇佣劳动。4)同其他牧民进行贸易，交换马、家畜等。5）新出现的是同日喀则进行贸易。

虽然新的经济政策允许牧民们自由地买卖他们的产品，但是政府贸易口的官员通过一些合同或收购任务来控制羊毛和山羊绒的买卖。原因是很简单的，这可使干部们获利。牧民们被区县的干部们强迫向国家出售一定量的这类产品，而这又被看作是在自愿的合同下所进行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日喀则地区贸易局同昂仁县贸易局签订合同，购买一定量的畜产品。根据每个区的畜头数，县把这一数量分摊给各个区。同样，区里又依次把数额分摊给各个乡，乡里再计算出每家牧民应负担的数额。在完成这些收购任务之前，政府都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来防止牧民在其他地方出售这些产品。1987年3月2日，区政府给帕拉乡政府领导的一个文件中写到：

“今年的征购任务量已下达。你应尽力动员和组织好群众完成任务。未完成征购数额者不得私自卖给任何其他人。乡政府务必坚决执行这一决定”。

文件中继续警告到：

“牧民私自卖掉征购任务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未完成任务就私自出卖，必须没收其全部所得，并追加罚款1元。

将视任务完成情况来决定是否给乡或乡以下单位以救济金。未完成的不予发给救济金，已完成的要多发给救济金。同样，国家也不把谷物和其他必需品卖给未完成者。”

在党的致富政策下，羊毛和山羊绒贸易十分有利可图。贸易口的官员们实在不愿放弃一个稳定的供货处，虽然法律

上规定此处无征购任务。西藏自治区外贸厅的厅长的一段话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县级干部们所面临的潜在的压力：

“西藏有5百万头山羊，每年应产500吨羊毛。但目前只征购150吨。除了增加征购量外，还应扩大加工规模。”

表1　昂仁县1987年从三个区征购量

| 区 | 羊毛（斤） | 山羊绒（斤） |
|---|---|---|
| 查孜区① | 63,650 | 4,376 |
| 措麦区 | 57,206 | 2,979 |
| 桑桑区 | 25,139 | 2,350 |
| 总计 | 145,895 | 9,704 |

①帕拉乡属该区。

羊毛和山羊绒的利润是很稳定的。表1说明了1987年县里从三个区的征购数量。

1987年，县贸易局以每斤3元（或6斤谷物）来购买羊毛，卖给地区是每斤3.9元，赢利30%。以每斤13元（或26斤谷物）收购山羊绒，以20元每斤卖给地区，赢利54%。县里羊毛和山羊绒的总利润是199,232元。实际上比这个数字要大，因为牧民们都喜欢换谷物，而县里以高出收购价0.5元的价格把谷物换给牧民。总利润中，一部分作为工资付给贸易处的工人，10%作为税交给自治区政府，还要扣除运费，但是利润还是很可观的，以至县里高层干部每年的工资达2500—3000元。

如果利用市场差价，这些畜产品就更有利可图。中国把贸易数字当成秘密，所以我们无法从国家贸易机关得到羊毛和山羊绒价格的官方数字，但是，其售价仍可以从不同渠道的信息中看到。1987年，未梳理的山羊绒在广州每斤售价大约是12.50美元（46.5元）。这个价比卖给县里的每斤要高

出2.3倍，比帕拉牧民的所得高出3.6倍。造成这种差价的唯一的人力劳动是按颜色把山羊绒分成不同的等级。如果在售前对山羊绒进行处理，价格会增一倍——大约每斤25美元（93元）。据说，1987年羊毛是以每斤4.6元的价格销往广州和上海的，这比县里的所得高出18%，比牧民所得高出53%，1987年出口到尼泊尔的羊毛，在尼泊尔边境售价是每斤6.5元。比较1987年牧民以不同价格卖出的145,895斤羊毛的收益，可以看出利润的分配——牧民得到437,685元，县里得568.991元，而地区（按尼泊尔价格计算）得到948,318元。这样，在羊毛贸易中，县里获得了大约131,305元的利润，地区得到379,327元。它们的总利润是510,632元。在西藏的自由市场上，羊毛和山羊绒的价格也很高。例如，1987年在拉萨，一斤羊毛卖5元钱（对比牧民所得的3元）。1987年冬天，到南边去跟农民进行易货贸易的三个帕拉牧民，把余下的羊毛（完成摊派定额后所剩）以一斤羊毛换9.8斤大麦（相当于4.9元），比地区价格高出63%。与此相似，1987年来帕拉的个体商贩出价是每斤山羊绒25—35元，比本地的价格高两倍还多。

对牧民的贸易剥削在本地区内也存在。目前，为满足地区官员的个人消费需要，牧民们被强制向他们出售酥油和羊。在这里，价格体系同样不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下形成的，而是靠建立起低于市场价格的合同制（摊派）来控制。地区官员拟定他们所需的酥油和肉的数量，然后，规划出年度摊派来完成这一数额，再按照牧民所有的牲畜头数下达给牧民。另一方面，官员们想使“合同”看起来是双方自愿履行的，因而不把价格定得太低，免得激起牧民对拉萨的抗议。这

样，山羊绒的价钱从1985年的每斤8元涨到1986年的 11 元，1987年13元，1988年达到18—24元。羊毛的价格也从1985年的每斤2元，涨利1986年的2.4元，1987、88年3元。这项涨价远远抵销了谷物和其它进口必需品（如茶叶）等价格的增长。官员们还着意保障地区仓库的储存，不断运进谷物和其它产品。由于他们给牧民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虽然稍低于开放市场的价格，由于他们可以既付现金，又付给物品，也由于他们提供了方便的运输条件，即只用3天就可以抵达地区中心，而和远方的农民做生意得用一个月。大多数牧民还是宁愿和政府的贸易机构打交道，尽管他们还有别的机会。但是，牧民们其实别无选择。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央制定的对西藏有见地的优惠政策在地方被打了折扣。我们在相邻几个县的访问表明这并不是个别问题，在其它牧区正在推行与此相同的做法。

尽管这一有争议的"合同——摊派"买卖方式仍存在，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牧民的主要畜产品显然正在增长。再加上政府在税收方面做出了让步，虽然1981年非集体化之后，牧群的规模缩减了8%，帕拉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提高，如：牧民们除了购买传统用品，如罐、锅、衣服、首饰和象牙之外，还置办了新的豪华家用品。如收音机、录音机、缝纫机、油灯和铁炉，以及象上文提到的，雇用村民从事一系列体力劳动。很多人修了新仓库，也有些人甚至建了新住房。建住房的耗资很大，因为做栋梁和柱子的木头必须从几百里以外运来。

传统上，羊毛一直是西藏的主要出口物品，牧民们于是成为扩大市场的重要的因素。但是，非集体化之后，他们对

远方的汉人和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加强。70年代中期，修建了从县城到各地区“能通货车”的公路，这对于推动贸易向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政府（直至个体商贩）能够很容易地把各种生活用品和谷物运到地区中心，等于运到使所有的帕拉牧民在3到4天之内就可到达的范围。后来（大约在1980年），又修了从地区到分散的各乡（包括帕拉）之间的支线，使货车运输更为方便。虽然这些公路修建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县和从属于县的偏远地区的政府间的交流，事实上，公路的作用更为深远。这些公路不仅使政府能够保障地方上牧区的谷物和其它基本贸易物资的供给，而且，还为以拉萨为基地的商人寻找兽皮、皮毛等的货源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使牧民有机会和日喀则等城市的新兴市场进行直接贸易。日喀则乘货车2、3天就能到，而商队步行则需要辛劳近两个月。

刚兴起的商队贸易，通常需要牧民在地区的货车上租地方运送畜产品（甚至是活羊），拉到日喀则去卖。然后再用所得的钱购买手工物品转卖给羌塘地区的其它牧民。政府贷款政策推动了这种贸易的发展。1986年后，想做生意的牧民，不管是在日喀则还是在牦牛生意兴旺的较远的西部地区，都可以得到贷款。而且，帕拉已经有17人得到了贷款，每人10,000元。很多在日喀则做生意的人并不是很赚钱，因为货车的费用很高，而且牧民们缺少经商之道。但是，当以后牧民们熟悉了新市场，做生意的重要性肯定会提高。

以上所述事实正在逐渐改变帕拉的贸易形式。去年，只有3个帕拉人经过1到2个月的冬季跋涉之后，到邻近的农业区去做生意。其余的人都是在地区内的贸易机关和商店进行

全部或大多数的贸易活动，剩下的或者是和到羌塘的商贩，极少的情况下，也用货车把物品运到日喀则去卖。尽管那些从事传统上的冬季跋涉贸易的人能把他们的物品卖得比官方价格高一些的价钱，但这部分高出的收入似乎还不足以补偿疲惫的旅程之苦以及路上对牲畜的伤害。这样，牧民们很有可能会继续乃至发展他们在远方的市场中的贸易活动。虽然这将使牧民的生活方式以后逐渐发生变化，目前还没有理由否认这种贸易对牧民的经济收入带来的益处。况且，牧民们并不是受诱骗才那么做的，而是自发投身于这样的贸易活动。

也许1981年后中国的改革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后果，就是帕拉地区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分化的速度加快、程度加深。1981年，所有的帕拉牧民几乎同时起步，人均占有牲畜至少39头。而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牲畜数量增多了，另外一部分的则明显减少，又出现了贫穷和富有的牧民。每人占有的牲畜量以0到154头不等。表2表明了发生过的显著变化。1981年，88%的家庭每人占有30—49头牲畜，而到1988年只有37%的家有那么多。而且，1981年没有少于30头牲口的家庭，1988年已有38%的家低于那个数字。1981年，只有12%的家庭有50头以上的牲畜，1988年已达到25%。1988年，10%的家庭有90头以上的牲畜。这种经济分化的结果是，1988年帕拉16%较富的人拥有33%的牲畜，而较穷的33%的人口只拥有17%的牲

表2　1981和1988年各家占有的牲畜

| | 0—29 | 30—49 | 50—69 | 70—89 | 90+ |
|---|---|---|---|---|---|
| 家庭数量(%)1981 | 0(%) | 35(88%) | 3(7%) | 2(5%) | 0(%) |
| 家庭数量(%)1988 | 20(38%) | 19(37%) | 7(13%) | 1(2%) | 5(10%) |

畜。1981年，公社划定的生活标准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缩小了这个地区旧社会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是，过去的7年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导致了牲畜逐渐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来的家庭，再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没有牲畜的家庭阶层。

这些“新穷人”靠给富有的牧民干活维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现在象旧社会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规律地雇用牧民、挤奶工、以及仆人。但这些工人并不受剥削，因为他们得到了很可观的工资——一般是一个月一头羊（大约相当于25元），外加很不错的伙食，如果合同期是一年，还有衣服。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纺羊毛，梳理山羊绒，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拉新的经济政策尤其使从前较富的阶层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财产被没收或是遭到严重歧视的人。现在拥有70头以上牲畜的6户人家中，4户（66%）属于这个阶层。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虽然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也过得很好。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由于事实上所有的牧民从前都被划分为中等或穷困阶层，很多过去的公社干部实际上不是出身于旧社会最穷的家庭，但是，他们没有象从前的富人过得那样好。一部分干部生活还不错，但相当一部分现在很穷或属于中低阶层。

从前富有阶层的经济复苏正延伸到权力、影响力和声望等。如，帕拉的两个地方选举的乡领导中就有一个从前是属于富有阶层的僧人。在文革中他曾经被判刑。僧人阶层中的其他人现在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大多数牧民，不管对错与否，用“贫困文化”来解释这种现象，即那些从前的穷人现

在境遇更糟是因为他们有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逃避艰苦劳作，不从长计议。而从前的富人生活蒸蒸日上恰恰因为他们的价值体系所倡导的刚好与前者相反。这种发展变化遭到一小部分牧民的憎恨，他们在公社期间都是有实权的官员，现在既没权又讨人嫌。他们中间的一位由于饱受了失去权力和名望的苦处，来到作者的帐篷，低声说："你们一定要向拉萨反应这儿正在搞什么。"当我们追问他是什么意思时，他又重复了一遍，并加上"你们明白的，你们明白的。"强调了很多次之后，他最后说："你们知道'阶级敌人'又抬头了。"这种偏激的看法，不管应和者有多少，还是在大多数牧民们形成了一股潜流，他们害怕左翼势力会突然再现，将新气象一扫而光。

两个分别反映1987—1988年间的穷人和富人家庭如何生活的简单的例子，将使我们看到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

第一类家庭：比较富有，除了向地区贸易机关缴售强制摊派之外，用不着从事任何生意。这家旧社会就很富，创建公社时被没收了财产。这家有7口人：三个成年男子、两个成年女子、一个老妇人、一个小孩。1988年夏天，这家有646头牲畜（278只绵羊、322只小羊、4头牛、5匹马）。人均92头。这些牲畜的市场价值是31,000元（8329美元）。这家杀了70只山羊供家人和雇用的帮手食用。为完成摊派，卖掉了：

170斤羊毛（×6斤大麦/斤）=1020斤大麦

27斤山羊绒（×28斤大麦/斤）=756斤大麦

9斤牛绒（×1.5元/斤）=13.5元

4.2斤酥油（×2.5元/斤）=10.5元

12头羊（×16～25元）=270元

共计卖得1,776斤大麦（人均254斤），比全家基本需求还多出大约500斤。此外，还有294元现金，用作其它开销。“家庭一”用9头羊做为工资付给那些给他家熟了90只羊羊皮的西藏村民们。还付给雇用的放牧人和挤奶工32头羊。这家在营地上有两个仓库、而且又在逐渐置办传统的、新兴的奢侈品，象收音机、金属箱子。这家是帕拉最富有的家庭之一。

与此相比，第二类家庭，其主人出身于旧社会的乞丐，现在，他又成了帕拉最穷的牧民。他家有4口人，（两个成年人、两个小孩）。每年需500斤谷物。1988年夏天，他家只有64头牲畜（7头牛，28只山羊，29头绵羊）1987年秋，只杀了8只山羊食用，为完成摊派任务，这家卖了：

13斤羊毛（×6斤大麦/斤）=78斤大麦

2斤山羊绒（×13元/斤）=26元

2.6斤酥油（×2.5元/斤）=6.5元

2只羊（×20或21元）=41元

共计可得78斤大麦，73.5元现金。这家还用一只羊和一农民商贩交换了75斤糌粑（用大麦面烤成）。但是，即便把这家得到的现金折算成大麦，其总数也仍然只有200斤，少于全家一年所需的谷物量，这家的男主人于是不得不一年有4个月到远方去做各种短工挣钱。

1.他为“家庭一”放牧两个月，其中的一个月，他吃自己的粮食，这样就可以得到3只羊，通常的工钱只有两只羊。

2.他为两户人家纺了27斤牛毛，挣到2只山羊。

3.他为另外一个营地的一户人家放牧两个月，挣到2只羊。

4.他捕了一只羚羊，把肉吃掉，把皮以50元的价格卖给

了一个从西藏东部来的商人。

5.他为另一户牧民杀了100多只羊、7头牛，得到80斤谷物的报酬，外加牲畜内脏。

他劳动挣来的谷物和钱这些补充收入足以补偿家人缺少的粮食。但是，家里还需要茶、菜油、衣服、毛皮、火柴、烟等物品。通常总是把男主人做为工资得到的羊卖掉购买这些东西。1987年，这家得到了250斤大麦的福利救济，这样就可以把那些羊留下来，为增加以后的收入打好基础。

这两个例子反映了公社解散后7年的发展造成的巨大的贫富差异。穷人必须做工挣钱，从政府领取福利救济，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平。富人就象在旧社会那样，雇用贫困的牧民干重活，过着富足奢侈的生活，在这里不可能详细阐述两者的差别。但总的来说，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因素造成的。如运气、技巧、消费观念以及辛勤劳作。牧民们把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们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因为每个家庭如果运气好、善经营，都有平等的机会发迹或是败落。尽管经济分化还没有旧社会那么严重，新出现的如上所述的那位穷人仍将形成一个暂时的雇工阶层。

虽然存在着强制摊派和经济差异，牧民们都觉得这些年的物质生活远远好于公社时期，那时人们总是挨饿，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象前面提到过的，在于税收的减少和牧民产品价格的提高，这都是西藏扩大经济改革的成果。同等重要的，是对劳力的严重需求以及相当可观的工资。有牧群的牧民需要大量的劳力来挤奶，加工奶制品或是放牧。同时人们并不贪图物质上的富足，而更看重闲暇时间，所以，只有当给朋友、亲戚帮忙，或是象“家庭一”那样，没有足够

的收入维持生存时，人们才会给别人家打工。而且，由于目前的经济分化还没有使很多人家难以糊口，劳力仍旧很缺乏，工作很容易找到。

还应提到的是，福利救济对于使一些家庭免于彻底败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

1981年后，帕拉地区整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同时，还应看到，大多数牧民仍然很穷。他们的帐篷里几乎没有地毯，身上也衣裳破旧。很多家庭一年只有4到5个月能吃到肉。一些人甚至住不起牛皮帐篷，只能住在布帐篷里。每逢狂风大作，帐篷就会被吹开。从经济上讲，他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赶上中国东部汉族村民的生活水平。

## 结 论

1980年5月，胡耀邦到西藏考察后实行的新的经济文化政策给帕拉带来了极大的变化。非集体化之后，牧民的经济生活很快还原到传统的生产、经营家庭体系，再加上税收政策的优惠，人们的生活普遍好转。尽管地方官员还没能完全贯彻实行开放的（或协商性的）市场体系。新政策使牧民对市场经济的参与越来越多，并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同时，1980年后的政策推动了文化、社会的复兴。这使牧民们重又成为传统文化中的活跃分子。由于不同汉族官员打交道、和政府交往时在书面或口头都用藏语，这些牧区正在重建华莱士所谓的“理想的文化体系”。尽管他们对北京政府能否长久地实行新政策缺乏信心，对政府官员专断有时是压迫性的举动感到恐慌，自从1959年中国政府对西藏实行直接行

政控制之后，今日帕拉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传统的生活方式。1980年后的改革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使牧民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并且重塑了在心理上、文化上都极有深意的价值和信仰模式。新政策从实质上讲，使牧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西藏教义的信仰得到了实现。

# 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谎言还是事实

（美）M·C·戈德斯坦　C·M·比尔 著

张植荣　李扬凡 译

**编者按**：戈德斯坦（男）和比尔（女）都是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85年至1988年，他们俩先后结伴赴西藏各地考察西藏牧区生活及计划生育问题。作者在本文中针对西方某些反华势力在西藏人口问题上所进行的敌视性宣传和不实之词，用自己实地调查的结果和事实进行了反驳。作者调查深入细致，文章写作立论有据，观点针对性强。本文认为，美国某些出版物攻击“西藏存在强迫堕胎、限制人口生产”的言论，立论有误，其材料来源于流亡的西藏难民或杜撰的事实。作者的结论是：“西藏自治区确实在经历一个高的人口增长率，而远非是在遭受一项强制性的或控制性的导致人口减少的和威胁藏人继续存在的政策。本世纪的最后十年西藏自治区的人口将增加50万以上的藏人，这些增加的

人口将会成为不发达的西藏经济和社会的负担。”

译自美国《亚洲概览》1991年3月号。

中国在现在的西藏（即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政策的实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系列的出版物声称中国过去和现在都在强迫藏人坚持严格的生育控制计划。该计划包括强迫堕胎、绝育，甚至溺婴。本文以作者自1985到1988年在西藏实地考察所独立收集的新的资料为依据，论述了这个问题。

## 要求一项强制性生育控制政策

对中国在西藏推行一项强制性生育控制政策的指控，在过去几年里展示了大量的理由。最新的一些解释包括1989年2月26日《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以及由一位美国医生布莱克·克尔所写的登在《西藏评论》第1989年8月号上的研究文章；由美国西藏委员会（一个私人组织）在1987年公布的一份题名为《今日西藏》的报告；约翰·埃夫登在《文化遗产》和《喜马拉雅研究简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以及1988年2月发表在《亚洲观察》上的题为《西藏的人权》的报告也提供了相似的解释。这些出版物对几个所述及的人口地区作了一些严肃的结论和指控。

对于西藏妇女可以养育的孩子的限制之一，克尔论述道：西藏“少数民族妇女被允许生两个孩子，而中国妇女（指汉族妇女——译者）被允许只生一个孩子。”他说，这项政策适用于所有的西藏游牧民和农民，他强调，这些人是如此贫困，如果他们要超过这一限制的话，他们是无法承担一

项罚款的，这样他们只得听任其家畜被充公权作抵押。

埃夫登也对强制性生育控制作了论述。西藏的普通百姓（“群众”）被允准生两个孩子，而西藏的官员（“干部”）只能生育一个。《亚洲观察》的报告也类似地论述道：“在西藏的藏人中存在着两个孩子的限制，这一限制在西藏自治区和相邻的藏人区域广泛地实施。”美国国务院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待遇的特别报告”有些闪烁其词地声称：“据报道，西藏人被允许有两个，有时是三个孩子。”

关于强制性堕胎、绝育、溺婴，以及来来去去的人口控制部分，克尔论述道，西藏那些违反规章而怀孕的妇女“必须堕胎和（或）绝育，不然就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和经济制裁。”他同时也认为“那些强制性堕胎、绝育和溺婴是中国在西藏生育控制政策的一部分。”埃夫登写道：

“基本情形在全国都是一致的。一位藏人母亲到医院生孩子，她被要求出示由当地政府单位发出的允许生这个孩子的证明（即准生证）。当她未能出示这一证明时，她虽然还是被允许分娩，而且还常常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但她一旦苏醒过来，即被告知婴儿已经死了……在许多事例中，她还发现自己已经做了绝育。”

克尔展示了他收集的92例流亡在印度的西藏女人的陈述，她们据信是已做了堕胎或绝育手术，克尔还说这些事例中的20%的人声称自己是被迫做的。

1988年2月号的《亚洲观察》的报告重复了对强制性堕胎和绝育的指控，并关注到了那些申述。但它认为还不能估计这些事例有多大的广泛性。然而，1988年7月发表的一份附加报告更少些谨慎性，它说：“更进一步的报道现在已出现

并倾向于支持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即1988年2月那份有关强制性生育控制的报告〕”国务院的报告对强制性堕胎和绝育没有什么借鉴意义。

克尔描述了一个执行强制性生育控制政策的机构：机动的计划生育小分队，它们光顾藏人居住的小村庄和游牧区执行堕胎和绝育。他说，这些小分队“在一笔金钱的刺激下去给尽量多的女人做绝育和堕胎。”比如，他引证了两位流亡喇嘛的报告，他们声称1987年秋天，在安多（青海省的藏人区）的一个村庄里，所有的怀孕妇女都被迫堕胎，并且所有的育龄妇女都被迫绝育。这一消息来源同时又说，这样的生育控制小分队开始于1982年，自1987年来，数目得以增长并且活动也更频繁了。克尔报道了流亡者的强烈指控，控诉道：“藏人受到了要将藏民族消灭掉的迫害。”埃夫登也作了类似的报道。所以，埃夫登、《亚洲观察》和克尔断言，西藏农民和游牧民只被允许生两胎，而且极端的强制性手段被用以加强这些规章。

与这些格外严格的生育控制手段的陈述形成鲜明对照，中国人的消息来源宣称，中国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没有强加于少数民族地区，象西藏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被迫接受执行与汉族（中国人）省份相同的限制人口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中国人的表述中，这些对西藏的特殊政策稍稍有些不同，但他们仍都坚持这一统一的口径。例如，《北京周报》上的一篇由北京人口研究所的副教授张天路写的有关西藏人口政策的文章宣称，西藏自治区在1986年就形成了其临时性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包括：（1）在藏族和其他少数

民族的干部和工人家庭中，允许生第二胎，特殊情况的，允许生第三胎；（2）目前对于农村、游牧区和边境地区，还未确立计划生育的目标。这些规章也宣称“对计划生育有重要意义的公共事业和教育，以及对妇女和儿童的医疗保障也应在群众中开展起来。”

美国人口统计署的朱迪思·贝英斯特，运用中文公开出版物和诸如“对外广播信息服务”以及“世界广播摘要”的无线电广播翻译系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她总结说，中国的少数民族直到最近为止是明确地被排除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而且该政策只是从1979年—1980年当中国开始开展“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才将注意力关注到少数民族地区来。贝英斯特报道说，在1982——1983年间，全国凡人数在300万或逾此数的少数民族都适用了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可能包含西藏人在内。这些规章措辞模糊，使得少数民族中的某些个人被限制到生两个或三个孩子，而别的只允许生一胎——如果他们居住在靠近汉人的地区的话（可能是用以消除忌妒心）；然而，其余的人员是被简单地要求“不超过四胎”。贝英斯特同时也报道说，第六个五年计划（公布于1983年6月）赋予当地政府以执行时的灵活性：“计划生育政策也必须在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区推行，每个地区都要根据其经济、自然和人口条件制定出计划生育规划。”她说，这一规定在1983年晚些时候，通过公布一系列新的规章而在西藏得以执行。新的规章宣称：西藏的政府职员可以最多拥有两个孩子；聚居的西藏农民和游牧民最多可以拥有3个孩子；而人口稀落地区的人没有出生人口的限制。

人口委员会的苏珊·格林哈格，调查了1984年到1986年

间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的人口政策。象贝英斯特一样，她指出，在地区一级上的人口政策是设想得能和当地条件相符合的。她援引了来自四川省的一个例子。在那里，干部们将一个县（峨嵋）分成五个部分，对每一个部分采取不同的生育政策。包括："（1）非农业区域，包括城市、城镇和矿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2）城镇周围平原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3）海拔500—1000米的山区：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生第二胎；（4）海拔1000—2000米的山区：最高海拔区的城郊夫妇，允生两胎；较低海拔区的城郊区允生第二胎，但第一胎是女孩才有此权利；（5）纯少数民族区域：不必执行生育控制政策。"

因此，贝英斯特和张天路都看到了最近在西藏自治区仅仅对藏族干部和工人适用的限制两胎的政策。张断言，不存在别的限制，而贝英斯特则提及在人口集中的农村区域的三胎限制和在人口稀少地区不实行人口限制。格林哈格的研究基本与这点相一致，尽管它没有对西藏自治区的每个部分都进行过讨论。克尔、《亚洲观察》和埃夫登所做的解释与这些观点没有任何苟同之处。对西藏人口控制政策的极不相同的解释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大，各个资料来源的可信性是如此之不确定（流亡藏人反对中国出版的资料）以致于无法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有说服力的判断。人们所忽略的是独立的研究者在西藏本土所收集的资料。我们在研究西藏的游牧生活的过程中，收集了这样的资料，并提供了我们所发现的东西以期使这个问题明析化。然而，在研查这些资料之前，有必要使"西藏"的含义明确化。

## 什么是西藏，西藏在哪里？

在有关现代西藏的作品上发生混淆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作者未能清楚地对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亦即西藏本土（由达赖喇嘛一直统治到1959年的地区），和居住在中国其它省诸如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人加以区别。“西藏”通常被用来争论时，就好象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藏人都居住在那里。尽管许多藏人确信这是一个理想的行事之国，但现代西藏本土在政治上是和与中国省份相毗邻的其他藏人区有区别的。因此，比如集合居住在中国省份的藏人的经历来代表西藏本土的藏人，这就是误导了。

大部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已处于中国直接的行政管辖下达几百年了。安多和康藏的大部(即扬子江以东的甘孜、理塘、那戎、巴塘）在18世纪早期即纳入中国控制之下。芒康——扬子江是界河。有些地区如康藏的那戎在1865年由达赖喇嘛的政府收回，只是在 1905年——1911 年又被中 国 夺去。这次是赵尔丰在确保了对扬子江以东的康藏控制之后，进军西藏，实际把中藏边界线向扬子江以西推进350英 里 直到江达的结果。中藏在1917—1919年的军事冲突以西藏收回对扬子江以西的康藏控制权而结束。而且他们还控制了江东的重要藏人区德格。然而，12年以后，军事失败的紧张局面导致1932—1933年中藏间的休战。此间中国又重新控制了德格。扬子江成了事实上的边界，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达赖喇嘛1959年逃离西藏并直到现在。

因此，如果把诸如安多这样的地区作为西藏本土的一部分进行讨论，是有点不够坦白的。安多人在中国的直接统治下

已达几百年，他们已经历了一个和西藏本土的藏人十分不同的经历，而且他们也没有被列入1951年规定中藏关系的十七条协议中去。作这样的提示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比如，按照十七条协议的条文，在1951年——1959年期间，西藏本土并不须搞农地改革。而集体化和其他改革却开始在毗邻省份进行，这导致了1956年开始的猛烈的叛乱和大批人的死亡。

相似地，由于有关诸如生育控制和移民的规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地的情形和总的来说是在省一级上颁布的，实际执行中的规章在毗邻西藏的省份的少数民族中和在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中有着极大的不同。当然，人们不能假定它们是一样的，尤其由于毗邻省份的民族构成和西藏自治区是那么的不一样。后者的藏人占压倒性优势（见表1）。然而，表1的资料有点误导人，因为毗邻西藏自治区的省份的藏人，基本上趋向于被划分进自治的地区即“自治州”和“自治县”。K·B·杜姆比，在他为美国国会准备的国会研究中心报告中，尝试了着重对这样的地区而不是全省范围的资料进行分析，以估计其人口数量和构成。运用由中国民委和《北京周报》发布的中国1982年人口统计资料和数据，他的资料（见表2）揭示道，尽管在这三个毗邻西藏的省份的少数民族区域中，藏族人口是多数，但那里仍有相当多的汉族人口。用不着明白地提醒读者，那些居住在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人所具有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经历使他们不可能与西藏自治区的藏人聚集。在数据上将外省的和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凑成一块是靠不住的，这有点相似于报道墨西哥的时候从墨西哥的“失地”德克萨斯州和加州找例证，或者相似于未能指明所报道的例证是属于爱尔兰共和国还是北爱尔兰。

因此，本篇文章所指的西藏，是指西藏自治区——即过去由达赖喇嘛在现代统治的地区。

## 研究地点和方法

由于流亡藏人和中国政府所做的解释令人可疑和其他公正收集的资料的缺乏，使我们的文章的基础就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发现上。我们的研究包含两个部分：1985年5个月的由梅尔文·C·戈德斯坦在拉萨所做的调查。他是以国家科学院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学者交流的身份搞这一调查的（中国民族高级研究和学习计划）；1986年、1987年和1988年为期16个月的联合调查，这是由上述计划，加上国家地理协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共同发起的，由在西藏自治区的作家们搞的。其中有10个月是和相对孤立的，由263名游牧民构成的社区生活在一起。这是一块名叫帕拉的传统游牧区，在拉萨西北300英里，在西藏巨大的北部高原羌塘西部的横贯西藏自治区东西的主要公路以北115英里。这个研究也包括在名叫纳里的这个位于拉萨市北郊3英里的小村子进行的对照性工作。

传统的人类学方法比如参与观察和广泛、深入的采访提供了本文所运用的资料。采访既包括正式的询问，当场记下笔记，并常用上录音机；也包括非正式询问，这时则是以谈话的方式收集资料。我们所举行的会见或采访是没有任何管制的，也没有官员来参加我们。所有的采访都是在藏人中展开。对纳里的人口统计资料转引自本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它是1985年由戈德斯坦开展起来并由他和比尔在1987年最终将它完成。在拉萨，许多有关此问题的非正式的讨论和会谈都

在与“干部”和“群众”朋友及相识中展开。

## 西藏的生育控制政策：拉萨

在拉萨执行的生育控制显然是一项强制性政策。但随着社会阶层的不同，（干部和工人与普通群众不同）以及种族的不同（汉族与藏族不同），管制和限制也不相同。当地官员的态度在政策执行的积极程度上也扮演了角色。西藏的汉族干部/官吏被迫接受与中国内地城市一样的标准：一对夫妇只被允许有一个孩子，而且生育的许可还得看他们所在的单位。

拉萨的藏族干部/官吏每一夫妇被允许生两个孩子。什么时候拥有第一个孩子由他们自己决定，但生第二胎则需经允许。增大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和绝育是有物质刺激的。例如，母亲通常因为只生一个孩子可以获得75天的带薪假；而如果生第二胎时与第一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超过3岁的话，她们就可获得4个月的假期。如果一个妇女生第一胎以后就绝育了，她会享受到一个长达一年的带薪假和一个月5元的对孩子的补贴（直到18岁）。而且孩子在以后还有进幼儿园、学校和安全性工作岗位的特权。如果这些限制被突破，看来也没有自动的消极制裁，但可以猜想，这样的人肯定会在工资和提升上遇到麻烦。更有甚者，生育超过限制的夫妇要向医院付款，而且这些孩子在拉萨也不会得到永久居住权。从我们的采访来看，这样的政策是有效的。大多数在拉萨的藏族干部都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尽管应指出的是这部分是因为在城市里孩子们的花费可以想象是很高的。

对拉萨的“群众”而言，与我们交谈的大多数人都说他

们对官方的规章没有把握，但那些限制并非是严格的、强制的。然而，有的人认为对一对夫妇生三胎的限制是官方限制。另一人说这个规定对群众和干部都是一样的。在1990年夏，一项新的政策在拉萨付诸实施，该政策第一次明确规定城市“群众”只被允许生两个孩子，这使他们和藏族干部具有了同样的限制。在我们1990年8月离开拉萨时，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有两个孩子以后还生的人是否会真的受到罚款和惩罚。由于我们没有在拉萨进行系统的调查和采访，我们对这里的情况只能说到这里，而转向我们主要调查的区域，西藏的农村。

## 西藏自治区的游牧区和农业区

西藏农牧区（约占全自治区的90%）的情况更清楚一点。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游牧和农垦地区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目的证据，尽管对于计划生育和小家庭的宣传、赞誉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所在的周围地区。

在帕拉，到1988年，有些牧民已听说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绝对没有强迫履行计划生育和限制家庭规模的任何压力。事实上，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妇女来问我们能否帮她获得避孕药。当我们调查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离此地骑马三天路程远的地方有能进行避孕注射的医疗所，在更远的县总医院，能进行人流和绝育术。当1986—1988年我们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称赞小家庭的宣传。1990年，两种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药丸)被小规模地分发给乡级官员，他们被教导要问一问处于再生（孩子）年龄的妇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没有压力或强制施之于她们了。令人吃惊的

不仅是牧民，连他们的官员，都有一个大家庭。帕拉的四名当地共产党员（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牧民）的多产经历即反映了这一点。对于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党委书记的妻子已有了7个孩子（6个活着）；第二个官员的两个妻子（一个是继妻)共有8个活着的孩子；第三个的妻子已有了7个孩子（6个活着）。这些高生育的总的观察可以对该游牧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统计信息为证明。

## 游牧民的多生多育：帕拉1986—1988

在帕拉，1986年至1988年两年的人口出生率为33‰，1986年至1990年四年的出生率为35‰，死亡率比出生率变动要大：1986年至1988年为19‰，而1988年至1990年为30‰，因为1988年至1990年发生了一定数量的致命疾病的死亡。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1986年至1988年为14‰（即每年增长1.4%），1986年至1990年为5‰（即每年0.5%）。这意味着按前者的速度，人口在53年内要翻一番，后者要140年。表3在一个更广阔的内容上对这些比率进行了比较。措勤、改则和革吉是西藏西部广阔的游牧区；帕拉所在的昂仁是农业尚未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帕拉的生育在四区中占较低位置，仅比昂仁和措勤较高一点，而低于革吉和改则。它比西藏的平均出生率只高出6—13%，但比全中国的出生率高出57—67%，表3也表明帕拉的人口出生率与高出生率国家如印度和蒙古的情况相似，而不太象中国。这些资料是与克尔、埃夫登和《亚洲观察》所宣称的在西藏实行所有夫妇只能生两个孩子的强制性生育控制之说不相符合的。

然而，我们关于帕拉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数据是建立在

仅四年期限的出生与死亡的情况上的。为了获得对该社区人口动力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对所有15岁至59岁（共71人）的妇女的生育史进行了收集。表4表明了这些妇女的实际生育经历。第一栏(包括所有妇女)表明头胎生产开始得相对较晚，直到30—39岁的妇女，平均拥有3.3个孩子，到40—49岁，妇女们平均拥有5.4个孩子，1988年这些孩子的平均成活率是4.9个(71%)。这一相对高的生育本应更高些的。如果不是妇女的第一胎出生年龄较晚（22.4岁）而且又有大量的妇女没有生育的话（39名30—59岁的妇女中有5人没有生育）。第二栏的资料表明了已确实生过孩子的妇女的情况。由于去掉了没有怀过孕的已婚夫妇和未结婚的妇女，情况看得更清楚了。人数较少的这些妇女的生育平均数比所有妇女的生育高出0.5至1.8个，远远超过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的任何限制。

表5和表6的资料表明了帕拉的生育过孩子的妇女的孩子成活情况。表5揭示了帕拉的妇女，年龄在30—39岁之间的，至少生过一胎的，平均有2.8个成活的孩子；40—49岁之间的，有4.9个成活的。另外一个考察是否存在强迫执行强制性生育限制的方式是调查已生达2个或3个孩子的妇女的数目。表6提供了这些数据。表6揭示了帕拉的45位育龄妇女中的25人（56%）有3个以上的成活孩子。许多人有更多的成活后代。在30—39岁之间的育龄妇女中，5人（31%）有4个以上的成活孩子，而3人（19%）有5个以上的成活孩子。在40—49岁之间的帕拉妇女中，6人(60%)有5个以上成活的孩子，7人（70%）有4个以上的成活孩子。

如果不看帕拉的出生率高的强有力证据，这些资料并不

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强制性生育限制只是近来才开始实施的，例如，在1983年贝英斯特报道了正式规章颁布以后。然而，我们的资料也表明连这样的情况也未发生。在1984——1988年，帕拉的妇女中有2人生了第3个成活的孩子，4人生第4个，3人生第5个，5人生第6个，1人生第9个。因此，帕拉的所有年龄段的妇女的再生育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限制夫妇生育2个孩子的人口控制政策。更进一步，不仅帕拉的游牧民并没有因为生第三胎、第四胎、第五胎、或不断地生孩子而遭到罚款，而且所有的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在社区里都拥有全部的权利。

**农村的多生多育：纳里1985—1988**

看来，象居住在帕拉这样的游牧区的牧民是按其意愿生儿育女，那么，西藏的农村会是怎样呢？作者们收集了纳里的资料。这是一个位于拉萨北部郊区仅3英里的农业山谷地带。这些资料也揭示了一个与帕拉相类似的模式。纳里有几个叫“生产队”的次级单位构成。我们对纳里山谷中心的这个队进行了家庭生育调查。

与帕拉不同的是，计划生育在纳里广为人知而且还得以实施。在这里很容易避孕，而且包括在不远的一所军队医院或拉萨市内可以做人流手术。事实上，我们所调查的妇女中有3人（7%）曾做过流产。然而，并没有强制政策。尽管我们发表了比帕拉较低的出生情况，但仍要比克尔、埃夫登和《亚洲观察》所宣称的生育限制要高得多。表7说明了这一点，揭示了在纳里的一个相对高的出生模式。20—29岁之间至少生过一胎的妇女平均有2.7个孩子，30—39岁的则平均

有3.3个。纳里的30—39岁、40—49岁和50—59岁的几类妇女与帕拉的这些人的生育率相比较，是较低的。还是因为前者自愿履行了计划生育。表8表明了不同年龄的妇女其成活的孩子数目。对表8的研究也支持了这样的结论即每对夫妇并不存在生育孩子的限制。在纳里，34名生过孩子的妇女中有16人（37%）有3个以上的成活孩子。其中30岁—39岁的，4人（40%）有3个以上，2人（20%）有4个以上，40—49岁的，5人（83%）有3个以上，3人（50%）有4个以上。

中国最近出版的统计资料也与上面所展示的高出生模式相符合。1982年登记住在西藏自治区的藏人为1,786,500人，这已增长到1985年的1,920，000人。3年中增长的133,500名藏族人表明了这几年有7.5%的增长率，或者每年2.1%的增长率（即33年人口增加一倍）。

## 结　论

这些资料表明，西藏自治区确实在经历一个高的人口增长率，而远非是在遭受一项强制性和控制性的导致人口减少和威胁藏人继续存在的政策。按最近的增长率，本世纪的最后十年西藏自治区的人口将增加50万以上的藏人。这些增加的人口将会成为不发达的西藏经济和社会的负担。因为例如，快速的人口增长显然会减少每个人占有的农田面积。80年代初期，所有的公社土地都已按人口进行了分配，这些土地是有限的资源。集体化解体后，就没有土地再分给规模扩大的家庭。因此，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坚持在那里实施一项与中国汉族同样的限制人口的控制政策。

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藏的人口增长对中国整个人口政

策并无多大影响。西藏拥有13%的中国土地，但只占其人口的0.2%。按1985年的人口标准，每年2.1%的增长率意味着西藏每年只增加4万人口，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每年是1,550万的话，那么这个数字是毫无意义的。即使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一年也只增加6万人口。第二个可能更重要的因素是潜在于藏族“干部”和“群众”中的一种情感。西藏自治区的藏人觉得他们自己处于被汉人包围的危险中，因此而寻求在人口数量上的力量和势力。生活在成十亿的汉族中国人的阴影中，他们吵吵嚷嚷地争辩说，在人口稀少的西藏实行人口控制是不公平的。藏人宁愿把人口控制看成权力和种族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对地区资源的承载力的遵从的问题。这样的感情和焦虑由于1984年以后中国工人和商贩的大量涌入而激化了。因此，计划生育在西藏是一个脆弱的政治问题，中国显然不决定推行这项政策以疏远占压倒性优势的藏人。

那么，作为结论，我们没有发现在我们所考察的牧区和农区如别人所宣称的那种人口生产限制。无论是在帕拉还是在纳里，都不存在流动性绝育队和强制性的堕胎和溺婴。完全相反，生育率非常高。即使在80年代城市的藏族干部很清楚是实施了生育限制，1990年，城市群众也实施了这一政策，但是，直到1990年，农牧区的大多数藏族人显然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在我们所独立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和克尔及埃夫登提供的报道之间存在的不相符需要讨论一下。我们认为由于几个可能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对强制性生育控制的指控的基础即错误的资料的产生。一个可能性因素是流亡藏人（以及显然

是几位旧西藏的官员）所提供的说明是夸大其词和杜撰的，以赢得外国人对其“西藏独立（目标）”的同情和支持。在拉萨的几个场合，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夸张和歪曲，在诸如经济和宗教自由许多问题上都是如此。例如，个人（朋友的朋友，或者茶馆里的人、或者大街上的行人）一开始可能会在认为我们所知道的问题既不真实又是夸张的情况下，告诉我们拉萨的形势很严峻。当我们有礼貌地问道：“现在还发生这样的滥用吗？”或“如果事情并没有那么坏，结果会如何呢？”，他们有时会承认事情近来已有了改善，尽管他们通常把这归结于外部对中国的压力。换句话说，他们对最近的形势持消极态度。或者说，他们会说在10年前的文革中就发生过这些事，以此来澄清他们最初的表白。简言之，1959年以来中国在西藏直接统治的后果之一是某些拉萨人对中国人心怀深深的愤怒和敌意，这就使他们用有色眼光看待最近的形势，而且时常导致歪曲、夸张和杜撰。人们期待着最近的难民会更精确地证实这一行为。

第二个可能性因素是那些解释反映了谬传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报道这些事件的藏人可能很易认为对他们而言已发生了什么事情，尽管并没有发生。例如，一位西藏妇女在医院生产时失去了一个孩子，她会宁愿咒骂是中国人杀了她的孩子而不愿接受孩子自然死亡的事实。相似地，一位在医院生产后不能怀孕的妇女也许会无意识地出于她对中国人的憎恨而导致这样的结论即她的不幸是中国人反藏阴谋的一部分。

第三个可能性因素是那些解释是真实的，但却反映的是极端情绪化的官员们搞的一些偶发的滥用条文的事件。既然

如众所周知的，在中国发生过极端地执行生育控制的情况，那么怀疑在西藏发生过孤立的事件并非是没有道理的。例如，格林哈格指出“在1983年，全国许多地方开展了堕胎和绝育的运动，这显然导致那些孤注一掷想生一个儿子的父母杀死他们亲生的女儿。”这些当然可能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藏人桑那多吉，西藏人民医院的副院长，当他写道，尽管与少数民族人民不实行生育控制的少数民族政策相矛盾，但在文革期间，西藏地区还是鼓励实行计划生育。这显然暗示早些时候存在过极端情况。

第四个相关因素是，克尔和埃夫登收集资料的方法论上的失误。两人都把其理论建立在有选择的难民上。即使充满高度情绪化和政治化气氛的在印藏人流亡社团同意中国在西藏的控制，事实上仍存在着各种陷阱。克尔认识到那些报告可能是自圆其说的夸张或者完完全全的杜撰，他力图解释这些可能性：

“采访土生土长的藏人（在西藏的）还不如采访流亡者，尽管流亡者的解释可能是虚构的，或者是偏见，或者是只代表了中国的压迫和生育控制政策的出轨。然而，这些解释是既全面，又与其他旅游者提供的解释相符合的。”

然而，这些调查者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开展会导致他们把握这样的可能性的精心的研究，也许因为他们预先就倾向于相信消极的陈述。例如，尽管他们从未表明他们是如何从几千名流亡印度的藏人中确定他们的采访对象的，但显然他们没有进行一项可以从最近的流亡者中选出有代表意义的样本的系统的、科学的调查。

相反，他们好象已把采访的精力注意到那些自称是做过

堕胎或绝育的妇女的身上，而未采取进一步显然的步骤去把这些人和那些来自同一地区的、但未做过这类手术的妇女进行比较。而且，他们也没有列出他们所称的发生了所谓的那些事件的特殊村庄（名字和日期）。即使他们自己的资料也不是直接的。例如，克尔报道说92例所报道的堕胎案例中仅仅有20%是被迫的，而他却声称强迫堕胎和绝育确实是汉人针对藏人的有系统的、广泛的政策。我们怀疑一项更严格的调查方法论也许会提高他们自己的有关重要问题的报道的精确性并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未能采取这样的调查，他们的资料的合理性或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如果排除了他们的报道中的自相矛盾的资料。

因此，我们猜想结合这些可能性是可以解释由埃夫登和克尔收集起来的所谓滥用生育政策的报道的。我们认为，不断存在的有关西藏生育控制领域的普遍的对人权的侵犯的诉说，并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统的和强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观表现，而是围绕着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的高度情绪化的气氛的表现。那些报道体现出了政治感情是多么容易误传客观事实。

**表1：　西藏自治区及相关省份的藏族人口统计**

| 省　份 | 总 人 口 | 汉　族 | 藏　族 | 藏族所占比例% |
|---|---|---|---|---|
| 四川省 1987 | 104,390,600 | 99,628,800 | 1,090,700 | 1.0 |
| 云南省 1987 | 30,547,700 | 23,009,900 | 410,000 | 1.3 |
| 甘肃省 1987 | 20,972,500 | 19,097,000 | 694,000 | 3.3 |
| 青海省 1987 | 4,195,500 | 2,250,600 | 1,058,300 | 25.2 |
| 西藏自治区 1985 | 1,990,000 | 70,000 | 1,920,000 | 96.5 |

**表2：西藏自治区和相关省份藏区的汉藏人口比例**

| | 藏族所占本地人口比例% | 汉族所占本地人口比例% |
|---|---|---|
| 西藏自治区 | 95 | 5 |
| 青海：6个藏族自治州 | 47 | 41 |
| 甘肃：1个藏族自治州 1个藏族自治县 | 39 | 54 |
| 四川：2个藏族自治州 1个藏族自治县 | 56 | 33 |
| 云南：1个藏族自治州 | 33 | 18 |

**表3 帕拉与印度、蒙古、中国、西藏和西藏西部人口统计比较**

| 地　　名 |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
| 帕拉（1986—90） | 35 | 30 | 0.5 |
| 措勤（1981） | 31 | 17 | 1.4 |
| 改则（1981） | 43 | 10 | 3.3 |
| 革吉（1981） | 39 | 16 | 2.3 |
| 昂仁（1981） | 30 | 9 | 2.1 |
| 西藏自治区（1981） | 31 | 10 | 2.1 |
| 中国（1987） | 21 | 7 | 1.4 |
| 蒙古（1987） | 37 | 11 | 2.6 |
| 印度（1987） | 33 | 12 | 2.1 |

**表4 帕拉牧民妇女生育情况（1988年对71名妇女的调查）**

| 年龄（岁） | 全体妇女 | | 育龄妇女（产一孩以上者） | |
|---|---|---|---|---|
| | 平均生育 | 人数 | 平均生育 | 人　数 |
| 15—19 | 0 | 12 | 0 | 0 |
| 20—29 | 1.3 | 20 | 2.3 | 11 |
| 30—39 | 3.3 | 18 | 3.8 | 16 |
| 40—49 | 5.4 | 11 | 5.9 | 10 |
| 50—59 | 5.4 | 10 | 6.8 | 8 |

**表5 帕拉育龄妇女的生产成活率（1988年对45人的调查）**

| 年龄 | 育龄妇女人数（产一孩以上者） | 平均婴儿成活人数 |
|---|---|---|
| 20—29 | 11 | 2 |
| 30—39 | 16 | 2.8 |
| 40—49 | 10 | 4.9 |
| 50—59 | 8 | 4 |

**表6 帕拉育龄妇女生产的年龄分布（1988年对45人的调查）**

| 婴儿成活数＼年龄段(岁) | 20—29 | 30—39 | 40—49 | 50—59 | 总计 |
|---|---|---|---|---|---|
| 0 | 0 | 0 | 2 | 1 | 3 |
| 1 | 4 | 4 | 0 | 0 | 8 |
| 2 | 3 | 5 | 0 | 1 | 9 |
| 3 | 4 | 2 | 1 | 1 | 8 |
| 4 | 0 | 2 | 1 | 1 | 4 |
| 5 | 0 | 2 | 1 | 2 | 5 |
| 6 | 0 | 1 | 2 | 1 | 4 |
| 7—10 | 0 | 0 | 3 | 1 | 4 |

**表7　帕拉与纳里生育状况比较**

| 年龄段 | 帕拉妇女 | | 纳里妇女 | | 帕拉育龄妇女 | | 纳里 育龄妇 | |
|---|---|---|---|---|---|---|---|---|
| | 平均产婴 | 总数 | 平均产婴 | 总数 | 平均产婴 | 总数 | 平均产婴 | 总数 |
| 20—29 | 1.3 | 20 | 2 | 15 | 2.3 | 11 | 2.7 | 11 |
| 30—39 | 3.3 | 18 | 3.3 | 10 | 3.8 | 16 | 3.3 | 10 |
| 40—49 | 5.4 | 11 | 3.4 | 7 | 5.9 | 10 | 3.4 | 7 |
| 50以上 | 5.4 | 10 | 5.1 | 7 | 6.8 | 8 | 6.0 | 6 |

**表8　纳里育龄妇女的生产年龄分布**

| 婴儿成活数 \ 年龄段 | 20—29 | 30—39 | 40—49 | 50—59 | 总计 |
|---|---|---|---|---|---|
| 0 | 1 | 0 | 1 | 0 | 2 |
| 1 | 2 | 2 | 1 | 0 | 5 |
| 2 | 6 | 4 | 0 | 1 | 11 |
| 3 | 1 | 2 | 2 | 0 | 5 |
| 4 | 1 | 1 | 2 | 4 | 8 |
| 5 | 0 | 1 | 1 | 0 | 2 |
| 6 | 0 | 0 | 0 | 0 | 0 |
| 7—10 | 0 | 0 | 0 | 1 | 1 |

**译注：**表4－表8中的育龄妇女指至少产一个婴孩以上的妇女。

# 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

（美）M·C·戈德斯坦 著 张植荣 肖蓉 译

**编者按：**戈德斯坦教授在该文中回顾了西藏问题的历史演变，着重探索了80年以来达赖喇嘛从事的一系列活动及其影响，并从世界政治角度分析了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在从事“西藏问题国际化”活动中取得某些“成功”的原因，对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本文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除探讨西藏问题的发展过程外，还依据作者在西藏考察的亲身体会，为解决西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议是行不通的，其他的政治解决方案也不会有多大市场。只有采取“Ethnic Solufion”（民族方案），才有出路。其基本构想“不是要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要在文化、民族方面给西藏较高的自治”。作者肯定了中国政府80年代在西藏推行的改革措施。对西藏牧区的改革，他尤加赞赏。他说，他提出“民族方案”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西藏的城市生活创造一种类似牧区的状态，即使西藏回复到传统的自治地位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状态。论文发表后，受到分裂集团的关注与攻击。《西藏评论》全文连载，并附了一个较长的攻击性评论。

1989年3月5日，西藏的喇嘛和尼姑在拉萨举行游行，支持“西藏独立”。这是自1987年10月开始的一系列类似活动中最严重的一次骚乱。在这些骚乱中西藏人展示的愤怒与暴力使中国政府震惊，同时感到难堪和气愤，意识到要制止它。北京认为毛之后的西藏政策结束了过去的灾难，是一项抚慰的政策，是赞成西藏人民发展经济宏扬文化的政策。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如今政府面对的仍是不断的游行和骚乱。其结果导致了1989年3月7日中国政府在拉萨实行军事管制。

1989年也是西藏喇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年。达赖是西藏的前统治者，现在居住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他的获奖演说未谈及中国在西藏的改革政策，而是大讲那里的阴暗面，声称在西藏存在可怕的体制性的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西藏流亡者和中国领导人描绘西藏的状况要么是一片黑暗，要么是一片光明——可怕的压迫或者是显著的改革和成就。这使得普通人接受一方的观点来看西藏。本章试图给读者提供两种选择：既描述灰暗的阴影，又对今天的西藏形势的复杂的历史渊源加以阐述。而这种探讨很可能激怒达兰萨拉和北京的一些人。我希望他们接受这种观点，把它看作是一个美国人对这一迅速变化而复杂的问题所作的平衡两方面的探讨。

最近在西藏的骚乱，再次把长期争执的西藏对中国的政治地位的问题提了出来，即“西藏问题”。整个20世纪，中国和西藏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每一方都调整地位和战略以赢得暂时的优势，但都不能取得双方同意的最终解决

办法——一个永久的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最初发动这场冲突的人们都已作古，但冲突仍在继续。今天，双方都发动新的战略，企图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作为恰当解决办法。

西藏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准确地界定“西藏”的含义，就很难考察对西藏的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达赖喇嘛和流亡的西藏人通常所指的“西藏”不仅包括事实上的政治实体（国家），即在1959年前由达赖喇嘛统治的地方，而且包括居住在西藏临近省份的藏族地区，如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许多西方人，有意地或无意地套用了这种概念。

藏学家黎吉生在区分“种族上的西藏”和“政治上的西藏”时，说明上述地区在中国人的控制下已有几个世纪。现在的西藏自治区（TAR）事实上等同于达赖喇嘛统治的政治实体。在本章中，我使用的“西藏”即指三、四十年代的政治实体，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自治区，而不是西藏流亡者构想的“大西藏”的概念。

## 一、历史背景：清朝统治下的西藏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作为政治实体的西藏是在18世纪初期满清王朝的鼎盛时期臣服于中国的。但是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从未正式化——双方的权利及义务未明确在条约或其它协议文本中加以规定。西藏成为与中国有松散关系的保护国。西藏仍由它们的官员和法律来管理。满族通过钦差大臣（称作驻藏大臣）对西藏发生影响和行使权利，驻藏大臣及其小规模卫队驻扎在拉萨。中国的清朝皇帝对于合并西藏将其作为一个省并不感兴趣。他们一再保证西藏的活动和政策并不与清

朝的利益冲突。19世纪满清的力量削弱，中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对西藏的统治越来越只具有象征性了。

英国在19世纪末期对西藏的入侵改变了一切。一系列事件剧烈地改变了现状。西藏突然出现在国际舞台的中心，直到今天。

## 1.英国的突然进攻

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影响扩展到西藏边境。它使一系列喜马拉雅山国家沦为其保护国或属地。1861年，它迫使位于西藏到印度主要贸易通道上的锡金成为保护国。然后英国试图与西藏建立友好关系，却失败了。因为西藏政府拒绝讨论旅游通商事宜。英国转而求助于西藏的宗主国——中国。1893年的"中英藏印通商章程"允许英国商人旅行到西藏的亚东（ya bang）开辟贸易市场，允许英国政府派官员驻留那里以监护英国的贸易。然而不是协议参加者的西藏拒绝接受这些条款。

1899年洛德·寇松就任印度总督。他重视英国与西藏关系的重要性，认为西藏的政治局势关系到印度的安全。他甚至提到西藏有被俄国控制的可能性。

寇松立刻认识到中国不能有效地控制西藏，通过北京无法与西藏进行富有成效的联系。他向北京施压企图安排与西藏官员的会晤。1903年底英获准派遣一个探险队穿过边境到达锡金以北15英里的一个西藏行政总部所在地。然而拉萨不愿意讨论任何事务，坚持要求英国人立即离开西藏领土。英国打开西藏大门的努力又一次尴尬地失败了。伦敦同意让探险队继续北上。尽管英国的目的是与西藏进行谈判而不是

侵犯。但英国的军官和官员们最终带领印度军队一步一步深入到西藏腹地。他们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沿途所遇到的西藏部队。1904年英国人作为一支西方军队占领了拉萨。

在此期间，中国驻藏大臣敦促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英国探险军谈判，但是达赖喇嘛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逃亡蒙古，大概是寻求俄国的支援以对付英国。他留在拉萨的代理官员被迫接受英国的条款，以保证英印军队撤离。由西藏和英国探险部队司令官签署的1904年《拉萨条约》排除了任何其它外国势力对西藏发挥政治影响。这暗示着包括中国和俄国。

此时，英属印度已准备将西藏置于它扩大的政治和贸易保护伞下。伦敦应西藏的请求终于放弃了对拉萨的占领。更为重要的是，伦敦立即与中国商议以保证中国接受拉萨条约。这样再一次肯定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协商的结果是1906年英中协议，重申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而英国只限于与西藏进行商业往来。

## 2.中国的反应

英国入侵西藏和1904年拉萨条约巨大地改变了中国对西藏政策。在此之前，清朝已明确表示无意直接对西藏进行政治管辖和使之中国化。然而现在北京意识到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它对西藏的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就可能丧失。尽管中国已经衰落，处于崩溃的边缘。然而它的反应却强烈有力令人吃惊。它采取措施，包括：对四川省的藏区从行政上加以统一管理；在西藏则更积极地参预西藏的日常事务。十三世达赖喇嘛求助于俄国沙皇但没有取得结果，而且他的

地位尚未确定，因为他逃离西藏，中国政府于1904年“解除”了他的职务。虽然西藏人从未怀疑他作为其统治者合法性。但驻藏大臣对拉萨事务的控制越来越强。这使得达赖不愿在与中国取得某种和解之前返回拉萨。

1908年，达赖来到北京。最后北京终于同意他回到西藏进行统治。1909年12月底达赖抵达拉萨时，他发现正有数千名中国士兵从四川开赴拉萨以确保他遵循北京的路线。对此达赖一直犹豫不决，直到1910年1月中国军队进驻拉萨时，他决定再次出逃。这次他选择了以前的敌人印度。中国再次解除达赖喇嘛的职务，并加强对西藏的控制。

## 二、西藏问题：1913—1951

1911年清朝突然崩溃，西藏开始结束它与中国的统一。逃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组织了一支军队迅速将中国的驻藏官员和部队驱逐出西藏。1913年达赖喇嘛胜利返回拉萨，毫无疑虑地宣布自己为西藏的统治者，不再承认即使是象征性的对中国的臣服。

### 1.西姆拉会议上的妥协

新成立的中国共和政府继续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重新统一中华帝国。所以控制西藏具有重大意义。达赖喇嘛（和英国人）意识到除非就西藏地位达成某种协议，西藏将不得不以武力保护其在1913年建立的独立地位。1913年由中国、西藏和英国全权代表参加的三边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1914年该会议通过一草约，定下了以后三十多年里西藏问题演变的背

景基调。

西藏要求西姆拉会议宣告它的独立。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获得大英帝国的强劲支持。然而英国的战略目标并非与拉萨一致。英国政府决定，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英国将不支持西藏独立或威胁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大英帝国不愿因西藏独立而引起沙俄和中国的指责。英国担心其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因此受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也担心一个独立的西藏可能不久将“独立”于英国的影响之外。

英国提议西藏在中国的名义统治下实行自治，中国对西藏的影响和权利将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将使得印度北部边界地区成为缓冲地带，英国可在此获得大量商业利益。西藏最终同意接受西姆拉妥协。因为它保证了拉萨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包括它的军队、财政及其它事务。而代价是它必须接受中国作为其宗主国。

在西藏问题上，领土问题比起政治问题更难解决。西藏和中国在边界划分问题上不可能达成一致。十三世达赖喇嘛政府要求所有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各省藏区，湄公河（即澜沧江——译注）——长江以东的藏族地区都归于西藏，这种要求直到今日的达赖喇嘛也未改变。而中国政府要求边界始于距拉萨125英里的江达。该地区位于湄公河以西。英国试图从中调解，但中国政府坚持领土妥协是不可接受的，并立即拒绝参加西姆拉会议。此后，英国和西藏签署了一协议确保彼此遵守未经签署的西姆拉条约的各项条款。该协议称只要中国政府拒绝签字，它就不能享有该协议规定的任何优惠。然而由于中国不同意该协议，西藏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大英帝国达到了它的目的，而西藏未获得中国承认的独立地位。

这些事件激发了西藏内部两大势力的激烈冲突。一方面亲英派的贵族官员要求现代化，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势力一直占上风，得到达赖的青睐。直到20年代初，保守的宗教界人士使得达赖喇嘛相信这是错误的政策。这些保守派认为外来的西方价值观念对西藏的威胁比中国对西藏的威胁更为严重。因为就长远来看，无神论的西方观念的扩散将削弱西藏的佛教主导地位。达赖喇嘛迅速决定压缩现代化的计划。这导致中国主动提议进行没有英国插足的双边会谈。尽管各种动议不断提出，但进展甚微。在1913年——1933年期间，西藏禁止任何中国官员进入西藏。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使得中国在西藏的前途略有转机。然而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被共产党打败，西藏问题的解决与1911年清朝终结时一样遥遥无期。有关西方国家满意于便利的西姆拉条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而同时视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交往。现在关于西藏政治地位的各种杂芜的观点都源于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双重标准。

例如，1948年西藏政府派遣了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西方，香港的英国官员在这些西藏护照上办理了二个月的签证。蒋介石的中国政府发现了此事，询问伦敦为何在未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情形下接受西藏护照。英国外交部向中国人证实这是一个差错，保证此后将不为西藏护照办理签证。结果当西藏代表团要求续签时，他们被告知他们的签证只能在一份单独的称为“身份证明”的证件上办理。西藏人感到吃惊和侮辱，拒绝接受这样的签证。英国外交部找出一个办法，将原有的签证“三个月”划去，代替以“九个月”。这样，大

英帝国即保持了它对中国政府的允诺，因为这不属于新的签证，同时又安抚西藏人，因为它接受了西藏政府颁发的护照。

### 2. 十七点协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两年中国发动一系列事件打破了1911年以后的僵局。新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一样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两年的时间内新中国政府取得了它的前届政府在三十年内通过外交、恫吓和赤裸裸的暴力均未能达到的结果：1950年10月跨过扬子江进军西藏，迅速降服了大部分西藏部队，然后迫使西藏进行谈判。此时通往西藏的路完全打开了。而中国明确表示要“和平解放”西藏，不进行武力占领。所以在北京要求拉萨开始谈判西藏问题时，人民解放军停止进攻。西藏政府求助于联合国、美国、印度和英国，均遭拒绝。1951年西藏政府派代表前往北京。西藏代表又一次被迫签署一项协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点协议”。根据该协议，西藏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中国同意保留达赖喇嘛和西藏原有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

自1911年满清政府垮台以来，十七点协议第一次为藏中关系建立了相互同意的一系列原则。但双方很快发现实施该协议之路并非畅通无阻。

## 三、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 1. 共处：1951—1959

1951年—1959年期间，双方冲突升级，不满加剧。尤其

是1955年以后形势更加恶化。直到1959年3月西藏人暴动失败，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

从一开始许多喇嘛和官员就公开反对中国在西藏的大规模存在。他们希望（也许是空想）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和允许中国掌握西藏的对外交往权和国防权，以满足北京的需要，而保留西藏对其内部事务的统治权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继续不变。所以，当第一批中国官员和部队打着红旗进驻西藏时，他们被激怒了，公开地充满敌意。他们对那些将西藏从帝国主义魔掌下解放出来和使西藏再次回到伟大的“祖国”的怀抱的宣传非常愤慨。

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和大多数主要政府官员都感到必须真诚地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以保证协议的有效实施和保护西藏的宗教政体的完整性。虽然他们不喜欢中国人在西藏的积极活动，然而他们仍然控制着政府部门，中国人很谨慎地请求西藏传统政府签署他们想颁布的任何命令。西藏政府的策略看来是通过在对外事务上的让步来保证最根本的目的，即达赖喇嘛的继续统治和保护宗教。

北京对十七点协议的看法与保守的西藏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早已决定的。他们认为当西藏更加能够接受新观点新事物时，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将在西藏进行。正如当时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土改一样。尽管西藏人不愿意接受十七点协议，但中国人遵守了它没在西藏农牧民中进行土地、经济与阶级结构的改革的诺言。所以，在1951—1959年期间，绝大多数村民并不反感中国人。

中国人试图通过显示对西藏宗教机构的尊重来取信于西

藏人。每年中国人向拉萨的大寺庙的20,000名喇嘛发放布施，并且从不对传统的社会、经济体制进行诋毁。1951年在拉萨的中国宣传专注于减小所谓帝国主义的影响，专注于帮助西藏的现代化而非共产主义化。许多西藏人被组织去中国，参观现代化的城市。在西藏政府的同意下，开办了学校和医疗诊所。妇女团体和青年组织也开始成立，得到许多贵族成员和商人团体的接纳。这些贵族和商人团体曾经在1950年以前致力于西藏现代化，但受到阻碍。

但是麻烦仍然存在。其中最大的麻烦是大量中国军队和官员进入拉萨引起的:这几千名中国人需要供给,加之中国的偿付银元政策，立即在1952年初引起谷物短缺和通货膨胀。这刺激了许多拉萨人的反华情绪，他们组织了一个秘密协会（即人民会议），要求遣返大部分中国人。

然而，许多试图与中国人相安无事的西藏官员并不信任中国关于西藏的长远计划。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麻烦和怀疑，1951—1955年西藏政府仍控制着西藏，传统的体制仍象1951年以前那样继续发挥作用。在这个时候，外藏的事件彻底地恶化了内藏局势。

十七点协议中规定的自由条款适用于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但不包括由中国行政机关管理的扬子江以东的藏族地区。所以中国政府毫无疑虑地在那些地区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举动引起了一些小规模的暴力反抗，但改造仍继续进行。1955—1956年间，暴发了一些大规模的反叛，许多中国士兵、官员和平民被杀。195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严厉地平息了叛乱。然而平叛导致了大量武装的痛苦不堪的东部藏人涌入西藏腹地。

达赖喇嘛及其政府此时担心中国人将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达赖喇嘛开始认真地考虑流亡问题。1956年底，达赖喇嘛及随行人员访问印度之后决定不返回西藏。1957年初毛泽东公开声明对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推迟六年；如果到那时西藏人仍不愿意接受，那么改造将再次推后；如果有必要，就推后几十年。由于这种承诺，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但是中国人不信任拉萨的主要官员，逐渐渗透到西藏政府。1959年3月，局势急剧恶化。达赖喇嘛的主要官员怂恿他再次出逃。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随同他出逃的有100，000西藏人，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寻求庇护。与此同时，西藏发生暴乱，遭到解放军的迅速平定。从此时起，西藏结束了传统社会，直接受中国行政机关的领导。1965年西藏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1959年，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政府宣布十七点协议无效。这使得西藏问题成为国际问题。流亡者开始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寻求国际上对西藏自决和独立的支持。这些活动持续至今。

## 2.中国直接统治

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平息了1959年的拉萨叛乱。许多西藏人在达赖喇嘛的寝宫附近的战火中被杀，其它一些人被捕或送往劳改营。然而北京很快决定由于西藏农民尚未作好经济过渡到公社化的准备，西藏的社会主义化应逐渐进行，要实现某些变革而不是全部变革。例如，尽管众多的僧尼被从寺庙遣返回家，但是西藏人个人仍被允许进行信奉喇嘛教的活动。绝大多数农民保留其在1959年时拥有的田地和牲畜，

经济安排和收入支出由个人决定。

1966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它彻底地改变了一切。此后的四年中，农村和牧区被划归为公社所有，农民和牧民成为公社的“所有者”之一，而实际上他们成为按公社领导命令工作的简单劳动力。正如其他地区一样，他们根据个人全年的劳动工分获取食物、用品和现金。虽然这一时期没有安排汉人在这些农村和牧区定居，但西藏的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

“破四旧”（旧观念、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政策得到大力推行，旨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单一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文化以取代传统文化。个人宗教活动被禁止，宗教建筑如寺庙、庙宇，甚至祈祷墙都被摧毁，西藏人被迫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而正是这些观念和习俗构成了西藏文化的特征。由西藏干部领导的阶级斗争和连续不断的与西藏人观念相抵触的宣传，以及嘲讽西藏人观念的宣传使得西藏人的心理严重失调。总之，这段时期的中国政策意在摧毁西藏传统生活方式中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 四、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对西藏的政策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和邓小平的崛起使中国产生了新的变化和经济变革。这些事件的影响也于1980年在西藏发生了作用。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机构开始调查西藏自治区引起争论的问题，考察中国对西藏直接统治二十年（1959—1979）的结果。

## 1.西藏状况

正当中国国内贬低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考虑如何纠正错误挽回损失时，西藏的第一任中共书记任荣的报告宣称，西藏的政治情况非常好，西藏人坚定地拥护共产党和祖国。大约与此同时，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在香港举行首次会谈，双方都表示关注西藏问题的解决。1979年北京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到西藏进行访问和考察。很显然北京相信西藏自1959年以来取得的发展和西藏人民与祖国的坚定团结会给代表们留下印象。

第一个代表团包括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和达赖流亡政府的另外几名成员。代表团首先访问青海省的安多地区。在那里，代表团受到群众激动的欢迎。群众流露出的支持达赖喇嘛的情绪使北京感到难堪。北京与拉萨的任荣联系，询问如果按原计划代表团继续访问拉萨，是否会发生意外。据说任荣的回答是拉萨人比安多地区朴素的农牧民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开化，而且拥护共产党的理想，访问拉萨不会出问题。西藏地方政府是如此坚信这一点，以致于在代表团抵达拉萨前夕，召开街道会议劝诫群众克制对“旧社会”的仇恨，不要对达赖的代表团投掷石块或吐口水，因为代表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

西藏礼貌地同意了，但紧接着给予代表团的欢迎远远超过了青海。成千上万的拉萨居民涌向代表团，许多人哭喊着匍伏在代表团周围，另外一些人则献上哈达，拥挤着去触摸达赖的哥哥，也有少数人打出了西藏民族主义口号，如“西藏独立”和“汉人滚回去”。由于北京的官员陪同流亡政府的代表团访问，使得任荣无法掩盖这次严重的失误和他对西

藏人情绪的完全错误的判断。任荣以其对西藏的文化、宗教和语言改革无动于衷而闻名。

这次事件使北京认识到西藏民族主义的严重程度和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中仍享有崇高地位的事实。而这些西藏人在旧社会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他们理应对中国将之从"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怀有感激之情，中国二十年的统治显然未能改变西藏人对达赖喇嘛神圣性的信仰和达赖喇嘛是西藏人领袖的地位，也未能消除西藏应由西藏人按照西藏的价值观念来统治的感情。

流亡政府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对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对于在西藏看到的大规模宗教和文化被破坏及普遍的贫穷、落后和物质缺乏感到震惊。这一切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迫使北京从新估计西藏的形势，开始调整与改革，并持续至今。

经过重要的事先调查，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于1980年5月对西藏亲自进行了一次没有先例的实地考察。很显然他们对于耳闻目睹的情况很不满意。他们迅速采取措施，将任荣召回北京，以避免他妨碍改革计划。胡耀邦公开发表了关于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务的全面的六点报告。

公开声明比起胡耀邦对党内干部的秘密报告和讲话显然温和些。据说在秘密报告中，他将20年的中国对西藏的统治等同于西方殖民占领。胡耀邦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支持那些国内外批评西藏局势的人，这构成了此后几年在西藏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背景。

## 2. 中国新的改革政策

改革政策反映出北京试图纠正在西藏的错误。但改革的前提是，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改革政策包括四个主要方面：迅速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西藏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潜力以实现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给予西藏更多的真正的自治权，尤其是文化和宗教方面，以减轻剥夺文化的指控；削弱汉族人在西藏的作用，限制汉人在西藏的数量，遣返大批汉族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回中国内地。

这项政策也是针对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集团的。首先，它可能缓和对中国人在西藏进行压迫和使西藏贫穷的批评态度，并使得北京的新的领导层能够在西方新闻媒介面前将自己描绘成温和人物并且对西藏问题具有远见卓识。其次，它可能会使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对流亡者的宣传鼓动产生怀疑，甚至可能说服流亡者和达赖喇嘛，北京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既使西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又使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

为了提高藏人，尤其是占人口80—90%的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北京迅速采取措施，解散公社，推行责任制。正如中国内地一样，公社的田地和牲口分配给公社社员，允许他们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而且，北京在西藏的政策比在中国其他地区更激进，规定在1990年前免除农牧民的税收和合同制，也就是藏人不必象汉人那样必须将其产品的定额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国家。这项政策非常有效，使得藏人能够按照传统的生产体系积蓄节余。到1987年，尽管有少数地

区由于土地贫瘠和气候恶劣仍处于贫困之中。但大多数西藏农牧民已用节余去购买新的商品，开始推倒旧屋重砌新房。

西藏的城市地区如拉萨也发展得很好。西藏由于生活费用高而被划入困难地区，所以干部的工资很高。例如，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西藏干部或研究人员，1987年在西藏社会科学院的起薪约200元，这是在北京所能得到的工资的2倍。个体和小规模的合营旅馆、“甜茶”店、酒吧、百货商店和其它商店大多数都经营得很好。事实上，到1985年，拉萨的消费品已是琳琅满目，“用户至上”的思想四处可见。市场上充满了日本电视、收录机、收音机和其它进口高档商品。（西藏自治区政府使北京相信由于西藏自然环境恶劣，需要进口产品而非国货）看见穿着传统服装佩戴藏刀的西藏商人骑着一辆崭新的宏达（Honda）摩托车已是很平常的。藏区之间也在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交换一些传统的西藏高档商品如圣像、银碗和其他东西。结果80年代尤其是1984年后，拉萨和农牧区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兴建西藏自治区经济和行政基础设施的计划。1983年，耗资3亿元的43项主要工程上马，其中包括在拉萨的一个拥有1200个房间的豪华饭店，一座体育馆，一批先进的地热发电设施和其他项目。工程完工定在1985年8月，以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1983年，开放政策在西藏推行。从1980年初开始的旅游业得到大规模发展。到1986年，每年到拉萨的旅游者人数为30，000～40，000（而1985年以前只有1，500人左右）。同样地，正如中国其它省份，外资也被邀请来帮助西藏发展。1985年，西藏某种程度上对西方和日本学者开放。很显然，

中国觉得在西藏没有什么需要隐瞒。

在藏文化方面，一系列主要改革逐渐实施。用藏文出版了一些传统的世俗和宗教书籍。现代西藏文学得到发展，几种文学杂志创刊发行。在报纸上刊登诗歌和小故事。拉萨电视台二频道开始用藏语播放节目，一些外国和中国影片被译成藏语播放。西藏大学的西藏语言文学系规模得到扩大。

在宗教政治上，允许个人加入传统的喇嘛教。他们可以公开进行宗教朝拜，绕行圣址，转经朝圣，在住处悬挂经幡，向神灵、僧尼和寺庙供奉钱物和其它供品。人们可以在家中设立祭坛，修造新的圣像，1985—1986年，僧人还可以被请到人们家中布道。拉萨的市场上公开出售达赖喇嘛的画像，当地藏人还佩戴达赖喇嘛的徽章。

宗教设施——寺庙和尼姑庵——也开始复兴。尽管政府仍进行着有效地控制。从1980年初开始，大量资金被用于重修或修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坏的几百座重要的庙宇。其它一切庙宇则依靠个人捐助得以修复。到1987年，拉萨最著名的三大寺（甘丹、色拉和哲蚌）拥有约1，000名僧人，比1959年时的20，000名僧人少得多。但这在改革之初，已是蔚为可观的。

对于西藏的藏族人，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期。他们对佛教的信奉可以通过祈祷和其他行为来表达，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的信仰得到了维护。那些在“破四旧”运动中被严重诋毁的习俗和价值观念重新得到恢复。父母们领着自己的小孩子到庙宇去，以便让他们能够学习他们的文化。西藏各地和青海、四川、甘肃的藏族人成群结队地涌向拉萨，朝拜布达拉宫和其它圣址。

其它一些政策致力于使西藏自治区成为更加真正的“西藏人”的自治区。首先，大张旗鼓地推行一项计划：许多汉族干部返回内地，藏族干部的比例得到提高，尽管执行起来并非如计划那样好，但到1986年西藏自治区的60%的干部均为藏族。1987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实行一项新计划，根据该计划，到2000年，藏语（书面及口语）将成为西藏自治区的官方语言。在北京，领导人达成一个共识，即由于西藏的独特历史，它不同于中国其它的自治区。许多西藏干部认为北京将很快发起第二次改革风潮，给予西藏特殊的自治地位，所有西藏官员都是藏族人，西藏政府的官方语言为藏语。

与此同时，开始成功地采取了一些致力于与流亡藏人建立新关系的政策。从1979年开始，流亡藏人可以回西藏探亲，西藏人也可以离开西藏前往访问（在某些限制下）。1986—1988年间，许多流亡藏人访问了西藏，尽管他们被迫作为“海外华侨”接受了中国签证。大量的海外藏人对在西藏做生意有兴趣。而且似乎有可能，一些流亡藏人第一次开始考虑中国的新政策是否可能在西藏做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同时，保留西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成分。一般来说，这些藏人并没有返回定居的打算，但他们开始喜欢可以来回走动的想法。当然，只要西藏继续沿此路走下去，终会导致更加完整的文化上的自治。正如我们在西方知道的，中国仍不允许政治自由化和议会民主的出现，但是在繁荣西藏文化方面中国政府却迈了很大一步。

## 3.北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

1979年，北京领导人似乎热衷于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有责任采取一项政策以改善西藏条件的改革者，而且正确地意识到和达赖喇嘛实现关系正常化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这不仅可能会平息国外最强烈的批评者，而且会给香港和台湾发出积极的信号。它还将削弱拉萨的少数民族主义分子的秘密团体，有助于使全体人民满意，从而能够使北京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它真正的问题——振兴衰落的经济。

尽管如此，北京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方面设立一个明确的参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自决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谈判桌上唯一的问题是西藏的自治（这正如1914年在西姆拉和1951年在北京的谈判那样）。中国的目的显然是"文化"解决，允许西藏自治区满足西藏人在宗教上和文化上的渴求，但仍保留目前的政治体制。无论如何，北京暗示达赖喇嘛，除了独立外，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

从有利于达赖喇嘛这点来看，这正是恰当时机。改革者对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使中国变得比较混乱。尽管流亡集团的主要口号是"西藏独立"，但它只有10万人，比起西藏自治区的二百万人（加上相邻省份的藏人约三百万）少得可怜。很显然，从长远的角度看，西藏人和西藏文化的未来取决于在中国的西藏人。达赖喇嘛明确地感到有义务代表他们与北京调和，现在看起来有可能达成某种妥协。达赖喇嘛的问题在于获得多大程度的自治而非独立才能够与北京重修旧好。

到1982年，双方关系已经热乎到达赖喇嘛可派一个高层代表团前往北京会谈。讨论的主题并不完全清楚，但似乎西藏人更主要地是通过会谈来教育中国人，摸清中国人的底牌，而非完全讨论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自治。为了表明他们对于汉藏关系的历史解释，他们讨论藏族与汉族在文化、种族和宗教方面的本质区别，以及在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的棘手情况。看来，藏人代表坚持任何解决都必须包括将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族地区与西藏统一，成为西藏的组成部分。流亡藏人代表还表明西藏应成为非军事区。这就意味着汉族部队应撤出西藏。讨论还涉及达赖在此后一、二年内访问西藏的可能性。在自治问题上未取得重大进展，很显然是由于达兰萨拉不愿意讨论这种妥协，即只涉及文化问题而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结构不做实质变更。

会谈进行期间，流亡政府和它的朋友们继续攻击中国残忍地大规模地践踏人权，在世界范围内鼓动独立活动。他们使用激烈的言辞，攻击中国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尽管达赖喇嘛偶尔地暗示西藏的情况有所改进，但这种评价被愤怒的反华调子淹没了。

1984年，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达兰萨拉和中国代表之间的会晤。关于这次会谈没有正式声明。但看来中国人对于谈判陷入僵局和达赖喇嘛拒绝停止反华宣传很不满意。这种宣传忽视了正在进行的重要改革。北京决定给予达赖喇嘛致命的一击，公开西藏流亡代表拒绝接受的五点建议。其中一条建议如果达赖愿意回中国，他将在北京而不是在拉萨定居。这种立场反映出中国人本质上的强硬态度。这使流亡集团大为震惊。他们不清楚北京希望通过公开五点建议达到什么

目的。

### 4.达赖喇嘛的困境

北京批评达兰萨拉不愿就现实解决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在共产党国家体制内给予西藏更大的自治,而非建立一个独立政府。这种批评可能是对的。另一方面,对于达赖喇嘛这也并非易事,因为尽管他本人很愿意就西藏地位与北京达成某种默契,但在流亡集团内部关于怎样程度的非独立的自治是可以接受的这点上并没有一致意见。有一部分人对于正在进行的秘密谈判很不高兴,他们激烈地反对放弃独立的美梦,反对让达赖喇嘛在北京而不是拉萨治理西藏。

根据地区、宗教和较少程度上的政治因素,西藏流亡集团分成不同的派系。从地区上,有三个派别:西藏中部和西部的藏人(即从政治实体上的西藏藏人);中国相邻省份的藏族人,西藏东部和北部的藏人(康巴人和安多人)。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传统的敌意,尤其是在中部和东部藏人之间,他们使用不同的有时是彼此不认识的方言。在流亡藏人中,一部分东部藏人自己设立难民营,完全独立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另一部分人名义上接受达兰萨拉的领导,实际上都在要求权利和特权。在宗教方面,一些佛教派别仍然与达兰萨拉保持远距离或者独立进行活动。在政治方面,西藏青年大会比达兰萨拉更热衷于武力斗争,企图在任何时候都不惜以暴力和恐怖主义行动来取得独立。

由于流亡政府没有强制性的措施贯彻它的意志,所以达赖喇嘛认为把不同派别的流亡藏人团结在一起是自己的主要

任务。很自然的，他竭力避免采取极端行为，这些行为可以激化冲突或者加剧已经存在的地区间和宗教派别间的敌意。他的领导战略是通过强调流亡藏人的共同之处：——保护宗教、语言、文化和为独立而战斗——将藏人团结一致。

80年代有许多因素限制了达赖喇嘛的行动。首先，地区差异使得达赖喇嘛完全不可能和中国人单独谈判西藏自治区的问题，即使他想这么做。因为这样做对西藏东部和东北部的流亡藏人是不公正的。结果，他要求所有藏族人统一于一个新的西藏。这正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西藏传统政府所要求的。现在，每当他谈到西藏时，就好象30、40年代西藏真的包括那些藏族地区。他谈到，中国在1949年入侵西藏，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毗邻作为政治实体的西藏的有藏人的省份。

从政治上，达兰萨拉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西藏难民只是暂时的流亡，积极反对藏人接受印度、尼泊尔或不丹的国籍，以保持无国籍状态。他们认为成为他国公民会损害对西藏的道义上的目标，会加剧藏人同化于居住国。一再强调藏人要等待西藏重新获得独立的达赖喇嘛很难突然告诉他的难民追随者们，现在将接受非独立的条件。

达兰萨拉长期以来谴责中国滥用权利的立场，同样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因为它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一种面孔，即象魔鬼一般。而这种描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能居实，但在80年代已明显不是的了。这种办法对内能有效地保持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却使得达兰萨拉难于向流亡集团主动谈论1980年后北京努力改善西藏状况的事实，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

对外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要缓和猛烈的反华宣传也是很困难。因为达兰萨拉攻击北京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利用里根政府时期华盛顿强烈的人权和反共兴趣，以保证得到有影响集团尤其是美国国会的支持。自1959年以来达兰萨拉一直以各种理由就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但现在西藏和中国都发生了变化，它却不愿失去新得到的听众，只好继弹老调。达赖喇嘛显然明白西藏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意义（这大概也正是他认为谈判将取得成果的原因）。但是他容忍对中国的错误导向的和胡编乱造的指控。显然，他认为舆论攻击将迫使北京同意给予西藏更好的条件。这样一来，尽管北京继续改善西藏的状况，却没有得到西方的好评。这都是由于达兰萨拉对北京进行攻击性的有效宣传的结果。

这一切创造了一个不可能导致建设性谈判的谩骂气氛。所以至1985年底达赖喇嘛仍未访问西藏就不会令人惊奇了。1979年的微弱希望很快破灭。这不仅是由于北京对达兰萨拉的粗鲁攻击感到愤怒，而且由于西藏的事态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使得达兰萨拉和流亡藏人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 5.北京的赢分

1985—1986年，西藏局势令人乐观。西藏自治区将推广使用新的语言（藏语），将执行新的文化政策，这将使西藏自治区再次成为特别的自治区。除了取得前文已讨论的成果，中国还赢得了几项国际上的胜利：和英国完成了香港回归中国的计划；联合国组织了一项西藏发展计划（正如瑞士红十字会所进行的那样），并且西方的一些大国领袖如翰姆特·科尔（德国总理）和吉米·卡特（美国前总统）于1987

年访问了西藏。

北京在讨好拉萨群众方面也似乎取得进展，尽管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政策，1985—1986年的拉萨人可分为三部分。约有10％的人，主要是高级官员，非常奢华；另有10％的小部分人是强硬的西藏民族主义分子，他们认为无论需要多长时间，西藏人应该坚持与中国人战斗以重建一个独立的西藏。在这两者之间是广大的工人、干部和商人，他们的感情和忠诚感是复杂的。尽管他们在中国怎样对待西藏这点上感到痛苦，而且可能同情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理想，但他们认为独立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所以他们不愿意在行动上支持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对于北京而言，这意味着西藏的大多数藏人的文化状况和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他们愿意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另一方面，如果事态恶化，他们也很容易被推向支持死硬的民族主义分子，迫使中国使用武力来控制西藏。所以，在80年代达兰萨拉和北京的斗争中，争取影响这部分人的态度是关键因素。

随着拉萨的新的改革出台，北京的新政策看来将继续发展和满足西藏人的需求。有迹象表明80年代西藏人大量流亡印度和尼泊尔的情况锐减，尤其是比起东德向西德移民的事实。由于西藏大部分人对现状越来越满意，北京认为与达赖喇嘛达成协议的重要性降低，在1985—1986年间，北京看来胜券在握。按原计划于1986年进行访问的达兰萨拉调查代表团被要求接受“海外华人”的签证，当他们拒绝时，访问被取消了。

北京的改革政策可能赢得西藏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国际声誉，对于流亡集团而言，这却是最糟糕的情况。达兰萨拉突

然发现它处于脱离西藏政治进程的危险之中。为此，达兰萨拉发起主要反攻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和支持西藏人的事业，从而向中国人表示它必须与达赖喇嘛和达兰萨兰达成妥协。

## 五、达兰萨拉的攻势

达赖喇嘛最大的问题在于尽管西方有人同情西藏人的事业，但没有大国政府支持它的独立要求。美国、英国和印度政府都不支持它的这一目标。所以，尽管流亡集团的舆论宣传有效地博得了同情并陷北京于尴尬之境，但对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没有直接的威胁。然而，流亡集团加强与美国议会的联系，取得他们在人权和反华方面的支持，由此以一种新的有潜力的战略使得北京为他的不妥协付出了代价。这个策略很简单。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支持，达兰萨拉施加一切影响促使国会议员（和其它人）借口中国对待西藏问题而在中美关系上设置障碍，以便大大抬高达兰萨拉在北京的地位，尽管美国官方政策在独立问题上并没有改变。很显然，达兰萨拉认为这种逐渐升级将最终迫使北京允许西藏实行不同的政治结构来解决西藏问题。

达兰萨拉的新攻势有四个组成部分：达赖喇嘛首次肩负流亡集团的政治使命出访西方，并在其政府讲台上发表公开政治讲演；在美国的众多佛教组织和其它亲西藏组织中发起大规模的向国会写信运动；煽动西藏的市民骚乱，里应外合，证实流亡集团在西方的指责，并再次加剧西藏人的注意力；达赖喇嘛建议不再以西藏完全独立为条件来解决西藏问题，以表明他的理智和灵活性。

1986年底和1987年初，流亡集团高级领导人及其“朋友”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这一策略，尤其讨论了达赖于1987年底访问美国的政治问题。1987年9月19日，达赖喇嘛抵达美国，两天后在国会人权论坛上提出一个建议，呼吁从西藏（包括藏族地区康和安多）撤走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恢复达兰萨拉和北京的会谈。

这一建议充满了感情色彩，指责北京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它适合于西方听众的胃口，而令中国人十分反感。虽然它没有谈判独立，但它公开表明达赖喇嘛愿就西藏未来进行谈判。尽管这一建议很笼统、模糊，但它使西方国家的议会和新闻界感到满意。

### 1.第一次骚乱：1987年10月1日

所有这一切在拉萨很快有了响应。因为许多西藏人了解中国人，他们定期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而且拉萨的电视播放了达赖喇嘛的美国之行。距达赖喇嘛的演讲和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不到一星期，拉萨的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僧尼举行游行支持达赖的倡议。

9月27日，约有27名哲蚌寺（位于拉萨西部）僧人在拉萨市中心主要市场的环行道路上游行，手里拿着西藏的旗帜，喊着如“祝达赖喇嘛万寿无疆”，“中国人离开西藏”的口号。这些僧人在拥挤的道路上绕行了五次，没有人来干涉他们。因为警察没有预料到这次游行，游行的僧尼沿着主要街道向自治区政府所在地进发，在那儿进行抗议活动。此时警察出现了，示威的僧人被带走了。

4天后，1987年10月1日早晨。这天是中国的国庆节。又有

20—30名僧人来到拉萨的市场区支持前几天的游行，要求释放那些被捕的人。警察将他们带到派出所，并对他们进行拷问。在毗邻派出所的楼房高层，有一些西藏人看见了这一幕。他们从窗户里喊叫："别再打僧人。"此时，一群西藏人已经聚集在派出所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很快，事态就演化成大规模的暴乱。结果，派出所和一些车辆被烧毁，许多中国人开的店被砸毁，有6—20名西藏人在警察（其中有藏族人）向人群开枪时被打死。

北京被这次暴乱及其反映的反华怒潮震惊了。许多年来在拉萨一直有秘密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但它们都是很小的独立的事件，很容易解决。而现在北京必须面对数千名愤怒的西藏人，他们不惧死亡和监狱去参加反对中国统治的大规模暴乱。这次暴乱尤其使北京难堪的是它正好应合了达赖喇嘛和美国议员的攻击，使世界看到那些谴责是真实的。

中国人首先宣称这次示威是达兰萨拉鼓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前三年中，许多西藏僧尼去达兰萨拉和尼泊尔旅行，流亡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难民也被允许访问拉萨，并连续逗留一个月。因此，进行煽动的机会是早已具备了。然而不清楚的是达兰萨拉（或其它流亡人士）是否确实要求一名或更多的哲蚌寺的僧人组织一次示威游行。但很清楚的是这次示威是为了支持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倡议。

拉萨的西藏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政府体系来解释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达赖喇嘛对议会的讲演可能是西藏历史的转折点。由于不懂得三权制衡的概念，拉萨的西藏人很自然地认为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反映了整个美国政府对达

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许多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很快将迫使中国给西藏以“自由”。中国过于疏忽，在北京和拉萨的新闻中发起猛烈攻击，指责美国国会干涉中国内政。而这似乎肯定了美国的行为的确相当重要的看法。有理由相信西藏流亡集团的确鼓动了这次僧人示威，也有同样程度的理由认为由于僧人认为达赖喇嘛的美国之行是西藏历史的转折点而自行上街游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希望发生流血暴乱。

这次暴乱不同于以前的小规模游行，其真正的原因很复杂。尽管进行了改革，但西藏人痛苦的痕迹和对政府的敌意仍存在，而且在西藏人看来政府就是汉人的同义词。象看不见的燃烧下的浓烟，这种敌意和挫折感一触即发，而警察殴打僧人的景象便成为导火索。

西藏人的敌意仍然残留的原因有几个。西藏人对自1959年中国统治西藏以来，他们个人和集体（种族）所经历的痛苦仍记忆犹新。他们认为他们在为保持文化和民族特征不被10亿汉人同化而斗争。此外，他们讨厌许多在藏汉人的优越感，这些汉人似乎把藏人看作是野蛮的原始人，把藏文化看作是低级文化。在拉萨的大量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汉人使问题更趋严重，导致无数面对面的冲突，而这些短兵相接，触痛了过去的伤痕。毫不奇怪的是西藏人总是以西藏种族的观点——汉人对藏人，来解释所发生的事件。例如，尽管汉人和藏人都抱怨“文化大革命”和腐化问题，但汉人谴责“四人帮”（一个政治派别），而西藏人则总是指责汉人，不愿意相信从毛到邓小平的过渡是一个质的变化，因为在他们看来汉人仍然控制着西藏人的命运。

中国坚持在西藏实施大规模经济发展计划自然会带来一些新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1983年以后大量汉人涌入西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非如经常指责的那样，汉人的涌入不是由于中国有意对西藏进行“殖民”，而是出于政府迅速发展西藏的愿望。尤其是在一些大的工程项目中，政府决定引进大量汉族工人。这就导致了对新的汉人旅馆、商店和其它服务设施的需求，许多有钱的汉族人来到西藏以满足这些需求。这些商人扩大他们的经营规模，向藏人出售从中国东部和外国进口的各种物品，以及传统用品如用于供奉寺庙的香和哈达等。他们还逐渐占据了拉萨修理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和电视机的行业。更高级的是，他们进行合作的私人贸易，在西藏与中国其它地区进行羊毛、丝绸和开司米衫的交易。这些汉人的成功给周围省份的人这样一个信息，在西藏有利可图，于是每年吸引了无数汉人进入西藏。甚至汉人乞丐也得到这个信息，到1988年时已有数队耍猴的汉人在拉萨行乞。

1985年开始的西藏旅游热也加剧了汉人涌入西藏，他们作为司机和导游控制着旅游贸易。而且拉萨的西藏人经济富裕起来，也给汉族商人提供了大量的当地消费者。在西藏的汉人相当吃苦耐劳。甚至那些激进的西藏民族主义分子宁愿雇佣汉人而不是藏人，因为汉人的工钱低而又省却不少麻烦（比如，汉人在工作期间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传统的礼物青稞酒）。

从正常的意义上讲这些汉人不是殖民者。他们不认为他们将永久移民西藏，而基本上他们都是到西藏赚钱，然而再返回四川或青海。而且没有汉人到农村和牧场里与农牧民竞

争。尽管拉萨人能够理解这些，但无法平息他们的愤怒和怨恨，因为汉人涌入的结果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城市里成为少数民族。这种怨恨很明显地产生于经济原因，因为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的主要部门。无论如何，汉人的涌入成为经常的谈话和抱怨的主题，在现实中有许多工作将深入去做。同时，这种怨恨又很大程度上具有种族特征，西藏人觉得拉萨正被同化成为汉人的城市。

西藏的发展计划突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西藏人感到被歧视。在自治区内没有优惠汉人的官方安排。相反，许多汉人报怨遭到歧视，因为新的计划给予素质较差的西藏人优先在政府部门选择工作的权利。但是由于在中国办理任何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朋友和关系（所谓的后门），所以许多中国人能够获得所有政府的允许和机会，因为他们的亲戚或朋友是干部或军官。

从西藏人对政府和改革政策的信心角度来看，在西藏自治区进行的加速发展计划是一个失误，因为它带来了一些并非有意的反面的后果。由于新的力量加深了早已存在的当地人的怨恨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的痛苦，改革对于西藏人的态度和感情的积极影响被破坏。而且，它更加将西藏人的注意力准确地集中在具有爆炸性的种族或国家问题——西藏有太多的汉人，汉人得到了太多的好处，反过来，又强化了西藏人没有权利和被汉人控制的感觉。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北京不愿意允许西藏人拥有他们所要求的充分的文化和宗教自由。对于寺庙的连续限制激怒了僧尼和许多俗人。对于大多数西藏人而言，拉萨的三大寺庙是西藏文化的本质象征，不允许它们发展到以前的规模是为

了突出西藏文化从属于中国的价值体系。的确，僧尼们还有其它不满，但在1987年的主要问题是北京不愿意允许寺庙的完全自治，和扩大到群众供养得起的规模——一个寺庙拥有1,000或10,000名僧人。

政府在语言改革方面也踌躇不前。因为彻底执行自治区的官方工作语言为藏语的政策将意味着最终所有的汉人干部和职员将被迫离开西藏。这项改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改革本身。北京没有迅速同意和开始这项长期计划，表明北京也不愿意进行许多西藏人渴望的其它改革：那些改革将使西藏自治区真正的“藏化”。

最后，不能低估西藏人强烈的被逐出家园的历史感。许多西藏人认为中国人占据了他们的家园，逐渐将它转化成中国的另一部分，并在这一过程中摧毁西藏人的机构和他们的价值观念。西藏人当然明确地不愿意重新回到“封建主义”和“农奴制”时代，他们认为西藏应该是一个由西藏人操纵，使用藏语，执行西藏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国家（无论是否独立）。在大多数西藏人看来，改革将通向这一结局。而如果西藏不是一个整体，仅仅允许转动经轮和点着酥油灯是不够的。

所以，1987年10月1日的暴乱是愤怒的情绪的产物。它是西藏人对自1959年以来被控制后失去国家的象征和文化遭到摧残的基本的反应，而不是对1980年以来改革政策的拒绝。建造更多的活动场所、道路、工厂和公寓并不能消除不满的根源。

1987年的暴乱使达兰萨拉获得巨大的舆论成功。达赖喇嘛的华盛顿之行不仅赢得国会人权小组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

有影响的议员的支持，而且引发了拉萨的激烈的市民抗议和流血冲突，而这次暴乱又被西方看作是不能忍受压迫的表示。拉萨的西藏人从他们的商品主义物质主义转向种族问题——为重新赢得文化和政治上的含义的祖国而斗争。

拉萨的藏人包括群众和干部的反应是有趣的。人们没有对暴乱的后果担心，也没有怀疑这种行为方式是否明智。相反，他们却兴高彩烈，尽管没有完成任何具体的事，但却使西藏人感到自豪。在以后的几周内，没有人谈论别的事情。甚至那些有献身精神的藏族干部和共产党员都认为暴乱的影响将是积极的，因为它将震动北京，发现西藏的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促使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做出决定加速改革进程，以纠正错误。

无论如何，北京对暴乱的最初反应使局势更为恶化。在2个月内，北京顽固地指责由达兰萨拉控制的少数人，不批评警察，也不承认警察开枪打死了几名示威者。要理解这种反应，就必须明白自治区政府的干部之间并不比流亡集团内部更一致。

在西藏实际存在着四种互相争斗的派别（就象北京的领导层中有不同意见一样）。一派是老的汉族官员（包括部队领导人），他们的思路更为保守和偏左（毛主义者），他们认为北京对西藏宗教和语言的让步是不明智的，新的经济自由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在执行这些改革政策时常常拖后腿。另一派是由老的藏族干部组成，他们同样的保守，赞成将西藏更紧密地与中国联系的政策，而不支持区分西藏文化、语言和人口的特征。第三派是那些中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支持北京的新政策，然而他们也是强烈的

亲民族主义分子，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保证实现一个更好的、由藏人治理、使用藏语的西藏。很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他们的最大支持者是第四派的政治力量，即年青的汉族干部。这些汉族干部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比老的汉藏干部更自由。但是在所有汉族干部和所有藏族干部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种族分界线。汉族干部和藏族干部很少有社交活动，除非是出于工作目的。在拉萨汉族官员的一个典型抱怨是，一个西藏人可能邀请一个刚在街上遇见的外国人去他家里吃晚饭，却不会邀请与他共事多年的中国同事。

在干部中讨论向北京提供怎样的关于暴乱的意见时，年青的藏族干部要求举手表决，警察和僧尼都应受到指责和处治。他们承认示威者违反了法律，应该被逮捕和送入监狱，但不应被殴打。殴打僧尼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并且侮辱了西藏人。然而，那些更保守的汉族和藏族干部对此并不热衷。当北京的决定最后传下来时，认为警察没有什么错误行为。这一决定触动了西藏人的种族敏感性，似乎汉人在与藏人打交道中不必遵守法律。

不管怎样，拉萨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很快恢复正常。暴乱一星期后，茶馆和啤酒店又满是人了，中国人又开始在市场上兜售商品。拉萨人看来不愿意冒险失去80年代他们已得到的利益和不顾他们的感情去发动群众示威游行。

然而僧人和世俗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情形却不这样。他们已经学会了怎样让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独立问题上。几个不怕坐牢和死亡的僧尼可能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挑战，同时支持达赖喇嘛和刺激西藏的藏人。美国国会给予达赖喇嘛的支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加强了僧人对外部事件的最初

看法，并给他们提供新的动力去继续进行要求独立的示威计划。达赖喇嘛对市民骚乱的公开支持更加鼓舞了这些持不同政见者。

在这里，美国国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尽管国务院努力对西藏事态作出较全面的判断，但国会却采取了强烈的亲藏立场。1987年6月18日，众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西藏问题的法案，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9月2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佩尔和其他七位议员致信赵紫阳总理，表示对目前西藏局势严重关注，声明他们完全支持达赖喇嘛的建议，称赞它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历史性步骤。10月6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并连同众议院6月通过的议案作为《国务院授权法案》的补充案。根据该方案，将美国对华出售或转让防务设施与中国如何对待西藏问题联系起来，将官方奖学金和对西藏难民的其它援助联系起来，并且表明国会认为美国应将西藏人民的境遇作为美中关系的重要因素。12月22日，里根总统签署该议案。这一切都为拉萨所知。有好几次，一些我不认识的西藏人在街上走向我，对美国政府支持西藏人的事业表示感激。

1988年初，拉萨的注意力集中在即将来临的祈祷法会。这一节日开始于2月17日，将有近2,000名僧人来到拉萨的中心寺庙参加为期三周的联合祈祷。这是西藏自治区所有政府高级官员都将参加的重大活动。届时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将从内地涌向拉萨。每个人都在担心祈祷法会能否按计划进行；如果能进行，僧人们是否会利用这个机会发起大规模游行。

现在回顾起来，北京的决定是一个灾难。北京在国际社

会处于守势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感到向世界显示其自由的西藏宗教政策的成效是很重要的，所以它决定举行祈祷法会活动。

为了便利祈祷法会的举行，北京突然改变政策，承认87年10月1日的暴乱的部分原因在于“残留着左的思想”，即在自治区实行改革政策的方式存在严重缺陷。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承认，正如1980年胡耀邦的判断一样使人震惊。这种转机使许多年青的藏族干部充满乐观情绪，使人们大为欢呼。他们因为北京接受他们的抱怨感到自己的正确。对许多人来讲，这可能最终导致他们所需要的更多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改革。

北京还对僧人作出新的让步以平缓紧张的局势。拉萨的僧人一直抱怨从1959年以来，寺庙的书籍、绘画、塑像和土地都被没收了。现在北京进行财物偿还，对已经丢失的进行赔偿。达赖喇嘛之后的第二号人物班禅大师抵达拉萨，试图安抚僧侣，以保证祈祷法会的顺利进行。而僧侣们坚持不参加祈祷法会，除非释放狱中的僧尼，1988年1月26日，在班禅大师进行干预后，自治区政府释放了约59名僧人，剩15名监禁。在祈祷法会开始前2周，除1人外，其余都被释放。班禅大师还公开表示政府将继续补偿僧尼和寺庙在过去的损失。1月27日，他在哲蚌寺宣布，政府将付给拉萨三大寺庙约2百万元（当时约合美元500，000）作为赔偿的一部分。

随着发展计划的进行，北京又一次错误地判断局势，试图把西藏问题当作经济和财政问题，而非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的问题。绝大多数僧尼的愤怒如此之大，难于仅仅用钱来平息，尤其是他们感到中国人打算利用他们神圣的宗教活动

作为宣传手段。当班禅大师在哲蚌寺宣布赔偿时，一个僧人竟然站起来打断他，说："别指望我们会对此感激不尽。中国人破坏了我们许多东西，赔偿算不了什么。"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僧人却未被捕。

在那段紧张时期，许多老僧人都劝阻政府举办祈祷法会，他们说无法保证青年僧人会有怎样的举动。他们警告说，如此之多的人群和僧人拥挤在窄小阻塞的寺庙区，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们建议最好由僧人在各自的寺庙内进行祈祷活动。现在回顾起来，这才是稳妥的决定。

但是，此时政府已进退两难，坚持举办祈祷节。外国记者已被邀请，所以它哄骗、威胁和请僧人们参加。尽管有许多僧人公开抵制，祈祷节仍然按原计划开始。直到3月5日最后一天，一切都顺利进行。这天，当最后一项传统仪程完成后，一个或更多的僧人突然对寺庙中的自治区的领导大喊大叫，要求释放那个被监禁的僧人。一个藏族干部明显地喊他们"闭嘴"。对此，僧人的反应是愤怒地喊起政治口号，如"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正当人们庆幸活动将平安结束时，灾难出现了，局势恶化。警察潜在的愤怒爆发了，使用过度的武力进行干预，制造了拉萨第二次流血冲突。紧接着在西藏进行了逮捕和管制。然而这只能更加疏远寺庙里的僧人。

### 2. 达赖喇嘛在1988年的活动

与此同时，在西藏外部，达赖喇嘛继续他的运动，以争取西方国家的议会积极干预西藏问题。1988年4月，他对北京的一项新声明作出反应。北京的新声明允许达赖喇嘛住在

西藏，只要他放弃西藏独立的目标。对此，达赖表示，在看到西藏获得“适当”的自治后，他将在12个月内对北京作出公开答复。他采取了非常温和的路线，他说必须找到“中间道路”。显然达兰萨拉认为，它的新攻势和暴乱取得了显著成效——北京现在准备接受新的条件。

不久，达赖喇嘛在西方作了他的第二次重要讲演，第一次详细阐明了他关于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条件。1988年6月15日，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上，他阐述了要点：西藏和青海、甘肃、四川及云南的藏族地区应成为一个自治的民主的政治实体，该实体以维护民主权利的宪法为基础。这个版图扩大的西藏应由民主的政府体制进行管理（不同于中国其它地方的体制），它有权利决定任何与西藏和藏族人有关的事务。中国保留西藏的外交权，但西藏可以通过自己的对外事务局发展和保持与外国的商业、体育和教育等关系。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少量军队，直到西藏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和西藏成为非军事区。最后，所有这一切将由全西藏范围的公民投票来通过。达赖喇嘛表示他已作好准备与中国人讨论他的建议。并且已选好他的谈判代表团。

尽管这些条件是流亡集团内部妥协的产物，但并没有受到中国欢迎。中国把它们看做是“独立”的伪装形式。这一次，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们看来首先取悦于西方听众，而不是北京。1988年9月23日，中国作出反应。北京采取了强硬路线，指出它希望与达赖喇嘛直接谈判，但必须有下列条件：与达赖喇嘛本人而不是流亡政府选派的代表团进行谈判；不得有外国人涉入；斯特拉斯堡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因为“它根本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

概念。”

达赖喇嘛的新建议在流亡集团内部也遭到反对。许多派系力量尖锐地批评它。包括西藏青年大会、旅欧西藏青年协会和居住在美国的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他致信全世界的藏人，攻击他弟弟放弃独立目标的决定。在1988年的后半年，流亡集团就是否支持达赖的倡议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尽管大多数人犹犹豫豫地表示支持，但明显缺乏热情。而较年青和受过较好教育的流亡藏人的敌意迫使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声明后不久，公开承诺他将不再作出任何让步。

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显得很遥远。达赖喇嘛作出姿态，提议1989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但他拒绝放弃任用外国人作为他的法律顾问，并表示斯特拉斯堡声明是解决西藏问题唯一合理的基础。尽管达赖在香港的哥哥几次访问北京以期联系的渠道畅通，但到1988年底，开始直接会谈的努力仍无结果。

达兰萨拉此时集中对藏人在西藏的痛苦进行戏剧化描绘，以游说西方议会的议员们（和西方新闻媒介）站在西藏人的立场上支持他们的事业。同时，它也鼓动僧侣、尼姑和西藏的其它民族主义分子参加市民抗议，因为这样的抗议很可能演变成暴乱或大规模示威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培养了一种僧人发动的动乱因素。

### 3.1988和1989年的西藏

1988年3月5日的暴乱迫使中国对其西藏政策重新估价。与达赖喇嘛重新修好的前景遥遥无期。改革并未能阻止西藏人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反政府暴乱。北京有几种选择。一种

是迅速完成更激进的改革以赢得西藏2百万藏人的忠诚。然而，考虑到流亡者和民族主义死硬分子的存在，给予西藏人（当然包括寺庙）实际上更多的自治权和自由，以及撤走汉人，将导致更加严重的混乱。另一派意见是关闭西藏的大门，停止旅游，减少对西藏文化的支持，培养同化的力量，使用武力威胁以控制人口。第三种选择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示威者和民族主义分子采取强硬路线，而在文化改革方面则不进不退。

1988年夏天，政治局委员和中国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乔石来到西藏。他召集改革时期以前的汉族领导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决定选择第三种意见，公开宣布要严厉对待反对者，并决定不再对过去寺庙没收和损失的财物进行大量赔偿，不再努力争取寺庙的支持。与此同时，在自治区使用藏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的计划被搁置，旅游大量减缩。但是，不涉及已有的文化和宗教自由，并且支持发展西藏经济。

与此同时，西藏的民族主义分子继续参预市民抗议。5个月后，1988年10月10日，僧众举行游行以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40周年，结果发生第三次大的骚乱。3个月后，1989年3月5日，僧众的示威导致了第4次暴乱，致使许多人丧生。这一次北京逮捕了很多西藏人，宣布实行戒严，直到1990年初才解除。

尽管实行了戒严，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并没有倒向“关门”政策。1989年即将结束，北京仍不愿意放弃在西藏的改革政策，但也不愿意进行得太快以打击流亡分子和赢得拉萨群众的良好祝愿和信任。例如，宣布新的温和的关于藏语的政策，要求藏语成为教学用语，不仅小学（已使用藏语）

而且1993年前初中和1997年前高中都使用藏语教学。到2000年，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也必须使用藏语。新的规定还声明，关于司法和公共安全事务，西藏人可使用藏语，也可使用汉语。而到1990年底，所有官方通讯都首先以藏文书写。这也满足了许多西藏人关于藏语作为自治区工作语言的希望。

北京没有处理西藏汉人过多的问题。然而寺庙的局势恶化了，当政府谈论实行非传统的保证计划时，甚至那些未参加示威的僧尼都被激怒了。拉萨的官方声音强调法律和秩序，以及发展经济，却忽视了其它更关键的问题。

1989年底，又出现了新情况——西藏农村和牧区的局势。最初的改革措施普遍免去了农牧民的税收和定额销售，它到1990年有效。然而却不知是否延长这一规定。不延长它当然会激怒农村的藏人。这些人很有意思、他们在过去二年的拉萨和其它市镇的动乱中保持了缄默。

1986年——1988年，我研究的牧区藏人与拉萨的藏人态度有显著差别。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牧区和拉萨的藏人经受了同样的折磨和羞辱，但牧民对新的政策更加积极，对于现状更少怨恨。这也许是由于在牧区的改革方式根本不同。不象拉萨，牧区没有汉人，所有的干部都是藏人，所有的官方措施都由西藏人执行。所以，他们没有遭受附尊就屈的污辱和诋毁，也没有被汉人包围的感觉。改革一开始，他们的生活迅速恢复到以前的传统方式。当然仍有不少问题，但人们满意于能够重新获得根据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来行动的权利。

## 4.1989年西藏外部的事件

在西藏以外，1989年北京第一次面对一次严重的汉人示威活动，其结果众所周知。在北京派警察部队平息西藏的暴乱和维持那里的法律和秩序之后，它立即又对北京和其它卷入示威活动的城市采取同样的措施。除了拉萨的西藏大学的学生进行罢课和示威游行以支持北京的学生外，这些事件没有对西藏发生直接影响。我被告知，许多西藏人确实认为汉人被枪杀就象藏人在前几次暴乱中那样是合适的。然而间接的，天安门事件后，北京保守的领导人自然地限制了西藏的新政策，那些政策有助于平息西藏人的怒气。

另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决定授于十四世达赖喇嘛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这表明了流亡集团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增加它的宗教领袖的声望，同时尽管是间接地却是有力地表明达赖在美国和斯特拉斯堡的建议是有效和恰当的。随后东欧和蒙古发生的变化更加鼓舞了西藏流亡分子，他们相信中国发生这种变化的那一天也不远了。这一系列事件看起来使达兰萨拉的意见更趋强硬，达赖喇嘛愿意作出实质让步以协议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在此后几年里更加渺茫了。例如，在最近的讲话里，达赖喇嘛告诉流亡集团，目前的事态发展给西藏人提供一个很大的机会，5——10年内中国将发生大的变化。这种信息表明只要西藏顽固坚持，继续扩大他们的影响，他们将取得成功。所以，流亡分子很可能有力地向西方表明他们的观点，等待中国的变化以解决西藏问题。当然，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流亡集团通过鼓动拉萨的民族主义组织发动大规模的市民叛乱，或者反汉

人的恐怖活动，来提高他们的影响。1989年西藏外部发生的事件使得北京和达兰萨拉都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

## 六、有何解决方案

1989年结束的时候，西藏问题仍是国际社会中最难解决的争端之一。目前的形势表明几年前流亡分子发动的政治攻势取得了策略上的成功。西藏人的事业在西方受到欢迎，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人权组织专注于西藏，宣称北京在西藏个人和整体上都侵犯了人权。美国国会采取了积极的亲藏政策，通过立法向西藏难民提供资助，开播美国之音的藏语节目，在与北京打交道时考虑西藏因素。这一切的基础在于西方几乎完全接受流亡分子关于西藏现代历史和当前局势的文化和政治结构设想。例如，国会领导人跟着达赖喇嘛的路线，谈论相邻的藏族地区时，就象它们是西藏政治实体的一部分。而在西藏人方面，不断的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和暴乱迫使北京实行戒严，和对改革的政策刹车。这些行动反过来又刺激西藏人，加剧种族紧张。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漫不经心地陷入了流亡政府的手掌

尽管流亡分子取得了这些胜利，但达赖喇嘛和流亡分子渴望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比197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渺茫。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几个主要大国仍然不支持流亡分子宣称的西藏过去是今后仍将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目标。而且，看来时间也不利于流亡分子。不象在南非和以色列，人口比例不利于当政的政治集团。而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大量汉人移民来淹没西藏。锡金和拉达克（被印度同化）的历史清楚地表明，西藏人口比起它的人口众多的种族．

邻居，在政治上非常脆弱。

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是否真正取得了巨大胜利？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分裂了，西藏在此后的混乱中赢得了独立，那么达兰萨拉可以公开地宣称它的战略取得了成功。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北京的变化不大可能按照流亡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对西藏问题发生重大影响。西藏流亡分子与天安门事件后逃到西方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取得联系，尽管他们欢迎达赖喇嘛加入他们反对北京的阵营，却不同意西藏人应拥有自决权。象北京一样，他们把西藏看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台湾的政策，即坚决认为西藏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尽管据说台湾秘密地向流亡集团提供大量财政支持。西藏问题的种族和领土基础是超越具体的政府和具体的领导人的。

所以，看来达兰萨拉的战略仅仅取得了付出重大代价之后的胜利。它争取到了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但未能有效地保护和发展西藏的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设置了一系列条件，而在这些条件下西藏的藏人不可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它甚至可能导致北京作出同化西藏文化和向自治区大量移入汉人定居者的决定。从这一点看，西藏的2百万藏人是达赖喇嘛和北京在80年代斗争的牺牲品。这段时期内，流亡藏人的生活是逐渐改善的，有一些藏人还利用国会提供的奖学金前往美国。但是拉萨的藏人却生活在戒严之下，面临失去他们近来已取得的重要权利的危险。

将来怎样？现在西藏和藏人的命运正处于转折点上。西藏是否会象北爱尔兰、以色列和黎巴嫩那样成为互相冲突和仇恨折磨着居民的地区。这是90年代面临的问题。

90年代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具备达赖喇嘛和流亡分子及北京都能接受的条件。对于前者，丝毫的让步将要求实质上的政治独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解决方案。然而北京却不愿接受这一解决方案。如果中国共产党统治象最近的东欧那样瓦解，很难想象在近期内能在“政治”解决上取得重大进展。这样一来，流亡分子肯定将努力利用他们在80年代已成功利用的手段来使西藏问题成其为一个不断存在的问题，甚至通过暴力抗议来加强攻势。

虽然流亡分子和北京重新修好的前景很渺茫，但仍存在一种替西藏人设想的解决办法，这一方案所涉及的条件对于绝大多数自治区的西藏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流亡藏人却不一定。该方案不要求建立不同的政治体制，却要求相当多的文化和种族自治权——一个同一种族、语言和文化的西藏自治区。很难准确描述这一方案，但很清楚的是，导致这种解决的变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总体而言，它要求在某个固定期限内，北京从西藏撤走所有的汉族官员和商人，那些有特殊专长的除外，如医生、工程师和教师。同时藏语应成为政府的基本用语，尽管西藏学校继续教授汉语，而且所有高级官员应掌握汉藏两种语言。这一“民族解决方案”不会与北京1980年改革目标相冲突，而且为北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不必冒险使目前西藏的暴力和混乱永久化或升级。

许多西藏的藏人相信这一方案将逐渐被所有的西藏人所接受。事实上，这种解决不是激进的，本质上它要求在城市里创造一个类似西藏西部边远的农牧地区那样的气氛。当然这一政策也有风险，但目前的不进不退的措施似乎具有更大的风险。这一“民族解决方案”最终可能为达赖喇嘛接受。

他已55岁了，必然考虑他死后藏人的前途。他本人在没有“政治”解决的情况下也许不愿意返回西藏，但当他和流亡分子等待能实现他们真正渴望的那种解决的历史变化时，他可能把“民族”解决作为过渡措施而给予沉默的支持。

然而该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西方支持这种解决。如果中国感到即使它冒险进行了巨大的改革，却被西方有影响的势力忽视并继续谈论西藏“大屠杀”，那么将很难看到中国这样做。很具有讽刺的是，尽管中国坚持西藏是内部事务，与美国或其它国家没有关系，但目前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却似乎是有影响的西方势力积极地公开地支持这种解决方案。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是否中国领导人有远见和力量去实现这种解决，而且关键的是西方学者、政客和新闻媒介能否引导人能够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有一个崭新的客观的看法，并鼓励北京向这个方向进行。解决西藏问题或其它问题都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西方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必须超越政治偏见，并全面考察这个尚不为人知的神秘世界。

# 达赖喇嘛和美国

詹·安德生 著　李有义 译

**编者按**：这篇文章介绍了1979年达赖访问美国时的一些情况和部分美国人对待达赖及佛教的态度。译自《西藏报》1980年，1—2季度合刊。

## 一

多少世纪以来，西藏以"禁地"而知名。它被认为是世界神秘的屋脊，秘密和神奇知识的仓库。多少世纪以来，从希罗多德起，就流传着关于这个神秘国土的故事，近年来还有一位英国管子工亨利·霍斯金思用罗桑默巴的笔名写了一本《第三只眼》。一个被神秘的云雾围绕起来的人物，就是神王自己。他是藏在各种神话交织成的帷幕后的一位东方的王公。

突然，有一天，人们看见他在纽约五条街上散步，在三藩市（旧金山）和电视记者谈话，在维斯康星州看美国足球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神秘的梦幻消失了，乐园也失去了。

只有那些拒绝改变他们对西藏的旧印象的人（这些人在西方颇有一些），才认为达赖喇嘛在美国的形象是不协调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如果不是有世界政治的阻力，这一情况早该发生了。

西藏的隔绝（并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严密）并没有妨碍前代的达赖喇嘛们出国去，当然主要是为宗教的原因。十三世达赖去过印度，这是本世纪初的事情，这一出访导致了他和物质上先进的，政治意识形态上和亚洲传统制度截然不同的社会发生了接触。他有一副灵活的脑子，认为和在印度的英国人增加一些谨慎的接触，对他的国家是有好处的。在他返回西藏后引进一些现代化：设立了一所英国学校，第一次安装了电线，还进行了军事改革。

1933年，十三世达赖去世后，与西方的接触仍继续进行。1940年十四世达赖坐床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这也影响到西藏，尽管只是边缘性的。在拉萨驻有一位英国外交官，西方人来来去去，布达拉宫的这位年轻的孩子是好奇和爱打听的，他玩一部美国的汽车，他看载有纽约摩天楼照片的杂志，他接见美国新闻记者，他对现代科技的成就印象很深。这些自然地增加了他对西方的向往，包括一些西方的大国，他很想都去看看。

1959年的逃亡，西藏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接触增多。在1973年，这位西藏宗教领袖访问了十一个欧洲国家。达赖喇嘛已三度访问欧洲，在他踏上西半球前，他还访问了外蒙和苏联。

## 二

请达赖来美国的问题，在几届美国政府的态度上都是有保留的。在他们看来，这位西藏领袖的一次访问会损害正在发芽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触，这一态度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让我们只举一个小例子，一部称作《失去土地的人》的

影片，是由美国情报机构于1971年摄制的。花了七万三千美元。由于政治的原因停止发行，西藏这块土豆太烫手了。

人们到国务院去询问，得到的答复照例是“这时候访问有所不便”。从各个想见达赖喇嘛的团体对美国政府官员产生了压力。当中美关系发展到已擎得住这样一次访问时，终于在1979年初，才给这位宗教领袖发了签证，这差不多就是两国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国务院否认这事和建交有联系）。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时候就不怕访问会影响对中国的关系呢？好！我们不妨猜想大约是美国政府得到中国的同意才发给签证的，因为反对访问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四人帮”倒了以后，北京对待西藏问题松了一些，这在1978年就看得很清楚，他们对达赖喇嘛表示了新的热情，甚至欢迎他回去，西藏人甚至被允许参观西藏以外的地区（至少在几个象征性的场合），在西藏也成立起接待委员会欢迎回来访问的西藏人，政治犯都释放了。假如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真诚的，北京就不会有其它选择，只能向美国表示，他们不会因给达赖喇嘛发了签证而提出抗议。同时美国政府决定在成为美国公民的西藏人的护照上，在出生地一栏填上“中国”。

当九月三日瑞士航空公司飞机在肯尼迪机场着陆时，等候迎接的西藏人用他们的乐器吹奏起欢迎曲，这不是什么新发生的事情，在它背后是有一串长而复杂的历史的。

## 三

达赖喇嘛是应宗教团体　大学、文化团体等的邀请而来

访问的。他对会晤学者、科学家和不同信仰的宗教人士感兴趣，参观社会和教育机关，会见住在美国的西藏人。当然会有许多关于政治理由的猜想，如为西藏独立争取支持，但他们得到的答复经常是：“我的访问基本上是非政治性的”。象六年前在欧洲一样，这位西藏的领袖始终保持他的诺言。

看看他七周访问的日程，他要去十七个大学和学院，活动节目包括讲演和各种集会，特别明显的是有许多这样的活动根本和西藏或东方研究无关。相反的倒是反映了达赖喇嘛多种多样的兴趣，使他去看一个原子能研究站，心理学实验室、休养所、肿瘤研究所和许多其它机构。这种脑子开阔、兴趣广泛，使那些认为宗教人物应当是深居法室的人感到惊奇，他们忘记了一位佛教僧人可以比念诵经文学习得更多一些；他学会了发问、调查、分析和综合。

达赖喇嘛想学习的西方科学对事物的发现，他作为一位佛教徒是完全熟习的，这包括象生理学家所发现的人在静坐时身体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西方学者们在研究转世问题上得到什么结论？佛教徒和西方的观点，在物质的构成和功能方面是否可以协调。

“我学习过一些关于对意识和思维科学研究的解释，人的脑子的本质和分子以及小小的原子。我对此很感兴趣，做为一名佛教徒试图寻找一个事实，我们将试用静坐修炼，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解释。它们也许存在于我们的经典中，但是假如科学研究找到另外一种答案，那我们只能接受这一事实。我就是这样对科学的发现经常感到兴趣，在这方面我学到一些东西”。（在麻省剑桥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他的真诚的广泛的兴趣，增加了他所接触的科学家对他

的敬佩。他不仅作礼节性的拜访，在他所提出的问题中，完全可以看出他是真诚地在学习。

## 四

大学总是有传统的，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智慧与方法的堡垒，大学也是最新的革命和最古老传统的温床。有美国的三个大学按照古老的传统授予达赖喇嘛以名誉博士学位，它们是洛杉矶的东方研究大学、维斯康星州的卡罗尔大学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大学，后两者是基督教的教会大学，为什么美国基督教大学会授予一位西藏的佛教僧人以荣誉学位呢？解释可以从授予证书上的说明中找到：

在思考和精神领域中，你已经在佛教学院的严格学术传统中表现了突出的成就，你在25岁时就获得了最高荣誉的博士学位（这里指的是达赖在西藏时获得了拉让巴格西，译者），在政府和外交事务中，你也能找到时间用著作教导和记录下你对哲学的精辟的内察和在现代世界中默思生活的意义。你著的书不仅是对大量佛学经典的重要贡献，也是对全世界所有大宗教全面对话的贡献，你作为一位佛教僧徒对默思生活的献身——这种悟脱境界——不仅在佛教徒中，也在基督教的静修者中赢得了钦佩和惊奇，包括美国静修僧人汤姆斯·穆尔通，你们之间的友谊和谈话是互相有益的。

西雅图大学有一个方面是很典型的，即它属于天主教的耶稣会派，耶稣会派传教士是第一批进入西藏的欧洲人，他们是安卓德，卡西拉，卡布洛，格鲁布，多维尔第西德里，这些耶稣会士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在西藏，有的住了若干年，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他们带回了大量关于那个偏远地方的资

料到欧洲。格鲁布甚至还绘制了一张五世达赖的像。那时候西藏统治者帮助耶稣会士的宗教工作，现在过了几百年，这种友谊的纽带又在西雅图得到承认。

## 五

50万可能是一个小数目，这要看内容。美国有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民，50万在这个数字中，只是五百中有一，在百分比中占零点二。这个数字是美国人中对佛教有点接触的，不管是信者还是非信者，真正的信者数字更少一些。

十年或十五年前，我们有花儿童和嬉皮士，所有这些年轻人都说是受了东方宗教的启发。在两个青年中就有一个脖子上挂着念珠，他们在念诵西藏的“开路经”而不是去学乘法表。年轻一代的这种狂行比老年一代的愤怒没有存在更长一些。忽然一天，念珠不再有意思了，“开路经”没念懂一个字就扔到一边去了。

但是有可爱的少数人理解那些经书里是有东西的，那里面藏着深刻的教训。在百分之零点二的人中，有一些人和佛教团体建立了接触，不管是西藏的还是印度的“真”派，这些团体开始都是由少数人搞起来的，他们都是热情的工作者，属于西藏教派的，他们就设法请一位西藏喇嘛短期的或者长期的来教经，这些中心慢慢发展起来，有的还成立了分支组织，也有的紧紧地围绕着一个有名的喇嘛进行活动。

一听说达赖喇嘛要访问美国，在美国的宁莫巴、萨迦巴、噶举巴、格鲁巴，那些一般佛教团体纷纷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他们的中心，这些中心，经常是按西藏的形式装饰起来 有佛坛、唐喀、经书。有些地方偏重于学术方面，学生

们学习藏语文，学习照西藏的传统辩经义，另一些中心强调修炼。

在这些中心里讲话时，达赖喇嘛总是强调教派间的团结，互相攻击是没有意义的，不要在不同的教派和团体之间人为地树立障碍，可能在西方的这些团体为生存下去而斗争是必需的，因为他们处在一种陌生的环境中，人们对他们的工作了解的很少，他们得找到人捐款、支持和为之工作，每样工作都是费很大劲才能完成。这可能导致了一种强烈的保护情感，而又为热诚的学生所保持下去，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努力。

达赖喇嘛以同样的热情访问每一个中心，以同样满意的心情看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但现在是未来的种籽，种籽撒好了吗？喇嘛教在西方的这棵树成长起来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些就是这位最高的西藏喇嘛在七周的访问中所要考虑的问题。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每件事应当严格地保持旧传统，还是因地制宜走向现代化？这并不是仅对这一情况的问题，它发生在每一次有大批人移植到一个新环境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却不能用行政命令来加以解决。必须试用不同的方法，还是老原则，“适者可以生存下去”。

教佛并不是西藏独有的，虽然它发展成为重要的一支。印度经典被译为藏文，而且是特殊的准确。现在这种宗教传到西方，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遵循老传统，另一条是把经典、仪规译为当地文字或者保留藏文本。现在看来多数地方采取第二条道路，在达赖访美期中，明显看出在许多地方给客人分发了用音符转写的祈祷文，这样参加者就可以藏语音

调念诵它，在最好的情况下，还附有一份英语的译本。

在天主教教会里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拉丁文才让位于信者的当地语言，但是西藏佛教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即教师大部分是西藏喇嘛，他们很少有除藏语外还通另外一种语言的。维持一个中心，需要有翻译，人们经常是用洋泾浜藏语念完祈祷文，并不懂它的内容是什么。

相反的，有一些经书被和这些中心有联系的商业公司或出版社翻译出来作为书籍出版，译文的不统一，增加了混乱，这不象当初梵文本译为藏文，现在把藏文译为英文没有标准译法，多数译者使用他们自己选定的词汇，这还不仅是一种语言的问题，它牵涉到欧洲的多种语言．尽管英语占主要地位。

除了这些书籍之外，传授主要是口头的，这需要从更有学问的人学习。有些被送到西方去的僧人，他们对西方的价值有了密切的接触，他们最后脱下袈裟，结了婚，找到一个一般的职业，有的还保留学者身份．但不再积极的作宗教的教师了。

## 六

圣巴特里克大教堂，比特尔路德教会，联合神学研究院，圣约翰大教堂，三一教会，统一普遍教会，圣班尼底克托中心，恒德里克教堂。

上面的名单很象是教皇访美的程序，但却是达赖喇嘛的日程。他出现在很多教会里，他会晤了一些基督教名人，他不可避免地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基督教徒和他自己的跟随者一样也是热衷于会见他，我们已提到教会大学．其它一些

教会机构也反映出他们的热情。

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位最高的西藏僧人是否是为向美国人传教而来的。他是否想制造一次新的嬉皮士浪潮，这些问题不断向他提出，他一概加以否认。他的答复："我并不想怎么样把其它人变成佛教徒，而想的是佛教徒如何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在纽约的圣巴特里克大教堂举行的巨大的多宗教礼拜时，大主教、红衣主教科克说：

"我们今晚在这里祈祷，没有一刻不想到我们是一些新的普通宗教的成员。我们寻求相互了解和欣赏另一种宗教信仰，我们寻求相互之间建立坚强的纽带。"

一旦这个观点定下来，就可以开始对话了，达赖喇嘛带给基督教徒和其它信仰的追随者的信息是这样的：所有宗教系统的一个基石是造福于全人类。可能存在许多哲学的分歧，但至少有这一点是相同的。让我们利用它作为起点共同努力去改善世界，共同努力去实现和平，快乐和慈爱，为了这一目标，没有必要把人们从一种宗教信仰改变为另一种宗教信仰。

同样佛教徒可以通过静修求得精神的平衡和谐调而贡献这方面的特别知识。内部的和平是外部和平的先决条件，静修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不管他属于什么派别。

教会里挤满了人来听讲，但很难说达赖喇嘛所讲的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

碰巧，教皇也在同时对美国作了为期六天的访问。但是这两位宗教领袖各在不同的海岸未能会晤。当然天主教教宗公开接待规模更为宏大，因为在美国有几百万天主教徒，他

们为能在美国土地上看到教皇而欢欣鼓舞。

但是教皇的访问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天主教会里发生了要取消一些过时的清规戒律的运动。当教皇宣布了他的正统主张，他几乎遇到了公开的抗议，这种情况在欧洲国家里也有发生，特别是荷兰和德国，这里保守的官方教会正在迅速地失去信者。

把这两位领袖比较一下是有趣的，教皇是在加强教会的统治来答复挑战，执行一条更保守的路线，达赖喇嘛在寻找新的冲动，新的概念和新的开端，他甚至看到他流亡的好处，他说，如果不是流亡，他将是一位更保守的人，对他的人民和他们的问题将知道的很少，这可以对区别找到一些解释：达赖喇嘛有机会与普通人民会晤并讨论问题，这在一个困难时期的宗教领袖是很自然的，由于他具有一副开阔的头脑，他认识到人类的问题不能靠教条来解决。

同样的分歧在两种宗教的组织和机构上也可看出来，这一分歧是有它的历史和神学根源的。天主教会是它本身组织的一部分，非常集中、严格和教条化。人们不能偏离罗马所定的路线太远，这一情势早已为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教士们所察觉。

相反的，西藏佛教在西方是很灵活的，组织也是分散的，每个集团都可以完整地保持独立的存在。在宗教问题上可以有巨大的分歧意见，但这并不能导致被逐出或宣布出教，简单理由就是没有人执行这种权力。

和基督教会比起来组织松散看起象是正常的，但也带来一些不利。完全没有集体的力量，没有人为所有佛教徒的利益发言。达赖喇嘛强调基督教徒为穷人所作的社会服务，是

佛教徒可以向之学习的例子，但基督教徒所以能作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基督教徒良好的组织。很难设想小小的佛教中心能够在他们活动的范围之外做出许多事情来。

尽管如此，这位西藏喇嘛还是天天强调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宗教是好的——一个宗教是很难满足每个男人和女人的需要的。所有宗教都应该受到尊敬，因为它们的目标是相似的。

这是一种老佛教徒的宽容而不是一种新发明，请记住乔治·波格尔于1774年访问扎什伦布寺，和班禅罗桑班丹意希谈话后所记三世班禅的谈话：

“他慈祥地说：我们都崇拜同样的神，只是名称不同，所有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只是追求的道路不同”。

## 七

宗教活动占据着这次访问，但是政治活动使它成为可能。这次访问的性质是非政治性的，但访问本身是政治性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并非由于他干了些什么，而是由于他本身的地位。

如前面讨论的，政治上考虑决定着他的来访是否便利。了解到中国对他的意见和继续作为西藏人的领袖而敏感，可以理解，但很难原谅，假如政府愿意继续与中国友好，发展贸易关系应当是十分小心地，甚至在最小的事情上避免刺激中国的不满。十年来所谈的“有所不便”表明了这一点，在其它国家还有其它的例子，在达赖喇嘛于1979年到达瑞士时，瑞士电视台想对一次访问录像，其中包括一些政治问题，但政府停止了这一计划。

卡特政府对和西藏宗教领袖接触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甚至拒绝在安全问题上合作。相反的地方官员则比较合作，他们没有强调世界政治，只考虑正常的人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中国的反应知道得不多，不过间接的也听到一些。很容易预料达赖喇嘛的访问会引起新闻界的大量报导，西藏的争论又会被新闻记者提出来，为了防止中国的观点被歪曲，北京允许一大批记者于夏天访问了拉萨。这样做，中国的观点就可以出现在西方的报刊上，他们知道有一些记者可以写出关于西藏情况的公正的报导，如果他们亲自到拉萨看了的话。

不仅新闻记者，连政治家和藏学家也受到邀请，这一年的政治家有加拿大托鲁多，英国的希斯（有趣的是中国喜欢邀请外国失势的政治家。他们多半是前总理，前部长，前外交家等，托鲁多不久前才由总理下台，希斯则让位于撒切尔夫人。早期的访问者有乔治·布什——1977年访问，他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头子，詹姆斯·施莱辛格，他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这两位都当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头子）。

更有趣的是就在达赖喇嘛访美期中，中国派了一个宗教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他们比达赖早到了几天，在普伦斯通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带着宗教自由已在中国恢复的信息访问了美国各地。这一观点也向西藏访问者重申他们已知道大昭寺已经开放（不过要买票）。

中国重新努力想使达赖喇嘛回去，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这总是个突出的问题，人们想知道达赖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答复是照例的：直到西藏的人民感到真正的满意时，他才会考虑回到中国人统治下的西藏

去。他对苏联和外蒙的简短访问，引起人们的猜测，有人说他和俄国人进行了秘密谈判。他累次申明那次访问是纯宗教的，但对许多人来说，他的申明太简单了，不是全部内容。政治作家们总是认为在公开申明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东西。

# 为西藏而斗争：利用宣传与公共关系发动政治攻势

（美）A·汤姆·格兰菲尔德 著
刘浩 译　植荣 校

**编者按**：1992年4月，台湾政治大学举办了“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格兰菲尔德博士向大会提交了这篇论文。该文客观地介绍了所谓“西藏问题”的由来及其演变过程，以及西藏分裂集团与西方势力在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提醒人们，在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学进入世界舞台后，培植利益集团、开展宣传攻势已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良好工具。

## 引　言

很多世纪以来，西藏一直是一个很少受到世界注意的地方。即使在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扩张的巅峰时期，西藏也没有遭到入侵。实际上，西藏是如此的封闭，除了1904年英印当局的一次军事远征以外，直至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历来访问西藏的西方人和日本人总计只有几百人。

1959年3月，拉萨的一次失败的武装叛乱标志着西藏从几个世纪以来的持久的隔绝状态中开始凸现出来。这次叛乱

导致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及其五、六万追随者逃往尼泊尔、不丹、锡金，特别是印度。

在印度的西北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建立了他的总部。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小镇上，他按照西方的宪法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设置了内阁（噶厦）和“人民代表”，在国际上还设有“办事处”，还有国旗、国庆日以及新闻出版机构等一国政府的所有外部标志。所有这些，都是准备有朝一日他和其他的人能够返回和再次统治西藏。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承认过这个流亡政府，并且由于冷战在象印度支那这样大的范围内持续进行，达赖喇嘛的事业在四分之一世纪强的时期里很少受到关注。然而，在最近的几年里，“西藏”和“达赖喇嘛”已变成世界上家喻户晓的词。这绝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颇具耐心、特意计划的争取国际支持活动的结果。他们坚信，只有使西藏问题国际化才能达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即西藏独立。本文打算考察这一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

## 历史背景

在六十年代，达赖喇嘛的主要目标是使西藏难民在他们新的家园里安置下来以及在西藏内部开展游击战争。由于西藏人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军事援助，并且他们确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支持，对于实现他们的目标是足够的了，因而国际支持被认为是不重要的。

在七十年代，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人由于陷入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便大量把其它行动当中的财力都转移到印支战场。这就意味着给西藏游击战的物质援助更少

了。1971年英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所有反共援助包括给西藏人的援助都突然间终止了。

同时，在中国内部由于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神秘死亡，中国领导层的分裂出现了高潮。林彪之死导致了政府对整个大陆包括西藏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我们相信，美国支持的终结和中国国内的温和政策这一双重因素的作用导致了达赖喇嘛与北京当局的秘密接触，在这一时期，有迹象暗示达赖喇嘛差一点返回拉萨。[1]最后谈判以失败告终而详情仍不得而知。

## 毛泽东去世之后的谈判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一个被称为“四人帮”的领导集团被逮捕，大陆上的政府政策变得更加温和。

从西藏来看，变化是迅速而显著的。北京官方公开承认过去的政策和实践给西藏造成了损害，访问者被允许进入西藏（尽管开始是极少的），并且西藏人开始被委任至少有一部分权力的职位。

1977年4月，未逃离西藏参加流亡的世俗最高官员阿沛·阿旺晋美首次宣布，北京将允许西藏难民访问他们在西藏的家人。此外，1978年2月，在西藏佛教等级制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班禅喇嘛被软禁十四年之后获得释放。

达赖喇嘛对这些变化作出了反应，他发表讲话呼吁当局对访问者开放西藏，北京政府几乎立即做到了这一点。[2]

达赖喇嘛赞同地作出了反应，缓和了他的讲话，较少谈到他对于西藏独立的期望，较多地提到对于西藏人民经济福

利方面的愿望。1978年他宣称："如果六百万西藏人民真正享有从前不曾有过的幸福和繁荣，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争论其它的方面。"[3]1980年达赖喇嘛又称："西藏问题的核心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幸福。"[4]他也开始公开谈论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和谐的可能性。

1978年11月北京当局升级了最初的提议，直接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接触，当时嘉乐顿珠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建议住在香港。中央情报局确信(知道？)北京领导人最终将想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5]新的一轮达赖喇嘛——北京接触开始了。[6]1979年8月，达赖喇嘛第一次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西藏，双方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很清楚的。

在流亡的头二十年当中，达赖喇嘛曾经试图为他的事业争取一些国际支持，尽管这并不处于优先的地位。例如，他不能出国周游以增进他的事业是因为大多数政府都不愿意给他签证。随着形势的变化，周游访问以获得可见度和支持变得更加重要。1979年达赖喇嘛首次访问了苏联、蒙古和美国。美国之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由于"不方便"的原因被拒绝签证达十年之久。[7]现在由于北京和达赖喇嘛关系的缓和，访问大概是"方便"的。实际上为了不惹怒北京和台北——两者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签证一直是被拒绝的。

虽然美国国务院坚持签证仅仅是为私人宗教访问而签发，但达赖喇嘛仍然从事了一些低度的、侧面的政治活动。在华盛顿，达赖喇嘛与几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会晤了三十分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见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出席了由众议员查理·罗斯组织的有180名国会议员参加的招待会。在其它的地方他会见了威斯康星州州长、加利福尼

亚州州长杰尼·布朗以及旧金山市市长迪安·菲恩斯坦。[8]这些政治场合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在美国存在着一股值得考虑的支持他的事业的潜在的大众力量，即使政府本身似乎不赞同支持达赖喇嘛。

对于西藏人到苏联——当时是中国的敌人——以及美国去访问，北京公开地感到不快。但是会谈没有离开预定的程序。几个月之后，即1980年5月，达赖喇嘛派出了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代表团到西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也于1980年视察了西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一样，他也对所看到的情况感到震惊。胡耀邦立即下令改变这种状况。[9]

这些变化以及承认在西藏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继续形成一般缓和的气氛。1982年4月达赖喇嘛派出了另外一个代表团到达北京，在那里他被同意将于1985年返回拉萨，在此之前即1984年的某个时候，一个高级特派团将访问西藏以准备这次行动。[10]

事实上这些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甚至于达赖喇嘛也公开宣布他将于1985年返回西藏。

但是这种乐观的想法太早了。谈判陷入了困境，达赖喇嘛想得到行动的自由，能与任何人公开地谈话以及住在拉萨，而中国当局却希望他能够住在北京，以便控制他的活动，使他接受西藏的有限自治。

迄今为止，似乎达赖喇嘛仍然相信西藏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在于同北京当局的直接谈判，第三方的卷入被保持在最低限度。并不是西藏人在这一时期不欢迎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的支持，只要同北京的谈判取得进展，尽管是断断续续的，他们仍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这些谈判上，然

而这些谈判从来都没有顺利进行过，因此到八十年代中期，达赖喇嘛及其顾问似乎作出决定，他们需要另外的手段来进行对抗北京的斗争。

## 西藏问题的国际化

就此而言，达赖喇嘛在印度之外的周游[11]很自然地被冠以宗教的色彩，尽管他被抓住每一个机会去会见地方官员以及向政治家们例如巴黎市长、英国国会和美国国会议员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陈述他的事情，如果没有任何事项不使那些勉强发给他签证的政府感到为难的话，这些访问的主要焦点实际上都是非政治性质。[12]

除了少数地方政治家外，流亡的西藏人还获得了为数不多的民众的支持。例如，1977年在纽约成立了美国——西藏委员会，到1981年在全美十个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但是总共只有100名成员。[13]

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西藏难民政府宣布1984年为纪念"斗争和重建二十五周年"纪念年，以便为他们的事业招来支持。他们分发T恤衫、钥匙链、张贴物和纪念章等，在印度的好几个城市里设置图片展览。一位最近才信仰佛教的富有的美国人，著名摄影家理查得·艾文登的儿子约翰·艾文登为了西藏的事业能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出版了一本名为《雪山之地的流亡者》的有关西藏历史的书，与达赖喇嘛的"官方"历史观点最为接近。同时，罗杰·黑格斯和拉巴措央受权写了一本圣徒传记，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传》。[14]

还有许多这种劳而无功的努力。1985年3月，"国际和解联谊会"以及设在伦敦的"科学佛教徒联合会"试图使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关注西藏问题。虽然这一联合国机构除了监督和批评之外没有任何权力，但它能够为它提出的事件提供较高的透明度和合法的手段。

1985年6月，西藏流亡者与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中国阵线发表了联合声明。[15]并且在随后的一个月里，西藏人在瑞士会晤了从蒙古、满洲和"东土耳其斯坦"来的代表，筹组"东土耳其斯坦、蒙古、满洲和西藏人民联合委员会"并开始出版《共同之声》杂志，据我所知，该杂志仅出版了一期。[16]

西藏在纽约的办事处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名为布拉达出版公司。据创办者之一丹增次仁的说法，开始该出版社仅仅是重印达赖喇嘛的原著自传以及作为"不需巨大花费的传播消息的途径，"他回忆道："很长时间以前，当你分发免费印刷品的时候，首先人们不接受它，其次，他们带着许多疑虑接受它，但是当你在一本有关西藏的书或小册子上贴上价格标签时，人们不仅会拿起它而且会买下它。"[17]

但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努力加起来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达赖喇嘛想要按照他的利益产生国际压力的话，他就需要某些进一步具有实质意义的东西，必须作出决定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使西藏在国际新闻媒介中更显突出，建立道德范围（独立、宗教自由、环境等）内的广泛支持，然后运用公众的压力迫使政府站到达赖喇嘛的一边，以达到迫使北京缓和其立场的目的。这一运动将包括下述几个部分：1.达赖喇嘛需要更多地出访以及使访问公开地带有政治性。2.必须在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建立起支持集团，以便影响他们的政府关注达赖喇嘛的利益。3.为了达到政府公开支持的最终目

标，必须招纳一些主要国家的国会议员。4.西藏内部的民众不服从运动必须得到鼓励。5.达赖喇嘛须继续以谈判为理由提出一些灵活的条款。

这一极其显著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在同北京的谈判中所遇到的无法克服的障碍所造成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由于范普拉赫开始为华盛顿强有力的威姆尔·卡特勒·皮克林律师事务所效力，1985年7月10日这个律师事务所在美国司法部注册成为“西藏”在美国的代理。

范普拉赫是一位荷兰侨民，作为达赖事业的促进者、达赖及西藏驻美办事处的代言人和法律顾问，他与达赖喇嘛的联系已有好多年了。(18)我认为，这种联系是理解达赖喇嘛现行的使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威姆尔、卡特勒和皮克林“以其在国会大厅里的表演较之于在法庭上更为人所知。”(19)一名主要的合作者卡特勒作为一名“在白天是共同的教父而在晚上是教母”的人物，被称为是“华盛顿的律师院外活动分子中最活跃的传奇式人物”。他成立他的事务所是为“任何能够负担费用的特殊行业提供服务。”(20)卡特勒被《全美法学杂志》选为美国最有影响的一百名律师之一，以及被《注视》杂志评为华盛顿最强有力的个人之一。(21)他本是卡特总统的首席法律顾问，并且自认为是自由民主人士，但他公开支持前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波克和安多尼·斯卡利，这两人是美国最保守的法官。此外，他的一名年轻的同事波登·格雷是现行布什政府的法律顾问。(22)

我们不知道幕后在干些什么，但是假设一下这些法律/院外活动机构的活动，我们可以推测，威姆尔、卡特勒和皮

克林建议达赖喇嘛如何发动公共关系运动以获得广泛的支持。毫无疑问，他们也开始打通国会的关系，特别是同众议员查理·罗斯、汤姆·兰多斯和本杰明·吉尔曼合作。

在1986年末和1987年初，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会议以建立逐渐为人所知的西藏院外活动集团。

1986年达赖喇嘛郑重地开始了他的访问活动，在访问西德期间，他与联邦德国议员特别是绿党成员建立了联系。在奥地利，当达赖喇嘛会见瓦尔德海姆总统时表示，为了政治事业的利益，即使作为一名宗教领导人也应该能无所顾忌。当时由于他有关在二战中纳粹会员身份事件，瓦尔德海姆正遭受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联合抵制。达赖喇嘛也访问了苏联，以及应教皇之邀去梵蒂冈参加了世界和平祈祷日。1987年3月恩纳尔斯爵士为达赖喇嘛在英国下议院举行了一个欢迎会。[23]

1987年6月西藏人获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对外关系授权法修正案，谴责在西藏“侵犯人权”并声明西藏目前是被中国用暴力占有。另外，26名国会议员致信赵紫阳总理谴责在西藏践踏人权。这正是达赖喇嘛所致力于的那种压力。

北京作出了反应，让德国总理科尔和前美国总统卡特分别于6月和7月份对西藏作了简短的三天访问。科尔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西藏的执政的政府首脑。两人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暗示，西藏的现状比达赖喇嘛所描绘的要好。[24]

## 美国成为斗争的战场

北京的不妥协立场使达赖喇嘛开始努力去促使北京让步。达赖——北京谈判的焦点从他们自己之间的谈判转移到遍及西方人及其领导人的心理及思想的斗争。当他于1987年9月18日至28日再次访问美国时，达赖喇嘛提高了他的赌注。中国驻美大使馆抗议了这次访问的政治性质。但是达赖喇嘛于9月21日在国会人权小组上发表讲话，并提出五点计划。他呼吁：1.西藏应成为和平区。2.放弃向西藏移民汉人。3.尊重人权和民主自由。4.重视环境保护。5.就西藏未来的地位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正当达赖喇嘛在美国活动的时候，北京当局于9月24日在拉萨召开了一个公判大会，判处了两名被控犯罪的西藏人死刑。三天之后，拉萨爆发了28年来第一次公开的示威游行。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又发生了另一次骚乱，造成了流血事件。

西藏所发生的这些事件主要起因于藏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对两名西藏人被处决的愤怒、旅游者（包括西方人和藏人）的煽动以及了解到达赖喇嘛当时正在华盛顿活动等。实际上，印有美国国会决议连同达赖喇嘛的照片和附有西藏旗帜的复印件在拉萨广为流传。

拉萨发生的事件给达赖喇嘛带来无法估量的好处，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西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10月6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类似于早先众议院所通过的法案的决议，同时附加一些条款将西藏人权问题的解决与未来向中国军售的问题相联系。根据该法案，为了维持

军售，美国总统须确认中国正“基于良好的信念和适当的方式”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里根总统于11月份签署了该法案。[25]

美国国会的这些条款也被10月份欧洲议会通过的法案所引用，而且联邦德国议院支持达赖喇嘛的五点计划。

该计划的制定是鉴于得到不断增长的支持以及该事业正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北京不为所动，其它国家的政府也不支持。美国政府继续拒绝达赖喇嘛的要求。例如，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1987年10月14日在两个国会委员会上作证说：“……美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会承认达赖喇嘛自称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此外，美国也拒绝了达赖喇嘛的五点计划，因为它是“一个流亡政府首脑提出的政治性计划，”没有任何政府承认它。[26]

另外，国务院对所谓国会正同意参议院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向西藏移民汉人的问题的消息感到恼火，说它是“不确切的、不全面的和错误导向的，”并且争辩说，刚通过的法案使西藏人可能得到的好处“并不大于中美双边关系的损害。”[27]

而且在白宫内部，里根政府高级官员承认他们对待中国人权问题是“软弱的”，国务院正在就西藏的情况进行认真的讨论，并对国会自身允许在此问题上匆忙得出结论感到恼火。国务院也强烈反对一些国会议员的建议，他们称达赖喇嘛亦应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样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席位。[28]

在努力获得国会的赞同的同时，也在寻求更广泛的民众

的支持。在美期间达赖宣布1990年为“西藏之年”，同时举办西藏艺术展览、文化展览、“僧侣辩”等。另外，他还宣布成立西藏之家，另一位最近信奉佛教的演员理查得·格丽作为负责人和主要的资金提供者。(29)他发誓“他将把西藏印在世界地图上，使他象马洛克斯和来苏尔（两种通过大量广告而广为人知的商品)一样在美国家喻户晓。”为此目的，他同著名的艺术家一起举办音乐会，在纽约最高级的餐厅举行最漂亮的晚宴。(30)

这样达赖喇嘛带着新的重要的支持结束了他的美国之行（此次访问在他的四次出访当中最具政治意义）。

当达赖返回印度时，他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虽然不断地遭到提问，他还是拒绝说出他关于独立的倾向，从而表明他继续期望与北京当局取得和解。(31)

西藏的局势仍然平静。直到1988年3月5日拉萨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活动。数千名西藏人参加了游行，警察使用了催泪弹和电警棍以恢复秩序。

当事情在拉萨和华盛顿摊开的时候，达赖喇嘛——北京之间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停顿。达赖喇嘛进行赌博，认为拉萨内部的少部分民众的不服从运动以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有助于促使北京作出进一步的让步。时间的选择显然是一个错误。骚乱发生在一个有叛乱历史的敏感的边界地区，而且美国国会的干涉恰好是在北京准备在中国放弃强硬路线的时刻。正如我在一封致《纽约时报》的信中所述，英国拒绝承认它在西藏现代史上所进行的幕后操纵，使得美国在西藏人权问题上所发表的虚伪的声明变得软弱无力，更为不利的是，它加强了中国强硬力量的控制。正如国务院一位高级官

员所说“在此特殊时期，国会对于西藏独立的支持，无疑发出了导致更多暴力因素的错误信号，引起更多的流血事件。”(32)

然而一旦发表了他的计划就没有收回的余地了。除非北京作出主要的让步，很显然北京是不愿这样做的。因此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院外活动机构，称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由经验丰富的流亡政府官员丹增次仁负责。他们作为一个西藏的外国办事处在司法部登记，并出版一本《西藏新闻观察》杂志，汇集有关西藏的新闻消息。另外，他们组织九位国会助手访问流亡西藏人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营地，这是一种聪明的、强有力的产生影响的方法。(33)他们还创办《西藏论坛》，是一本由在中国受教育而现已离开中国的西藏学生所撰写的中文杂志。这本杂志后来由在中国职位最高的西藏人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晋美主编，他在中国长大，曾在北京学习并在拉萨的高级中学执教。他的加盟是西藏流亡者的一个重大成功。(34)

随着新近获得了支持和他的组织获得了适当的地位，达赖喇嘛现在开始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使谈判重新回到正轨。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发表讲话，首次宣布他愿意返回一个不完全独立的西藏。他提出建立一个与中国“结盟”的西藏政治实体，即中国负责外交和国防事务，而西藏将维持与其它国家的“宗教、商务、教育、文化、旅游、科技、体育以及其它非政治活动”的关系。(35)

由于北京政府多次声明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会晤达赖喇嘛或其代表以讨论除独立之外的任何事项，因此达赖

喇嘛着手任命一个六人代表团，包括两名助手以及范普拉赫为法律顾问。他声称他们将于1989年1月在日内瓦等候中国方面的代表。

欧洲议会议员们感到不那么高兴。欧洲议会英国保守党主席普拉姆爵士说："无论就那一方面来说，达赖喇嘛对斯特拉斯堡的访问是非官方的。对于他来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欧洲议会赋予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极端的重要性……我相信，正当欧洲议会增进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达赖喇嘛的访问是无益处的。"(36)

流亡的西藏人也对达赖喇嘛的妥协表示反对，他们指责"一些外国人"向他们的领导人提出了这些建议。(37)

但是这些言论并不是针对欧洲人的。达赖喇嘛运用该场所作为他新近赢得国际支持的象征。这一讲话也表达了其本意，使中国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他们的伪装被揭开了。达赖喇嘛公开同意中国经常在谈判中提到的一种情况。来自于中国的一则消息说："达赖喇嘛的让步象突然掉下来的一颗炸弹，当局仍然不知道如何去应付。"(38)首先是一些较为温和的言论。法新社援引一位中国官员莫超平（音译）的话说："虽然……部分独立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调子有些变化。"(39)

事实表明，北京当局在如何答复达赖的建议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困难的，直到19个月后才于1990年1月作出正式答复。当时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宣布不存在谈判的可能性。一个新的原因是，达赖喇嘛拒绝放弃西藏曾经是独立的观点。(40)

## 中国内部的斗争

与此同时，骚乱在西藏持续发生，中国官员在有关支持在西藏实施较少的自由、较多的控制以及不向达赖喇嘛让步等问题上的呼声更高了。1988年3月13日《西藏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我们必须给予一小撮严重的分裂主义犯罪分子以坚决的、准确而迅速的打击。……他们是这次骚乱的罪魁祸首，是社会上的祸根。"(41)负责公共安全的领导人乔石对这些事件起了主要作用，当时他呼吁政府采取一项对叛乱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42)

针对西藏的骚乱和外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这两件事，北京的强硬派领导人取得了胜利。长期以来，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和争论不休的。正如国家民委副主任陈欣所说，达赖喇嘛正试图"利用外部力量干预西藏内部事务。"(43)

强硬派领导人也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阻力。在北京和拉萨都有一些官员支持同达赖喇嘛进行妥协。班禅喇嘛是持这种观点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1988年3月29日他在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藏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有一些人认为必须打倒喇嘛和摧毁寺庙，我们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我必须严肃警告那些想要严厉打击喇嘛和关闭寺庙的那些人。"(44)1989年1月，50岁的班禅喇嘛突然在日喀则去世，从而失去了一个能对西藏问题的解决起重大作用的重要人物。(45)

其它的人也清楚，西藏问题不全是外部煽动的结果。援引当时赵紫阳总理的话说，一方面骚乱的起因应归结于"外国的分裂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在西藏"也长期存在着'左'的政策……（例如）在西藏的领导人当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

宗派主义。纠正这些错误的工作进展很慢。西藏人民的自治权利、西藏的语言以及藏族的风俗习惯没有得到尊重，这些错误也没有得到妥善、迅速的纠正。”(46)

1989年3月，几个月来的少数游行和抗议活动发展到严重的示威游行，北京宣布在拉萨及其周围实行戒严，强硬派最终取得了胜利。

个人之间的会谈仍然在进行。例如通过一名中国知名藏学者王尧——他自称是“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双重外交的关键人物”——在欧洲会晤了范普拉赫和其它的人。(47)在班禅喇嘛去世之前同他也有一些会谈。达赖和班禅曾互致信件并通过电话交谈了几次。虽然从北京打出的电话被监听，但在一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他摆脱了控制，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预先安排的电话会谈。此后在西德也进行过一次。(48)

## 天安门事件之后

由于同北京的谈判在1988年开始变得缓慢，达赖加快了他的努力以赢得国际支持。从1988年末到整个1989年，他访问了斯堪的纳维亚、拉丁美洲（在那里他会见了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总统，从而使这些访问带有官方的色彩）、西德、法国和爱尔兰。(49)

在荷兰和法国，他建立了支持集团。在英国下议院也建立了西藏议会集团。(50)在新德里和哥本哈根他举行了有关西藏的专题讨论会。在波恩组织了一个论坛，“为世界各地的西藏支持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和看法的机会，以便在未来采取更为密切的活动。”这些聚在一起的人包括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以及英国和意大利议会议员。(51)

在华盛顿威姆尔、卡特勒和皮克林的努力取得了成效。1989年3月15日美国参议员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六个星期之后，本杰明·吉尔曼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个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售防御武器。1989年5月4日，参议员佩尔向对外关系授权法案附加了三项条款：1.向西藏难民提供五十万美元的援助；2.向西藏学生提供三十所学校的奖学金供其在美国学习；3.禁止向中国出售国防物资。5月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谴责中国侵犯人权。一个月之后，参议员霍尔姆斯提交一份法案敦促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

在其它的讲坛上也取得了重要的胜利。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西藏问题首次得以讨论，同时联合国大会也两次提到西藏问题。1989年11月，英国上议院也首次讨论了西藏问题。

对达赖喇嘛的最大帮助莫过于北京政府自身。当拉萨宣布戒严产生很少义愤的时候，1989年之夏的天安门事件却活生生地呈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上，这些形象严重地损害了北京的声誉。北京的威信降低了，因此达赖喇嘛的地位相应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西方。

达赖喇嘛最重要的成果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和平奖的决定更多的是出于反对中国的想法，较少的是出于对达赖喇嘛的亲近。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接近诺贝尔委员会的人说，他们选择达赖喇嘛作为获奖者“是试图去影响中国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民主运动的学生领导人的努力的承认……”达赖喇嘛于1月1日被提名，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于9月份被授予和平奖。(52)

诺贝尔和平奖使达赖喇嘛得到了从未预料到的好名声，基于这种新的认识，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加强了他们的努力。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他们帮助建立了议会委员会。[53]达赖喇嘛继续进行范围广泛的访问，例如应哈韦尔总统个人的邀请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54]他不受欢迎的国家大概只有尼泊尔，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压力，他被拒绝签证。[55]他的代表丹增次仁、甲日洛地和范普拉赫也广泛地访问了澳大利亚、整个拉丁美洲。[56]他们筹措资金、建立支持集团、会晤政府官员、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清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出西藏人权问题。其他的西藏人（两名最近从中国出逃的）也遍访各国，与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相协调。[57]

建立大量支持集团的战略甚至扩大到建立一个类似于联合国所称的"未代表的国家和人民组织"，由范普拉赫和美国作家英格拉姆出面组织。在它的成立当中，西藏的流亡者如甲日洛地也出了很大的力。该组织的总部设在海牙，1991年它拥有22个成员，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库尔德斯坦、西巴布亚、澳洲土著居民和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少数民族等。资金由美国服装公司的汤普金斯·董提供。[58]

这些世界范围内努力的相互协调是成功的关键，为此目的召开了协调大会。1990年3月，来自28个国家的250名代表（约三分之一来自美国）聚会印度，参加由理查得·格丽和联邦德国议员皮格拉·凯利、格尔特·巴斯蒂安组织的"西藏之友大会"。[59]稍晚一些时候，来自34个国家的140人在伦敦出席了西藏国际协商大会，以便将世界各地的议员们联合起来，尽管存在着蒙古和津巴布韦一位退伍将军这样的反对

者，冰岛首相还是出席了这次会议。[60]

为了将这些世界范围内的努力协调起来，西藏人建立了一套计算机网络，将他们的办公室、官员和支持者联结起来。该网称之为“西藏网络”，它通过设在达兰萨拉的自备微型地球站避开印度的通信线路，是一种可以全球即刻联络的设备，以便进行特别的协调行动。[61]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相对于达赖喇嘛在美国所作努力的期望来说都是次要的。正是在美国才使得达赖的大多数努力受到关注，并且获得了满意的成功。1990年2月，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附有一项在“美国之音”创办藏语广播（于1991年春季开播）的修正案。但也搁置了为西藏难民在美国学习提供三十名奖学金的一百万美元。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宣布1990年5月13日为“国庆日”以支持中国和西藏的自由和人权。[62]

西藏人及其支持者未能在1990年造成一个“西藏之年”，但他们设法在下一年作此努力。仅在1991年10月，设在纽约的“西藏之家”组织的活动就多得令人惊奇，它在36个国家举行60次活动，以响应它在纽约的活动。[63]

1990年5月，西藏的戒严令解除了，并且允许游客访问。但是拉萨的情况未有太大的变化，人口的管制仍然很严。

由于西藏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北京看来也不愿让步，因此达赖喇嘛除了继续寻求更多的国际承认和增加可见度外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另外设置了办事处直接与联合国打交道。到现在为止，达赖喇嘛在新德里、纽约、伦敦、苏黎世、东京、加德满都和日内瓦都派驻了代表。“西藏之年”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格丽也兑现了他的诺言，筹集了525，000美元在纽约购买了一幢价值达825，000美元的豪华建筑，作为在美国开展活动的总部。[64]

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声援西藏国际运动"向人们提供一种印有"拯救西藏"字样的银行支票，购买一美元的支票就算加入该运动。他们与美国劳联——产联和中国人权组织联合发起"抵制运动"，旨在使美国人抵制中国生产的玩具。这些玩具占美国市场中洋娃娃的55%以及其它玩具的40%。还计划预定在1992年末放映"庆祝西藏"的电影以及举办相关的"捐助生活"音乐会，届时将有一些著名人士如朱丽丝、嘉宝、乌尔曼以及英国女王参加。[65]

西藏人在联合国也取得了成功。经过不断的努力，他们终于使得人权委员会谴责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该决议使用"民族同一性"这样的词句，但避开独立的问题。这是自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此外，两名西藏少女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和青年全球环境论坛。[66]

而且达赖喇嘛继续他的访问。他去爱尔兰会晤了玛丽·罗宾逊总统，在法国会见了显赫的政府官员，到列支敦士敦会见了亲王，以及再次到奥地利同瓦尔德海姆总统会面。他回访了蒙古，访问了爱沙尼亚，在同兰茨贝吉斯总统会晤之后，他向议会发表了讲话。在拉脱维亚他会晤了冈布洛夫总统，在保加利亚（在索菲亚正计划筹办一所"西藏之家"）他受到了热列夫总统的欢迎。并且他再一次出访了苏联、美国、英国、瑞士和德国。他对瑞典进行了一次"官方访问"，

而在1988年和1990年他仅被允许作为私人访问，并受到政府的冷淡对待。(67)

然而最大的成功是在美国。1991年4月，经过多年的努力（1979年以前达赖喇嘛一直被拒绝签证进入美国），达赖喇嘛终于在国会大厅里同国会议员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晤。在此之前国会领导人拒绝了他的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讲话的要求。国会领导人声称，在国会大厦里举行会晤是极其少有的，以便向中国发出一个信息。随后在白宫，他同布什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会晤了三十分钟。

政府官员坚持说访问是"私人性质"的，达赖喇嘛被看作是一名精神领袖。白宫争辩说，国会有关西藏的决议仅仅是"国会的意思"，美国政府和官方政策均不受此约束。(68)

正如事实那样，十二年前达赖喇嘛未能获准进入美国，而现在他被给予少有的礼遇，同美国总统在白宫里进行个人会晤。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威姆尔、卡特勒和皮克林的卷入、亦或是一件特意安排的事件、对北京的支持下降以及布什总统对北京的贸易政策和拒绝进行政治机构改革的愤怒等原因造成的。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国会领导人打算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但总统可以阻止这一决定。

1991年10月28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国务院授权法案，包括如下内容：

关于西藏，包括中国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份的混合地区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根据国际法它是应当建立的，它的真正代表应当是被西藏人民所承认的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的说法，仅仅是国会的看法。(69)

在澳大利亚和英国，达赖喇嘛也取得了胜利。澳大利亚

众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在西藏侵犯人权。英国首相梅杰在首相官邸招待了达赖喇嘛。虽然那里的政府官员们痛心地正式宣布那是达赖喇嘛以其“精神领袖资格”而进行的私人访问。与此同时，131名下议院议员继美国国会修正案之后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70)

同中国的谈判变得不可能了。达赖于1991年9月收回了他的斯特拉斯堡计划，代之以一种内容较少的建议。1991年10月他在耶鲁大学发表讲话，要求北京允许他率一个和平代表团访问他的故土。他为这次访问提出了三点条件：1.自由行动的权利，2.能自由地与任何人交谈而不报复他们，3.世界各地的记者应被允许跟随他。(71)

这一次中国的答复是迅速而明确的。除非达赖喇嘛宣布放弃独立，他才可以回到西藏。(72)。

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冒着进一步招致北京愤怒的危险，同中国的持不同意见者一起进行示威游行，反对中国总理李鹏1992年2月对联合国的访问。它也组织了另一次由国会助手指定地点的难民参观活动。上一次在1988年的类似活动使得国会对西藏的兴趣大大增加了。(73)

西藏利益集团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继续进行努力。1992年初，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该委员会勉强通过（27票对15票，10票弃权）不谴责在西藏和中国侵犯人权的议案。虽然中国以前的盟友如俄国支持这项决议，但是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以巴基斯坦为首的盟友反对这些议案。观察家们相信，由于美国拒绝将西藏与中国问题分开，从而导致了这项决议的流产。美国代表布来克威尔表示他的国家“……关注整个中国包括西藏的持续的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状况。”然而他继续

强调，“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是勿容置疑的，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74]

尽管进行了这些活动，达赖喇嘛还是要使他的流亡政府得到承认。由于他富有成果的努力，离这一步越来越近了。

## 北京的反应

同西藏活动集团的成就相比，中国的反应是相形见绌的。在拒绝达赖喇嘛最近提出的返回西藏的要求时，一位外交部的官员指责他正在试图“按照他的喜好来左右公众的观点”。[75]北京的反应表明，他们并没有完全明白对方的观点。

北京反击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不断增长的唯一武器是在地方报纸尤其是在海外发行的报刊(《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日报》)上发表大量的文章，用一些不确切的观点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强调该地区过去的一些黑暗情况，以此来说明现在的情况改善了许多，外部用来观察西藏现状的方法是错误的。[76]他们攻击达赖喇嘛阴谋恢复旧社会；“很显然，他想带回来的是少数集团统治者奴役大多数西藏人民的特权。”[77]他们拒绝承认西藏骚乱仅仅是外部势力和“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煽动的结果。每当一个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的时候，他们都不断地提出抗议(“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领导人，他流亡在外并且从事政治活动，旨在分裂中国和损害民族团结。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见达赖喇嘛。”)[78]

换句话说，那些没有看到中国报刊的人(绝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根本无法接近中国的立场。在美国，一项最近

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新闻报道的研究是这样描述北京对于该问题所作的努力的：

（北京）有关西藏的材料都有同样的缺点，即在另外的标题上损害了文章的作用；极端幼稚（“10月1日上午，正当拉萨人民在祥和、喜庆的气氛中观赏国庆节的时候……）反复不断地抨击（“反对分裂祖国、反对阴谋分裂祖国、反对破坏稳定和团结”），未阐明的统计数字，……来自于被指定的代表人物的不愿意听的引文（“旧社会对于农奴施加酷刑的情景，例如活剥人皮、砍掉手掌、挖出眼珠等仍记忆犹新”）象这样表达的信息不能引起人们的严重的关注……(79)

北京也为外国读者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西藏的书籍，同时也向国外派出了文化剧团。(80)

当西藏人让国会助理陪同参观西藏难民营以及继续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活动的时候，北京拒绝给美国国会议员签证并花很少的时间在华盛顿进行游说活动。(81)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北京开始重视有关侵犯人权方面的情况。1991年11月，北京向全国发表了62页的人权报告书，驳斥了有关对人权状况的指控。(82)这一次通过印度总理拉奥，他们发出暗示他们有意同达赖喇嘛进一步的会谈。(83)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暗示愿意在西藏内部改变他们的政策。1991年末，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起草一个新的法案，给予西藏自治区更高度的自治权。(84)

更重要的是，为了对抗威姆尔、卡特勒和皮克林所取得的成功，北京雇佣了华盛顿最有名的、最有效率的公共关系事务所赫尔与科诺尔顿来代表它。

他们需要许多帮助。例如，1991年7月11日他们租用了美国广播公司“第一时间”的新闻节目。美国广播公司曾派人假装成旅游者到拉萨，拍回了一些平常的街头景象。然而这些图像被加上了一段中国警察毒打僧侣的情景，该段录像清楚地显示了1988年——1989年所发生的事件，但未标明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此外，很明显该节目十分倾向西藏活动集团的观点。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随后采访了中国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他不断地重复那些不可信的、无任何实质内容的话，直至给他看了那段僧侣被毒打的录像为止。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并迅速地走出了会客室。

中国人被愚弄得象傻子一样，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国会表决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前夕。

## 结　论

西藏院外活动集团是在同北京的谈判陷入停顿的时候形成的。它是在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对美国政治生活有了基本的了解的情况下形成的。正如现代公共关系创始人爱德华·伯纳斯在二十年代所说：“对公众的有条理的习惯和观点的有意识的、有理智的控制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操纵这些看不见的社会机制的人组成一个幕后政府，成为我们国家的统治力量”。(85)

通过产生对北京的道德义愤来促进西藏人的事业已经成为一个范围广泛的公共关系运动。随后运用所产生的公众压力来获得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官方支持。最后这些积累起来的支持将被用来从外交上对北京施加压力，促使其在西藏问题上让步。

西藏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功部分地归因于他们所运用的战略，但是他们从中国拒绝西方国家的意见中得到了无法估量的帮助。正如一位西方国家驻北京外交官所说，“不能把西藏逼入死胡同”。(86)

在西藏活动集团所选择的道路中也存在着危险。西藏人当中正在上升的有可能无法得到满足的期望就是一个例子。正如在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当时中央情报局的援助被认为是全部所需的援助。(87)未能满足的期望将导致在西藏发生进一步的、更多流血的骚乱。

在美国也存在着公共调查的危险。院外援藏集团的不轨行为可能引起人们对援藏事业的怀疑并削弱对它的支持。在援藏集团当中，它的最著名的两个领导人理查得·格丽和约翰·艾文登据传由于格丽与艾文登第一个妻子有绯闻而长期不和。(88)同时两名强有力的国会支持者汤姆·兰多斯（国会人权小组创建者之一）和查理·罗斯都在接受几起有关道德事件的调查。(89)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的代理人赫尔与科诺尔顿律师事务所正在加强对他们看来感到厌恶的道德行为的攻击。(90)

十分有趣的是，达赖喇嘛在国会强有力的支持者汤姆·兰多斯同中国的代表赫尔与科诺尔顿律师事务所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国会人权小组在赫尔与科诺尔顿办公室接受免费的办公空间，从而产生了有趣的利益冲突。(91)

对未来的预测是困难的。只要北京拒绝作出让步，达赖喇嘛除了继续进行这项具有很大冒险性的战略外别无选择。外交压力可能奏效，但是值得怀疑的。他只能期望现今领导人去世之后北京政府跨台或象前苏联一样国家陷入分裂。

在这场代价高昂的游戏中北京握有王牌。为了改善现存的汉人和藏人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北京可以显著地改变它在西藏的政策。否则骚乱将在西藏继续发生。最近《西藏日报》报道了西藏领导人当中的明显的不同意见。(92)正如在前苏联所看到的，压制只能导致民族主义的增长。

北京也将不得不向达赖喇嘛作出让步。即使是赫尔与科诺尔顿在后一阶段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公共关系活动也将不大可能改变大多数人对北京政府的看法。他们可以拖延更多的国会调查，但是在其它的方面则很少可能做到。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谈判桌上。对双方来说，任何其它的途径都是冒更大悲剧的危险。

**注释：**

〔1〕汤姆·格兰菲尔德：《现代西藏的诞生》1987年英文版，第183页。

〔2〕丹增嘉措：《达赖喇嘛自传》纽约1990年版，第222—223页。

〔3〕《十四世达赖喇嘛声明、采访文集》达兰萨拉1982年版，第51页。

〔4〕同上，第59页。

〔5〕达娃诺布："中国与达赖喇嘛的对话1978—1990"《太平洋事务》1991年秋季号第369页。

〔6〕同〔2〕第223页。

〔7〕《西藏评论》1979年6月号第8—9页。1979年11月号第14页。

〔8〕《纽约时报》1979年9月12日，第A12页。

〔西藏评论〕1979年第11期第6—9页。

〔9〕同〔5〕第353页。

〔10〕同〔2〕书第240页。

〔11〕达赖于1967年访问了日本和泰国；1973年访问了西欧；1974年访问了瑞士；1978年访问了日本；1979年访问了蒙古、苏联、希腊、瑞士和美国；1980年访问了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1981年访问了英国和美国；1982年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蒙古、苏联、匈牙利和西欧；1983年访问了美国；1984年访问了英国、美国和日本。

见罗杰斯·黑格斯和阿沛·措央：《十四世达赖喇嘛传》1984年版第198—199页。

〔12〕《西藏评论》1984年第5期第6页；1984年第十期第5页；1984年11期第7—8页；1985年第2期第5页。

《西藏公报》1984年11期至1985年第1期，2—3页，16页；1985年4—5期第12页。

〔13〕《西藏评论》1983年第5期第7页。

〔14〕《西藏评论》1984年第3期第11页。

〔15〕《西藏评论》1985年第5期8—10页；1985年第7期7—8页。

〔16〕《西藏公报》1985年第8—9期第19页。

《共同之声》1986年第一期。

〔17〕同丹增次仁的谈话，载《自由》1991年第10期第16—18页。

〔18〕《西藏公报》1985年8—9期第13页。

〔19〕《美国银行家》1985年11月4日，第38页。

〔20〕《华盛顿商报》1989年第1期。

〔21〕同〔20〕《华盛顿邮报》1991年7月14日第W7页。

〔22〕"敲响边鼓"《华盛顿邮报》1989年3月31日第D1页。

"卡特勒的观点令人震惊"《华盛顿邮报》1987年9月14日第A3页。

〔23〕《西藏评论》1986年第6期6—7页；1986年9—10期第4，5页；1987年第4期7—8页。

《西藏公报》1986年6—7期第2—3页。
〔24〕《西藏公报》1987年7—8期第6页。
〔25〕《西藏评论》1987年第8期第77—79页；1987年第11期11页；1988年第1期第5页。
〔26〕“西藏人民的人权状况”《美国国务院公报》1987年11月号第50页。
“美国官员为其关于西藏骚乱的立场辨护”《纽约时报》1987年10月15日第A18页。
〔27〕《纽约时报》1987年10月7日第A1页。
〔28〕《纽约时报》1987年9月18日第A1页。
〔29〕《纽约时报》1987年9月28日第C23页。
〔30〕《纽约时报》1988年5月17日第C16页。
〔31〕《纽约时报》1987年10月8日第A8页。
〔32〕汤姆·格兰菲尔德：“致编辑的一封信”《纽约时报》1988年3月23日第A26页。同〔27〕
〔33〕《西藏评论》1988年第11期第4页；1989年4—5期第7页。
〔34〕《西藏新闻》1988年9—10期第9页。
《西藏公报》1991年3—4期第5页。
〔35〕《远东经济评论》1988年10月6日第33页。
〔36〕“达赖提出自治建议”共同社1988年6月15日电。
范普拉赫：“渴望谈判：对西藏日益增长骚乱的唯一答案”《国际关系》1989年第5期377—392页。
〔37〕被指责的人包括英国前首相希思、恩纳尔斯爵士、吉米·卡特、范普拉赫和作者本人。达娃诺布：见〔5〕第355页。
《西藏评论》1990年第7期第15页。
〔38〕法新社对外广播新闻：1988年7月28日第44页。
〔39〕同上，1988年6月23日第42页。
〔40〕见〔5〕第355页。

〔41〕英国广播公司《世界要闻综述》1988年3月16日 第三部分：远东。

〔42〕援引自1988年7月20日《南华早报》。

〔43〕法新社对外广播新闻：1989年3月8日第14页。

〔44〕法新社对外广播新闻：1988年3月29日；1988年4月6日。

〔45〕汤姆·格兰菲尔德：《在幕后活动的神秘活佛》《卫报》1988年10月8日第8页。

〔46〕援引自《明报》，《世界要闻综述》1988年6月4日。

〔47〕“中国与达赖试图举行秘密谈判”路透社1989年11月15日。

〔48〕同〔2〕第260页。同〔5〕第370页。

〔49〕《西藏评论》1989年第8期第6页。

《西藏公报》1988年10—11期2—3页；1989年6—7期3页。

〔50〕《西藏评论》1989年第9期第7页。

〔51〕《西藏公报》1989年6—7期1—2页，12页。

《西藏评论》1989年第6期第5页；1989年第12期第5页。

〔52〕“达赖喇嘛获得和平奖的办法与原因”《纽约时报》1989年10月13日第A14页。

〔53〕《西藏评论》1990年第3期第6页；10—11期第3页；1991年第1期第11页。

〔54〕《西藏评论》1990年第3期第4页。

〔55〕《西藏评论》1991年第3期第4页。达赖喇嘛对尼泊尔的唯一的一次访问是1981年对佛祖圣地卢比尼的一次简短访问，当时给予他的是旅行签证。

〔56〕《西藏评论》1991年第1期第9页；1991年第2期第4页。

〔57〕“藏人向其它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伸出手来”《旧金山年鉴》1990年12月3日第A14页。

〔58〕路透社1991年2月4日电。

《西藏公报》1991年3—174期第页。

〔59〕《西藏评论》1990年第4期10—11页。最初该会议名称为“西藏支持者国际联络大会”，对此印度官方有所保留。于是又更名为“国际西藏之友大会”，也未得到印度的赞同。西藏独立问题在印度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拉吉夫·甘地总理同中国总理李鹏在北京签署了一项协议，重申印度长期坚持的原则“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不允许西藏的活动分子在印度的领土上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巴巴拉·克罗斯特：“中印联合声明震怒了西藏人”《纽约时报》1989年1月3日第A11页。

〔60〕《西藏评论》1990年第8期6—7页。

〔61〕《Link—Up》1990年第9期15页。

〔62〕《西藏新闻》1990年1—4期第4页。

《西藏公报》1990年3—4期第16页。

〔63〕《纽约时报》1990年9月13日第B24页。

《西藏评论》1990年第8期第7页。

合众国际社1991年10月7日电。

〔64〕总部设在这幢新大楼里的机构有：西藏办事处、西藏之家、美国西藏委员会、西藏妇女协会、西藏青年协会、布拉达出版公司、西藏之声、西藏信息网、西藏协会、西藏基金会和美国西藏人移民计划等。

〔65〕《西藏评论》1991年第2期第4页。“争取和平的隐士”《纽约时报》1991年3月12日第A23页。

《西藏公报》1991年11—12期第29页。

〔66〕《西藏公报》1991年9—10期第1页；1991年7—8期第2页。

〔67〕《西藏评论》1991年第5期7—8页；1991年第12期第5页。

《西藏公报》1991年9—10期第20页；10—11期第7页，11—12期第23页。

《雪狮新闻通讯与目录》1991年夏季号增刊第19页。

〔68〕《纽约时报》1991年4月19日第A7页。

《西藏公报》1991年5—6期第16页。

《西藏评论》1991年第5期第6页。

1992年3月9日同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官员的谈话。

〔69〕《西藏公报》1991年11—12期第22页。

《西藏新闻》1992年1—2期第4页。

〔70〕《西藏评论》1992年第1期第8页。

《西藏公报》1991年7—8期第17页；1991年第1—2期第24页。

〔71〕戈德曼："达赖喇嘛呼吁帮助返回西藏"《纽约时报》1991年10月10日第A17页。

〔72〕"中国拒绝达赖喇嘛结束流亡的建议"法新社1991年10月10日电。

〔73〕《西藏评论》1992年第2期第7页。

〔74〕"人权会议决定不表决中国人权记录决议"法新社1992年3月5日电。

《纽约时报》1992年3月13日第A30页。

"中国对第三世界支持不表决西藏决议表示感谢"路透社1992年3月7日电。

〔75〕同〔72〕

〔76〕《北京周报》（周刊）在1990年发表了19篇有关西藏的文章，在1991年1月到7月之间，发表了27篇之多。《今日中国》（月刊）在1990年发表了4篇，1991年发表了12篇。

〔77〕喜饶尼玛："西藏人权今昔"《西藏评论》1992年2月24日—3月1日第27页。

〔78〕"中国对梅杰接见达赖喇嘛表示震惊"《每日电讯报》1991年12月6日第12页。

〔79〕卡尔松："新闻中的西藏：不安后的反思"《亚洲学者公报》即出。

〔80〕《西藏评论》1992年2月24—3月1日第8页。第44—45页。

〔81〕巴巴拉·克罗斯特："中国拒绝给两位参议员签证"《纽约时报》1992年4月7日第A7页。

在同一位北京驻纽约总领事馆中负责政治事务的领事的谈话中，我被告知没有有关西藏问题的公共关系计划。1992年3月27日。

〔82〕克里斯托弗："中国反驳对它的人权指控"《纽约时报》1991年11月3日第A12页。

〔83〕"印度总理拉奥说中国准备同西藏领导人会晤"路透社1991年12月29日电。

〔84〕法新社1992年7月22日电。

〔85〕援引自恩莫斯，《今日时代》1992年1月22—28日第6页。

〔86〕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天安门事件帮助了西藏"《纽约时报》1991年8月18日第4部分第4页。

〔87〕同上。

"布什加入援藏的圣殿"路透社1991年12月16日电。

〔88〕《政府公报》1991年9月22日第F5页。

〔89〕《华盛顿邮报》1990年4月18日第A2页。

《纽约时报》1992年4月7日。

〔90〕《纽约时报》1992年1月16日第A17页。

〔91〕同〔89〕

〔92〕法新社1991年10月16日电。载法新社对外广播新闻第19—20页。

# 中国与达赖喇嘛的对话（1978—1990）：是谈判前的准备还是死胡同？

（藏族）达娃诺布 著　肖蓉 译

**编者按**：达娃诺布，1949年7月出生。童年在萨迦派办的一所寺院学习。1956年入汉人学校念书。1959年，他随达赖集团逃至印度，入英印孤儿院上学。1969年考上印度德里大学。达娃诺布是流亡藏人中的“知名学者”。1972年起曾长期担任反动刊物《西藏评论》主编，为分裂集团鼓噪。他于197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以第一人称“手法”，肆意攻击党和政府在五十年代推行的治藏政策。该书在海外广泛流行，配合了分裂集团在七十年代发动的全球性反共反华宣传活动。作者在本文中回顾了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十多年来对话的历史过程，对话的基本焦点，和症结所在。文章的中心思想适应了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议”，鼓吹使西藏回到历史上的“自治”。文章还鼓吹，为了使达赖谈判成功，必须促使西方大国向中国政府施压，在

拉萨特别要在全藏发动抵抗活动；并促进中国民主化。事实上，上述策略正是分裂集团在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过程中正在采取的步骤。

本文译自美国《太平洋事务》1991年秋季号。

## 引言

在1959年后的中藏政治关系中，1978年12月由邓小平倡议的谈判大概是最有意义的政治事件。中国最初——而且现在仍然抱有的目的是劝说自行流亡的藏人领袖“返回祖国”。流亡中的达赖喇嘛与西方新闻媒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陷中国于尴尬境地，而且更严重的是中国担心达赖喇嘛被反华势力所利用。尤其是1986年以前当苏联对西藏问题发生兴趣时，更令中国担忧。(1)如果达赖能被劝说结束流亡，那么中国的难堪和潜在威胁将自动消失。更进一步，中国希望能有效地利用达赖在西藏进行合法化统治。正如1987年以来拉萨发生一系列支持独立的骚乱所表明，政治化的藏人仍然抵制中共的统治。

和他的人民一样，达赖认识到除了通过对话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外，别无选择。70年代初中美关系恢复，美国放弃支持西藏事业时，达赖更加强烈地认识到这一点。从那时起，西方国家对达赖的和平倡议的道义支持显著增加，1989年甚至授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当中国战略性地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靠拢时，中国并未将西方国家这种“压力策略”当作威胁，而更多地是看作为西方压迫中国效忠西方的策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在联

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可能性减少，不再是早些时候联合国通过三个关于西藏的决议案时的情形了。

上述政治变化影响了中藏双方的看法，促使同样现实的双方领导人邓小平和达赖喇嘛于1978年12月同时举镐破冰。无论如何，这得归功于邓小平。正是他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不仅包括四个现代化而且大胆地着手解决一些突出的国内问题如台湾和西藏。对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推行1959年以前的现实的西藏政策的邓小平而言，[3]再次大胆地与达赖接触并不出于偶然。

另一方面，70年代末达赖喇嘛改变其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他斗争的宗旨由争取独立转至经济利益。1978年3月10日，他发表声明，“如果在西藏的六百万藏人真正地比以前更幸福和富裕，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什么”。[4]一年以后，他解释道：“我们流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六百万藏人的利益”。[5]1980年他更加明确表示：“西藏问题的核心是西藏六百万藏人的利益和最终幸福”。[6]通过这些表示，达赖喇嘛迎合了中国人关于对谈判的前提条件：不谈西藏独立的问题。

## 谈判的原则界限

1978年12月3日，邓小平向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传达了三点意见。明确声明第一点，“根本问题在于西藏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须根据事实来决定……如果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其它都无从谈起”。[7]达赖方面将此理解为所有对话的议事日程将不包括完全独立。[8]邓的第二点建议是达赖喇嘛可以派代表团前往西藏实地考

察。第三点，邓接受藏方的提议，允许50名从印度来的藏语老师到西藏不同地区任教。

达赖喇嘛开始派遣一系列“事实调查团”前往内外藏时，当时负责西藏事务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指出其性质是中国对达赖喇嘛的妥协。中国人事先采取的措施表明藏方在西藏的调查将不会作为对话的基础，而北京将自己决定中藏对话的原则界线和主要内容。

1980年5月22日—6月1日，胡耀邦率领中国自己的考察团访问西藏，并直接提出了六点政策。第一，自治的含义是“有权自己决定事务”，但这一定义不能扩大到政治领域，而主要涉及经济的非中央化。第二，藏人免交国家各种税利，免除国家派购，而且其产品以议价出售给国家。这项经济优惠政策持续3至5年。第三，建议根据西藏的特殊的实际条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在执行中必须考虑到整个西藏经济的不同情况。第四，北京将增加对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发展当地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第五，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必须“致力于恢复和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所有忽视和削弱西藏文化的看法都是错误的。”第六，扩大藏人的参政范围，在2—3年内藏族干部应占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的2/3以上。(9)

在做了必须的经济方面的让步以满足达赖喇嘛于1978和1979年提出的基本要求后，胡耀邦将中央的政策立足于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即他返回中国的问题。1981年7月28日，他向嘉乐顿珠传达了中国“对达赖喇嘛的五点建议”，并强调“这是我们真诚和严肃的决定”。第一，中国已进入政治上稳定、经济繁荣、各民族友好团结的新时期，这种发展趋势

长期内不会改变。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都是“聪明人”，应该相信这个事实，如果不相信，也可以观望观望。第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谈判的人应该“开诚布公”，不要“象商人那样讨价还价”。在中国方面，将不再追究那些参加1959年叛乱的西藏人。第三，“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回中国永久定居；因为一旦达赖喇嘛返回中国，他能维护国家统一，为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第四，如果他返回中国，他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将与1959年以前相同。他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强调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都不必担心生活和工作条件，中国将保证他们的特权。第五，达赖喇嘛可以自己决定何时返回，并提出届时的要求，中国将组织大规模的欢迎仪式和举行记者招待会。(10)

达赖喇嘛对中国的五点建议作以如下反应：“中国不是讨论六百万藏人面临的真正问题。而是试图将西藏问题局限于我个人的地位”。(11)1987年9月21日，他在美国国会的人权论坛上提出五点反建议：一、使整个内外藏组成一个和平区；二、中国放弃向西藏移殖人口的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三、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权利；四、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停止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废料；五、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12)

达赖喇嘛的第一项要求须作一些解释，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安全考虑。他坚持他的和平区的概念是“保持西藏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和平和中立的佛教国家和将亚洲大陆强国隔开来的缓冲国的地位。”该建议与比兰德拉国王提议宣布尼

泊尔为和平区是一致的，而且中国支持该计划。然而，在亚洲内陆建立一个和平区将要求中国从西藏撤走军队和军事存在；同时也使印度从沿西藏的喜马拉雅地区撤走军队和军事存在。“这一目标可通过国际协议来实现，这有助于满足中国合法的安全需求，并在该地区与西藏、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建立信任。”(13)

一年之后，达赖喇嘛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阐明了他的“中藏对话框架”，在政治上对中国做出很大让步。他说中国可以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但西藏应设有自己的外交办事处以负责涉外的商务、教育、文化、宗教、旅游、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性的活动。在国防方面，中国有权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军事存在，直到该地区通过和平会议和国际协议实现非军事化和中立化为止。(14)

就达赖喇嘛而言，他的斯特拉斯堡声明是对争议的西藏问题的妥协性方案。在放弃西藏独立要求的同时，(15)争取更大程度的内部自治，这种要求不会与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考虑冲突。当然，达赖喇嘛十分明确地希望在西藏建立的政治体系，即完全的内部自治。达赖喇嘛要求整个西藏（包括卫藏、康和安多）在法律的基础上成为一个自治的民主的政治实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16)他认为“一个自治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就是由公民选举的执政首脑、财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最后，中国领导人将会承认“对占领地的殖民统治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新的霸权主义表现。一个真正的统一或联盟是能在对各方均有利的情况下以自愿方式来实现”。(17)

直到1990年2月以前，中国未对西藏领袖的计划给予书

面答复或反驳。尽管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在此之前已通知达赖喇嘛的代表扎西旺迪，和平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声明都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中国的主要反对意见是针对达赖关于1950年中共接管前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论断。这一论断在“五点和平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声明分别出现了三次。在这两项倡议中，达赖喇嘛尽管认为西藏在1950年以前是一个独立国家，但现在他承认中共接管西藏的现实，并愿意在这一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西藏的未来地位。

但是对于北京的领导人，仅仅暗示承认西藏的现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够的，尽管这样承认已迫使达赖寻求与中国的对话，他们要求达赖喇嘛公开承认中国1950年的行动在历史上是有效的，在意识形态上是公正的，而且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西藏问题上不得不面对两难处境，因为尽管所有的国家都承认1950年以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许多国家认为在中共以前西藏是独立的，(18)这使得中共有帝国主义行径的罪恶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指责在中共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共产党的革命正是建立在最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对于西藏过去是独立的最轻微的暗示都极为敏感的原因。达赖喇嘛提到西藏过去是独立的被看作是“他继续争取独立计划的一部分”。(19)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如果达赖喇嘛希望继续和中国对话，他必须彻底放弃任何独立的想法，无论是是指过去的历史还是将来的目标。“在关系到中国国家未来的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20)

谈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提到《北京周报》（1990年2月）上署名沙舟的文章。这篇文章非常明确和严肃地阐明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并且据西藏情报机构的消息，该篇文章在西藏的党和政府机关被作为官方文件散发，这篇文章批评了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和斯特拉斯堡声明中的所有主要观点。与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在1950以前历史上是独立的论断相反，沙舟坚持西藏早在13世纪蒙古人建立了元朝（1271—1368）时，就已归属中国。达赖喇嘛提出西藏的“联盟地位”的要求——即西藏享有很高的内部自治，中国保留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也被沙舟拒绝，因为这是“企图将中国领土内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转化成宗主国和被保护国的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认为这样的概念“即使还成立，也是一直为帝国主义者珍爱的。它对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形成直接的挑战”。达赖喇嘛在西藏建立和平区和缓冲国的建议也被拒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自己的领土的一部分划分为和平区或中立区以隔绝于邻国，也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能接受这样的地位”。最后，西藏领袖关于西藏建立民主政府的理想也遭嘲讽，“这样的情感应来自于西方的政治家。它来自于封建农奴制的代表就显得很荒唐。达赖喇嘛通过这样的声明来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大唱赞歌，相反却否定社会主义”。[21]

1982年达赖喇嘛方面的三个代表提出了三项要求。土登朗杰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提出了九点建议，[22]对西藏应给予更多的优惠，因为西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特殊性质，所以要求特殊的待遇。中国对此的回答是，西藏已于1950年获得解放，正在进行着全面的建设，而台湾尚待解放：“西藏不能让历史的车轮倒转”。在得到这种以马列主义措词的答复后，西藏方面决定以共产党的方式进行争辩，他们

引用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根据决议，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条件承认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这意味着在蒙古、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和其他地区，人口大多数是非汉族，他们有权自己决定是脱离中华苏维埃和成立独立的国家，还是加入苏维埃共和国，或者在中华苏维埃国家内保留自治区域”。[23]土登朗杰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尊重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对此，中国人答复简洁明了：“我们（中共）在那时还是小孩，而现在已长大成人”。

西藏代表在讨论中提出一个现实的主张，即北京应该考虑将康和安多（内藏）合并于西藏自治区（外藏）——使西藏高原上所有讲藏语的人统一到一个行政单位里，而他们的地位将由北京和达赖喇嘛协商。中国人的答复是这在行政操作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内外藏覆盖的领土面积太大。然而，在这个问题中几位领导人意见并不一致。1980年胡耀邦告诉嘉乐顿珠“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主张”。乌兰夫也支持这个主张，他回忆周恩来在1951年向西藏代表保证十七点协议时，表示内外藏的统一问题“将单独考虑”。[24]

1984年10月24日，西藏原代表通过不同渠道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他们要求释放最近逮捕的西藏持不同政见者，以为真诚对话营造适当的气氛。他们建议允许更多的西藏事实调查团前往西藏，以继续中藏接触。他们宣布达赖喇嘛拒绝接受中国的五点建议，重申西藏人的基本要求，诸如内外藏的统一，高度自治，与中国保持联盟关系，撤走中国军队以为西藏成为和平区铺平道路，等等。

1984年10月28日，江平向西藏代表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欢迎达赖喇嘛回国，无论他是永久定居还是短期访问，这几年的中藏对话有助于相互理解，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并不妨碍进一步的访问和交换意见。在谈到达赖喇嘛回国的地位时，江平重申了胡耀邦在1981年向嘉乐顿珠提出的五点建议，以及此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胡耀邦的讲话，胡表示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贵族身份和作为一个要西藏人民拥戴的历史性人物的地位都将得到保证，而且如果他表现出是一个爱国者，达赖喇嘛将有班禅喇嘛一样的地位。

其后，江平用很长篇幅评价论述和证明西藏公元七世纪起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流亡集团必须将此作为对话的别无选择的前提条件。尽管达赖喇嘛表示了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意愿，但在印度的西藏流亡分子和一些组织继续致力于西藏独立的活动——这些活动破坏了中国人关于对话的前提要求。追述了公元七世纪至1950年的中藏关系的历史后，江平援引英国驻印总督汉密尔顿和尼赫鲁的话，即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作为结论。中国还拒绝了西藏人关于更大程度的自治和扩大内藏的地位的要求。不可能建立"更大的西藏自治区"的理由如下：1.尽管这些地区都同属藏民族，但它们已分离很久，所以内藏和外藏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很大不同；2.考虑到该地区如此幅员辽阔，如果康区和安多与西藏自治区合并，对于联合的经济文化发展并没有好处。除非放弃建立大西藏自治区的要求，否则"无从对话"。这一立场在1981、1982年不同的中国官员向达赖喇嘛作了表明。江平强调"解放"以后藏族地区已建立了一个自治区，

十个自治州和二个自治县，在其他讲藏语的地区不可能再有行政地位的变化。(25)

最后，江平间接地提醒西藏代表应将重点置于达赖喇嘛在1978和1979年指出的“西藏人民的幸福”问题上。江平确信中国已向西藏提供足够的资金和物资来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给该地区带来全面的发展。从1952年至1983年期间，中央向西藏提供财政拨款达723亿人民币。江平详细列举了该笔资金的具体支出，如用于工业项目、交通和通讯发展、教育和寺庙的重新恢复。“象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西藏自治区也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走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道路。”换句话说，西藏人必须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条件：西藏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不会改变。江用这样的话作出结论：“因为大门已开，欢迎你回国，但是解决取决于你，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的立场和态度，否则，不可能达成协议”。(26)中国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尽管由不同的发言人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北京永远欢迎达赖喇嘛的对话，但对话的内容和条件必须由中国当局确定。如果西藏人想继续对话，就必须接受这些条件。北京在似乎对达赖喇嘛敞开大门的同时，又拒绝接受任何西藏人的要求，这可能由两个因素导致：减轻或解除在中藏对话问题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拖延时间以待现世达赖喇嘛的圆寂。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声明作出反应，以及进行1982和1984年的两次会谈。1988年6月23日，在一次定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官方地对达赖喇嘛要求给予西藏“联盟”的地位作出评论。他拒绝西藏具有“独立、半独立、甚至伪装的独立”的

地位，但不再拒绝达赖喇嘛的所有建议。[27]无论如何，由于达赖喇嘛的计划设想西藏具有单独的地位，我们可以说中国外交部拒绝将斯特拉斯堡建议作为中藏对话的基础。中国驻外大使包括驻华盛顿和新德里的再三表明中国的这一立场。

1988年9月23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正式向达赖喇嘛代表递交了一封正式信件：

> 我们欢迎达赖喇嘛在任何时候与中央政府对话。对话可以在北京、香港或任何我们在海外的大使馆或办事处举行。如果达赖喇嘛发现这些地方交谈不方便，他可以任意选择地点。但有一个条件，不得有外国人卷入。我们准备派一定级别官员与达赖喇嘛直接对话。
>
> 有两点必须澄清：1.我们从不承认噶厦政府，因为它一直鼓动西藏独立活动。我们拒绝接受任何由噶厦政府（西藏内阁）派出的代表和事实调查组。2.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新建议"不能作为与中央政府对话的基础，因为它根本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概念。如果达赖喇嘛真诚地愿意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真正地关心西藏人民的幸福、经济发展和藏民族的兴旺发达，他就应该放弃独立。达赖喇嘛应将其自身置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与中央政府、西藏人民政府和西藏人民共同讨论关于西藏的大政方针。[28]

这封信简明扼要为谈判定下了前提和议程。它婉言谢绝了以斯特拉斯堡建议的西藏半独立地位作为中藏谈判的框架，并间接提出谈判的中心在于有关的西藏的经济政策。它还表明即使这样有限的对话也需要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即达赖

不再讲1950年前，西藏历史是独立的观点。最后不允许西藏流亡政府任命的成员与会。只有达赖本人或者他委派的私人代表(29)才能参与对话。这封信的宗旨就是中国只承认中央政府和流亡的达赖本人的对话，而不承认达赖以"流亡政府首脑"身份参与谈判。

为了有力推动双方的正式谈判，"西藏流亡政府副部长"晋美朗珠于1988年10月25日对9月23日的中国来信作出了答复。流亡政府建议于1989年1月在日内瓦就西藏的未来地位与中国政府举行首轮会谈。这位"副部长"在新德里无法见到中国大使，只好把复信交给了使馆参赞赵兴顺（音译），赵问晋美，达赖是否参加会谈，回答是否定的。在此之前，流亡政府已宣布了六人谈判代表团的组成名单，晋美朗珠是成员之一。赵还问那位荷兰籍国籍法学家（范普拉赫——译注）是否为代表团成员。这位西藏部长回答说，"他不是谈判代表，而是代表团的三位顾问之一"。(30)

赵的提问是与中国政策一致的，因为藏人的拒绝违背了中国人在1988年9月23日来信中提出的先决条件。这也是中国国家民委副主任陈欣1988年11月声明的主要内容。他说：达赖喇嘛本人不打算参加会谈，表明他对拟议中的日内瓦会谈缺乏诚意，"我们从不承认达赖领导的流亡政府。我们只同达赖本人举行会谈，而不同所谓的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代表团会谈"，陈欣还指出，西藏代表团里有一个外国人，"也违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会谈原则。"(31)

四个月后，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过去西藏的大贵族和要员，现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重申了陈欣的声明。阿沛提出了三条反对意见后指

出，"只要达赖放弃西藏独立，为民族和国家的团结为建设祖国与新西藏作贡献，我们欢迎他回到祖国。"这一立场，被邓小平和中央政府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32]

1989年4月12日，达赖喇嘛驻新德里办事处对中国提出的三条反对意见发表了公开声明。它说："谈判的推延在于中国政治上的不妥协。即：独立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代表团必须代表达赖喇嘛；谈判不能有外国人参加。"这个公开声明解释了达赖的观点：

我们已经多次通过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向中国表示：（1）由神圣的达赖喇嘛提出的对话框架是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联盟关系；（2）神圣的达赖喇嘛任命了他的对话代表团，而且他有权指定任何他认为能代表他的人；（3）代表团里没有外国人。但代表团有藏族和非藏族的顾问。代表团从有资格的人那儿听取建议，而不考虑其国籍身份也是很正常的事。[33]

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当局是否接受达赖喇嘛的解释，因为1989年3月7日中国在拉萨实行戒严后，达赖喇嘛中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至今仍未恢复。然而，在中国学生支持民主运动被平息前夕，北京通过其驻新德里大使馆向达赖喇嘛表示，尽管中国政府不同意将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作为对话的基础，但"同时他们仍坚持对话。"[34]（六四事件后）作为机智的政治家，达赖喇嘛宁愿加入全世界的对华谴责潮流，而不谋求从北京提供的机会中获取好处。正如1990年5月底中国政府官员所声明的，"中央政府一直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对待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而且我们对对话的诚意和渴望一直未变。"他指责西藏领袖"自己关上了对话的大门，

因为他在3月对拉萨实行戒严后中断了那些有意的接触。”(35)

## 保守派和务实派

在西藏问题上如果认为中国领导人意见一致，那就会误入歧途。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相当不同的两种观点：即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区别。例如，根据中共中央前任总书记赵紫阳和沙舟，与达赖喇嘛对话不存在什么问题，达赖应该重返祖国，其前提是他不再主张西藏独立；(36)另一方面，邓小平和胡耀邦认为应通过与西藏领导人的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阿沛·阿旺晋美也曾暗示，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议比他在华盛顿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更易接受。因为达赖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提出，他准备与中国中央政府对话，并让“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外交与国防事务”(37)。但是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两个建议并没上述区别，他们都拒绝这两个建议。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考察十年来汉人在西藏问题上决策程序的演变。1978至1979年邓小平发出倡议后，将西藏事务交给了胡耀邦。直到1981年7月，胡一直负责此项工作。7月28日，胡耀邦构画了中国的西藏政策。按照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西藏问题归结于达赖喇嘛的作用。因此，中国将西藏政策交给两个机构去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外交部。当达赖的代表访问北京时，中央委员会去处理西藏事务；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也与达赖代表往来。

当中国高级领导人处理西藏问题时，我们要不断考察中国领导人处理这一问题的官僚体制与工作作风。官僚体制是依据规则、条例、及程序运作的，而往往对各种倡议是反感

的。中国官僚体制的加强与中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强硬是吻合的。汉人的决策方式表明，某些领导人上台对西藏问题会持更务实的立场。而过去那些意识形态激进的领导则会持保守的立场。因此1979年，邓小平宣布，达赖应该与中国领导人对话，“除西藏独立不能谈外，一切都可以谈”。胡耀邦甚至接受内外藏统一的观点。1978—1985年，务实的中国领导人允许来自达兰萨拉的四个事实调查团访问了内外藏不同地方，而这些代表都是达兰萨拉西藏政府的成员。1982—1984年中藏代表在北京举行了两次试探性的对话。

然而，1986年6月，中国政府开始对中藏对话持强硬态度。他们拒绝接受第五批西藏事实调查团。他们认为代表团必须持华侨护照。[38]以前的六个代表团都没有必须持华侨护照。他们持的是印度政府颁发的特别身份证。它标明西藏流亡者是“藏族人”，出身地是：“西藏”。这种写法是与中国不断重申的观点不同的：中国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流亡藏人事实上是中国公民。然而直到1986年中国人对印度的这种做法一直置若罔闻。这表明直到1986年中期，邓小平与胡耀邦等务实派在西藏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决策权。1988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在新德里致函达赖喇嘛的代表，就对“代表团外交”持强硬立场：我们不接受任何由“噶厦政府”委派的代表团或调查小组。[39]中国的官僚体制终于在西藏问题上取得了控制权。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保守力量占上风，除了官僚体制上升、意识形态僵硬外，还有三个其他因素：第一，达赖喇嘛失信。他原定1985年访问西藏，但未成行，这使中国务实派领导人也怀疑他和解的诚意。第二，1986年中苏关系正常化。

这使得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在达赖流亡背后的最大威胁已经消失，中国不必对达赖妥协了。第三，1987年初胡耀邦倒台，加强了党政军中保守派对西藏问题的决策权。

1987年9月27日和10月1日发生在拉萨的倾向独立的示威活动，是对务实派最沉重的打击，而给强硬派提供了活炮弹。强硬派不仅包括党和军队中的某些高级汉族官员，而且包括拉萨上层的某些藏族官员，他们担心达赖返藏后无路可退。这些当地的干部认为拉萨骚乱证明了务实政策的失败。多杰才让，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在1987年10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常听说达赖表示，只要西藏人民生活幸福，他就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可事实上，现在达赖在西藏独立问题上更加明目张胆。"(41)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日报总编丹增指出，1985年达赖集团派遣特务到西藏从事间谍活动，最近的拉萨事件"完全是达赖集团煽动和操纵的"。(42)多杰才让说"这进一步证明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立场丝毫未变。"(43)

但是，关于中国与达赖喇嘛正在进行的对话，西藏的上层领导只好等待中央指责达赖操纵拉萨骚乱的口径下达。1987年10月3日，人民日报文章指出，拉萨骚乱"是达赖集团煽动和指使的"，"达赖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开支持西藏独立"，(44)拉萨的西藏领导立即召开民众大会，谴责达赖和示威者(45)，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政府主席热地是第一个上台讲话的拉萨官员。1987年10月6日，他在会上指出："不久前达赖跑到美国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他煽动西藏一小撮分裂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响应他在国外的分裂活动。这再次暴露了他分裂祖国的企图。"(46)

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讲话中推论拉萨的地方干部，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都在利用达赖操纵拉萨事件的这一指控，反对中央与达赖和解的务实政策，保护本阶级的利益。这进一步加强了北京的强硬派立场（特别是在1986中期以后）并使两条路线的争论复杂化。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1988—1989年。这也是中国对斯特拉斯堡建议迟迟不予答复，并最终于1990年2月出台强硬政策的原因。强硬政策的出台表明，北京和拉萨的保守派成功地利用拉萨事件来证明他们的看法：即达赖喇嘛已违反了邓小平提出的对话根本前提：西藏独立不能谈。然而，达赖喇嘛幕后操纵拉萨示威的初衷并不是企图搞独立，而是要向中国施加压力，使之妥协接受达赖的某些政治上的主张。但他的初衷被保守派加以错误的解释，并促使北京对中国与达赖的谈判采取强硬政策。

尽管我认为1989年是保守派战胜务实派的分水岭，但中国领导层各派都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独立不能谈，这是谈判的基本前提。但在同一问题上，各派还是有些区别的。保守派根本上拒绝在1950年以前西藏历史存在的某种独立并认为这是未来西藏独立的种子。务实派如邓小平、胡耀邦等大致赞同达赖接受1950年后的西藏事实，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在此基础上，达赖愿意谈判，使西藏与中国结成“联盟”地位。务实派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仅仅因为达赖认为1950年共产党接管之前西藏是独立的，而主张未来西藏独立，其可能性是极小了。原因在于：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强国，如果中国改善与印度和苏联的关系，外国军事干预援助西藏独立的可能

性不会出现。同时他们还认识到，西藏独立的思想难以一时消灭，而实现这种思想尚需必要的力量与合适的环境，但目前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党政军中的强硬派都是些大汉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历史上中国经常垂涎西藏，而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这一梦想。因此，对强硬派而言，消灭“藏独”思想是共产党人神圣的职责。

在中藏谈判中，强硬派与温和派关于1950年以前西藏历史的争论可能要延续下去。因为达赖喇嘛表示，他拒绝按中国人的愿望去修改西藏历史。[47]同时他还说：

> 中国人对我的声明产生了误解，我并不主张西藏独立。中国人说他们要发展西藏。这是件好事。与中国保持关系，我们西藏人会获益非浅。但是目前的自治毫无意义。如果目前的自治体制令西藏绝大多数人满意，就不能有如此广泛的动荡。[48]

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提出的方案旨在西藏建立一种与中国保持“联盟”关系的地方民主制度，中国负责西藏的外交与国防。这一新方案不仅要给予西藏一种半独立的地位（就象1720～1911年的中藏关系一样），而且要改变西藏自治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恰好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所反对的。这些人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已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达赖的“民主自治”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一路货色，与“西藏优越的社会主义相悖。”[49]苏联东欧的剧变对保守派而言，肯定于中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西藏问题上。苏东剧变也使中国领导人担心，如果不牢牢控制西藏问题，西藏会出现乱子。

达赖喇嘛提出的中藏“联盟”地位与北京为台湾、香港、

澳门设计的“一国两制”有相似之处。这两种体制都将主权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又保留大量的内部自治，包括建立和保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权利。事实上，1982年，西藏代表团在试探性的谈判中已提出按中共给予台湾“一国两制”解决西藏问题。但中国方面拒绝了这一主张，认为西藏问题完全不同，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早已在1951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予以解决。[50]但西藏代表团认为，由于协议是城下之盟的产物，而且中国当局在西藏背叛了“协议的每项条款”，他们不得不放弃十七条协议。[51]

正象我们所知，达赖派往中国的代表在很多问题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因为他们缺乏谈判的后盾力量；但在关于内外藏统一的问题上，始终坚持己见。1981年，嘉乐顿珠向胡耀邦首次提出了这一主张，1982年和1984年西藏代表团在北京对话中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在斯特拉斯堡建议和华盛顿“五点和平计划”中，达赖喇嘛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将来西藏人仍然会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内外藏是基于同一语言、宗教、文化与种族的民族实体。而且达兰萨拉当局的权力精英们包括达赖在内，有来自康区、安多的。他们竭力希望中国给予他们的利益同时能给予他们的家乡。

中国当局在许多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如西藏要求更多内部自治与统一，尽管中国起初拒绝了这个要求，但这也是需要进一步谈判的问题。中国甚至拒绝接触其他问题，如独立、民主政权、缓冲国、和平区等，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明显违反邓小平提出的谈判先决条件的。他们对达赖的“五点和平建议”，停止汉人移民西藏，在西藏高原停止核试验，尊重人权与民主自由等要求，一概拒绝。

依据邓小平、胡耀邦提出的政策方针，中国在北京的政府部门及其在新德里和香港驻外使馆与达赖喇嘛的亲信进行了一系列的个人外交接触。这些人包括达赖的哥哥们，达赖驻新德里的代表扎西旺迪。达赖的四个哥哥被特邀访问了中国，其母亲于1979—80年生病时，北京派了一名藏医前往达兰萨拉。达赖喇嘛任命扎西旺迪为西藏谈判代表团团长，前往日内瓦时，（尽管没有成行）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还为旺迪先生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这些外交策略都是为了争取流亡藏人政治结构中的占上风的战略性观点发生转变，以便促进达赖接受中国的条件，重返西藏。西藏代表确认，在香港与新德里进行的这些个人外交接触中，中国外交官与官员并没有什么新的建议或承诺，只是想努力澄清与[illegible]官方政策，并劝说西藏人接受中国的要求与条件。(52)

中国对西藏强人嘉乐顿珠特别关注。有人说他没有征求达赖的意见就在政治上擅作主张。嘉乐顿珠曾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培训，中美和解后美国从对西藏的卷入中抽身。嘉乐顿珠自1970年代初一直住在香港，伺机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值得一提的是嘉乐顿珠1978年首次在香港与中共代表接触也是一位名叫约翰·多芬（John Dolffin）的美国人安排的。此后他多次应中国邀请前往访问，达七、八次之多。最近的一次是在1989年，他代表达赖喇嘛参加班禅喇嘛的追悼会。

在美国人帮助下，嘉乐顿珠与中国领导人相处不错。他们认为他是一位合适的中间人。事实上，北京曾向达赖暗示，希望嘉乐作达赖的私人代表与中国人谈判。但遭到达兰萨拉的反对。它认为中国企图通过此举使中藏的对话限制在达赖

个人身上。中国人更欣赏嘉乐顿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比达赖更显得具有灵活性。嘉乐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内外藏统一，只有这样，他便同意并接受中国关于达赖返藏的前提与条件。

嘉乐顿珠的不同观点在流亡政府中产生了矛盾。且不说达赖与他这位失控的哥哥之间的矛盾，嘉乐与噶厦的矛盾就更大了。后者认为这位强人正在篡夺达赖喇嘛的特权。1987年9月，这一矛盾达到了顶点。那时拉萨发生了支持独立的游行。北京引用嘉乐顿珠的话，说他不赞成西藏独立的主张，并以此来反对西藏分裂主义和拉萨骚乱[53]，拉萨骚乱爆发时嘉乐正在北京进行两周的私人访问。1988年3月，噶厦在一份白皮书中，要求嘉乐澄清他在北京对中国方面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他只是在达赖与北京之间传递信息，而无权代表达兰萨拉并做出任何政治决策。[54]北京继续通过嘉乐传递信息。因此北京的战略是力图使他们与达赖的对话不具有任何官方和法律的色彩，而仅限于这位教主及其家庭的私人性质。但是，达兰萨拉企图使谈判国际化和合法化。

中藏谈判还在另一种非正式场合进行。1979～1988年，达赖与班禅通过西藏调查团来往了四封信件，通了两次电话。班禅的主要论点是他将在有限的范围内[55]为西藏人民的权利而斗争；达赖喇嘛应该努力维护流亡藏人的团结与文化特征；游行示威和反华言论势必加强中国领导层的保守派力量，间接上也不利于西藏的事业。班禅喇嘛与流亡藏人的最后一次接触是在1988年底的东京机场。他率团访问拉丁美洲，途经东京机场。在那里，班禅会见了达赖驻日本的代表白玛甲波。班禅表示支持达赖的斯特拉斯堡建议。

## 结论：对话的前景

十多年的接触对话后，中藏谈判可能还要继续下去。毫无疑问，对话已进入了“谈判前的准备阶段”。[56]——这是关于谈判的谈判。通过口头及书面的往来，双方已探明了对方的谈判底细，以及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只要双方真心还是可以缩小差距，求同存异，达成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因此，谈判前的准备阶段将影响中藏谈判的结果。通过公共舆论，[57]达赖已表示愿意妥协，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及中国在西藏的安全利益，但是北京却没有以相应的态度作出反应。中国一再表明与达赖谈判的诚意，其主要动力是要劝达赖“回归祖国”。然而北京始终坚持中国提出的谈判前提，而不愿作出妥协。中藏谈判表明，谈判不仅需要双方对不同的利益具有妥协的诚意，而且要求谈判双方力量对称，以保证妥协方案的执行。否则，力量强大的一方就会提出谈判的前提条件并强迫力量弱小的一方必须接受。但这于谈判的继续，只能是死路一条。在这样情况下，包括西藏人民在内，作为一个谈判的弱方，不平等的谈判者需要争取舆论的同情，以保持问题的永远存在。

应该指出，达赖虽然缺乏与中国进行平等谈判的力量，但他从西方对中国的广泛压力中得到了补偿。但可疑的是，西方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加强了对中国的道义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却在西藏问题强化了立场，以对抗西方。[58]这并不是说要求西方停止对华的道义压力，而是希望西方对西藏的支持上升为对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采取行动，从而影响中国对西藏问题政策。然而，在不久的将来人们是看不到这些事

情发生的。原因有二：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集团尽管目前对中国进行"和平制裁"，但仍然与中国保持非正式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仅仅是一个对其是否忠诚西方的考验，而不会真当回事。第二，西方，特别工业化发达国家认为他们在尚未开发的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不会为了西藏而葬送这些利益。

我们只考察了中藏谈判的"准备阶段"，目的在于恢复公正的谈判（即使没有平等的基础）。这需要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不仅美国，而且苏联（历史上对中亚细亚有过战略影响[59]）都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因为只有超级大国才能迫使北京对达赖作出让步。第二，目前，西藏的反汉活动仅限于拉萨，只有推动这一活动在全藏广泛开展，才能增强达赖对中国人谈判的力量。第三，如果中国民主化运动取得成功，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给予西藏更高的自治或半独立地位。真正民主的汉族人民不仅珍惜他们本民族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也会珍视西藏人民的自治历史和民族特性，尽管他们不会承认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利。

然而在可见的将来，上述三个前提条件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1986年以来中苏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逐步改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内外藏大量集结，限制了西藏抵抗活动；中国的民主思潮仅仅限于学生，而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保证中国的统一与强盛。

**注释：**

〔1〕见《西藏评论》1990年3月号第10—13页。

〔2〕A.汤姆·格兰菲尔德《现代西藏的诞生》pp.79—103，146—60。

〔3〕《中国报导》1987年1—3月号p.9。

〔4〕《达赖喇嘛文集》1982年达兰萨拉。p.51。

〔5〕〔6〕同上，p35，p.59。

〔7〕198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统治部副部长江平接见达赖三人代表的谈话，传递了中国的观点。

〔8〕1990年5月29日采访达赖代表扎西旺迪。

〔9〕“中国对外广播”第1卷108号，pp.Q3—6。

〔10〕我概括了中国人的五点建议，其中第三点原来涉及达赖定居北京一事，1988年却不提了。

〔11〕新德里达赖办公室1988年：达赖喇嘛与五点和平计划，第4页。

〔12〕同上，第5—9页。

〔13〕同上第6页。

〔14〕《西藏公报》1988年5—7月号，第2页。

〔15〕应该指出，达赖的斯特拉斯堡建议遭到流亡的青年藏人的强烈批评。

〔16〕同〔14〕。

〔17〕同上，第3页。

〔18〕在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是M·C·戈德斯坦长达898页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1989年伯克尼出版。

〔19〕《北京周报》1990、2月19—25日号，p22。

〔20〕同上，p3˙2。

〔21〕同上，pp.21—23。

〔22〕新华社电1981年9月30日。

〔23〕《国际研究》1988年第23卷第4期、第325页。

〔24〕采访扎西旺迪。

〔25〕〔26〕同〔7〕

〔27〕Amrita Bazar Patrika（加尔各答）1988年6月24日。

〔28〕中国驻新德里使馆消息，1988年9月28日。

〔29〕中国领导人暗示达赖应委派其兄嘉乐顿珠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加谈判。

〔30〕《西藏评论》1988年11月p.4。

〔31〕香港《文汇报》1988年11月25日。

〔32〕1989年3月31日，新华社。

〔33〕1989年4月12日，达赖驻新德里办公室的声明。

〔34〕《纽约时报》1989年6月28日。

〔35〕《香港快报》1990年5月9日。

〔36〕《印度邮报》1988年7月12日。

〔37〕同〔32〕

〔38〕《西藏评论》1986年7月号p.6

〔39〕同〔28〕

〔40〕《印度时报》1980年5月1日。

〔41〕《国际新闻综述》1987年11月3日。

〔42〕〔43〕同〔41〕p.16；p.17。

〔44〕同〔41〕1987年10月5日。

〔45〕同〔41〕1987年9月26日。

〔46〕同〔41〕1987年10月9日。

〔47〕1990年7月12日，与达赖的私人通信。

〔48〕《新闻周刊》1989年3月27日，p.56。

〔49〕同〔19〕p.23。

〔50〕印度报业托拉斯，北京，1988年7月11日。

〔51〕1988年7月9日，达赖驻新德里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

〔52〕这一观点与下面四段的观点是作者对西藏流亡政府

一位高级官员的采访（1990年11月22日）。该官员要求匿名。

〔53〕达兰萨拉：噶厦新闻，1988年，p.16。

〔54〕同上，P.viii，pp.2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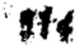
〔55〕文些有限范围，包括班禅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他在共产党宪法范围内起作用。

〔56〕见《国际杂志》1989年春季号。pp.232—37。

〔57〕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也表明了西方舆论的观点，即使不能说代表了全世界的舆论。

〔58〕对这种行为的解释，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可以找到先例。当西方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时，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强大动力促使中国人民自豪地站起来反对国际的侵略欺侮，保卫中国主权。这种历史分析可帮助人们理解，中国对外来干涉内政的观点。

〔59〕见《西藏评论》1990年3月号pp.10—13。



# 编者赘语

国外藏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是，关于西藏政治、经济和当代西藏社会的研究，只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才兴旺起来。这一时期的研究与国外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反共反华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国际上也有不少正直的学者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从事藏学研究。本集译文着重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外藏学的兴趣目前多集中于本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而且一般都与西藏问题有关。故编者加了一个书名《二十世纪的西藏》。恰当与否，望读者评价。

本集大部分文章是北京大学西藏研究小组的成员们组稿翻译的。我们这个小组是一个青年自愿者的学术小集体。大家有着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在本职工作与学习外，在藏学研究上花了不少心血。杨公素先生是我们的师长和导师，著名的藏学家。我们是在杨先生的引导下步入藏学领域的。所以请他老人家为本集作序。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本集中有些文章曾在国内的许多内刊或内部资料上发表，也选入了本集，充实了内容。对原作者及译者表示感谢。

涉及二十世纪西藏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对海外学者也

较为陌生。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阅读文章，我们把文章进行了分类，并在每篇文章之前作了“编者按”。

国外藏学界在研究西藏时，时常沿用英国人制造出来的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保护国”等概念，有时也称“西藏事实上独立”过或称西藏是一个“国家”。这些概念与观点我们在翻译中一般照译，以全其貌。但需要说明，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希望读者们自加批判地阅读。此外，因为原文写作时间不一，故涉及西藏的许多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

我们研究小组毕竟都是些青年人，由于水平有限，虽倍加努力，译文也免不了有庇漏之处，恳请藏学专家及读者们赐教指正。

北京大学西藏研究小组

张植荣

1992年11月